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项目批准号 19FDJB004

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 历史考察

作者姓名：何先成

工作单位：四川文理学院

二〇二二年九月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项目批准号 19FDJB004

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 历史考察

二〇二二年九月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1)
二、妇女运动及其相关概念	(5)
三、研究史回顾	(7)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15)
五、研究内容	(16)
六、创新之处	(17)
 第一章 川陕苏区建立前的川陕边区妇女状况	(19)
第一节 劳动主力中的阴盛阳衰与妇女的悲惨境遇	(19)
第二节 川陕边区妇女运动渐趋活跃	(25)
第三节 红四方面军入川与川陕苏区的建立	(29)
 第二章 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方式	(32)
第一节 革命纪念日和农历节令日动员	(36)
第二节 革命歌谣动员	(42)
第三节 媒介动员	(52)
第四节 会议动员	(57)
第五节 发布法令、文件、布告、条例、 规定或斗争纲领动员	(60)

第三章 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路径及效应	(68)
第一节 普遍建立妇女组织	(68)
第二节 提升妇女经济地位	(79)
第三节 发展妇女教育事业	(84)
第四节 提高妇女参政度	(96)
第五节 婚姻自由的实践探索	(105)
第六节 政治动员的效应分析	(110)
第四章 川陕苏区各种组织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	(117)
第一节 共青团、童子团、少年先锋队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	(118)
第二节 新剧团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	(122)
第三节 各级宣传队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	(129)
第四节 工厂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	(139)
第五节 医院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	(144)
第六节 运输队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	(147)
第七节 特殊组织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	(150)
第五章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	(152)
第一节 妇女独立团成立背景	(153)
第二节 妇女独立团详考	(155)
第三节 妇女独立团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178)
第四节 妇女独立团对革命的体验	(185)
第六章 川陕苏区的巾帼英杰	(204)
第一节 川陕苏区巾帼英杰的来源及群体形象	(204)
第二节 张琴秋对川陕苏区的贡献	(214)
第三节 部分本地巾帼英杰略传	(223)

第七章 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比较分析	(234)
第一节 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开展的背景	(237)
第二节 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共同点	(238)
第三节 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特色比较	(246)
结 语	(258)
第一节 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历史定位	(258)
第二节 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现实启示	(262)
参考文献	(274)

绪 论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十多块苏区并成立了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其中，川陕苏区亦称川陕革命根据地^①，是由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领导创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和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之一。川陕苏区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在其鼎盛时期，跨今川陕渝两省一市，包括通江、南江、巴中、万源、平昌、宣汉、达县、开江、渠县、大竹、城口、旺苍、苍溪、阆中、南部、仪陇、蓬安、营山、广元、昭化、剑阁、宁强、西乡和镇巴等川陕边区二十余县（市、区），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其中通江、南江、巴中、万源、平昌、旺苍、城口全域和宣汉、仪陇、阆中、广元、昭化的大部分，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其余各地为游击区。^②整个川陕苏区所辖区域的人口约500万，妇女占半数，她们在苏区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川陕苏区时期，由于战争环境恶劣，绝大部分青壮年男子都参加了红军，在前线战斗。中共依据川陕地域社会特征、川陕边妇女特点，采

^① 新中国成立后，川陕苏区又被称为“川北苏区”“川陕赤区”“川北赤区”“川陕革命根据地”“川北老根据地”“川陕边老根据地”“川陕边区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川陕区革命根据地”“川北革命根据地”“川北根据地”，等等。参见李健等：《川陕革命根据地党群关系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②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内部资料），1979年，第2页。

取系列举措动员广大妇女走出狭隘的家庭圈子，自觉投身于革命洪流，使其在与男性共同参与革命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解放，推动了革命战争的发展。她们在人力资源紧缺的前提下，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在后方参加田间劳动，担负着运输军需物资、抬担架、护理伤病员等繁重的后勤保障任务，从事医务、通讯、宣传、文化以及其他军事、政治工作，尤为突出的是，川陕苏区时期组建的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妇女独立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成建制的正规妇女武装，为粉碎敌人进攻，保卫后方与领导机关的安全，向敌人奋勇冲杀，前仆后继，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人民军队战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被称为中国乃至世界革命史上的奇迹。

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① 毛泽东从理论上深刻揭示了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在一切斗争中……女子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都绝不能成功。”^② 学界既有研究也表明，“在中国妇女身上，共产党人获得了几乎是现成的、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广大的被剥夺了权力的群众。由于他们找到了打开中国妇女之心的钥匙，所以也就是找到了一把战胜蒋介石的钥匙。”^③ 可见，妇女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川陕苏区广大妇女为支持战争、拥护红军、维护苏区，以及实现自身解放付出巨大牺牲，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巨大而独特的作用，突出表现了妇女在革命战争的坎坷道路上的奉献精神和战斗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妇女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赢得了社会对女性价值的承认和尊重。徐向前在分析红四方面军能在川陕边站得住脚的原因时，认为妇女革命的积极性很高，又能吃苦耐劳，是相当活跃、得力的革命力量。^④

因此可以说，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历史考察这一课题是中共党史、

①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页。

② 毛泽东：《妇女们团结起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③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395页。

④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页。

苏区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透过分析梳理关于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若干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口述回忆资料，对川陕苏区妇女在中共领导下进行的自我解放运动、中共在领导妇女运动过程中所选择的政治动员方式及路径、作为革命参与者的广大妇女是如何理解和体验革命、她们的情感因素在中共进行政治动员时扮演着什么角色、革命进程对于广大妇女形象的塑造产生了何种影响、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还原出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真实历史面貌，既可以为我们深入理解川陕苏区历史提供钥匙，拓展路径，又可以为新时代妇女工作的开展提供有益的现实启示。

（一）理论价值

1. 本书是学界首次较为系统全面地开展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研究的结果，有助于推动有关川陕苏区女红军文献资料和口述回忆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撰工作的进展，丰富川陕苏区史的内涵。

2. 专题研究川陕苏区妇女运动，有助于深化中共党史尤其是苏区史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研究有较为丰硕的成果，发表与出版不少论著^①，而对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全面性或专

① 主要成果有：〔美〕凯塞L·M·瓦尔克：《中国共产党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曾成贵译，《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年第2期；吴小卫、杨双双：《中央苏区婚姻制度改革与妇女解放》，《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林颂华：《中央苏区妇女问题初探》，《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张玉龙：《中央苏区时期妇女教育略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12期；李霞、尹士凤、邱祥莺：《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妇女解放运动》，《党史文苑》2009年第2期；苗伟东、江静：《中央苏区农村妇女参政叙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1期；汤水清：《乡村妇女在苏维埃革命中的差异性选择——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1期；胡军华、唐莲英：《论中央苏区的妇女政治动员》，《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郭璐：《论中央苏区妇女地位的演变》，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陈华：《中央苏区妇女社会生活的变迁研究》，赣南师范学院硕士论文，2008年；李如英：《中央苏区妇女权益保障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何莉：《中央苏区妇女教育问题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胡军华：《异军与正道——以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为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王景璐：《中央苏区妇女革命动员工作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张雪英：《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题性的深入研究则十分薄弱和滞后，这与川陕苏区特殊的历史地位很不相称。加之，川陕苏区是中共领导创建的最完整的苏区之一，其妇女运动的基本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一脉相承，但又有其独特之处。因此，以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作为研究样本，可以反映中国广大妇女群众解放史的某些特征，进而为川陕苏区史研究提供新视野和新范式。比如，本书通过大量未刊川陕苏区女红军口述回忆资料，从性别与革命的视角、政治动员的视角，对当年中共动员妇女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生产建设支援革命战争，川陕苏区妇女的精神风貌、生活方式、社会地位，川陕苏区妇女何以成为革命的坚定拥护者，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等系列问题作了原初式的重构，有助于中共党史尤其是苏区史的研究走向深入。

（二）现实意义

1. 有利于弘扬与践行苏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开展党史国史、红色文化等主题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将有助于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本书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助力，发挥革命精神的引领、凝聚、激励和教育功能，对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使其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苏区精神”^①，“要饮水思源，不能忘记革命先辈、革命先烈，不能忘记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②本书可以使原川陕苏区广大人民深切感受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从而积极投身于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伟大事业的现实行动。

2. 有利于把握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丰富妇女发展内涵。习近平总

① 习近平：《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11月4日。

② 《习近平在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强调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人民日报》2019年5月23日。

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① 对川陕苏区妇女运动进行历史考察，挖掘其现实启示，有利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把握新时代中国妇女工作的时代主题，丰富妇女发展内涵，促进社会和谐。

二、妇女运动及其相关概念

为了更为清晰地呈现本书的研究目的，有必要在此对书中涉及的妇女运动及其相关概念予以界定。顾秀莲主编的《20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对妇女运动做了定义，指出妇女运动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为争取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和家庭中享有与男性平等权利，为推动女性自身解放与发展而进行的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规模、以女性为主体的社会运动”。^② 在中共的革命话语中，妇女运动指“动员广大妇女群众来参加整个革命斗争，在整个的革命斗争中去获得妇女的解放”，而非“单独的妇女解放运动”，也绝不是“少数妇女同志的工作”。^③ 从中可以看出，妇女运动具有群众化的特点，其实质是中共所领导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一种党的附属工作”。具体而言，妇女运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共为最大限度争取革命力量，对所在区域广大妇女进行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目标的政治动员；二是妇女自身在融入革命、解决特定问题过程中实现自我地位提升和自我解放的实践。因此，有学者指出，妇女运动的完整表述应该是妇女解放运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6 日。

② 顾秀莲主编：《20 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 页。

③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1 页。

动，其主要目的是强调妇女解放的实践性与过程性。^①可见，妇女运动是中共革命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中共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党的各项工作中。正如原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所言，中国妇女运动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部分，妇女的前途命运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②

在党的各类文献中，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妇女工作在主体上存在差异。妇女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映的是妇女自身的发展变化，其主体是广大的妇女群众；妇女工作“以妇女为对象，以共产党领导的妇女组织为桥梁和纽带开展，以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推动妇女解放，促进男女平等和党的事业发展为目标的事务和活动的总称”，是妇女运动在中共的工作层面的表达形式^③，其主体是中共和中共领导下的妇女组织及妇女工作者。但它们在内容和内涵上大体相同，经常互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各种关于妇女工作的报告、决议案、大纲、口号、方针中的提法，其内容大多与妇女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如1928年7月10日，中共六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出现“妇女解放运动”这一词语。文件第一部分阐明“中国共产党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关系，但是在具体内容中多用“妇女运动”一词。^④在《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一书中，“妇女工作”出现388次，“妇女运动”出现237次，“妇女解放”“解放妇女”和“妇女解放运动”共出现53次。^⑤文字表述差异的背后，恰恰折射出中共关于妇女运动的阶级立场、理论依据和思想理念。

① 李静之：《论妇女解放、妇女发展和妇女运动》，《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6期，第8~9页。

② 顾秀莲：《加强中国妇女运动史研究 把握当代中国妇女运动时代主题》，《光明日报》2019年3月8日。

③ 耿化敏：《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1921—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63~265页。

⑤ 胡军华：《异军与正道：对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

三、研究史回顾

毋庸赘述，我们应该尊重和借鉴前辈学者的成果并进行认真消化吸收。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使自己的研究主题不致盲目无根，进而明确自己的研究起点和创新要求。因此，对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相关研究状况进行尽可能地梳理与评介是十分必要的。

学界对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川陕苏区史、红四方面军军史曾经一度是学界研究的禁区，严重影响了对红四方面军及其开创的川陕苏区的认识和评价。这一时期，主要是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川陕分团、一些地方上的党史研究机构和文物保护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部门做了一些对川陕苏区历史文献资料、文物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一工作具有艰难性和复杂性。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资料汇编或选编有：195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翻印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①；1957年黄自敬编撰的《川陕区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②；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编撰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③；1961年和1963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相继完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大事记初稿》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送审稿）》，但这两本史料并未公之于世，其间，该委员会还收集了大量的珍贵战史资料。这些资料为进一步开展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研究提供了条件。“文化大革命”时期，川陕苏区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处于停滞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内部资料），1954年。

② 黄自敬：《川陕区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③ 四川大学历史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9页。

状态。

第二个时期，改革开放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时期，各有关单位、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搜集、整理并内部发行或公开出版大批涉及川陕苏区若干专门问题（包括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文献资料、回忆录、口述史料。同时，在围绕川陕苏区史研究的宏观建构方面取得可喜成就。

乘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骀荡东风，1978年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整理编纂《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①，1979年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出版《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下）》^②和编印《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③，同年，四川省博物馆编印《川陕革命根据地石刻标语选编》^④。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指出：“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⑤这成为各界展开川陕苏区史资料搜集与学术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此后，关于川陕苏区史的资料汇编或选编、回忆录、口述史料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比如四川大学编印出版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⑥、林超主编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⑦、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出版的《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⑧和编印的《川陕苏区教育史文献资料选编》^⑨、杜中主编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⑩、李树棠编著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粮

① 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内部资料），1978年。

②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79年。

④ 四川省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石刻标语选编》（内部资料），1979年。

⑤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

⑥ 四川大学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⑦ 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⑧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⑨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苏区教育史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5年。

⑩ 杜中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政史长编》^①、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的《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②、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③、许世友的《我在红军十年》^④、北京部队红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编写组的《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⑤、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例选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烈士名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等战史资料。此外，还有原川陕苏区所在各县市的党史资料征集机构、档案局（馆）编辑并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或文史资料。^⑥ 上述这些资料广泛吸收了20世纪50年代川陕两省社科界的研究成果，充分听取了一大批在川陕苏区战斗或工作过的老红军高级将领、基层红军的建议，因而为研究川陕苏区妇女运动提供了重要材料，有助于推动有关川陕苏区史的学术研究走向深入。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全面反映川陕苏区史整体脉络的综合性或专题性研究论著。如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著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⑦、温贤美的《川陕革命根据地英烈传》^⑧、唐敦教主编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⑨、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⑩、蒲龙的《川陕苏区钱币》^⑪；又如元江的《对红四方面军

① 李树棠编著：《川陕革命根据地粮政史长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④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战士出版社1987年版。

⑤ 北京部队红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编写组编：《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⑥ 比如四川省通江县现代革命史资料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1辑（内部资料），1981年；中共通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2辑（内部资料），1982年；中共平昌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川陕苏区平昌县历史文献汇编》（内部资料），1986年。

⑦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著：《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内部资料），1979年。

⑧ 温贤美：《川陕革命根据地英烈传》，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⑨ 唐敦教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⑩ 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⑪ 蒲龙：《川陕苏区钱币》，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妇女武装若干问题的考订》^①、王玉兰的《川陕苏区妇女武装在革命战争中的特殊贡献及历史地位》^②、屈德骞的《中国第一女团长张琴秋》^③、邓均洪的《川陕苏区妇女武装产生的历史条件探》^④。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成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⑤，研究会先后召开四次有关川陕苏区的学术研讨会，出版有关资料、论著达 650 万字以上^⑥；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博物馆创办内部刊物《川陕苏区史》以及《川陕苏区历史研究》，刊发了一批有关川陕苏区史的研究文章和老红军的口述史料，成为当时学界研究川陕苏区史的一个重要阵地。

第三个时期，21 世纪以来，川陕苏区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成果更加丰富，研究内容逐渐深入，主题涉及政治动员、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事斗争、文化建设、社会变革等各领域。其中，日益涌现出一些研究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研究成果。下面分类述之。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在全国各大苏区中是十分突出的部队，是中国人民军队史上第一支成建制的正规妇女武装。关于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研究，主要代表性成果及观点为：徐峰以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为中心，从性别视角对地域社会与川陕边区妇女的革命性的关系、女性性别意识与革命之间的张力等问题进行探讨。^⑦ 另外，他以妇女独立团女战士剃光头为视角，阐释了苏区时期女性身体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⑧

① 元江：《对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若干问题的考订》，温贤美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39～347 页。

② 王玉兰：《川陕苏区妇女武装在革命战争中的特殊贡献及历史地位》，《达县地区党史资料》（内部资料）1989 年第 1 期。

③ 屈德骞：《中国第一女团长张琴秋》，《党史天地》1994 年第 8 期。

④ 邓均洪：《川陕苏区妇女武装产生的历史条件探》，《四川党史》1998 年第 1 期。

⑤ 川陕革命根据地研究会成立于 1979 年 5 月，结束于 1985 年 12 月，对川陕苏区的研究，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⑥ 温贤美：《关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总结》，温贤美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63～373 页。

⑦ 徐峰：《性别视角下川陕妇女的解放与革命——以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为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 年第 5 期。

⑧ 徐峰：《剪发与革命：苏区革命妇女的身体政治史研究——以妇女独立团剃光头为例》，《北京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

何先成运用大量文献和口述回忆资料对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是否由妇女独立营扩编而来，妇女独立团是否存在一团、二团，妇女独立师是否存在，长征时期、西路军时期的妇女独立团等问题作了考辨研究。^①同时，何先成对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女战士实现对革命的体验的路径，是否直接参加前线战斗，以及如何处理革命与性别意识之间关系等问题作了详细讨论。^②何先成还对川陕苏区时期妇女独立团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这一问题作了探讨。^③此外，王强、李单晶、罗大明的《从红军长征路线申遗看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历史贡献及时代意义》^④，何广华、何明圆的《妇女独立团武艺总教官何子友的烽火岁月》^⑤，吴丹、雷志敏的《妇女武装在万源保卫战中的独特作用及原因初探——以妇女独立团为例》^⑥，西华师范大学沈婷婷的硕士论文《川陕苏区女红军研究》^⑦，均从不同角度对妇女独立团作了探讨。

在川陕苏区妇女组织研究方面，学者主要集中对川陕苏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妇女组织的职能及作用作了探究。主要论文有：马建堂、刘长江的《川陕苏区时期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⑧，马建堂的《论川陕苏区时期的群众组织》^⑨，李敏、陈宇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党对群众团体

① 何先成：《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详考》，《苏区研究》2018年第2期。

② 何先成：《匹妇有责：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对革命的体验》，《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③ 何先成：《川陕苏区时期妇女独立团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

④ 王强、李单晶、罗大明：《从红军长征路线申遗看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历史贡献及时代意义》，《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1期。

⑤ 何广华、何明圆：《妇女独立团武艺总教官何子友的烽火岁月》，《党史纵览》2014年第7期。

⑥ 吴丹、雷志敏：《妇女武装在万源保卫战中的独特作用及原因初探——以妇女独立团为例》，《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⑦ 沈婷婷：《川陕苏区女红军研究》，西华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⑧ 马建堂、刘长江：《川陕苏区时期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⑨ 马建堂：《论川陕苏区时期的群众组织》，《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工作的领导》^①，刘英华的《浅谈川陕苏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②。

在川陕苏区妇女地位变迁研究方面，学者主要关注妇女地位的变迁、特点及作用。其中，西南交通大学叶芳的硕士论文较为新颖。文章认为妇女在政治方面的地位得到显著的提升，但在经济、文教卫生、社会观念等方面没有取得相应的进展。该文还从妇女史角度比较了苏区建立前后妇女地位的变化及其特点，并对整个川陕苏区妇女参军、参加劳动的过程作了分析，为川陕苏区妇女研究乃至整个苏区妇女研究开阔了新视野。^③ 另外，魏法谱对妇女在川陕苏区所起到的作用作了归纳。^④

关于川陕苏区时期中共对妇女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方面，学者主要探讨了中共在川陕苏区对妇女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举措、意义及局限性。相关的论文有李敏、赵红梅的《论川陕革命根据地党对妇女的思想政治工作》^⑤ 和祝秦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初探》^⑥。

研究川陕苏区妇女教育问题的代表性论文有吴丹的《川陕苏区妇女教育问题研究（1932—1935）》。文章认为，川陕苏区妇女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的一种强有力手段，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村妇女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为苏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⑦

还有一些学者以川陕苏区的妇女解放实践为主题进行研究。比如李涯《苏区妇女解放实践初探——以川陕根据地为例》^⑧、陈雪涛《川陕苏区的妇女解放与妇女歌谣》^⑨。文章认为，妇女解放激发了她们参政议政

① 李敏、陈宇：《川陕革命根据地党对群众团体工作的领导》，《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2期。

② 刘英华：《浅谈川陕苏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③ 叶芳：《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研究（1932.12—1935.4）》，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④ 魏法谱：《论妇女在川陕苏区中的作用》，《沧桑》2007年第2期。

⑤ 李敏、赵红梅：《论川陕革命根据地党对妇女的思想政治工作》，《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⑥ 祝秦：《川陕革命根据地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初探》，《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⑦ 吴丹：《川陕苏区妇女教育问题研究（1932—1935）》，四川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⑧ 李涯：《苏区妇女解放实践初探——以川陕根据地为例》，《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⑨ 陈雪涛：《川陕苏区的妇女解放与妇女歌谣》，《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的革命热情，她们用自己擅长的歌谣形式，唱出自己的爱与恨、苦与乐、觉醒与追求、翻身作主人的豪情和送郎当红军的柔情。

当然，还有大量篇名中带“川陕苏区妇女”但史料价值和学术意味均不明显（类似新闻报道）的文章，此处不再回顾。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有关川陕苏区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并没有停滞。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团队，在李健教授的带领下，与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合作，整理出版大型文献资料集成《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①四川文理学院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作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自成立以来，一直关注川陕苏区史的研究，并将其列入每年的课题指南中，其中包括川陕苏区妇女运动有关问题的研究。

由上述可知，目前学界关于川陕苏区史的资料整理、研究取得一定成绩，多以资料选编或汇编、著作以及学术论文形式呈现，涉及内容较为广泛，但关于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研究还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专题研究不深入，且多为“浅表性”的重复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整体性原则上，都未延伸到历史事件的核心，缺乏对新出版史料的发掘运用和剥笋似的层层深入分析，更少从政治动员的视角去研究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第二，川陕苏区的妇女武装最为勃兴，这里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支成建制的正规妇女武装——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这支妇女武装关注不够，现有的研究大多着眼于基本史实的梳理，以“介绍”、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或回忆录性质为主，且在一些重要史实上语焉不详，缺少学术意义上的专题研究成果。第三，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比较研究，就笔者管见所及，学界尚无相关研究成果。第四，研究成果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以“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立意的著作，有张雪英的《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②、胡军华的《异军与正道：对中央苏区妇

①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 张雪英：《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考察》^①等专著。然而，学界至今仍没有一部充分运用有关文献资料、口述回忆资料和档案资料来对川陕苏区妇女运动进行历史考察的专著问世。

基于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笔者不揣浅陋，拟在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搜集整理大量关于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文献资料、口述回忆资料和档案资料，在尊重历史，保持真实的前提下，以“川陕苏区”为时空，以“妇女运动”为切入点，通过史实的梳理与挖掘，探讨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背景，中共在川陕苏区对广大妇女进行政治动员的路径、方式及效应，川陕苏区各种组织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川陕苏区的巾帼英杰，以及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的妇女运动比较等问题，勾画出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全貌，彰显女子红军精神和女子红军文化的独特魅力，试图填补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专题研究的空白。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书将在广泛搜集有关文献资料、口述回忆资料和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牢牢把握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借鉴和汲取学界最新关于妇女运动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变换研究角度，加强多维度的综合比较研究，重点探讨在现有有关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研究成果中很难找到较为完整答案的几个重要问题。比如中共在川陕苏区对妇女的政治动员、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川陕边妇女的革命意愿与女性性别意识之间的关系、川陕苏区巾帼英杰的先进事迹及其贡献、川陕苏区各种组织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的妇女运动比较等，努力勾勒一部客观、全面的川陕苏区妇女运动史。

^① 胡军华：《异军与正道：对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二）研究方法

历史研究基本定理及方法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为史料学，专论史料之搜罗采集；其二为考证学，在鉴别史料以及确定事实性；其三为综合的观察，即在认识事实之意义及其间之联系性；其四则为叙述，系将所认识之事实，按其联系性表出之。”^① 本书拟采用的研究方法，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种：

第一，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在本书中，笔者充分利用了大量文献资料、口述回忆资料和档案资料。资料的多样性增加了“在许多假话中选择那较像真实的东西的技巧”的难度。^② 因此，决定了本书要在实证与考辨的基础上，以谨慎和谦卑的态度对待“原初”的历史，通过各种新旧史料互相参证的分析方法，“尽可能不在预设前提的背景下”^③，将川陕苏区妇女运动这一论题置于当时具体的环境中去考察，使其“本相”更加彰显。

第二，借鉴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书引入了一些政治学、社会学的方法，来对中共在川陕苏区动员妇女参与革命，妇女生活、生产及参政议政、参与公共事务、支援革命战争，以及妇女独立团等情况进行动态考察，弥补了单纯从川陕省委、省苏，以及红四方面军的文件、政策和制度层面去研究苏区史而忽略苏区各项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的不足。

第三，个案研究法。笔者花了大量笔墨探讨川陕苏区巾帼英杰的典型案例。通过对历史个案的透视，以期对于认识广大妇女在革命中的作用及地位，能够起到“一叶知秋”的效果。

① [德] 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上），陈韬译，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185 页。

② [意]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英] 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9 页。

③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 页。

五、研究内容

本书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大部分。其中正文分为七章，兹将每章的主要内容简要陈述如下：

第一章：川陕苏区建立前的川陕边区妇女状况。主要从川陕苏区建立前，川陕边妇女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以及阶级觉悟、革命意识等方面分析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必然性，即川陕边区存在对妇女压迫的事实，妇女具有反抗压迫的意识并通过组织采取实际行动，从而为笔者重点探讨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苏区后，中共有效动员妇女融入革命事业，以及妇女对革命的体验等问题张本。

第二章：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方式。川陕苏区广大妇女具有母亲、妻子和女人的身份角色资源，显示出巨大的能量，成为中共政治动员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本章主要从革命纪念节和农历节令日动员，革命歌谣动员，媒介动员，会议动员，发布法令、文件、布告、条例、规定或斗争纲领动员，对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方式进行具体而微的阐释。

第三章：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路径及效应。中共、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在川陕苏区对妇女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使川陕妇女的自我意识得到觉醒，点燃了她们投身革命的热情。本章着重从普遍建立妇女组织、提升妇女经济地位、发展妇女教育事业、提高妇女参政度、婚姻自由的实践探索等方面探讨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路径，并对政治动员的效应进行评析。

第四章：川陕苏区各种组织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川陕苏区大量党政军群组织中均设有专门做妇女工作的妇女组织或部门，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密切。不仅如此，在党政军群组织中的各级机构中还有大量妇女从事战斗和工作。本章重点对川陕苏区各种组织中的女同志及其在组织中发挥的作用进行阐述。

第五章：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主要围绕妇女独立团（营）成立和发展、妇女独立团是否由妇女独立营扩编而来、妇女独立团是否存在一团和二团、妇女独立师是否存在、长征时期和西路军时期妇女独立团、妇女独立团是否直接参加前线战斗、妇女独立团女战士如何处理革命与性别意识之间关系等问题，进行考辨与研究。

第六章：川陕苏区的巾帼英杰。对川陕苏区巾帼英杰的群体形象进行具体阐释，并通过个案描述与研究，展现川陕苏区的外来巾帼英杰与本地巾帼英杰在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贡献。

第七章：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比较分析。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的妇女运动进行比较研究，探讨其个性与共性。

六、创新之处

笔者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提出新解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视角新

本书试图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女性革命史、身体史和政治动员的视角，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一块重要苏区——川陕苏区的妇女运动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对学界存在意见分歧的问题充分展开讨论，力图保持研究的客观性，构建出一幅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鲜活图景。

（二）资料新

本书不仅使用近年来出版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一书，还参阅引用了大量四川省档案馆，以及巴中、通江、南江、达州、宣汉、万源、城口等市县档案局（馆）、党史办和方志办所藏的尚未公开出版的地方志、口述史料、回忆录、调查资料、报刊资料、档案资料、

文史资料、实物资料，这些资料大多是学界此前从未或很少运用过的。故仅就史料发现、发掘与使用的意义而言，其创新价值甚大。

（三）内容新

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川陕苏区妇女运动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特别是对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政治动员的路径、方式及其效应、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川陕边妇女的革命意愿与女性性别意识之间的关系、川陕苏区各种组织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川陕苏区巾帼英杰的群体形象、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比较等既往研究中比较薄弱的内容进行专题探讨。

第一章 川陕苏区建立前的川陕边区 妇女状况

川陕苏区建立前的川陕边区妇女在政治地位、经济生活和婚姻生活等方面处在社会底层，无自由可言。本章主要从川陕苏区建立前川陕边妇女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以及阶级觉悟、革命意识等方面分析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必然性，即川陕边区存在对妇女压迫的事实，妇女具有反抗压迫的意识并通过组织采取实际行动^①，从而为笔者重点探讨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苏区后，中共有效动员妇女融入革命事业以及妇女对革命的体验等问题张本。

第一节 劳动主力中的阴盛阳衰与妇女的悲惨境遇

川陕边地区，是指米仓山和大巴山之间的四川东北部和陕西南部的广大地区。这里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山高谷深、岗峦起伏。这一地区宜农宜牧的田地多位于大巴山南部地势比较开阔平缓的山区和丘陵地带，而大山老林地区则是土多田少，坡陡土薄，农作物生长较慢。这里交通闭塞，工商业很落后，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为主体的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现有史料表明，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当地除有几家由资本家办的小型兵工厂和用土法生产的小钢铁厂外，没有现代的工业

^① 关于妇女运动形成因素的论述，参见康国：《妇女运动的成立及要求》，《妇女杂志》1923年第9卷第1号。

生产，只有一些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生产。主要生产小型农具、酒类、火纸、土布、衣服、鞋袜、食油等。”^①“商业仅限于土特产品和日用品的供销，经营者以本地的小商贩为主，贩卖广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如粮食、盐、油、布、酒等而且资金微薄、经营艰难。较为大宗的贸易则多为外地商人经营（以渠县、南充、营山、汉中、合川等地人为多）。他们将本地药材、银耳、生漆、桐油、茶叶、皮毛、猪鬃等运往重庆、合川、汉中等地；将食盐、糖、布、绸缎、香烟药品、烧酒及其他的日用品输入。”^②据民国时期的《宣汉县志》记载：“农人之唯一收入为收获品，然正产之谷，除纳租外，存余几何？即为家人含哺鼓腹之资，不足者，则以冬季之豌、麦、胡豆，夏季之杂粮为补助，而洋芋、番苕尤为大宗，至少可供半季粮，然于经济无与也。所恃以活动经济者，或栽蓝子，或栽叶烟，或栽甘蔗，各视其土宜而定，最普通者惟种鸦片烟。”^③

其时，川北、川东北地区由田颂尧、杨森、刘存厚三个军阀控制。田颂尧控制通江、南江、巴中、仪陇、南部等22县，杨森占有广安、营山、渠县等地，刘存厚占据绥定（今达州市）、宣汉、万源一带。他们在各自防区内掌握着经济大权，为了维持战争过程中巨大的军费开支和腐朽的享乐生活，便残酷剥削民众，巧立名目强征各种捐税。当时，鸦片在全国各地属于“硬通货”，市场上的交易，多以鸦片议价。因此，各军阀就将鸦片税当作自己的生命线，强迫民众大量种植鸦片。民众种烟、售烟、吸烟十分盛行，致使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便染上了烟瘾，出现“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的景况。^④宣汉峰场场住户仅100余家，却有80家烟馆，80%的民众染有烟瘾，“那些地带的小孩，在从母胎下地后就非吹以烟气不可，否则即不易养活。因为他那母亲就抽烟，他是在母胎里就受上了烟毒的。”^⑤鸦片的吸食导致当地男人身体

① 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页。

② 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7页。

③ 庞麟炳：《宣汉县志》卷5《职业志·农业》，民国二十年石印本。

④ 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⑤ 《川北剿匪军事之概观》，《国闻周报》第12卷，1935年第16期。

羸弱，没有体力承担繁重的劳动生产。因此，妇女参加劳动比例非常高，成为家庭内外的主要劳动力。她们承担着春耕、夏种、秋收、冬砍、挑担、做饭及家里其他一切琐碎的事情。“除了生儿育女，还要烧火做饭，洗浆缝补，喂猪放牛。她们耕田、插禾、背柴、打草、挖地，是晚睡早起的家庭奴隶。”^① 当时川北流行一句俚语：“要吃通江饭，妇女打前战。”^② 徐向前对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所见所闻的这种劳动主力中的阴盛阳衰现象及原因作了细致的描写和分析。“田野里、山坡上，见到的多是妇女在劳动、砍柴、背粮、挑粪、耕田……有些妇女身后背着娃娃，照样干活。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的妇女从小就参加劳动，是主要劳动力。男人抽大烟的多，体力不行，家里家外的繁重劳动，便靠妇女来承担。”^③ 不仅如此，这一地区大男子主义盛行，不少男子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把家里屋外的事情都交给妇女做。据刘桂芳回忆：“十八岁，同白宗高圆了房，我们共同料理家务，可是这个白宗高好吃懒做，从不干活，一切事情都靠我。”^④

虽然川陕边妇女终年劳作，挑起了家庭生活和农业生产的重担，但由于川陕边地处偏僻的山区，政治、经济、文化落后，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以及把女子当作一种物品的观念贯穿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社会、家庭婚姻的各个方面，广大妇女遭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奴役、摧残、束缚、支配，使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婚姻状况等方面没有享受相应的权利，甚至连生存也常常受到威胁。

广大妇女在经济生活中没有做主权和过问权，处于丈夫的从属地位，“只有男州，没有女县”“马有龙头猪有圈，婆娘有个男子汉”就是当时

① 范青、陈辉汉：《陈昌浩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

② 李玉南：《要吃通江饭 妇女打前战》，中共通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2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75页。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151页。

④ 刘桂芳：《我特别爱唱〈戒烟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妇女政治地位的真实写照。^①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②

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川陕边妇女在婚姻上没有自主权，婚姻命运全由家长操纵包办，妇女即使再不如意，也不能提出离异。更为严重的是，川陕边长期普遍存在童养媳（“干女子”）这种畸形的婚姻形式。比如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南江县大河乡就有童养媳 248 人。^③童养媳是指有儿子的家庭，领养、抱养或买别人家的小女孩作为儿媳妇，待双方成年后由父母做主“圆房”成亲。关于童养媳制度产生的原因，1933 年聂辉扬在《安徽大学月刊》第 1 卷第 3 期发表的《童养媳在现行法律上之地位》指出：“童养媳制度……流毒之广，遍及各省，要为吾人所未为可否认者。究其发生，又大半基于经济之原因。盖养家方面，既可增加一人之协助劳作；又可节省聘财等费。生家方面，既可免除养育责任，又可节省粧奁等费。”^④1935 年，乔启民在《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长》一文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阐发：“关于童养媳的风俗……其流行的原因，大多由于经济的关系。就男家方面说，纳娶童养媳不用繁文缛节，甚为俭省，并且纳娶童养媳后，在家庭方面，无异增添一个劳工，或操作家事，或耕耘农田，所以纳娶童养媳是最经济的一件事。就女家方面

① 唐敦教：《川陕苏区的妇女》，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 年，第 269 页。

②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 页。

③ 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6 页。

④ 聂辉扬：《童养媳在现行法律上之地位》，《安徽大学月刊》1933 年第 1 卷第 3 期。

说，正当生计窘迫，维持匪易的时候，减少一个人口，即减轻一分负担，所以出嫁童养媳，不啻是救济农家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办法。”^① 由于童养媳在法律上处于无权地位，因此，她们过门后，命运悲惨，常遭公婆歧视、虐待，在家庭中不得不承担媳妇、奴婢和劳力等多重角色。她们从小当牛做马，经济上和人格上毫无独立性可言，过着非人的生活，命运十分悲惨。当时，丈夫打骂老婆，妇女受公婆打骂，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反抗或逃跑，会遭受非常残酷的惩罚。有的被毒打致残，有的被切开小腿肚子塞进盐巴折磨，有的被捆起来扔进河里淹死。^② 川陕边区童养媳这种悲惨境遇在有关川陕苏区女红军的口述回忆中处处可见，兹引数例，以见一斑。伍荣芳回忆：“婆婆稍有不顺心，就对我责骂和毒打，我身上的伤从来没好过。”^③ 王文珍回忆：“我在六岁的时候，就卖给一家富农当童养媳。每天从早到晚，凶狠的婆婆吆喝着，有干不完的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叫我干的活也重起来，如稍微不遂婆婆的心，轻则痛骂，重则毒打。我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是，凶狠的婆婆居然用烧红的火钳烫我的大腿，我还得咬紧牙关，含悲忍泪，继续干活。”^④ 杨清香回忆：“我八岁的时候就被卖给当地一户有钱人家当童养媳，从此再没有同父母见过面。我从早到晚却有干不完的事，稍有不顺婆婆的心，她张口就骂，伸手就打，轻则揪耳朵，重则脚踢加棍棒，我身上的伤痕从来没有间断过。”^⑤ 刘桂芳回忆：“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为干女子，（丈夫）白宗高好吃懒做，从不干活，一切事情都靠我。他又抽鸦片烟，一不顺心又打又骂。”^⑥ 周明回忆：“1924年，全家老小的生活处于极度贫困之中，一日三餐都无着落，父母无奈之下，含泪把刚满七岁的我送给了一个大户人家当童养媳，从此便开始了度日如年的生活。当时我虽小，但每天

① 乔启民：《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长》，《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期。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151页。

③ 伍荣芳：《红军总医院是张琴秋领导建立起来的》，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王文珍：《曾传六局长为我主婚》，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⑤ 杨清香：《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保卫后方》，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⑥ 刘桂芳：《我特别爱唱〈戒烟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都要干很多活，稍有差错就要挨打，身上总是青一块肿一块的。”^① 陈焕英回忆：“八岁那年，父母亲便相继去世，无奈之下，奶奶只好把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为了生活，我小小年纪就要砍柴劈柴，挑水做饭，还要剥猪草，摘棉花，推磨，经常推着推着磨就睡着了。”^② 刘坚七岁时被姑父卖给一个姓陈的财主家当童养媳，“她每日除要服侍好傻子男人外，白天还要放牛、拎水、砍柴、扯猪草、喂猪，夜间要纺线、搓麻绳，还得天天挨家公家婆的打骂。”^③ 刘立清十岁时，被父母送给一个姓李的人家当童养媳，“婆婆是个心狠手毒的人，常常虐待她。每天天不亮，她就要起床去挑水、割草、喂牛，然后做早饭。做完早饭，又要打扫屋子。她整天象牛马一样干活，吃的却是猪狗食。弄不好，还要遭到婆婆的责骂、毒打。”^④ 童养媳的悲惨境遇，一方面造成许多悲剧，妇女自寻短见的事层出不穷。李玉南回忆：“她们坡里做了，回家又要做繁重的家庭事务，一年苦得像头牛，到头来吃没吃，穿没穿，有时还要遭受男人的打骂。她们无路可走，有的悬梁，有的跳河，有的吞食大烟，悲惨的死；有的逃亡他方，从虎口出来，又投入到狼的怀抱。在旧社会妇女自杀成了家常便饭，每个村庄一年都要出现好几个。”^⑤ 另一方面，悲惨境遇也使她们具有勤劳、肯吃苦、反抗性强、渴求自由解放的特点，具有童养媳背景的女子后来大多数成为川陕苏区的革命者。吴朝祥回忆：“当时苏维埃机关的女同志一般都是童养媳雇农出身。”^⑥

川陕边妇女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川陕边区地处偏僻山区，文化教育素质落后。除了少数地主富家的小姐、太太有机会念书外，几乎都是文盲。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川陕边区文盲超过 90%，劳动妇女则

① 周明：《我到南江县宣传队当宣传员》，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陈焕英：《死也要跟着红军闹革命》，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曹光辉、蔡彦彪：《刘坚——在艰难中磨砺自己》，瞭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传》，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47 页。

④ 蒋志敏：《刘立清——智勇双全的女战士》，瞭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传》，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22 页。

⑤ 李玉南：《要吃通江饭 妇女打前战》，中共通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 2 辑（内部资料），1982 年，第 76 页。

⑥ 吴朝祥：《从通江到大藏寺》，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几乎百分之百是文盲。由于教育的不普及，她们的才智便不能得到开发，应有的知识和能力也得不到培养。

总之，川陕苏区建立前川陕边劳动主力中的阴盛阳衰与广大妇女所遭受的悲惨境遇，决定了她们具有反抗性强、渴求自由解放的特点。由此可见，川陕边妇女运动的发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节 川陕边区妇女运动渐趋活跃

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土匪等几股势力既相互勾结又相互斗争，使川陕边区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川北、川东北地区田颂尧、杨森、刘存厚三个军阀在各自防区内残酷剥削民众，烧杀抢掠，任意欺侮人民，强征、预征苛捐杂税，使得贫困农工，虽终岁勤劳，亦不足以缴纳捐税。其时，有句俚语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残酷现实：“穷人头上三把刀：租子重，贷利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穷人面前三条路：逃荒、反抗、坐监牢。”^① 比如在田颂尧的防区，仅就鸦片税一项，通江、南江、巴中三地每年共要缴纳 200 万两；在刘存厚的防区，乞丐还要出花子捐。^② 加上地主阶级、豪绅高额的地租、押金和残酷的高利贷盘剥，使得即使在丰年，川陕边区的农民也得吃上半年多的野菜、杂粮，过着牛马般的生活。有一首歌谣唱道：“糠菜就是半年粮，流离失所遍地跑。……一家几口无粮菜，地主逼债最毒辣。……不顾穷人衣与食，苛捐杂税整死人。”^③ 正所谓：“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④ 以通江苦草坝为例：“由于佃地人多，产量低于土地面积，与地主分后一半只能有半年粮，靠

① 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 页。

②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著：《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内部资料），1979 年，第 7 页。

③ 《歌唱十二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86 页。

④ 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 页。

推渡船，卖力背背，卖药材补助。吃的大部分是洋芋、玉米、荞麦，稻米多半为地主捣去了，或卖钱买盐吃去了，遇着荒年，或受地主迫害时，吃草根、葛根、神仙泥，乙卯大天旱，饿死人很多，不少人流浪外地，甚至人吃人。穿土布都不容易，经常穿的是襟吊吊，十多岁的大姑娘还没裤子穿。盖的是包谷壳（当时俗称叫冲壳子）也很多，住岩洞的农民更不少，农民根本就是无吃、无住、无穿的穷苦人。”^① 而在南江县大河乡，“一年平均只有五个月吃粮食。一般年成不吃野菜，粮食不够吃就去购买。贫农则差八月粮。一年每户只有十斤肉，每人年平0.8斤油，一般人一年平均五两盐。每人平均二年一套单衣，百分之三十的人没有棉衣。住草房的贫农占百分之九十五”^②。穷苦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副产品，有一大半都被“发财人”剥削去了，不仅如此，他们还要缴纳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川陕边区的农民在残酷剥削与压榨下，已到了“血竭脂枯”的程度了。徐向前回忆：“四川军阀连年混战，……群众生活却苦不堪言，简直贫困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围着块棕片遮身。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人们简直透不过气来。……山坡平坝的大片良田，被勒令种植鸦片，供大小军阀、官吏吸食和贩卖。……有些青少年甚至也染有抽鸦片的恶习，弄得骨瘦如柴，不成个人样子。土匪（当地人叫“棒老二”）猖獗，啸聚山林，经常打家劫舍，绑票杀人。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在军阀地主统治下，成了兵匪为患、烟毒遍地、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④ 徐向前的回忆真实地反映了川北人民在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多重剥削下的苦难生活，也反映了川北民众同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只要导火索出现，便会爆发出来。

① 西南师范学院调查组：《通江县永安乡典型调查材料》，杜中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页。

②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调查组：《南江县大河乡五社调查》，杜中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10~311页。

③ 静民：《各级经委会目前应做的几点工作》，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8页。

④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2页。

广大民众在倾家荡产也无法承担苛刻繁重的捐税时，他们便在川东、川北和陕南的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发动“吃大户”、吊打团总、甲长，以及大规模的抗捐抗税运动。这一时期发生在川东北和陕南地区的主要斗争有：1928年至1929年，王维舟、李家俊领导的川东游击军在万源县（今达州万源市）发动农民起义，后转战城口、宣汉一带，震动川北^①；1929年6月，共产党员旷继勋率领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在遂宁、蓬溪举行起义，转战南部、渠县、梁山（今重庆市梁平区）等县^②；1932年下半年，巴中大批饥民发动“吃大户”运动，通江发生大规模抗捐斗争，南江农民结队赴县城请愿反对田颂尧预征烟税^③；1932年11月南部县的升钟寺、保城寺一带发生二万余人的升保暴动，并组织成立四千余人的红色游击队^④；1932年汉中县（今陕西汉中市）民众发动抗捐税、打委员、打差人运动，其时，陕南西乡开辟游击区并建立红二十九军。^⑤

考察川陕苏区成立前川陕边妇女运动，应该“把她们置于特定的时空中去认识，基于她们所处的环境来解释产生这些行动的可能性”^⑥。川陕边广大妇女，由于长期的劳作与沉重的家庭压力，加之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没有自主权、文化上落后、生活上不如牛马，促使她们更具革命性和反抗精神，更愿意积极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斗争。这些构成了川陕边区妇女运动渐趋活跃的社会基础。正如徐向前所说：“群众受压迫剥削很重，迫切要求翻身解放，容易发动。特别是妇女，革命积极性甚高，能吃苦耐劳，是相当活跃、得力的革命力量。”^⑦

早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川东、川北和陕南的地下党组织就十分重

① 王维舟：《川东游击军的斗争》，《成都日报》1958年11月23日。

②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著：《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内部资料），1979年，第12页。

③ 《南江革命简史（初稿）》（内部资料），抄件现存于四川大学图书馆。

④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著：《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内部资料），1979年，第11页。

⑤ 贺长清：《关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条件》，中共宣汉县委党史研究室：《宣汉党史资料》第16辑（内部资料），2003年，第52~67页。

⑥ 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5页。

⑦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页。

视对劳苦妇女的发动和组织。妇女们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积极加入农会，参与抗租抗税、破仓分粮、宣传发动群众和武装反抗军阀、地主豪绅的斗争。比如，顺庆西区的妇女组织发动了系列斗争支援红四方面军，包括“到处发动砍豪绅富农的柴草”“放他们的田水到贫农田中去”“砍豪绅的树子的斗争”等。^①在斗争中，她们得到了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

其时，不少女子学校在宣传革命、启发民众觉悟、提倡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26年至1928年，巴中县立女子中学的学生连续三次参加了反军阀田颂尧“窝禁于征”“籍团扩军”“毫厘归分”运动，最终迫使田颂尧让步，撤销“巴中县禁烟查缉局”“通南巴联团办事处”和取消“毫厘归分”制。^②1930年1月1日，杨文局在达县女子师范学校成立的党支部领导下，同党内的一些老师、同学张贴标语、搞宣传，开展闹学潮等活动。^③1931年，汉中女师的学生自治会在中共陕南特委的领导下，创办刊物《冲锋》，传播马列主义，抨击军阀和地主豪绅；1932年“三八”妇女节，汉中女师学生印发三八妇女特刊，两名女学生被伪汉中公安局拘留，在汉中南郑引发了规模浩大的学潮运动。^④1932年，南江县高级女子学校的学生走上街头，将民族民主斗争同反对苛捐杂税斗争结合起来，宣传救亡图存。^⑤

这在众多口述回忆史料中也能够得到印证。冉崇华回忆，1923年，王维舟从上海回到宣汉县清溪场办新群女子小学传播革命思想，“即把大

① 《团四川省委关于顺庆西区游击战争的总结和布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

②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巴中县城学生运动》，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309页。

③ 杨文局：《回忆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妇女工兵营情况》，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生产历史回忆资料（1927—1949）》（内部资料），1990年，第133页。

④ 刘炳强：《陕南党的活动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309～310页。

⑤ 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伯冉海舫、二伯冉雨生找去当教师。王老首先向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教师宣传苏联革命的伟大胜利，并组织他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学习马列主义。阅读一些进步书刊，从而使他们逐渐懂得了一些共产主义的真理，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启发。父辈们思想上获得进步，首先就使我们姊妹得到熏陶：一是不再受缠足的痛苦；二是享受到兄弟们一样可以读书受教育的平等权利；三是不相信世间有什么鬼神。”^① 覃天佑回忆：“民国十八年黄金乡舒清泉创办惠迪女子初小，我便托人说情当了一个教员，在校内宣传革命。于五月四日，组织学生游行，并写了一篇小说，题目是《神农的后代》，大约几千字，是描写当时农民反对苛捐杂税，与军阀官僚作斗争的情景。”^② 罗高元回忆：“宣汉罗家坝进化高级两等小学校教员符其善、向文彬、王正朝等人组织学生演文明戏《打媒》，揭露包办婚姻制度。”^③

上述情况都充分说明，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前，中国共产党在川东、川北和陕南地区，有较好的革命基础，特别是广大妇女已逐渐具有革命意识。当时南江流传的歌谣：“今年闹款，明年造反，后年国民党就垮杆”，真实地反映了这一趋向。

第三节 红四方面军入川与川陕苏区的建立

1932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一万九千余人^④，在徐向前等同志指挥下，突破京汉铁路西征，突围漫川关，越秦岭，走关中，再越秦岭，南

① 冉崇华：《深切的怀念——我们家几位革命烈士事迹的片断回忆》，中共宣汉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宣汉党史资料》第5辑（内部资料），1985年，第97页。

② 覃天佑：《宣汉早期革命的记述》，中共宣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宣汉党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3年，第79页。

③ 罗高元：《普光乡革命之初起与独立营的成立》，中共宣汉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宣汉党史资料》第10辑（内部资料），1991年，第60页。

④ 徐向前回忆：“从我军被迫撤离鄂豫皖到川北立脚，历时两个多月，转战三千里。……先后共歼敌近万人，自己仍有一万四千多人，占撤出鄂豫皖时总兵力的四分之三。”《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0页。

渡汉水，于12月中旬抵达汉中西乡以南的钟家沟地区。这时，红四方面军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成都一带大混战，便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进军川北，并于12月底越过大巴山，进入四川边境，然后兵分三路。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十二师攻占川北的通江县城，方面军总部和军委机关进驻通江，立即成立由旷继勋担任主席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权组织的过渡形式，颁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政纲。接着红四方面军乘胜挺进，1933年1月下旬，攻克川北重镇巴中县城。2月1日，红七十三师解放南江。通（江）、南（江）、巴（中）的解放，为川陕苏区的建立开辟了道路。

2月7日，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召开。大会选出以袁克服为书记的中共川陕省委，宣告赤江、红江、赤北、巴中、南江五县县委成立，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发展党的组织与扩大红军》和立即召开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等决议。这次会议实现了党的统一领导，保证了革命的胜利发展，结束了由红四方面军前敌委员会领导地方党的状态。^①2月中旬，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通江县召开，会上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并正式成立以熊国炳为主席的省苏维埃政府。此后，各级正式的苏维埃政府机构相继普遍成立，标志着川陕苏区的正式形成。为巩固、发展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先后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发动的三路围攻，主动发起仪南、营渠、宣达三次进攻战役，粉碎刘湘集团组织的为期十个月的六路围攻，为粉碎“川陕会剿”、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江北进而发起广昭战役、陕南战役和强渡嘉陵江战役。在其鼎盛时期，川陕苏区“扩展到东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镇巴、宁强，纵四百余里，横五百余里，总面积达四万二千余平方公里，人口约五百余万。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八座县城，建立了二十二个县市的革命政权”。^②

川陕苏区的开辟、巩固和发展，直接有力地推动了妇女运动的开展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9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页。

并影响到妇女的方方面面。徐向前回忆：“红军到来，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男女同工同酬，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打碎了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使她们挺起了腰杆，见到了天日。就拿婚姻自由来说，同过去的封建买卖婚姻比较，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妇女们觉得自己的地位改变了，被当人看待了，生活有了希望。所以，她们的革命积极性很高，不愧是土地革命运动和反封建的先锋。斗地主、拥军、生产、戒鸦片烟、参加苏维埃和地方武装等活动，妇女都站在前列。”“有的妇女白天出来参加活动，晚上被封建家庭捆打、饿饭，第二天照样跑出来干。不屈不挠的精神，实在可嘉。她们在妇女组织领导下，担负起为红军做衣服鞋袜、看护伤病员、侦察敌情、运送粮食物资、代耕军属土地、动员扩红等任务，搞得十分出色，是党和红军的得力助手。”^①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页。

第二章 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 政治动员方式

动员是一个与革命及战争相关的术语。蒋方震的《新兵制与新兵法》是国内最早关注这一术语的著作，该书从军事及法制的角度阐述了动员的缘起、本义等。^① 其后，动员“从最初在军事学领域的运用转入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相应地，人们将动员分为国防动员、经济动员、社会动员、资源动员、政治动员等类型”。^② 政治动员是一种政治行为，指特定的政治主体为实现其在特定时期内的政治目的，以宣传、组织等手段，采取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措施，将各种分散的、个体的力量收拢、聚积起来，使潜在的革命者转化为现实的革命力量的行为和过程。^③ 它对应的是能够被动员起来的个体或群体在生命历程、人生态度与世界观等方面共享的普遍性或可传递性。

毛泽东对革命时期政治动员的概念、内涵及方式作了精彩深入的分析：“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

① 蒋方震：《新兵制与新兵法》，商务印书馆 1945 年版，第 53 页。

② 徐彬：《前进中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1921—1966）》，新华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2 页。

③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2 页。

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① 如果动员人民参加红军、拥护苏维埃只停留在口号上和理论上，对于调动其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工农、小资产阶级“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就都自动跟共产党走”。^② 正如西达·斯考切波的研究曾经强调，如果中共没有表现出是为农民利益而斗争，并且采取符合农民习惯的方式而行事的话，农民是不会情愿、更不会坚定地为红军提供人力、物力支持。^③ 对此，毛泽东对如何实行有效政治动员有精辟的论述：“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④ 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从争取民众支持，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一角度来看，政治动员与革命动员内涵是一致的。因此，有的学者在探讨中共的政治动员时常用革命动员来替代。比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革命，是中共通过革命动员来实现对政治体系的交流功能的控制。^⑤

目前，学界对苏区时期中共政治动员研究的绝大部分成果是以中央苏区为个案进行专题考察，少部分成果涉及闽西、湘赣、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而几乎没有涉及川陕苏区。^⑥

①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

② 张海鹏、赵庆云：《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26页。

③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05页。

④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37页。

⑤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181页。

⑥ 路阳：《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共政治动员问题的研究综述》，《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3年第4期，第85~97页。

中共一贯高度重视妇女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革命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确立在农村开展妇女运动的方针、政策和策略。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各级苏维埃政权围绕军事斗争这个中心，从妇女需求、保护妇女权益出发，采取一系列针对妇女的政治动员举措。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农民运动决议案》，肯定“吸收农民妇女群众加入斗争有极大意义”，“农民妇女乃斗争着的农民中最勇敢的一部分，轻视吸收农民妇女到运动中来，必然会使农村革命减少力量”^①。同时，在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对女工农妇运动作出具体指示，批评了过去忽视劳动妇女群众作用的特点，充分肯定了女工农妇是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的主力，认为党应该高度重视并积极吸纳广大农村妇女到革命队伍中来，特别是“在乡村经济中，妇女之异乎寻常的困苦状况，过分的劳动，在家庭习惯及社会风俗上完全没有权利等，成为吸收一般农妇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及夺取她们到革命方面来的条件”。并把妇女工作放到战略高度予以考量：“党必须在劳动妇女中作系统的、经常的指导，自中央直至支部，必须至少有一人负妇运之责，或视相当情形组织妇女委员会”，“农民组织之中要有妇女委员会，妇女必须参加苏维埃政权”。^②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妇女运动——尤其是女工运动，需要中央切实的注意。农委和妇委应加强自己的经常工作”^③。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提出：“不但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定出合理的不受一切宗法封建关系和宗教迷信所束缚的男女关系以及家庭关系的法令，承认结婚离婚的自由，而且还要实行各种保护女性和母性的办法。要发展科学和技术，使妇女能够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12页。

②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9—193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7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3页。

事实上有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的政治文化工作。”^①同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强调：“妇女群众在苏区中不需要独立的组织，应按照她们各自的社会地位分别加入各种社会团体。她们在这些团体之中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并且党团在这些团体中尤其是在工会贫农团中，应特别注意推举女工农妇的积极分子到指导机关中参加实际工作，以培养她们的作事能力。”^②1931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劳动妇女斗争决议案》将农妇运动引入土地革命，明确指出党在苏区妇女中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应加紧领导劳动妇女参加土地革命的斗争，利用各种组织的方式，尽量发展她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组织并领导她们拥护苏维埃红军，改良自己的生活”^③。

上述中共关于妇女工作的基本纲领和政策，为中共在川陕苏区对妇女的政治动员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川陕苏区广大妇女具有母亲、妻子和女人的身份角色，显示巨大的能量，成为中共政治动员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本章将运用有关文献和笔者搜集整理的川陕苏区女红军口述回忆资料，尝试对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方式进行具体而微的阐释。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苏区时期，“苏维埃政权之正确的组织，是要以党的坚固的指导为条件的”^④。“组织工作的意义，绝不止于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换言之便是：组织工作，即党指挥群众运动的枢纽。没有好的组织，便不能指挥广大的群众运动，运用党的政策；一个好的政策，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0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70页。

④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08页。

是要有好的组织才能实现的。”^①“从组织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基于政纲、党员、组织机构等等之上的政治角色的集合体。中共基于不断积累起来的各种政治资源以及体制力量，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确立起了主导地位，并在与国家政权机构系统建立一体化的政治关系基础上，支配着中国的政治动员过程。就组织自身所具的功能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内在的政治理念、组织原则非常有利于政治动员。”^②正如徐向前所说：“组织就是凝聚力，能把各种分散的、个体的力量，收拢、聚积起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高度的组织性，是无产阶级政党赖以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重要手段。”^③加之，当时战争形势严峻，党政军群关系界限不明显。这在川陕苏区也不例外。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川陕边区的革命力量较为薄弱，内生力量的缺乏，导致革命部队大规模进入后，原有的党组织力量难以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最初的推动更多地依赖于外来力量——红军。其后，在新成立的中共川陕省委的领导下，各项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和加强。故笔者讨论的政治动员发动者不仅包括中共，还包括中共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红四方面军和群团组织等。为不致引起混淆，在此特作说明。

第一节 革命纪念节和农历节令日动员

革命纪念节是一种政治仪式，有其特有的政治功能，并非简单的传统纪念的性质。利用纪念节进行政治动员，是中共政治动员的重要策略，也是中共表达政治主张的有利时机。^④1931年4月21日，《中央关于苏区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80页。

② 徐彬：《前进中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1921—1966）》，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

④ 陈金龙：《略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17页。

宣传鼓动工作决议》强调利用纪念节开展政治动员：“一切纪念节在苏区都应该是广大的宣传鼓动的日子。”^①中共还进一步明确规定纪念活动“必须与巩固与发展苏维埃根据地的争斗联系起来”^②。中共在川陕苏区对革命纪念节的利用相当到位，善于根据重要纪念节的特点，结合当时所面临的中心任务，通过印发宣言传单，发布布告，在大路旁边、十字路边、庙宇和公共游览地方书写标语口号，建立各种公开的组织等方式，对妇女进行重点动员、层层动员，激发她们的革命热情，使其在扩红、肃反、剿匪、筹集革命所需的现金、粮食、服装、武器和其他物资等工作方面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通常被作为“有着革命传统的节日，是鼓舞动员妇女的时机”。中共在川陕苏区每年都要召开“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大会，在大会前夕和大会期间，均会发表宣言、发布布告、提出口号。其内容一般是描述纪念“三八”节和妇女解放的重要意义，提出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主张和政策，激发广大妇女的革命积极性。比如1933年2月20日，在“三八”节来临之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川陕省委发布《纪念“三八”告白区劳动青年妇女书》提出：“我们川陕赤区的青年劳动妇女们，生活改善，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与男子一律平等，婚姻自由，女工和男子同样工作拿同等工资。在产前产后休息八个星期，农村劳动妇女都分得好田好地。”同时发出动员口号：“赤区和白区的劳动妇女联合起来！劳动妇女解放万岁！”^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川陕省委宣传部在“三八”节前夕，印发《为组织慰问队等告妇女群众书》，号召劳苦青年妇女积极拥护红军，组织慰问队、做鞋队、洗衣队，送自己丈

① 《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

② 《中央关于广州暴动纪念日的工作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9页。

③ 《纪念“三八”告白区劳动青年妇女书》，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7～1358页。

夫或兄弟去参加红军，消灭敌人。^①

川陕苏区时期，在举行与工人有关的重要纪念日時，中共会下达指示，号召各级党部结合纪念日的意义讨论妇女问题，动员妇女组织慰劳队、救护队到红军中去。比如1933年1月29日，在纪念“二七”和“二二五”前夕，四川省委作出指示：“在通南巴、城万、夔巫的苏维埃区域和红军巩固的向前发展当中，应实际的建立苏维埃内无产阶级的领导——引进雇农和手工业工人参加苏维埃政府，成立雇农工会，成立各乡村阶级工会，选派工人参加红军，建立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各级党部讨论女工运动问题，建立女工工作，尤其是成、渝、顺、嘉丝厂的女工工作，在‘二七’和‘二二五’中应建立起来。”^②1933年2月1日，四川省委宣传部提出各级部门要在“二七”纪念日時发布与保护女工有关的口号单。口号单具体内容为：“女工……与成年工人同样工作，应得同样的工资，同样的分红。”^③

五月有不少与革命或鲜血有关的节日或纪念日，比如“五一”为国际劳动节，“五三”为济南惨案纪念日，“五四”为青年节，“五五”为马克思誕生日，“五七”“五九”为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五卅”为五卅运动纪念日。故称五月为“红五月”。^④中共自成立以来就利用“红五月”纪念活动来进行宣传革命、组织群众等活动。^⑤在“红五月”这个特殊的月份，中共在川陕苏区也十分重视开展“红五月”纪念活动，一般会发表宣言、口号，作出专门决议，举行集会，提出有关妇女权益，妇女组织的职责、职能等内容，对于激

① 《为组织慰问队等告妇女群众书》，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委员会编：《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页。

② 《四川省委致各级党部信——关于“二七”和“二二五”纪念工作的指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6页。

③ 《四川省委宣传部“二七”纪念口号单》，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8～1239页。

④ 赵俊清：《李兆麟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1页。

⑤ 杨会清：《“红五月运动”的兴起及其运作模式（1921—1935）》，《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第84页。

发川陕苏区广大妇女的革命热情有着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红五月”纪念活动改变了以前将各个革命纪念日分开进行的做法，而是把整个月的工作纳入“红五月”纪念活动中进行部署，并通过借助群众运动的方式加以推动。1933年“红五月”前夕，川陕省委印发“红五月”工作决议案，提出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与各种革命团体组织统一起来。^①川陕省总工会形成并下发《川陕省总工会红五月工作计划决议案》，提出争取女工权益的任务，指出各级工会要在女工小组上详细地讨论决定工资。^②陕西省委印发“红五月”宣传大纲，提出维护女工权益的宣传口号：“女工产前产后休息一月，工资照发！”^③1934年4月，红三十军政治部印发《为纪念“五一”毛浴镇各机关工作人员联席会议决议案》提出，为粉碎敌人六路围攻，号召每乡组织一排人的运输队（不分男女），其他各级苏维埃则应更加努力进行动员，使加入运输队的妇女更多。^④同年5月，中共川陕省委印发《红“五一”工作的检查与对“五卅”工作的决议》提出，党对妇女团体、妇女工作的领导和具体工作是：“切实加强对工会、反帝拥苏大同盟、互济会、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领导，在目前战争中，这些组织都要加紧建立自身的群众工作，并动员自己组织里的群众来参加消灭刘湘的一切紧急工作，特别要抓住目前形势来开展苏区的反帝国主义运动。”^⑤

1933年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纪念南昌起义与红军的成

① 《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② 《川陕省总工会红五月工作计划决议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

③ 《陕西省委宣传部红色五月宣传大纲》，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1页。

④ 《为纪念“五一”毛浴镇各机关工作人员联席会议决议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页。

⑤ 《红“五一”工作的检查与对“五卅”工作的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77页。

立，决定自 1933 年起，将每年的 8 月 1 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① 纪念“八一”节时，一般要召开纪念大会，在大会之前，会表演一些红军歌舞来感染红军将士和普通民众。当时主要演唱的歌曲有《八月桂花遍地开》《红军最爱穷人家》《吃水不忘挖井人》《革命就要革到底》等。同时中共在会议前夕也会编发一些维护妇女权益的标语口号大纲，用于纪念日期间散发宣传。比如 1933 年，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印发《“八一”反对战争日和中国红军成立纪念日的标语大纲》，提出“女工做同样工作得同样工资”的口号。^②

反六路围攻期间，局势紧张，为动员妇女支援红军，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于 1933 年 11 月 29 日印发《纪念广暴消灭刘湘标语大纲》，动员劳动妇女“团结起来参加分田查田严拿敌侦探彻底消灭刘湘来纪念广暴！”^③

由于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川陕苏区大量男子参加红军，致使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广大妇女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川陕省委、省苏和红四方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及其下属各级组织为了发展生产，还抓住农历节令，广泛宣传鼓动妇女群众进行劳动生产，号召妇女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斗争。在春耕秋收时节，为保证前线红军将士军需供应、苏区各级机构的开销和用度，1934 年 3 月，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印发《春耕运动宣传要点》进行春耕宣传与鼓动，号召“在家的妇女姊妹，赶快挖地点冬粮，下一季不愁吃穿”^④。同年 5 月 12 日，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又印发《春耕宣传大纲》，号召广大妇女“鼓动自己的丈夫兄弟参加红军！妇女姊妹在家里，大家学会耕田、挖地、点粮食。多喂猪鸡吃油盐，女人和

①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4 页。

② 《“八一”反对战争日和中国红军成立纪念日的标语大纲》，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85 页。

③ 《纪念广暴消灭刘湘标语大纲》，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13 页。

④ 《春耕运动宣传要点》，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73 页。

男人一样犁田、耙田、撒种、栽秧”^①。对于如何开展生产运动,《加紧生产运动决议》指出:“第一,我们要动员广大劳动妇女起来加紧秋收斗争,不让一颗谷子落在田里,所有的粮食都要收在贫农中农手中,首先要把红军公田的粮收起来,要组织收割队。割赤区边境地主豪绅、富农的谷子。第二,要加紧秋耕运动,把赤区所有土地都开辟出来,种小菜,种粮食,不使一寸土地没有栽上东西。……第六,为保卫秋收,不让地主豪绅来抢我们的粮食,就要整顿地方武装,扩大地方武装,把各地赤卫军、游击队、战斗连等组织起来,扩大起来,家家制刀矛土枪土炮,加紧站岗放哨,戒严肃反,不让有一个敌人[混]进赤区来,破坏我们的生产,抢我们的东西等。”^②同时,各级群团组织也以实际行动积极领导女工开展春耕运动。比如1934年3月,川陕省雇工代表大会号召雇工会的女工部要积极领导女工加紧春耕运动。^③

在农历春节期间,川陕省委印发斗争纲领,动员妇女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斗争。1934年1月,红军第九十师政治部翻印的《中共川陕省委白区年关斗争纲领》提出:“反对□□□□□妇女!女工和男工干一样活路拿一样工钱!反对□□过好年!丫环年关领双薪,要主人家发新衣服过年!”^④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利用革命纪念日和农历节令日能有效地满足政治动员的需要,具有唤醒川陕苏区广大妇女集体记忆的重要功能,有助于增强她们对川陕苏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利用革命纪念日和农历节令日成为中共在川陕苏区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载体。

① 《春耕宣传大纲》,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6~1387页。

② 《加紧生产运动决议》,杜中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

③ 《川陕省第三次雇工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9页。

④ 《中共川陕省委白区年关斗争纲领》,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9页。

第二节 革命歌谣动员

革命歌谣是伴随革命战争而产生、发展的，是中共向群众传播其革命意识形态并实现政治动员的最有效、最直接的重要途径之一。正如有研究者指出，“革命文件不如革命口号，革命口号不如革命歌谣。”^① 其时，中共在川陕苏区根据实际情况，运用当地民俗中长期流行的曲调和通俗上口的民间语言或民歌俚语，采取广大妇女所熟悉的方式，收集、整理、改编和制作了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贯穿党的政策和意志导向的革命歌谣，形成了妇女在革命意识形态中的阶级话语。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 反映阶级对立、阶级仇恨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强调广大妇女贫苦的根源是“穷一富”“革命一反动”等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呼吁通过革命建立新社会。其时，改编创作了许多控诉旧社会妇女遭受的压迫和动员妇女起来改变不合理现状的革命歌谣。这类歌谣真实地反映了她们的困苦生活现状，极能抓住她们的注意力，激起其对旧制度的憎恨。

（1）描绘农村妇女与富家女子生活的悬殊。比如《妇女革命歌》（二）唱道：

今日好天晴，无事散散心，听我表个妇女们，贫富不均匀，有钱妇女们，出门一身新，擦油抹粉多是过，好似女观音。穷人妇女们，可怜又伤心，玩灯唱戏无我分，生活做不休。有钱妇女们，每日睡早晨，睡到申时下床边，打扮出房门。穷人妇女们，天天起五更，饭煮熟了天未明，吃饭上山林。有钱妇女们，吃喝好得很，每天三顿食不耽心，顿顿都有荤。穷人妇女们，可怜又伤心，无油无盐吃两顿。有钱妇女们，说话恼人心，

^① 王焰安：《红色歌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他说穷人是成命，运坏八字轻。穷人妇女们，自叹自苦情，只恨八字不如人，有冤无处申。有钱妇女们，享福太过分，那妇女永不穷，恐怕要遭瘟。^①

又如《穷苦妇女歌》中唱道：

正月里来是新年，穷村妇女真可怜，一年到头辛苦做，衣食二字都不全。二月里来是花潮，富豪女儿多妖娆，在家呼奴又唤仆，出门骑马又坐轿。三月里来是清明，穷富真是不平等，穷人也是父母养，富人未必是天生。四月里来大麦黄，穷人最怕这时光，麦粥麦饭未吃饱，饿得儿女喊爹娘。五月里来是端阳，农民妇女十分忙，煮熟麦饭把牛放，送条人口好栽秧。六月里来三伏天，劳动妇女受熬煎，衣服那有绸和缎，粗布衣服汗不干。七月里来七月七，穷人妇女常着急，娘婆两家穷得很，只靠纺纱度生命。^②

(2) 反映广大妇女受剥削压迫，控诉揭露国民党黑暗腐朽的统治，讨伐婚姻不公，描绘没有教育权、参政权，进而宣传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和男女平等。比如当时根据新葡萄仙子曲调传唱的《工农兵妇女歌》(一) 和根据可怜的秋香调编写的《工农兵妇女歌》(二) 唱道：

《工农兵妇女歌》(一)

我本是一女人，数千年痛苦都受尽。深闺阁中，好似犯罪人，教育莫闻经济无权，到于今，还有吃人旧礼教，一切自由都送掉。斩断礼教束缚，打倒封建势力，若不这样，永做奴隶！^③

① 《妇女革命歌》(二)，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9页。

② 《穷苦妇女歌》，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1页。

③ 《工农兵妇女歌》(一)，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8页。

《工农兵妇女歌》(二)

可怜的妇女，妇女，妇女，妇女要革命。公婆他打骂你，丈夫他也压迫你，还有那旧礼教也来束缚你。公婆他享福了，丈夫他自由了，妇女你的自由呢？你的平等呢？他呀，每天只在黑暗里，养儿、烹调、缝衣、洗浆，受气的妇女，挨打的妇女，累死的妇女，可怜的妇女。^①

根据苏武牧羊调创编而成的《青年妇女歌》唱道：

青年妇女真可怜……男子受教育，女子不相干，婚姻不自由，父母来包办，这些痛苦都是社会制度的不全。^②

根据扇子调改编创作的《妇女歌》(三)唱道：

三从四德真可恨，旧礼教捆死人。
穿耳缠足与擦粉，妆丑怪被人轻。
看起这是不平等，那把妇女当做人。
政治经济我无份，教育法律佑干净。
怎么男子这样重，怎么女子这样轻。
更有一事残忍，好不叫人脑壳痛。
既要终身父母定，不该把我变卖银。
倘若青年丈夫死，娘婆二家喜在心。
娘家他说要表礼，婆家争讲几多银。
若是娘家穷的很，一直送到婆家门。
若是婆家难得混，好像多了我一人。
自己法度自己命，帮取富人做佣心。
你看自己想一想，再不革命怎翻身。
铲出一切买卖式，取消一切包办□。

① 《工农兵妇女歌》(二)，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8页。

② 《青年妇女歌》，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委员会编：《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5页。

赶快参加来革命，或当赤工或红军。^①

《妇女革命歌》（一）唱道：

妇女真可怜，几岁把脚缠，筋骨都折断，痛苦实难言。
婚姻不自由，父母来包办。不到十二三，就往婆家搬。
男子受教育，妇女不相干。知识也没有，一切不能干。
政治和法律，说是男子汉。这样看起来，封建要推翻。
妇女来革命，也要掌政权，打垮豪绅们，平等才实现。^②

《婚姻歌》唱道：

过去媒人来说媒，那管脚躄和眼瞎。父母做主就算数，硬要女嫁他。这样结的婚，逼死多少人，不是去扑河，就是去跳井。出了共产党，婚姻得解放。妇女翻了身，婚姻自主张。^③

2. 反映广大妇女抛弃传统的恋爱观，把崇高的爱情和革命利益结合起来的动人场景。当时川陕苏区战斗频繁，中共多次开展“扩红”运动，动员青壮年参军支前。因此，出现了许多紧扣革命主题，以“劝”“送”开头，描写广大妇女把革命利益置于个人利益、家庭利益之上，从过去的思夫到鼓励丈夫参加红军和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争取早日胜利归来再团圆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歌谣。比如《穷哥穷妹心连心》唱道：

不爱金，不爱银，不爱官家有钱人。穷家哥儿爱穷妹，苦男苦女结深情。穷哥穷妹心连心，手拉手儿跟红军。^④

《白布手帕四面花》唱道：

① 《妇女歌》（三），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8页。

② 《妇女革命歌》（一），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8页。

③ 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通江党史资料丛书》第6辑（内部资料），1984年，第196页。

④ 《穷哥穷妹心连心》，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8页。

白布手帕四面花，一颗红星中间扎，有了红星心里亮，等死等活嫁给他。^①

《我送情哥当红军》唱道：

情哥哥，心上人，我送情哥当红军，几时砸烂旧世界，几时你才回家门。^②

《送郎参军》唱道：

风吹七里香，么妹送情郎。哥哥当红军，临别情意长。路上多保重，寒冷添衣裳。男儿打天下，生铁炼成钢。穷人要解放，英雄上战场。盼你凯旋归，我俩配鸳鸯。^③

《送郎当红军》唱道：

弯弯路，密密林，妹送情哥当红军。打双麻窝子送给你，穿起麻窝子好行军。弯弯路，密密林，妹送情哥当红军。国仇家恨要牢记，冲锋杀敌向前进。弯弯路，密密林，妹送情哥当红军。妹问情哥几时回，红了全国看亲人。^④

《我等百年心不变》唱道：

妹送情哥下四川，消灭刘湘打江山，你当红军九十九，我等百年心不变。^⑤

《胜利归来哈哈笑》唱道：

不要郎的花花轿，要郎去把革命闹。不要郎的绸缎袄，要

① 《白布手帕四面花》，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0页。

② 《我送情哥当红军》，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67页。

③ 《送郎参军》，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9页。

④ 《送郎当红军》，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0页。

⑤ 《我等百年心不变》，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0页。

郎去操枪和刀。不要郎分手把泪掉，要郎胜利归来哈哈笑。^①

《十劝我郎当红军》唱道：

一劝郎，你且听，我劝我郎当红军，月亮弯儿月，红军主张为穷人。二劝郎，要知道，现在革命正高潮，月亮弯儿月，国民党命难逃。三劝郎，要认真，跟着红军闹革命，月亮弯儿月，共产主义多光明。红军不比军阀们，月亮弯儿月，穿吃一律都平罗等。四劝郎，你放心，优待条例说得明，月亮弯儿月，田地有人来代耕。五劝郎，冲向前，要把敌人消灭完，月亮弯儿月，家务事情我承担。六劝郎，要小心，站岗放哨多留神，月亮弯儿月，切莫放过那敌人。七劝郎，要勇敢，不顾生死冲向前，月亮弯儿月，快些占领全四川。八劝郎，多宣传，鼓动白军齐哗变，月亮弯儿月，活捉刘湘杀人犯。九劝郎，莫迟慢，跟着红军好好干，月亮弯儿月，要当英雄和模范。十劝郎，意志坚，干到全国红旗展，月亮弯儿月，那时夫妻大团圆。^②

《参加红军歌》（一）唱道：

妻：上前叫声夫，听我说明白，想起来从前受尽多少苦，夫妻们一天做到黑，到头来还是无米无衣服。

夫：从前受的苦，真是说不出，皆因是共产党来与我做主，到现在有了共产党，过去的痛苦一概都解除。

妻：共产党真正好，穷人喜不了，那田地和政权人人都得到，倒可是那强盗，还未来打，刘湘贼他妄想再来赤区闹。

夫：刘湘他算啥？老子不怕他，我们青年热血正当洒，大家去参加红军拖枪打，努力去打那贼子就把台来垮。

① 《胜利归来哈哈笑》，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1页。

② 《十劝我郎当红军》，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2页。

妻：我夫说的话，当真去参加，你去参加要把心放下，家庭中自有你妻来掌拿，切莫够念你妻和小娃娃。

夫：我心早放下，你们莫记挂，我今去后你们也要造成革命家，大家努力切莫害怕，杀尽那强盗，快乐转回家。

妻：好好好好好！我夫去得了，为了全世界你要努力搞，顶好青年同志们，大家去参军把贼狼来除消，除尽那贼根我们有责任，个个青年参加莫迟钝，实现那全川首先胜利，杀尽那国民党才得享太平。^①

此外，还有《劝郎当红军》《送郎当红军》《十二月叹郎》《调兵歌》《送郎歌》《送哥当红军》《叹郎歌》《十二月探郎》《十把扇儿》《杜鹃花开迎哥哥》《十二把扇儿》等歌谣也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②

3. 反映川陕苏区广大妇女拥军、拥护共产党、拥护苏维埃，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参加苏区政权管理，支援红军的场景。比如《短短麻绳情意长》唱道：

三根麻线一般长，织根腰带送情郎，红军哥哥莫嫌短，短短麻绳情意长，见绳好比见我心，捆尽天下活阎王。^③

《打双草鞋送红军》唱道：

打双草鞋送红军，根根谷草穷人心。穿上登山山让路，穿上过水脚不沉。^④

《红军歌》（四）唱道：

妇女联合红军呀！草鞋、布袜拿到红军手中发，不是红军

① 《参加红军歌》（一），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3页。

② 这些歌谣的具体内容详见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62~1776页。

③ 《短短麻绳情意长》，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8页。

④ 《打双草鞋送红军》，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8页。

我不给他。^①

《工农掌政权》唱道：

十月里来小阳春，妇女同心多齐心，组织做鞋洗衣队，送夫送弟当红军。^②

4. 揭露国民党反动本质，争取“白军”投诚红军。比如根据十想调改编创作的《劝郎回头歌》，以男女对唱的方式展现了一位妇女劝身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丈夫投诚红军的情形。

妻：好郎君，相亲爱，郎君今日离别我，心中真难过。我的郎，心中真难过哟喂！

夫：郎当兵，莫奈何，断口绝粮日难过，不当没法活。我的郎，不当没法活哟喂！

妻：听说是，官长恶，三操两讲勤务多，累死又累活。我的郎，累死又累活哟喂！

夫：卡士兵，亏伙食，两顿稀饭不能吃，官长吃好的。我的郎，官长吃好的哟喂！

妻：扣洋饷，修洋房，买起田庄接婆娘，只管好福享。我的郎，只管好福享哟喂！

夫：到冬天，受寒冷，身上穿的烂巾巾，冻得真要命。我的郎，冻得真要命哟喂！

妻：一打仗，真骇人，逼着士兵去拼命，官长后面跟。我的郎，说起真痛心哟喂！

夫：打死的，士兵们，成千成万埋一坑，说起真痛心。我的郎，说起真痛心哟喂！

妻：白军苦，说不完，劝我郎君回头转，另寻别事干。我

① 《红军歌》（四），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9页。

② 《工农掌政权》，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7页。

的郎，另寻别事干哟喂！

夫：听人说，红军里，官长士兵一样的，胜过亲兄弟。我的郎，胜过亲兄弟哟喂！

妻：军属们，分了田，代耕队帮你来包干，有吃又有穿。我的郎，有吃又有穿哟喂！

夫：牺牲了，有价值，为了穷人争口气，世代不忘记。我的郎，世代不忘记哟喂！

妻：学军事，学文化，能文能武谁不夸，不当睁眼瞎。我的郎，不当睁眼瞎哟喂！

妻：红军里，好处多，劝我郎君干这个，纵死也快乐。我的郎，纵死也快乐哟喂！

夫：红军好，白军糟，我的心里早知道，现在当兵你莫焦。打仗子弹往天上放，待机约伙拖枪往红军跑。^①

5. 反映妇女参加革命的歌谣。比如描写广大妇女参与站岗放哨查路条的《放哨歌》唱道：

四更五点钟，太阳往上升。女同志去放哨，盘查路行人。盘查路行人。远看看不见，近看又无人。东看看，西看看，还是不见人。还是不见人。耳听脚步响，来了一个人。背洋枪，穿武装，你看多荣光。你看多荣光。同志你且听，你是哪部分？从哪来，到哪去，干的啥事情？干的啥事情？女同志你且听，我是老红军。从陕西，到四川，去剿蒋匪军。去剿蒋匪军。你是老红军，小妹子不放心。路条子，拿出来，妹子看分明。妹子看分明。果然是老红军，请你多关心！麻烦你，大半天，去剿蒋匪军。^②

6. 宣扬妇女解放的歌谣。比如《妇女解放歌》唱道：

① 《劝郎回头歌》，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5～1826页。

② 《放哨歌》，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8页。

一更出厨房，心中自思量，昔年礼教太不良，女子受冤枉。
从小就缠足，一生不出屋，三从四德真残酷，坐在黑地狱。

二更纺棉纱，本是做人家，丈夫平日将奴骂，说我连系他。
足小不能行，遇事靠别人，坐在家中本是真，只好不做声。

三更进绣房，坐在踏板上，无言无语脱衣裳，心中自思量。
于今世界上，妇女得解放，明天就把男样装，女子（天）[添]
了光。

四更睡在床，与夫来商量，我们大家得解放，好与你帮忙。
丈夫喜洋洋，喜得抽巴掌，你替我来帮点忙，我也（占）[沾]
点光。

五更天大明，床上扒起身，靸着鞋儿往外行，不做婆啰人。
天变挑得水，天晴（坎）[砍]得柴，生活忙了我又来，夫妇俩
和谐。

公婆也爱我，我也爱公婆，大家齐来做生活，出进人手多。
伯伯小叔在，同住也无碍，轮今建个新世界，大家要亲爱。^①

这些革命歌谣大部分取材于本乡本土，说的是妇女们自己的事，讲的是革命道理，符合妇女心理要求，通俗易懂，简洁直率，朗朗上口，易记好学，一唱便会，具有巨大的革命号召力。通过革命报刊的刊发，以及革命队伍的宣传和教唱，中共有效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唤醒了广大妇女的革命意识，发挥了动员、组织和影响广大妇女为革命事业服务的作用，她们积极参加革命，拥护红军，支持苏维埃，争取婚姻自由、教育权、参政权，创造男女平等条件。

革命歌谣服务于革命运动，从革命的情感动员的角度充当着革命斗争的武器，具有革命性、战斗性和政策性，通过表达广大劳动妇女拥护革命、拥护党、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的心声，颂扬苏区军民鱼水深情和欣欣向荣的新生活，诉说阶级仇恨，描绘革命的理想蓝图等阶级话语，为川陕苏区军事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① 《妇女解放歌》，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8页。

此外，作为革命歌谣动员的重要补充形式，中共还通过创作与演出戏剧、话剧等方式，激发广大妇女做到团结和相互支持，如川陕省苏维埃创作的话剧《慰问》就是关于20岁的赵记松母妻鼓励赵记松及其堂弟赵记林参加红军的故事。^①

第三节 媒介动员

一、报刊动员

川陕省委和苏维埃政府十分注重以报刊的方式进行动员。川陕苏区党政军群各级组织创办发行的报刊有23种。^②其中，川陕省委省苏机关报是《川北穷人》，后来，该报停刊，川陕省委、省苏创办发行各自的机关报，川陕省委机关报是《共产党》，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是《苏维埃》；红四方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机关报是《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是《干部必读》，此外，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省政治部还出版有《战场日报》，可能是《红军》报的前身^③，红四军政治部主办的《红星》，红九军政治部主办的《红旗》，红三十军政治部主办的《赤化全川》，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办的《红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川陕省委机关报是《少年先锋》，副刊是《赤色儿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办的《经济建设》，川陕省总工会机关报是《斧头》，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办的《血花》，省工农医院政治部主办的《小日报》。另外，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还不定期出版《红军画报》，各军、

① 《慰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2~1820页。

②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报业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③ 张之华：《排难创新的写照 不胜不休的记实——介绍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报纸》，《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

师发行的战斗《捷报》等。^①从报刊种类看，除了有党、政府、军队、共青团的机关报，还有专业性的报刊。这些报刊均为手刻油印。

这些报刊紧紧围绕党政军群的阶段性中心工作，刊登了不少中共、苏维埃和红军维护妇女权益的各项决议、方针政策、法律文件、斗争口号纲领以及介绍有关妇女运动开展情况的文章。这些文章语言朴实生动，易为妇女所接受。比如1933年11月23日《共产党》第20期介绍了广元县十月革命节期间妇女加入妇女独立连的情况。^②1933年12月1日《共产党》第22期刊登的《川陕第三次党大会广暴纪念日开幕》中提到，在1933年12月11日举行的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将讨论妇女运动列为主要议程。^③1933年12月6日《红军》第27期也对此作了宣传报道。^④1934年2月6日《共产党》第43期刊发署名文章《怎样才能彻底消灭刘湘》，号召妻子劝丈夫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⑤1934年1月1日《苏维埃》第21期刊登周光坦在川陕省土地委员会会议中的报告《平分土地与消灭刘湘战斗任务》，劝说广大妇女支援红军，拥护苏维埃，“妇女个个要到沿途去优待彩病号，妇女要到沿途去捉侦探，妇女要组织侦探队去肃反，[我们]要坚决把富农多余的粮食农具征发出来。……妇女要送自己的丈夫参加红军。那个妇女要不让自己的丈夫参加红军，（他）[她]便是想做断头鬼，想帝国主义、国民党来杀（他）[她]”。^⑥1933

① 张之华：《排难创新的写照 不胜不休的记实——介绍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报纸》，《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沈果正：《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报刊》，《新闻研究资料》1987年第4期；李中一：《刻写〈共产党〉报的回忆》，洪荣华、王明渊、朱宗玉主编：《红色号角：川陕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页。

② 《在大会上扩大党员团员》，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4页。

③ 《川陕第三次党大会广暴纪念日开幕》，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1页。

④ 《中国共产党川陕第三次党大会紧急动员消灭刘湘》，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6页。

⑤ 何志余：《怎样才能彻底消灭刘湘》，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1页。

⑥ 《平分土地与消灭刘湘战斗任务——光坦同志在全省土地委员会会议中报告》，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44~945页。

年8月23日《干部必读》第41期发表陈昌浩的《培养干部的提案》宣传培养妇女干部的苏维埃学校。^①1933年8月28日《干部必读》第43期刊发《赤北县工作情形和错误的报告》批评了赤北县妇女会形同虚设的情况。^②1934年2月22日《少年先锋》第35期表扬了总经理部女工厂捐助大洋十八元零十串支援革命的先进事迹。^③1934年10月7日《少年先锋》第87期详细介绍并表扬了赤北劳动妇女捐款捐物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的模范事迹。^④

这些报刊的发行渠道畅通，发行网络比较健全，极大地确保了宣传动员的时效性、广泛性和丰富性。曾直接参加川陕省委机关报《共产党》油印、出版工作的李中一回忆：“一、当时苏区邮政系统比较完善，省、县都设赤色邮政局，区、乡设代办所，大多数报刊都是通过邮政发行的；二、由工作队（组）自己带到各县、区、乡去；三、红军和地方武装战时还有专门的发行渠道，保证把报刊迅速送到前方；四、各级党和政府设有发行科，建立有健全的发行网络，负责把上级的文件、报刊发送到读者的手中；五、各地书店也发售报纸……总之，在正常情况下，苏区的报刊发行都能做到快速、及时。”^⑤

中共在川陕苏区通过报刊对广大妇女进行政治动员，提高了她们的思想觉悟和革命意识，极大地拨动了她们的革命心弦，激发了她们的革命热情，对于川陕苏区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标语动员

中共历来重视通过各类标语来开展宣传工作。标语具有直观明了、

① 《培养干部的提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6页。

② 《赤北县工作情形和错误的报告》，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42页。

③ 《援助开滦罢工的热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8页。

④ 《赤北劳动妇女拥护□□□□》，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1页。

⑤ 李中一：《刻写〈共产党〉报的回忆》，洪荣华、王明渊、朱宗玉主编：《红色号角：川陕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3页。

成本不高、简易便捷、明白易懂、富于鼓动、视觉冲击强等特点，对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群宣传效果显著。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指出：“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① 川陕苏区的标语分为石刻标语、墨书标语、粉笔标语等，而石刻标语可以说是其时中共政治动员工作上所独有的一大特色。

川陕苏区的大部分区域属于丘陵地带，山高林深石头多，当地石匠也多。因此，中共川陕省委、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十分重视通过镌写石刻标语来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1933年11月《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决议》要求：“各级苏维埃要组织宣传队，对上级来的宣传品要切实散发出去，并向群众解释，马上进行在各石头上刻标语。”^② 此后，各地纷纷召开会议，贯彻落实《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决议》精神。同年12月，川陕省巴中道召开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形成的《川陕省巴中道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决议》指出：“各级苏维埃要组织宣传队、贴发队，把宣传品切实张发出去，要普遍张贴在深山老林去，并马上在各石头上刻标语。”^③ 西北军区政治部在部署白区的工作时强调：“在白军经过的道路上多多〔刻〕些石字标语。”^④ 为此，川陕苏区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组织专门的“钻花队”、镌字队，“在山岭石崖上，牌坊石门上，以及石桥栏板上”^⑤，镌刻了数量众多、简短有力、通俗易懂的石刻标语，其中有不少涉及妇女工作、保护妇女权益、妇女解放的内容。比如红四方面军在广元镌写了“男女平等！”；在苍溪镌写了“妇女在政治上经济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② 《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页。

③ 《川陕省巴中道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页。

④ 《消灭刘湘——紧急关头的紧急工作》，四川大学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5页。

⑤ 刘瑞龙：《红四方面军文艺工作略谈》，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56页。

上文化教育上与男子一律平等!”^①；在巴中、平昌、达县等地镌写了“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②。

除石刻标语外，还有粉笔标语和墨书标语。川陕苏区时期写得最多的标语是“共产党不杀好人，只杀反革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拥护红军”“红军万岁”等。^③ 1933年11月23日《共产党》第20期刊发《对广暴六周〔年〕纪念工作决议》指出：“要组织张发队、粉笔队，有组织的写标语，将传单发给群众。”^④ 徐向前回忆：“部队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满街满墙，都是我军张贴的传单和涂写的标语”^⑤。粉笔队将一些由川陕省委、苏维埃和红军等各级组织印发的反映保护女工、维护妇女权益的红色标语，用土红、木炭书写在大路边、十字路、庙宇和公共游览地等民众常聚集之地。据陕西汉中市文史工作者左汤泉调查，红军入陕进川所经之地城固、小河口、上元关以及西乡的钟家沟等地，刷写了大量墨书标语。^⑥ 据巴中市史志工作者王志雄调查，在南江县下两镇铁尖村周雪平家墙壁上书写有“推翻国民党，解放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万岁”两幅墨书标语；在南江县双流乡学儿梁村郑家大院写有“坚决反对保守思想不爱学习的孬人!”的墨书标语。^⑦

中共在川陕苏区通过标语动员的方式，宣传了党、苏维埃和红军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地启发了广大妇女的阶级觉悟。她们积极参与党的活动，执行党的政策，成为川陕苏区巩固和发展的坚强后盾。

① 四川省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石刻标语选编》（内部资料），1979年，第80页。

② 四川省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石刻标语选编》（内部资料），1979年，第81页。

③ 刘义先：《我们到处写禁烟标语》，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对广暴六周〔年〕纪念工作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

⑤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3页。

⑥ 左汤泉：《川陕苏区革命文化史料陕西汉中部分述评》，《川陕苏区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⑦ 王志雄：《川陕苏区宣传工作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97页。

第四节 会议动员

一、召集群众大会

群众大会可以加强群众的政治教育，严密群众的组织，动员和教育群众。毛泽东对群众大会的动员作用作了高度的肯定：“村的群众大会，是极能够教育群众、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应该把它看作一种重要的动员与教育群众的方法。”^① 召集群众大会，动员群众有具体方法和策略：“A、先派人择定地点预备讲演台及各种应备的设备。B、事先须贴布告定何时何地开会。C、派所有宣传队出发于开会前到各地号召群众，或打锣或吹号，或用留声机来号召群众均可。D、预备议程及应通告之提案并拟定几个切合实际的口号。E、准备讲演人，讲题要先规定并通知。F、尽可能的找当地懂得普通话的人做翻译。G、台上不要多人上去，要留人在台下招呼。H、散会后宜进行个人谈话，征求群众意见。并选择先进勇敢分子介绍入党。”^②

“四川为封建遗孽的老巢，妇女所受的压迫和痛苦，十之八九必然是富于革命情绪而尚待启发。”^③ 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只要有喘息之机，川陕苏区必定召开诸如妇女会议、节日表彰大会、座谈会、报告会、现场会、专项动员大会，集中广大群众（包括妇女）于县、区、乡、村苏维埃所在地，对之进行动员。《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规定村苏维埃的职责：“经常召集全村群众大会和十家代表会议，传达上级苏维埃的各种决

① 毛泽东：《乡苏怎样工作？》，《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② 红四军前委宣传科：《宣传须知》，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279页。

③ 《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央档案馆、四川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年—1927年）（内部资料），1984年，第113页。

议和指令，解决全村发生的一切问题。”^① 杨茂德回忆，苏维埃政府经常召开群众大会。^② 张永芳回忆：“每到一个地方，先召集苏维埃干部研究，再定时间定地点召开群众大会。”^③ 在群众大会上，一方面，中共非常注重对广大妇女的口头宣传，抓住她们实际生活中的可怜事实，正确引导很多妇女陈述其遭遇的苦难。“在最初一次的妇女大会上，经过戒烟的宣传后，她们表现了出人意表的热忱，那次到会的妇女虽有不少吸烟的，但一致诉说她们所受着的痛苦。有的说她仅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因为丈夫无钱购烟，竟将儿子出卖了。有的说她的儿女病了，因为他们夫妻都吸鸦片，以致没有钱医治，结果死了。有的说她仅有一条长裤，竟被她的丈夫拿去换烟吸，使她很久的时间无法出门。有的说她家因为吸鸦片欠了债不能还，欠了税无法缴，又打不起官司，结果把田地典卖光了，丈夫和儿子逃往陕甘去了，至今不知下落。她们这样互诉痛苦，弄得多数到会者号啕大哭起来。她们发誓彻底拥护戒烟。”其后，妇女成为戒烟运动的急先锋。“在通江县所举行的一次妇女戒烟群众大会上，有五千以上的妇女参加，其中有些是从很远的乡村赶来的。”^④ 另一方面，中共宣传员给广大妇女教唱反映党、红军和苏维埃路线、方针、政策的歌曲，以提高她们的思想政治觉悟。马本才回忆：“我记得在旺苍坝东河附近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张教导员组织群众，教唱《参军歌》，教妇女群众唱：‘送郎送去当红军，打倒土豪闹翻身，全家都光荣。送郎送在大门口，双手接住我郎手，实在也难丢。送郎送在大门外，叫声我郎莫贪财，早早早回来。送郎送到房儿边，我为我郎点支烟，外出解口干。’”^⑤

处于群体中的个人，因从众心理影响，易于让群体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从而表现出明显的集体心理。换言之，个体在群体中试图追寻集

① 《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页。

② 杨茂德：《那时苏维埃经常在毛浴开群众大会》，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张永芳：《长胜县扩红工作受到了川陕省的表扬》，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

⑤ 马本才：《张教导员组织群众教唱〈参军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体认同，以提升个体生命的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集体的依赖。中共召集群众大会，运用正确的策略和方法，使广大妇女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达到显著的政治动员效果。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动员后，妇女能够按照党的意志自觉地汇入革命的洪流中，在斗地主、拥军、生产、戒烟运动、参加苏维埃和地方武装等方面成为先锋力量。而这种场面，也正是革命时代的特征。

二、召开专门的妇女大会

在严峻的军事形势之下，川陕省委、省苏以及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高度重视妇女大会的政治动员作用和教育作用，通过妇女大会来领导劳动妇女斗争，争取妇女利益。这一时期，川陕苏区专门组织召开了三次全省妇女代表大会，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亲自或派代表出席。川陕省委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于1933年9月15日在通江县召开，区、乡和部队的参会代表共约300多人。省委、省苏领导袁克服、熊国炳、余洪远、傅钟、张琴秋等同志出席大会并讲话。会议主要议题是动员妇女进行革命斗争，并贯彻执行川陕省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婚姻条例》，讨论妇女怎样解放，实现与男子在政治上、经济上平等的问题。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于1934年3月8日在巴中召开，参会代表400余人，省委书记周光坦和李维海、刘瑞龙等同志出席大会。会议主要议题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妇女工作和贯彻中共川陕省委决定的《妇女斗争纲领》。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于1934年9月在巴中召开，参会代表近400人，会期4天。会议主要议题是为了动员劳动妇女积极配合红军粉碎“川陕会剿”。^①

其时，各地苏维埃也纷纷召开妇女大会。比如赤江县在1933年10月

^① 刘坚：《我在红军里》，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184页。

和12月25日分别召开妇女党团员大会^①和全县妇女大会^②；1933年12月25日至28日，江口县召开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③

第五节 发布法令、文件、布告、条例、规定或斗争纲领动员

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随着川陕省委的成立，为有效进行政治动员，围绕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召开了党和团的代表大会，省苏及各级苏维埃大会，工人、妇女、青年、地方武装和红军的大会，提出关于动员妇女拥红护军、拥护苏维埃、保护妇女权益、发挥妇女组织作用的各项具体工作。川陕省委、省苏、红四方面军及其下属各级组织将会议形成的决议和审定的文件、法令、规定或斗争纲领予以印刷公布，并要求付诸实践，实现“党的决议和口号于群众中”^④。

在严峻的军事形势下，川陕省委召开会议审定通过《关于妇女工作》的文件，对妇女工作的开展提出具体要求。因这份文件意义重大，兹摘录于下：

一、细心研究劳动妇女的痛苦与要求，提出具体的纲领。发动广大的劳动妇女参加整个阶级斗争；查田地、查阶级、肃反、改造苏维埃等斗争；特别是领导雇工、贫农与红军家属的妇女参加查田队与反富农斗争等等工作。妇女一样的参加各种革命团体，苏维埃贫农团、工会、反帝拥苏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等。

① 《赤江县连日召开各种会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9页。

② 《为动员群众消灭刘湘，各县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和其他各种会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6页。

③ 中共平昌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平昌县大事记（1921—2011）》（内部资料），2012年，第13页。

④ 盛继红编：《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0页。

二、加紧对女工部的领导。动员广大女工加入工会。发展大批女工党员，特别是广元背煤炭的女工和丝厂中的女工。

三、耐心的教育说服广大劳动妇女群众参加消灭刘湘的激烈的战争。最近期内完成妇女独立团。各县组织一妇女侦探队到白区去侦探敌情，破坏敌人后方；组织看护队、慰问队、洗衣队；妇女参加运输队、担架队；在后方办招待处。男子在前方打仗，女将在后方煮饭送饭、站岗放哨。妇女鼓动自己的丈夫、兄弟大批去参加红军，完成党提出完成二万新红军的计划。

四、在消灭刘湘的紧急动员中，各地妇女积极的参加拥护红军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动员大批劳动妇女做鞋袜、草鞋来拥护红军，募集每人二百文的捐，购买一切物资来送到前方去慰劳红军，尤其是慰问医院的彩病号。鼓动热心忠实的女同志到医院去担任看护工作。经常的派遣慰问队到前方和医院中去。

五、敌人不仅用武力来进攻我们，同时又想用经济封锁来给我们许多物质上的困难。我们的妇女一定要普遍的参加生产，把粮食多多的点起来，到处发展合作社运动，发展苏区经济。

六、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一定要各乡各村组织起来。我们的同志，一定要亲自到乡下、厂里去接近广大的劳动妇女，在广大劳动妇女中做实际工作，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成为广大劳动妇女的组织，成为劳动妇女特殊利益的斗争[工具]。领导广大妇女参加阶级斗争，特别要为优待红军家属而斗争。一乡一村之中，劳动妇女都能在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里面，解决许多困难问题；学习共产主义，学习团结，学习斗争，得到娱乐与学习的机会。

七、党要大大加紧文化教育工作，提高妇女的政治水平，启发劳动妇女的阶级觉悟，动员广大（下缺）^①

^① 《关于妇女工作》，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7~1218页。

中共川陕省委根据《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劳动法令（草案）》中关于保护女工和妇女的条文，结合川陕苏区的实际情况，召开会议审定颁布《妇女斗争纲领》，对苏区妇女、女工的切身利益提出具体要求。其全文如下：

（一）妇女的

- 一、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与男子一律平等！
- 二、妇女有结婚、离婚的自由！
- 三、劳动妇女与男子同样有分得土地权利！
- 四、劳动妇女有组织为自己谋利益的妇女会、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自由！
- 五、劳动妇女有参加政权机关的权利，与男子同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六、劳动妇女有参加和组织工会、农会及一切社会团体的权利！
- 七、雇工苦力妇女应增加工资和改良待遇！
- 八、青年妇女与男子同样有受教育的权利！
- 九、反对包办婚姻！
- 十、反对买卖婚姻及童养媳制！
- 十一、反对多妻妾、蓄婢制度！
- 十二、反对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旧家庭的束缚！

（二）女工的

- 一、女工与男工应得同样工资！
- 二、女工不做粗重、妨碍身体的工作和夜工！
- 三、反对虐待女工、轻贱女工！
- 四、女工产前后休息八星期，工资照给，另给补助费、医药费！
- 五、女工月经五天内停止工作，工资照给！
- 六、雇主要为女工设置婴儿院等，哺乳时间至少一小时，

每次距离不得过三小时，停工时间工资照给！^①

《妇女斗争纲领》肯定妇女在革命中的地位，规定了妇女的各项权益，提出男女在政治、经济、教育上平等；婚姻方面，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一夫多妻多妾及蓄婢制度，提倡男女婚姻自由，女子有结婚、离婚的自由；提出妇女有参加、组织社会团体的权利。在《妇女斗争纲领》中还制定了保护女工的举措，比如男女同工同酬，反对轻视女工，女工产前产后，生理期、哺乳期的优待（工资待遇问题）。可以说，《妇女斗争纲领》是一份全面解决妇女实际问题、满足妇女要求的文件，为妇女运动指明了斗争目标和方向，与《婚姻条例》《工人斗争纲领》一起构成妇女运动的行动指南。

1933年6月，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红军与地方武装决议（草案）》，提出把在纪念“八一”节前扩大一万新红军作为川陕省委、省苏的中心工作。为完成这项任务，中共动员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群团组织拥护红军，号召她们组织宣传队进行宣传鼓动工作。^②川陕省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指出：“坚决执行劳动法令，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女工。……女工不得做重活路。”^③1933年12月11日，在反六路围攻的关键时期，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将“妇女运动”作为大会的讨论议题之一。^④张国焘向大会作了《为保卫赤区，消灭刘湘而战》的大会报告，号召在战争时期，各地按县为单位或区为单位积极组织脱产的妇女侦探队。积极动员各乡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支援红军作战，鼓励妇女加紧生产。^⑤

① 《妇女斗争纲领》，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156页。

② 《红军与地方武装决议（草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③ 《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④ 《川陕第三次党大会广暴纪念日开幕》，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1页。

⑤ 《在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张国焘同志的演说词——为保卫赤区，消灭刘湘而战》，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33页。

其后召开的川陕省巴中道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再次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各县要大力成立脱离生产的妇女侦探队、妇女独立团等组织，动员广大妇女到白区侦察敌情，帮助保卫局肃反。^①在反六路围攻期间，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区政治部发布布告，提倡男女在经济、政治、教育上平等，宣布废除一夫多妻、实行一夫一妻制，废除娼妓。^②1934年9月的《川陕省第二次全省地方武装大会决议案》指出：“把全苏区的男女老少把连武装起来……男女游击队要到处打游击，打到敌人后方去。”^③《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广元县第一次党团代表大会决议（草案）》提出，广元党今后在动员妇女运动方面的具体工作是：“切实检查劳动法令执行，增加工资，实现八小时工作制，对……妇女工人的生活改善。”“对劳动妇女的组织和领导：（一）将各乡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赶快组织起来，已成立的要整理好；（二）提高妇女文化教育政治水平线，热烈来参加苏维埃政权；（三）反对过去妇女不能与男子平等的错误倾向；（四）反对打骂妇女的旧家庭；（五）铲除封建势力和旧礼教，要实行苏维埃婚姻条例；（六）妇女要自动组织慰问队，去慰问红军及医院彩病战士，组织洗衣队、缝衣队等来配合红军行动。”^④同年11月14日中共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开展游击战争的决议》，强调动员妇女参加地方武装、妇女团体的重要性，并部署动员妇女开展游击战争的具体工作：“发展妇女游击队和妇女独立团。”“赤区雇工、贫农、中农在十六岁到廿三岁的把连参加少先队，二十三岁到四十岁的把连参加赤卫军，不问男女都须参加。”“召集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协会的会议，进行热烈的鼓动，号召群众起

① 《川陕省巴中道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页。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军区政治部布告——为坚决消灭刘湘事》，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2页。

③ 《川陕省第二次全省地方武装大会决议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9页。

④ 《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广元县第一次党团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202页。

来保卫赤区，参加赤少队。”^① 同年 11 月 26 日苍溪县委召开会议审定发布《从十一月廿四号到十二月廿四号一个月工作计划》，其中第五条是关于成立女工农妇组织的详细计划：“五、成立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协会。（一）十二月二号开全县妇女大会，一号到会。……（三）群众组织女工农妇协会、贫农团、省工会、百业工人会、船工委员会，一月内。”^②

为保证革命战争的顺利进行，扩大红军，动员妇女送自己丈夫和儿子参加红军，川陕省苏维埃专门制定优待、抚恤军属的条例。

为解决广大红军将士在作战时的后顾之忧，鼓舞红军将士士气，使其可以一心一意地勇敢作战，1933 年 8 月，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部翻印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印发的《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该条例对于优待红军家属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一、凡参加红军的战士及其家属（父母妻子）一律分与好田地，尚没有分得田地者立即分受。

二、分给红军及其家属的田地上的一切粮食，归红军战士和其家属所有，任其自由处理。如红军家属缺乏粮食时，得由苏维埃发给或借贷，欢迎群众自动拥护之。

三、红军家属之没有生产能力的，由当地苏维埃负责动员群众为之代收代耕，一切种子、耕牛、农具，苏维埃负责帮助解决；其有生产能力者，亦得酌量帮助其种子、人工……

四、红军及其家属及红军公田如缺少水利时（如天旱时），有优先分得水利之权。

五、如遇饥荒时，红军家属得由苏维埃负责救济，如供给粮食、防水救旱等。

六、红色战士如因战争和工作中伤亡者，由苏维埃实行伤亡抚恤条例（另行公布），特别优待抚恤。

① 《开展游击战争的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45 ~ 346 页。

② 《从十一月廿四号到十二月廿四号一个月工作计划》，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52 页。

七、红军及其家属由苏维埃发给优待证，如在苏维埃经营之经济公社或合作社购买物品时特别廉价优待；如该物品缺乏时，且享有购买的优先权。

八、没收豪绅地主一切反动的衣服、房屋、财物实行分配时，首先分给红军及其家属，帮助其解决一切物质困难。

九、红军家属入学读书时完全免费，并给予入学优先权，其书籍、纸、笔墨等费，如无力举办时，由苏维埃帮助解决。

十、红军家属有病，可由苏维埃国家医院或工农药房免费医治（如请医、送药，抬送红军医院等）。如遇死亡，由当地苏维埃帮助殓葬，并帮助照料其家事。

十一、经常动员群众做慰问红军家属并帮助其解决困难问题（如少先队、童子团等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等）。

十二、白区工农兵士来苏区参加红军的一律分与好田（名为红军公田）。红军公田及其粮食由区苏维埃负责请人代耕代收和保管，或群众自动代耕，必要时不得动用红军公田之粮以为代耕者之报酬。粮食任由红色战士变卖处理，其家属并可移住赤区，一样享受优待条例的优待。

十三、参加地方独立团独立连游击队之红色战士及其家属，均享受本条例之规定。^①

同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又印发《抚恤伤亡条例》，规定军属可以享受以下优待政策：

三、牺牲者的抚恤金，给予他的直系家属（父母妻子）领取，主要目的是酌量补助他有劳动力的家属生活上的费用，并抚养子女的成长。……五、对牺牲或残废了的战士的子女，给予进学校免费与优先的权利，家属和子女到医院诊病完全免费给药；牺牲者的妻子如有子女，给予养育子女的补助费。没有

^①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137页。

家庭顾虑年纪（青）〔轻〕的女子，一样有进学校免费的优先权，并享有介绍工作分配土地房屋的优先权，对他父母的物质的供给，拨发社会保险金方面有优先权，并依据劳动能力按月酌量给予补助金。^①

《抚恤伤亡条例》规定牺牲红军的妻子在享有教育、工作、土地分配、房屋分配等方面具有优先权；其父母的物资供给、社会保险等方面给予优先权，并发放补助金。

为使上述政策得到落实，1933年11月，川陕省红军家属代表大会在巴中召开，形成《川陕全省红军家属代表大会决议》，号召苏维埃及广大群众要特别优待红军及其家属，切实解决红军家属的困难；决定红军家属要分好田好地，可以参加互助会，解除生产、生活过程中困难；动员广大妇女参加苏维埃工作，在苏维埃政权及各种组织中担任具体工作，加入群众团体，帮助苏维埃肃反，做鞋、做袜拥护红军，帮助医院，组织运输队、担架队，配合红军行动。^② 1934年召开的红军家属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动员妇女拥护红军的口号：“弟劝兄、妻劝夫，参加红军！做鞋做袜拥护红军！”^③ 这些举措创造了不少妻子送丈夫、母亲送儿子参加红军的典范。

① 《抚恤伤亡条例》，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② 《川陕全省红军家属代表大会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

③ 《红军家属代表大会口号大纲》，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7页。

第三章 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 政治动员路径及效应

中共在川陕苏区对广大妇女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使其自我意识得到觉醒，点燃了她们投身革命的热情。那么，在中共领导下，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怎样开展和运行？选择何种路径？效应如何？本章将着重从普遍建立妇女组织、提升妇女经济地位、发展妇女教育事业、提高妇女参政度、婚姻自由的实践探索等方面探讨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路径，并对政治动员的效应进行评析。

第一节 普遍建立妇女组织

红四方面军入川前，深受压迫的广大妇女渴望革命，渴望翻身解放。随着川陕苏区的建立和发展，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广泛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等妇女解放思想，广大妇女深受启迪，革命热情极高。其时，由于革命战争的需要，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赤卫队，后方的绝大部分工作要靠妇女承担。

毛泽东曾说：“女子有力量，还要加上一条结团体。没有团体，这种力量是散的、零碎的，人心是各管各的，这叫做心不齐，力不合。有了团体，心就齐了，力量就结合起来了，就能齐心合力干大事。”^① 因此，

^① 毛泽东：《妇女们团结起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

在中共的高度重视下，川陕苏区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据估计，川陕苏区贫雇农、中农、小市民、雇工家庭妇女参加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女工农妇协会）的至少有 30 万人之多，还有直接参加机关、部队、工厂，脱离生产的妇女达 1 万人以上。^① 尤其是一大批优秀青年妇女，毅然参加女红军，谱写出中国乃至世界妇运史上辉煌的一页。李玉南回忆：“除后方直属部队外，妇女参加红军后，主要是在独立团、女工兵营、刘华工厂、被服厂、新剧团、总医院、分医院、洗衣队、担架队等单位的比较多，乡一级、区一级、县一级、省一级也有妇女。那时乡和区都叫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有主任委员，县、省叫妇女部，张庭富是省委妇女部长，她后来调省委当内务主席。省工会的女工部部长是李远清（女）。那时还成立了反帝拥苏大同盟。这个大同盟的秘书长吴朝祥（女）。另外，贫农团、赤卫军中也有女的。”^② 陶万荣回忆：“省和各县机关的宣传组织、党务、群众团体、后勤工作等都有女同志参加，后方工作的女同志占的比例是很大的。”^③ 吴朝祥回忆：“当时在地方工作的主要妇女干部，如省中共妇女部长杨明善，副部长陈英明。我当时任省少共妇女部长，后又由肖成英（现改名刘建）担任。另有宣汉县副县长雷鸣珍（现在北京）等。在军队中的如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四师宣传队长张大由，总供给部女工营长林月琴，政治教导员王泽兰，副营长刘百姓等同志。在总政、军、师都有妇女宣传队，新剧团（即文工团）、医院、运输队、担架队、被服厂等单位也都有女同志，而且比例数相当大。”^④ 其职能是发动妇女群众参加土地革命，参加苏维埃政权建设；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为红军做军鞋、做衣、洗衣、缝衣、送菜、送粮支援前线以及为红军家属代耕代种等；动员妇女送自己亲人参加红军；

① 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编著：《红军在巴中》（内部资料），2002 年，第 40 页。

② 李玉南：《川陕时期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 年，第 138 ~ 139 页。

③ 陶万荣：《川陕苏区妇女学校》，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 年，第 131 页。

④ 吴朝祥：《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94 页。

培养妇女积极分子，发展女党员、女赤卫队员，选拔和培养妇女干部；争取男女婚姻自主，提倡男女平等，实行同工同酬，踊跃参加苏区各项建设；动员组织妇女在战时担任侦察、站岗放哨、送信、联络、抬担架、救护伤员等工作。

川陕苏区大量党政军群组织中设置的专门做妇女工作的妇女组织，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隶属于党的妇女部、妇女运动委员会；二是联系苏维埃与广大妇女的妇女组织，这些组织一般设置于各级苏维埃政权系统内，比如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三是各种妇女群团组织，比如工会里的女工部、青年团里的青年妇女部、农会系统的妇女委员会等。^①

一、隶属于党的工作系统、负责指导妇女工作的 妇女运动委员会、妇女部

川陕省委及其下属各级组织均设有妇女运动委员会、妇女部，其工作主要是了解妇女的福利、婚姻等情况，到各地检查督促妇女组织发动扩红、支前，指导基层工作。各级妇女干部负责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和童养媳制度，也直接处理一些婚姻家庭纠纷。

川陕省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是张庭福。妇女部的主要任务是号召所有受苦受难的妇女积极参加苏维埃，搞宣传和建立广泛的妇女组织，为前线打仗的红军做鞋、做衣、搬运粮食和弹药、抬送伤员等。^② 姚明善回忆：“当时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支援战争，保卫苏区。我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这一工作中去。我先被派到长赤县做发动群众，主要是妇女群众努力生产，节衣缩食，打草鞋，织袜子，积极支前等工作，同时还检查群众拥军，做军鞋，以及代耕的情况，长赤县是模范县，各方面工作都做得好，多次受到省委、省苏的表扬。不久，我又被派到南江县作训练赤卫队、儿童团、少先队的工作，同时慰问红军家属，也检查分田分地

^① 耿化敏：《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1921—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2页。

^② 张庭福：《我当上了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的情况。下去工作，并不是我一个人去，省委、省苏、政治部、保卫局等单位都派了人，我们一道去工作的。我们下去以后，各种工作都做。我们还教妇女唱《送郎当红军》《送子上战场》等歌曲，动员妇女送自己的亲人参加红军，扩大红军队伍。随着战争的需要，我们还组织了妇女运输队，为前线运送武器弹药、粮袜给养，保证战争的胜利。还组织妇女当看护，精心护理伤病员，并组织宣传队到医院慰问伤病员，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早日重返前线杀敌。”^①

1933年6月，在赤江县召开的党团员代表大会上，李玉南被选为川陕少共省委常委、少共省委妇女部长。少共省委妇女部的主要任务是：“到各县、区、乡做发动妇女支前和扩大红军工作，分配各县、区苏维埃妇女给红军洗衣服、做鞋子、扎袜底和组织妇女担负运输工作等。”除此之外，少共省委妇女部的工作人员还要担负繁重的战勤任务。李玉南回忆：“在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中，我所在的川陕少共省委妇女部协助红军总经理部担负繁重的后勤运输保障工作，如组织运输队给红军运送粮食、弹药，组织担架队抬伤员、救彩号（伤号），与总医院配合，组织看护队帮助总医院看护伤员等。”^②

县委妇女部由县委组织部长或宣传部长领导，主要任务是宣传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力量，组织做军鞋、送公粮支援前线，同地主土豪开展斗争。同时，还要做妇女工作，使广大妇女走出家庭参加革命。^③ 区苏设有妇女部，乡村成立基层妇女组织，配备妇女专职干部。比如当时江口县下辖12个区苏均设有妇女部。^④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下设妇先队。^⑤

① 姚明善：《永远不忘艰苦的岁月》，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94页。

② 李玉南：《我当上了少共省委妇女部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肖志珍：《我的回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43页。

④ 中国共产党平昌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平昌县历史（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⑤ 汪荣华：《征途漫忆》，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

各级妇女部中的广大妇女主要从事后勤工作、宣传保卫工作，战时还要负责夜间在城门站岗、放哨。孙桂兰回忆：“我在妇女部的工作，主要就是搞后勤，烧水呀做饭呀。那时的条件非常差，最恼火的是没有充足的燃料，又没有煤，几十个人的生活要全靠我们几个人。打柴是一件苦差事，那时候的炊事班男同志较少，而且男同志几乎全部充实到了部队里，许多时候还要参加训练和战斗，所以打柴的事也就全部落到了我们女同志身上。因为交通不方便，一捆一捆的柴全靠我们肩挑背磨从山上背下来。有许多女同志由于背柴，从山上摔倒过好几次，有些同志还扭伤了腿，好几天都不能走路，还有一部分女同志就是烧水、做饭。由于国民党的统治，到处的人都是蔫的，有许多田地都荒芜了，为了给红军做好每一顿饭，而且最大限度地让每一个战士吃饱，我们每顿饭都做得精打细算。……我们一有空闲时间，就走上街向过往的群众宣传，到老百姓家里宣传。宣传红军的好处，我们经常宣传的内容就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子弟兵，我们要打富济贫，要平分土地，打倒一切剥削阶级……’”^①

各级妇女领导干部特别是妇女部长实行任命制，且因形势发展需要会先后在不同地方担任同一职务。刘坚回忆：“川陕苏区各县的妇女部长人选，是由省委妇女部研究出名单经省委常委研究确定的。……由于战斗频繁，各县的妇女部长变动较大，有的同志由于工作需要，在短短的时间里先后被调到几个县去担任妇女部长，如熊文珍就先后到南江、万源、广元各县担任妇女部长。”^② 各级妇女部长的级别很高。刘坚回忆：“省委妇女部长是省委常委，下面各级妇女部长也都是同级党常委。”^③ 可见当时川陕省委对妇女工作的重视。

① 孙桂兰：《我们在通江南城门站岗放哨》，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刘坚：《我在红军里》，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页。

③ 刘坚：《我在红军里》，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

二、联系苏维埃与妇女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

1932年4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各级苏维埃政府需组织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由3人至5人组成之，党的妇委书记及群众团体妇女部主任都可以加入该委员会为委员”。“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设主任1人，以总揽该委员会的工作，不分科。主任及委员由人民委员会及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委任之。”^①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川陕省委、省苏以及红四方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在各种会议文件、决议中多次强调组织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紧迫性与重要性：“一定要各乡各村组织起来。”“我们的同志，一定要亲自到乡下、厂里去接近广大的劳动妇女，在广大劳动妇女中做实际工作，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成为广大劳动妇女的组织，成为劳动妇女特殊利益的斗争[工具]。领导广大妇女参加阶级斗争，特别要为优待红军家属而斗争。一乡一村之中，劳动妇女都能在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里面，解决许多困难问题。”^②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的政治决议中明确提出组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来负责妇女解放运动的具体工作。但是，直到1933年纪念“红五月”之后，川陕苏区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建才有实质性进展。川陕省苏维埃所属各级组织号召广大劳动妇女加入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比如川陕省雇工会号召广大妇女加入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③川陕省苏维埃下辖区苏、乡苏、村苏贯彻川陕省委的指示，纷纷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比如罗家河坝乡苏维埃成立后，随即建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由七人组成（其名不详），主要负责人有赵大秀、郭大莫。她们组织全乡劳动妇女热烈参加拥护红军及慰劳伤病员的工作”^④。南江、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纲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

② 《关于妇女工作》，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7~1218页。

③ 《川陕省第三次雇工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9页。

④ 《罗家河坝乡苏政权的建立和工作》，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通江党史资料丛书》第6辑（内部资料），1984年，第48页。

长赤两县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有会员 5 万余人，大都是雇农、贫农、中农、小市民、小手工业者中的妇女，年龄在 16 岁到 45 岁，其中青年妇女居多数。^①

川陕苏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是在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领导下为广大劳动妇女谋解放的一个群众性组织^②，它不是政府的具体工作部门，而是各级苏维埃政府关于妇女工作的咨询部门，与党组织的妇女运动委员会和各群众团体妇女部的关系均为工作指导的关系。^③ 下设青年部、宣传队、慰红队、担架队、洗衣队等。其成员不脱离生产，大都是雇农、贫农、中农、小市民、小手工业者中的妇女，年龄在 16 岁到 45 岁，其中青年妇女居多数。^④ 1933 年 4 月 13 日，川陕省委印发《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规定其职责为：“帮助苏维埃和保卫局的肃反工作。……戒严、站岗、放哨、捉敌人侦探，肃清地方反动武装和地主豪绅反动分子。”^⑤ 《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其性质和任务：“是劳动妇女斗争和教育的机关，要为解放妇女各种生活上的痛苦来做斗争，从家庭婚姻、土地问题直到参加政权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并要组织读报、识字、唱歌来提高劳动妇女的兴趣。”^⑥ 对此，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也提出一些反映广大妇女利益的政策口号和主张：“（一）政治、经济男女平权；（二）反对穿耳、缠足；（三）反对包办婚姻；（四）反对三从四德。”^⑦ 据张永芳回忆：

① 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6 页。

② 《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1 页。

③ 张雪英：《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76 页。

④ 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6 页。

⑤ 《中共川陕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52 页。

⑥ 《红色战士必读》，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58 页。

⑦ 吴朝祥：《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94 页。

“那时候的妇女比男人还苦，因为除了干活之外还要缠脚，男人还经常打女人。我们宣传女孩子不要缠脚，若有哪家要强迫女娃儿缠脚，妇女会就要找她，严重的还要罚款。若有哪家的男人打了女人，妇女会也要去找他的。经过我们的宣传，女娃儿没人缠脚了，也没有哪个男人打女人了，男女平等了，过去只许男人赶场，现在女人也敢赶场了，女人不管干什么同男人一样。”^①

各地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为苏区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比如长赤县下两区的8个乡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组织运输队30个、800余人，担架队5个、70余人，洗衣队19个、200余人，做鞋组40个、300余人，童子团40个、180余人，少先队40个、200人，代耕队40个、400余人，参加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212人。”^②

在严峻的革命形势背景下，为了尽可能多地扩大红军，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加强党对妇女组织的领导，扩大并健全苏区内的党的妇女工作组织，并提出具体的工作方式，即“健全各个区域中的女工农妇代表会的工作，吸收最广大的女工妇女〔农妇〕群众积极的参加经济与文化的建设”^③。红四方面军粉碎刘湘集团六路围攻后，依据中共解释“中国广大劳动妇女——女工和农妇”的概念，明确妇女组织的对象不只限于农村妇女，还包括女工。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改称为女工农妇协会。女工农妇协会的经常性活动和妇女改善委员会类似，主要是拥红、拥苏，协助苏维埃扩红、宣传，替红军做鞋、做袜、打草鞋，送自己的儿女去当红军，参加运输队运送军需物资和战利品，护理伤员，抢修工事、道路，组织妇女学习文化政治，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革命斗争。^④

① 张永芳：《长胜县扩红工作受到了川陕省的表扬》，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③ 《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2页。

④ 中共通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104页。

各地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妇女会、妇女解协会召开会议时，由会议召开地负责安排与会代表和村民的食宿。1934年8月18日，观音庵三乡一村苏维埃主席在日常伙食开销账簿中详细记录了该村在召开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妇女会、妇女解协会的会议时招待与会代表的开销情况。

九月十四：晨、午、夜，共吃米三升。开妇女改善生活委员会，坐五桌，红军五人，女同志二人，夜下米一升。……

十月初二：晨、午、夜，共吃米七升。同志三人、运输队十名，开妇女会，女同志代表、百姓、村内职员人等共四桌。……

十月十四日：晨、午、夜，共吃米九升半。开妇女解协会，开武装与群众会，同志与村内职员总共十二桌。……

冬月初十日：晨、午、夜，共吃米八升。开妇女会，同志、代表、老百姓，职员共六桌。……

全月^①初四日：晨、午、夜，共吃米四升。开妇女会，男同志、女同志、代表、村内职员共四桌。……

全月初八日：晨、午、夜，共吃米四升。开妇女会，同志、运输队共卅八人，乡苏女同志四人，三乡宣传员一人，少先队长一人，雇工长一人，代表三人，老百姓八人，村内职员在内。^②

三、各种群团中的妇女组织

（一）农协或农民委员会中的妇女组织

农协或农民委员会是乡村的政治机关。^③ 在广泛动员下，广大农村妇

① 全月，即十二月。

② 《观音庵三乡一村伙食零用簿》，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5～1859页。

③ 《四川省委关于全川工作的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5页。

女加入农协，组建农妇组织。各级农协的领导机关设有妇女部、妇女代表大会、妇女小组。^① 农协妇女部的职责是：“经常召集妇女代表会，多吸引无组织的妇女来参加，讨论她们的特殊要求（如帮人工资平等、反豪绅欺压侮辱妇女等），领导她们的特殊斗争，但是党不应去启发农妇对农民的婚姻斗争。”^② 在苏区与国统区交界的地方，农协妇女部还负责“在群众对于苏维埃红军影响扩大的地方，……号召老幼男女大大小小的起来组织红军之友、欢迎红军会、红军慰劳队、洗衣队等来讨论和进行关于拥护红军的各种工作”。^③ 农村中妇女支部和妇女小组的建立需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支部的建立应以旧的团为单位，每团建立支部，以甲或地名来分小组，不必建立妇女支部，如乡村间男女界限不易克服，可建立妇女小组，要支干会去领导。”^④ 但是，某些地方的农妇组织机构非常脆弱，一旦组织者被捕或被枪毙，农妇组织就名存实亡或解散。比如“梁达虎赤区曾在杨锡容女同志领导下，组织一千多农妇加入农协。后来杨同志被长毛叛徒捉着，被当地驻军枪毙，农妇组织随着赤区破坏而涣散了。”^⑤

（二）工会中的妇女部

1933年4月28日，川陕省总工会印发《川陕省总工会章程及组织法》，规定川陕省总工会设女工部，部长1人，县总工会设妇女部，部长

① 《四川省委关于领导年关斗争的决定》，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页。

② 《四川省委给中江县委的信——关于形势的分析和今后工作的指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16~617页。

③ 《白区工作决议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④ 《四川省委给中江县委的信——关于形势的分析和今后工作的指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19页。

⑤ 《秋霞致中央的报告——关于政治、组织、军事、工运、农运、C. Y.、妇运等工作情况》，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1~462页。

1人，区工会设妇女部，部长1人。^①为提高省、县、区等各级女工和劳动妇女社会组织的地位，1934年5月25日，川陕省雇工总会印发《川陕省雇农工会章程》规定省、县、区等级的妇工部领导人，由各级常委担任，常委可以不从事劳动生产而专门管理会务，而且在必要时可以增加若干秘书和干事。^②

（三）反帝拥苏大同盟中的女工部

川陕苏区反帝拥苏大同盟的主要工作是：“结合根据地的中心工作，通过重要节日纪念活动，进行广泛的对于苏联实际生活、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与拥护苏联的宣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进攻苏维埃和红军，动员群众配合、支援消灭刘湘的斗争。”^③反帝拥苏大同盟下设女工部，部长是张□□。^④

另外，在“赤白对立”^⑤区，即苏区与国统区交界之地，为激发更多非苏区区域乡村中的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中共还动员组成公开合法的互助会、俱乐部、游戏班、青年男女识字班、农村妇女缝纫班等公开的妇女组织，开展“五抗斗争”（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同时成立单独的斗争组织。^⑥

中共通过发挥各类妇女组织的作用，保证了妇女工作的开展朝着有序的方向进行。这些妇女组织是连接中共和广大妇女的极其重要的“传

① 《川陕省总工会章程及组织法》，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5页。

② 《川陕省雇农工会章程》，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0页。

③ 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1页。

④ 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1页。

⑤ 所谓赤白对立，是指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之间的对立，它不是由苏维埃革命加剧的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主要发生在苏区边境地区。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9页。

⑥ 《白区工作决议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动机构”，在动员妇女巩固苏维埃政权、慰劳红军支援革命战争、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大大调动了妇女的革命热情。

第二节 提升妇女经济地位

川陕苏区建立前，川陕边区妇女是家庭内外的主要劳动力，挑起了家庭生活和农业生产的重担，但由于川陕边区地处偏僻的山区，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广大妇女遭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束缚，她们没有土地权、财产继承权和支配权，在经济生活中处于丈夫的从属地位。在阶级社会里，经济权力就是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在经济领域中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①“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②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强调：“经济既不平等妇女是得不到一切平等和自由的。他们不但成为资本家用以操纵劳动市价更廉贱的生产奴隶并且负担资本主义社会组织中家庭的和母性的负担”^③。因此，获得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基本前提，可以为妇女地位提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共在川陕苏区主要通过进行广泛的土地分配运动和保护女工特殊利益来提升妇女经济地位。

一、妇女享有土地分配权

广大妇女拥红、拥苏的原因之一就是她们相信红军代表穷苦人民利益，参加红军能够吃饱饭。黄道炫的研究指出：“在高歌猛进的革命大纛后面，柴米油盐总是会顽强地显示着它们的存在。”^④川陕苏区也不例外。

①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0页。

④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1页。

罗彦贵回忆道：“红军部队好，我们这些小孩要有多欢喜就有多欢喜，去参加红军就想吃个饱饭。”^① 叶琳回忆：“因为自己家里穷，只有一点点地，打不了多少粮食，否则自己也不会成为童养媳。而婆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好，是典型的佃农，租人家的房，种人家的地。自己既然离开了婆家，再回娘家的话，对娘家也是个负担，所以干脆参军。”^② 中共在川陕苏区十分重视通过实施土地分配来解决广大妇女的吃饭问题，以提升广大妇女的革命热情。

1933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印发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革命十大纲领》和鄂豫皖时期《怎样分配土地？》的小册子，作为动员群众、划分阶级成分和掌握政策的依据。^③ 其中，《怎样分配土地？》对不同阶级妇女的土地分配原则作了若干说明。其一，提出改变“女子脚小不能耕田，就不分配土地给女子的错误观念”，妇女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土地分配权。其二，女子出嫁之后所分得土地可以带到婆家自己耕种或留在娘家由其丈夫帮忙耕种。其三，贫农、雇农、中农出身的寡妇“可以分配土地，或雇人耕种，或托人代种，或将土地出租都可以的”。若她们不愿耕种土地，苏维埃政府可以酌量给予救济；而地主寡妇则是不分配土地，富农寡妇可以分配坏土地。其四，富农妇女“分最坏的土地，由他自己耕种。如果他万一不能耕种，他可与人家换工做，或他的亲戚帮助他种，我们也不反对”。对于拥护革命，遵守苏维埃法令的地主和富农家属“可以按普通人一样分得土地，但绝对不代耕”^④。其时土地分配原则是“以乡村为单位，按土地和人口的总量，抽多补少，平均分配”。除留足红军公田外，成分好的成年女子能分五背田^⑤，未成

① 罗彦贵：《我们在香山占了三个月》，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长征永远在叶琳的脑海中》，彭俊礼主编：《通江女红军》，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112页。

③ 其时，川陕省委还未成立，由军队暂时统管党务政务。

④ 《怎样分配土地？》，杜中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128页。

⑤ “背”：是川北一带特有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一背相当于二斗（约50公斤）谷子的产量。《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公粮条例》，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页。

年女孩子能分三背田。^①

同年，川陕省苏维埃主席熊国炳签发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土地法〉布告》以“川陕父老兄弟姊妹们！”为抬头，不仅如此，《布告》第六条明确规定“能够做庄稼的壮年男子女子多分一点”^②。从中可以看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承认广大劳动妇女享有土地分配权。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注意优待军属，给她们分配较多较好的田地。“这个区域内红军战士家属，多分得较多较好的土地。因此，他们可以用半雇佣劳动或部分雇佣劳动，来代替耕作，没有发生像鄂豫皖区代耕制度的问题。”^③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印发《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规定：“一、凡参加红军的战士及其家属（父母妻子）一律分与好田地，尚没有分得田地者立即分受。二、分给红军及其家属的田地上的一切粮食，归红军战士和其家属所有，任其自由处理。如红军家属缺乏粮食时，得由苏维埃发给或借贷，欢迎群众自动拥护之。三、红军家属之没有生产能力的，由当地苏维埃负责动员群众为之代收代耕，一切种子、耕牛、农具，苏维埃负责帮助解决；其有生产能力者，亦得酌量帮助其种子、人工……四、红军及其家属及红军公田如缺少水利时（如天旱时），有优先分得水利之权。”^④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印发的《抚恤伤亡条例》规定，牺牲红军的妻子享有分配土地房屋的优先权。^⑤

各地根据省苏土地分配政策，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分田方案。现存的《江口县观音庵分田方案花名册》记载了当时江口县观音庵分田情况，颇值一读，节录如下：

赵李氏（子参加红军），五十六岁，男丁四女二，贫农，七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8页。

②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土地法〉布告》，杜中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

④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优待红军及其家属条例》，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137页。

⑤ 《抚恤伤亡条例》，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背八升，又佃胡会诗田二十背，……进刘姓公田三十背，地六升。

杜天川，贫农，五十六岁，男二丁，女三口，进刘冯氏田二十五背，地一升，……三人劳动，二人不能劳动，子已出外。

杜开泰，中农，五十三岁，男二女三，田三十五背，……二人劳动，三人不能劳动。

向林秀，四十五岁，男三女一，自田三背，地二升，……进胡坤益四十二背，一人劳动，三人不能劳动。

向子彦，四十岁，男一女二，进余姓田十五背，地四升，……一男出外，一人劳动，二人不能劳动。

蒲银昌，五十七岁，男二女一，进学田十五背，地一升，……二人劳动，一人不能劳动。

胡理一，五十三岁，男二女三，自田十二背，地二升，……进胡会诗（团正）田十五背。一人劳动，四人不能劳动（男二人外出），子参加红军。

向硕彦，五十岁，妻何氏四十四岁，长子二十六岁参加红军，二子早娃六岁，三子火娃四岁，四子八娃一岁，大女九香子十一岁，二女桂香九岁，进学田四十背，地二升，……四人劳动，四人不劳。^①

这份花名册显示，苏区政府落实了女子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土地分配权的规定，但会考虑到有获得土地资格的家庭是否为红军家属、劳动力状况等因素，人均所分的田地背、升数并不完全一致。

但是，川陕苏区各级苏维埃在土地分配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一些错误意见，比如“满工不分田”“半工分两背”“女雇工不分田”等。到1934年3月28日，川陕省雇工代表大会形成《川陕省第三次雇工代表大会决议（草案）》对之进行严厉批判，并提出“要立即使每个雇工，特别

^① 《江口县观音庵分田方案花名册》，杜中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184页。

是失业的雇工分得好田，征发一部分富农的农具来分给雇工。”^① 土地分配中还贯彻了过“左”政策，“贯彻了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和地富家里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并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发生，带来了不良后果”^②。为了有效落实土地分配政策，周纯全在川陕省第四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上的总结讲话中强调：“我们首先要把苏维埃办好，要好好分田地。分田地组织土地委员会、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协会都要参加，要想分好田地，一定要把苏维埃组织好。”^③

其时，土地分配与动员妇女支援革命是紧密联系起来的。周光坦在川陕省土地委员会会议中将平分土地与动员妇女结合起来，鼓励广大妇女加入反刘湘六路围攻的斗争中。他在《平分土地与消灭刘湘战斗任务》的报告中提出：“妇女个个要到沿途去优待彩病号，妇女要到沿途去捉侦探，妇女要组织侦探队去肃反，要坚决把富农多余的粮食农具征发出来。妇女要送自己的丈夫参加红军。”^④ 川陕苏区的土地分配政策，以及在执行过程中提出的“打倒土豪劣绅”“平分土地”“废除一切高利贷债务和地主契约”“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口号，对广大妇女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她们积极生产，支援红军，为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保护女工特殊利益，提倡同工同酬

中共在川陕苏区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中，始终关注广大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制定一系列旨在维护工人阶级经济利益的法律法令。就女工而言，中共除了保护她们一般的劳动权益，还针对女工的生理特点和身体素质制定许多特殊措施以维护其经济权益。

川陕省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

① 《川陕省第三次雇工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9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8页。

③ 《川陕第四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总结》，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7页。

④ 《平分土地与消灭刘湘战斗任务——光坦同志在全省土地委员会中报告》，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44~945页。

埃的任务》强调：“坚决执行劳动法令，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女工。……女工不得做重活路。”^①《川陕省雇工代表大会雇工斗争纲领》提出苏维埃实行保护女工的法令，男女工人工资一样等斗争口号。^②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颁布《妇女斗争纲领》，提出保护女工的举措，比如男女同工同酬，反对轻视女工，女工产前产后、生理期、哺乳期的优待等。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女工与男工应得同样工资！

二、女工不做粗重、妨碍身体的工作和夜工！

三、反对虐待女工、轻贱女工！

四、女工产前后休息八星期，工资照给，另给补助费、医药费！

五、女工月经五天内停止工作，工资照给！

六、雇主要为女工设置婴儿院等，哺乳时间至少一小时，每次距离不得过三小时，停工时间工资照给！^③

中共通过上述各项法令和举措，赋予妇女享有和同阶级男性相同的土地分配权，保证女工特殊利益，满足了广大妇女切切实实的经济利益，提升了妇女经济地位，为妇女争取人身独立和各方面的自由解放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第三节 发展妇女教育事业

教育是革命文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妇女解放首先必须实现教育机会上的平等。中共十分重视对广大妇女进行思想文化教育，着力发展教

① 《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② 《川陕省雇工代表大会雇工斗争纲领》，杜中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页。

③ 《妇女斗争纲领》，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156页。

育文化事业。1932年7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发训令：“各级的文化部应设立妇女半日学校，组织妇女识字班，可办家庭临时训练班，田间流动识字班，教员由政府及各地学校教员及群众团体的干部来担任。”^①在战争环境下，妇女教育被中共作为政治动员中一种必不可少的力量。1933年7月，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发布训令第四号，强调“在国内战争环境中，苏区文化教育不应是和平的建设事业，恰恰相反，文化教育应成为战争动员中一个不可少的力量，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一切战争动员工作，这是目前文化教育建设的战斗任务”^②。中共在川陕苏区对妇女教育事业的发展高度重视的目的同样是为革命战争服务，帮助实现战争的动员和夺取革命胜利。

随着川陕苏区的发展，中共领导下的各级管理教育的机构和组织次第成立。川陕省苏维埃设有文化教育委员会，下分为学校教育局、社会文化局和国家出版局，其具体职责为：“1. 学校教育局，指导各地列宁学校，审查教师、教材，办理苏维埃学校，培养各种专门技术人才的学校。2. 社会文化局，设立大规模的俱乐部，新剧团，经常指导各地读报、识字、俱乐部的工作，发展赤区文化。3. 国家出版局，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书籍，苏维埃理论与实际的各种小册子，工农群众与红色战士的读本，私人著作，经国家出版局审查认可付印。”县苏维埃设有文化委员会，其职责为：“设立高级列宁小学、俱乐部。审查各区列宁学校的教师和检查各区文化教育的成绩。”区苏维埃设有文化教育委员，其职责为：“发展全区的文化教育，将上级印发的报纸、布告、宣言、标语分发各乡，及设立布告处，办理俱乐部，检查各乡列宁学校教师、教材及识字、读报的成绩。”乡、村的文化教育工作则分别由乡苏维埃和村苏维埃负责。其中乡苏维埃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职责是：“办理列宁小学校，设立红场，进行军事与体育的操练。设立俱乐部，张贴上级的报纸、布告、

① 《临时中央政府文告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六号》，张挚、张玉龙主编：《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四号——文化教育工作在查田运动中的任务》，张挚、张玉龙主编：《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

宣言、标语，正确的向群众解释。进行普通的识字、读报〔等〕各种文化教育工作。”村苏维埃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职责是：“发展全村的文化教育，建设俱乐部，经常举行晚会、唱歌、讲演，解释苏维埃的一切法令，进行读报、识字等工作。”^①

中共在川陕苏区先后制定下发、翻印、转发多个关于男女教育平等、文化教育、技术培训的文件，为妇女提供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比如《关于妇女工作》指出：“党要大大加紧文化教育工作，提高妇女的政治水平，启发劳动妇女的阶级觉悟。”^② 1933年7月，《接受党二次大会决议和川陕共产青年团今后的任务》强调：“建立和扩大对广大劳动青年的文化教育工作，设立俱乐部、唱歌班、读报班、识字班以及青年妇女的缝纫班，各村乡区都要设立，每乡要设立列宁小学，马上要做到每区要设立一个，每县要设立一高级列宁小学。”^③ 同年9月，川陕省委颁发的《妇女斗争纲领》规定，“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与男子一律平等！”“青年妇女与男子同样有受教育的权利！”^④ 同年11月，川陕全省红军家属代表大会形成的《川陕全省红军家属代表大会决议》中明确号召红军家属（大多为妇女）要自动组织识字班、读报班，提升文化水平。^⑤ 这些方针、政策的落地落实大大促进了川陕苏区妇女教育的发展，干部学校、列宁小学以及各种形式的俱乐部广泛设立。徐向前回忆：“省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了干部学校，各县、区均建立了列宁小学，进行义务教育；每个集镇均设俱乐部，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⑥

① 《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149页。

② 《关于妇女工作》，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8页。

③ 《接受党二次大会决议和川陕共产青年团今后的任务》，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

④ 《妇女斗争纲领》，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⑤ 《川陕全省红军家属代表大会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

⑥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7页。

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川陕苏区的妇女教育主要包括妇女干部培训工作、识字扫盲运动、思想政治教育、业务教育、军事训练等方面。

一、重视妇女干部培训工作

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和苏区的扩大，需要大批妇女干部，而广大妇女大多没有文化，政治思想和文化素质亟待提高。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川陕苏区关于妇女的干部训练班全面铺开。川陕省委成立省委党校、省委妇女学校，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省苏维埃学校加强对红军和地方政权中妇女干部的培训工作，提升妇女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干部训练班最大的特点是配合中心任务，理论联系实际，形式灵活多样，时间短、解决问题快。

川陕省委通过省委党校培训妇女干部。党校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通过党校培养干部，是中共的优良传统。中共川陕省委党校创办于1933年2月，初驻通江，同年8月迁至巴中，10月又随省委迁回通江。1934年，省委常委罗世文担任党校校长。省委党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县委和区委工作干部。教材多取于《党章》《共产党》《党员须知》《劳动法令》《土地法令》等党的基本知识和方针政策，还有一些基础文化知识读物。授课教师主要有廖承志、罗世文以及川陕省委的领导同志。学生300余人，其中女学员有150余人。党校学员按班、排、连编制，最多时有5个连，分高级班、初级班和专业班。高级班主要是培养县委和区委的干部，初级班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做支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干部，专业班的任务是培训专职搞宣传工作的干部。川陕省委妇女部长肖成英、肖志珍、吴朝祥等，都在省委党校的高级班学习过。^①

1934年川陕省委在巴中创办川陕省妇女学校，校长是刘桂兰。学员主要是从各县、区抽上来轮训的妇女干部、女党员、团员，或者是有发展前途的工农妇女。陶万荣对妇女学校的情况作了回忆：“妇女学校的校长是刘桂兰，她也要讲课。再就是请书记部长讲课，省委书记周纯全讲

^① 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办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6～417页。

当前形势、党的工作；妇女运动由陶万荣、张琴秋、刘桂兰讲。军事方面的课请部队首长讲。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学习必备军事常识，总之，上课的内容是按照当时的情况，需要那方面的就请那方面的负责人来讲。虽然当时条件差，但女同志们的学习热情很高。比如华全双因为肯钻、肯刻苦，由文盲最后留在少共省委妇女部工作。”^① 刘坚回忆：“川陕省委的领导同志对我们妇女干部的培养教育是很重视的，专门办了妇女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妇女工作的骨干。罗世文同志给我们讲马列主义理论课；刘瑞龙同志讲发动、组织群众，搞好宣传工作的方法。”^② 学校主要课程有：时事政治，军事知识，医疗救护，妇女、青工、儿童工作，文化课等。学习内容主要是：革命理论、党的知识、阶级斗争知识、政治形势和党的政策、《红军须知》和妇女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培训期一般为5~8个月，每期100多人。这所学校为苏区培养了何莲芝、王定国、吴朝祥、肖成英等数百名出色的妇女干部。^③ 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受到阶级启发的妇女更进一步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和当前任务、丰富了革命理论知识，坚定了革命信念，懂得了革命的道理和方法，从而为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川陕省苏维埃成立省苏维埃学校对妇女干部进行培训。省苏维埃学校成立于1933年9月15日。分为初级及专门科，培训时间在一月到两月，主要培养苏维埃各部门工作的中下级干部。第一期学员人数超过500人，学员包括具有斗争与学习精神且不抽大烟的乡苏、区苏、县苏委员以及工会、贫农团、妇女、青年、赤卫军分子。^④ 课程主要是学习《党章》、《党员须知》、时事政治、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法、土地分配政策和方法。授课教师主要是川陕省委、省苏维埃和红四方面军政治的领导

① 陶万荣：《川陕苏区妇女学校》，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32页。

② 刘坚：《我在红军里》，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

③ 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编著：《红军在巴中》（内部资料），2002年，第121页。

④ 《培养干部的提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6页。

干部。^①

二、开展大规模识字扫盲运动

文化程度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作用。川陕边区大多数女孩子或者妇女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基本上都是文盲。川陕省委以及中共领导下的省苏、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认识到，识字扫盲教育是川陕苏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的基础，如果妇女看不懂标语传单，听不懂革命道理，就不能理解党的方针政策，不能承担革命工作。因此，中共要求通过广泛的识字教育使群众能够达到认识标语和路条并能写信、看各种文件的水准。

川陕省委把教当地妇女识字作为川陕苏区妇女教育的首要任务。1933年8月12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颁发的《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明确了川陕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任务：“工作的重心应当是发展社会教育，各处都办工余学校、俱乐部、识字班、读报班，加紧识字运动，使苏区工农大众能识字，有计划的建立各地列宁小学。建立出版工作，大批的出版共产主义的书籍。同时为了适应苏维埃的需要，大会决定要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马上成立苏维埃学校，培养文化和其他各种专门人材。”^② 根据省苏指示，江口县苏为提高广大妇女识字水平和文化素养，开办读书班，教妇女读书识字。^③ 妇女工兵营把不识字的同志分成班，组织她们利用工余时间进行学习，开展了“识五”运动。林月琴回忆：“（杨文局）开展了‘识五’运动，要求每个同志每天识五个字，做到会认、会讲、会写、会用。大家一般是先从自己的姓名学起，然后学‘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既认了字，又学习了政治常识。”^④ “通过四五个月的学习后，就

① 中共通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页。

② 《目前形势与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③ 中国共产党平昌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平昌县历史（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④ 林月琴：《回忆妇女工兵营》，《解放军报》1982年3月9日。

渐渐收到效果。进步快的同志可以写家信，有的可以记学习心得，有的还能给壁报写稿。比如李开英通过学习，不仅能给儿子写信，还能辅导其他同志，工兵营当时学得不错的还有施光珍、彭爱莲、李宗南、李世英等。”^①在总医院缝衣连，设有专门的识字班长，金秀英回忆：“每天连的识字班长把两个生字贴在织布机上，大家只要一休息就地上画。”^②刘华被服厂平时安排有识字、写字等文化学习。^③

为了动员广大妇女参与识字扫盲运动，中共在川陕苏区还编写了《识字歌》：

同志们，要知道，文化知识不可少。为适应革命需要，我来读宣言，你来读捷报，革命的生活真正好。同志们，大家来，努力识字学文化，比一比哪个呱呱叫。

读报组，识字班，每个同志都争先。要消灭青年中文盲，你来读捷报，我来读宣言，革命的生活真活跃。同志们，大家来，努力识字学文化，比一比哪个呱呱叫。^④

此外，还有一首《识字歌》也被广大妇女广为传唱：“共产党是核心，领导工农闹革命。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田颂尧，刘督办，夹着尾巴已逃窜。活捉刘湘，赤化全川。川陕省江口县，工农联盟把身翻。打倒土豪和劣绅，分地又分田。儿童团，少先队，站岗放哨查坏人，保卫苏维埃，学习文化干革命。学习少先队，学习赤卫军，长大当红军。夜老虎，本姓程，反包围，立功勋。连夜摸上寿南寨，打垮

① 《杨文局回忆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妇女工兵营情况》，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生产历史回忆资料（1927—1949）》（内部资料），1990年，第134页。

② 金秀英：《红军缝衣连》，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16页。

③ 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军需工厂简介（1927—1949）》（内部资料），1988年，第44页。

④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历史歌谣集》（上）（内部资料），1982年，第71~72页。

匪旅冷白云，追敌匪军震凉桥，戴营全军尽消魂。”^①

川陕苏区妇女的识字扫盲运动作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带有强烈的政治教育意味并贯穿于各种教育形式之中。识字班教材的编排注重与现实结合，多用当地方言和口语，浅显精练、便于记诵的语言将中共的方针政策、土地革命、阶级观念、苏区政权建设、男女平等、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建设等内容传递给广大妇女，使之在识字过程中深化对革命的理解与认同。

三、开展业务教育

川陕苏区各级党政军群组织积极开展业务教育，鼓励和支持提高广大妇女的专业技能，以此增强其社会独立能力。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地方医院、各军医院对护士、卫生员、看护开展基本的医务护理知识教育。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卫生员的何建贵回忆：“我在总医院学了不少技术，一般伤病员我能治疗，我比较精通的就是中草药。”^② 聂绍军的二姐在八十九师医院里学医。^③ 1934年2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在沙溪乡王坪创办了护士学校，校长苏井观。护士学校归总医院医务部管辖。同年10月，学员扩大到400多人。学校按军队编制，将学员编为看护营，营长林春芳，政委丁强。下辖3个男看护连和1个女看护连。护士学校对业务知识的教学特别重视，具体课程包括有《病理学》《解剖学》《药理学》和《脉络学》。授课教师有苏井观、周敬安、林春芳、李炳伍、汪兴容、潘文森、喻成明、蒲文清等人。在教学方式上采用半医半教的方式。“上午带领学员医伤治病，下午就教他们学习业务。轮流替转，做到工作和学习两不误。”在学员们学习有困难时，苏井观等人对之进行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学员们学习《解剖学》的《人体结构》有困难，苏井观就利用被处决的罪犯的尸体，进行实地

① 《识字歌》（二），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79页。

② 何建贵：《我在总医院学了不少技术》，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聂绍军：《红军在得胜成立了苏维埃区委会》，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解剖，一边讲述给学员们听，一边操作，使他们看得见，摸得着，清楚明白，易懂易记。当学员们掌握了一定的基础知识，苏井观又鼓励他们实际操作。这样边教边学，学了就用，学的知识牢靠。学员们进步很快，学到很多知识。”在苏井观等人的努力下，护士学校在较短时间内，为红四方面军培养了数百名医务工作人员，壮大了战地医务服务队伍。^①

宣传队教给宣传员必备的各种宣传知识和技巧，提升她们的宣传能力。刘桂芳回忆：“每天晚上，一个晚上学唱歌跳舞，一个晚上学文化。……那时学习的课本开头那一段，……‘说起穷人真是苦，又冷又饿住茅屋，吃没吃顿好饭菜，穿没穿件好衣服，一年四季做活路，牛马畜牲都不如。’还有《中国革命十大纲领》，要求宣传队每个人必须记住：‘第一推翻帝国主义，第二企业银行没收尽，第三打倒国民党，各派军阀消灭尽，第四铲除富豪绅，政权归我工农兵，第五没收地主地，穷苦农民把田分，第六工作八小时，工人工资加几等，第七取消苛捐税，契约借条当众焚，第八没收军阀产，分给穷苦的士兵，第九选留好田地，留给英勇的红军，第十联合苏俄国，世界工农一家人。’这些字我也认不得，但是天天跟着读，时间长了就能背得了。因为这些在宣传的时候都要唱，特别在场上搭台子宣传的时候，都要打着竹板唱。”^②王希云回忆：“在宣传队里早晚学习快板词、歌词，别人唱，我就跟着唱，我的记性好，跟上四五遍就记得过了。就这样我一边学一边练，时间不长，我也能够登台了。”^③杨清香回忆：“我虽没上过学，但记忆力特别好，又好问，在写标语的时候学习了认字。早晚学习快板词、歌词，我只要听到别人唱上三四遍，就记住了。”^④

被服厂、缝衣连老工人给不会针织、缝纫的女工教授手工技能。川陕苏区的妇女不少人是童养媳，出身贫寒，加之当地男人因长期吸食鸦片导致没有体力承担繁重的劳动生产，主要的家务和农业劳动都由妇女

① 四川省通江县现代革命史资料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1辑（内部资料），1981年，第49~50页。

② 刘桂芳：《我特别爱唱〈戒烟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王希云：《我们在巴中搞了很多次扩红宣传》，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杨清香：《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保卫后方》，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完成，但她们很少有机会做针线活。对于刚加入被服厂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提供后勤保障的川陕妇女来说，针线活太过陌生。赵正富回忆：“她们不要说绣花缝衣，就连做鞋补疤的粗活也很少干过。她们拿起小小的铁针，比那百斤重的担子还要吃力。”^①针对这一情况，林月琴、张茶清、赵正富亲自到排里为广大妇女教授相关专业技艺。赵正富回忆：

我们三个“老被服”工人便分头下到排里，一边做政治思想工作，一边教技术。……我们先教班长、排长，她们学会了，再去教战士，一面口头传，一面一针一线地做给她们看，把配搭的方法和要领作详细介绍。大家围桌而坐，互教互学，会的带不会的，不多久，技术就逐渐熟练了，针线、布块也听从安排和指挥了。质量不断提高，工效大大加快。在此基础上，我们开展了劳动竞赛。每人每天由缝一套提高到两套，后来，又提高到三套。^②

在总医院缝衣连二排，全排除排长会织布以外，谁也不会，有的甚至没有见过织布。但因为伤员急需纱布、绷带，因此排长手把手地教授织布技能，最终经过排长的努力和全连队员的苦学苦练，大家都掌握并能熟练运用有关技能进行织布。金秀英回忆：“排长坐在机上一边织一边教我们，讲一会便叫我们自己织，一边织一边体会要领。刚开始，脚手配合不起来，加上心急，特别爱出毛病。排长看我们有些急躁，立即召开了排务会。会上，她先表扬了大家为了尽早满足伤病员的需要，高涨的学习情绪，然后又耐心地给我们解释说：‘但是，织布也和作别的工作一样，光着急是不行的，要细心耐心地学。’同时，大家经过讨论，也都表示了决心：为了使伤病员早日恢复健康，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不怕腰酸腿疼，多织多练。从此，平时谁也不愿休息，连最小最爱玩的向秀珍、何秀英，也是一有空就偷偷跑到织布房内，苦学苦练。就这样经过

① 赵正富：《红军恩阳河被服厂的建立及其发展》，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58页。

② 赵正富：《红军恩阳河被服厂的建立及其发展》，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58页。

一星期的紧张学习和苦心钻研，基本上都能织了。最快的一天能织一疋（四丈八尺），慢的也能织半疋左右。”^①

中共在川陕苏区开展业务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专门职业人才，使她们真正成为苏维埃运动的坚强后盾和力量保障。

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为提高广大妇女的政治意识，阶级觉悟，宣传动员广大妇女参与游击战争和后勤保障工作，中共在川陕苏区要求有关工作人员用时局政治、苏维埃宪法、土地法令、劳动保护法、红军优待条例及游击战术等内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一部分。^②总医院政治部内设组织科定期举办党团员训练班（有时又叫党校），“每期学习一至四月左右。参加学习的一般都是排以上干部和医务人员中的积极分子，或者伤病员中的骨干。每期学习的人数，少则三十，多则七十以上。”^③对于学习优秀、成分可靠的妇女则给予提拔任用。总医院政治部内设宣传科，“负责宣传、文化和教育工作。设列宁学校，俱乐部和办报组。列宁学校主要组织招呼兵和看护读书写字。选用《新战士读本》和《红色战士丛书》等书刊作为教材，既学文化，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④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创办的护士学校开设的政治课由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讲授，内容是革命斗争形势，无产阶级的革命道理，打土豪、分田地，红军的性质、任务，前方战斗消息及注意事项等。^⑤

为更好地向群众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宣传队对女队员进行培训时，

① 金秀英：《红军缝衣连》，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516页。

② 《团四川省委致团南充中心县委信——对游击战争的指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83页。

③ 四川省通江县现代革命史资料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1辑（内部资料），1981年，第37~38页。

④ 四川省通江县现代革命史资料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1辑（内部资料），1981年，第38页。

⑤ 四川省通江县现代革命史资料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1辑（内部资料），1981年，第49页。

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刘桂芳回忆：“上午听宣传队的队长给我们讲苏维埃的各种政策法规”，“下午学习唱歌跳舞。那时教我们唱的歌词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送红军》《送郎当红军》《戒烟歌》等。”^①

为提高女工的政治思想觉悟，妇女工兵营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材是杨文局和林月琴等人根据省委宣传部的课本并结合当时的形势、任务、战斗口号、前方捷报编写的。^② 刘华被服厂平时政治学习主要是上政治课，讲无产阶级、穷人革命，讲搞好生产支援前线的意义、作用等。^③

五、进行军事教育

红四方面军被服总厂女工跟正规军一样，需进行队列、瞄准、投弹、爬山等军事训练。林月琴回忆：“下一步是军事训练。头一天傍晚，刘百兴就将红旗插上山头。第二天出早操，她便领着大家练爬山，开展争红旗竞赛。在通江参军的李敏个子矮，但爬山特别快，经常抢到红旗，因此得了个‘小飞机’的绰号。午饭后出操，开始时，大家叽叽嘎嘎，一喊口令就笑个不停。”后来，在刘伯新的严格训练下，工兵营“站起队来一条线，走起路来一阵风，唱起歌来又整齐又清脆。”^④ 刘华被服厂平时安排的军事训练主要是队列、射击、投弹、打野操。^⑤

女童子团队员要参加军事训练。屈际珍回忆：“天天在东门那个大操场下操，走了要报数，回来也要报数，报了才去洗脸吃饭，吃了饭就开会，会开了就休息。偶尔也做游戏，就到大操场去丢手帕儿。”^⑥

各级政治部中的女战士同男同志一起进行军事训练。赵楚碧回忆：

① 刘桂芳：《我特别爱唱〈戒烟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杨文局回忆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妇女工兵营情况》，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生产历史回忆资料（1927—1949）》（内部资料），1990年，第134页。

③ 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军需工厂简介（1927—1949）》（内部资料），1988年，第44页。

④ 林月琴：《回忆妇女工兵营》，《解放军报》1982年3月9日。

⑤ 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军需工厂简介（1927—1949）》（内部资料），1988年，第44页。

⑥ 屈际珍：《天天在东门那个大操场下操》，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最初当兵在政治部里就是学习，学习下操啊、打靶呀等等。”^①

各级宣传队也要对女队员进行军事教育。刘桂芳回忆：“每天早晨要集体出去爬山，看谁先爬到山顶。爬山不仅仅是锻炼身体，还是磨练耐力，因为宣传队每天要上街下乡到处跑。”^②

广大妇女不怕苦，特别勇敢，同男同志一起参加军事教育、军事训练。由于战时局势紧张，情况复杂，中共在川陕苏区开展的针对妇女的军事教育、军事训练持续性不足，且每次训练时间很短，因此她们主要是在后方从事后勤保障工作。但不可否认，她们的军事素质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提高。

中共在川陕苏区开展的妇女教育，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化教育，主要是为适应革命环境和苏区建设需要，以智力和劳力均衡发展为原则，将宣传与政治教育相结合，妇女教育与劳动、干部培养相结合，而开展的以妇女干部培训工作、识字扫盲运动、思想政治教育、业务教育、军事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实践。川陕苏区教育教学内容充实丰富，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广大妇女在教育中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文化知识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她们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地拥护红军、保卫苏区并积极投入革命洪流，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共政治动员的一种强有力的路径，这种战时教育体现了中共高效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因此，在艰苦严峻的战争环境下，川陕苏区妇女教育取得的成绩非常值得肯定和赞叹。

第四节 提高妇女参政度

妇女参政主要是指妇女参与管理国家政治事务和公众事务以及参加各种组织，体现了妇女的尊严与主人翁地位，是衡量妇女地位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是实现男女平等、保障妇女政治权利的重要内容，

① 赵楚碧：《正月间取龙背那是一场恶仗哦》，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刘桂芳：《我特别爱唱〈戒烟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指标。恩格斯强调，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是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① 由于不断的战争，大量男子参军的原因，在后方出现妇女群众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现状，为切实从政治层面保障妇女参政地位、最大限度地动员妇女参与革命，中共在川陕苏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一、赋予妇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李银河指出：“选举权的获得和对选举过程的参与是妇女参政的基本方式之一。”^② 中共历来十分重视妇女运动，长期致力于使被剥夺参政权的妇女群体实现民主参与。苏维埃政府规定苏区妇女享有与男子一样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将其提升到宪法的高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汉、满、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国的台湾、高丽、安南人等）、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苏维埃公民在 16 岁以上皆享有苏维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和地方的政治事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③ 这是中共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宪法条文的形式规定妇女的参政权利，为其在苏区实现妇女参政开创了先河。苏区政府在制定与实施的选举细则里特别注重保障妇女的权益，规定苏区内实行比例选举模式，要求妇女代表至少要占到所有代表成分中的 25%。这在 1933 年 8 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关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选举运动的训令中作了特别强调。^④ 1934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2 页。

②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 页。

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11 页。

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二号——关于此次选举运动的指示》，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选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9 页。

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苏维埃最宽泛的民主，首先表现于自己的选举。苏维埃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女子的权利与男子同等。”^① 1935 年周和生在总结中国苏维埃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中国妇女，自有历史以来就处在奴隶的地位，从没有参加政权的机会，而苏维埃特别保障妇女至少要占代表成分中 25%。”^②

中共在川陕苏区十分注重鼓励广大妇女参加苏维埃的工作，在苏维埃政府中担任代表、主席和各种委员会的工作，担任合作社和文化教育工作，参加拥护红军委员会来管理自己的事情。^③ 先后颁发各种决议、纲领、布告、通告，用以保障广大妇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参加省委、省苏及其下属各级组织的权利。川陕省委颁布《妇女斗争纲领》提出：“劳动妇女有参加政权机关的权利，与男子同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④ 1933 年 7 月，川陕共产青年团规定今后的任务是，积极吸纳表现好、思想素质过硬的女工农妇参加苏维埃政权，检查苏维埃工作，提升她们的地位，动员并保障她们参加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的选举运动，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即参加各地各级苏维埃的改选并选举出席省委、省苏、省工农兵大会的代表。^⑤ 同年的“八一”纪念节前夕，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印发《“八一”反对战争日和中国红军成立纪念日的标语大纲》，明确规定妇女的选举权以及各级苏维埃政府中要有一定数量的妇女代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988 页。

② 周和生：《七年来的中国苏维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58 页。

③ 杜中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9 页。

④ 《妇女斗争纲领》，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5 页。

⑤ 《接受党二次大会决议和川陕共产青年团今后的任务》，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00 页。

表。^①同年11月形成的《川陕全省红军家属代表大会决议》，号召广大妇女“努力参加苏维埃各种工作，担任苏维埃的代表、主席和各种委员会的工作，担任合作社和文化教育工作，参加拥护红军委员会来管理自己的事情”。^②1934年3月15日，川陕省总工会发布通告，动员广大女工、劳动妇女参加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运动；同时，为提高妇女们参政的积极性，通告提出实行保护女工条例，同工同酬，禁止买丫头等女工的特殊要求。^③

川陕苏区召开的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的女代表均达到或超过总代表的五分之一。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召开的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50余人，其中女代表30余人，被选进省苏维埃机构工作的有11名代表。8月1日，在巴中召开的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160人，其中女代表340余人，被选进省苏维埃机构工作的有32名代表。1934年12月，在巴中召开的川陕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440人，其中女代表360余人，被选进省苏维埃机构工作的有27名代表（见表3-1）。^④

表3-1 历次川陕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女代表人数情况表

省工农兵代表大会次数	召开地点	召开时间	到会代表数	女代表数	女代表所占比例	女代表当选委员数
第一次代表大会	通江	1933.02	150余人	30余人	20%	11（委员）
第二次代表大会	巴中	1933.08	1160人	340余人	29.3%	32（委员）
第三次代表大会	巴中	1934.12	1440人	360余人	25%	27（委员）

① 《“八一”反对战争日和中国红军成立纪念日的标语大纲》，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3页。

② 《川陕全省红军家属代表大会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

③ 《通告——为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运动事》，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8页。

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151、170页。

在严峻的军事形势之下，中共在川陕苏区专门召开了三次全省妇女代表大会，省委、省苏以及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对此高度重视，均亲自或派代表出席。川陕省委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于1933年9月15日在通江县召开，区、乡和部队的参会代表共约300多人，其中得胜、江口两地就有10名妇女代表出席。^①省委、省苏领导袁克服、熊国炳、余洪远、傅钟、张琴秋等同志出席大会并讲话。主要议题是动员妇女进行革命斗争，并贯彻执行川陕省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婚姻条例，讨论妇女怎样解放，实现与男子在政治上、经济上平等的问题。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于1934年3月8日在巴中召开，参会代表400余人，省委书记周光坦和李维海、刘瑞龙等同志出席大会。会议主要议题是进一步推动妇女工作和贯彻中共川陕省委决定的《妇女斗争纲领》。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于1934年9月在巴中召开，参会代表近400人，会期4天。会议主要议题是动员劳动妇女积极配合红军粉碎“川陕会剿”。^②

为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加生产，支援前线，做好防特捉奸活动，其时，各地苏维埃纷纷召开妇女大会。比如赤江县分别在1933年10月召开妇女党团员大会^③和12月25日召开全县妇女大会。^④1933年12月25日至28日，江口县召开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⑤

其他类型的会议中妇女代表人数亦为不少。比如川陕省第二次党团员代表大会到会总人数大概有二、三百人，妇女要占一半。^⑥各县、区、

① 中国共产党平昌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平昌县历史（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② 刘坚：《我在红军里》，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184页。

③ 《赤江县连日召开各种会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9页。

④ 《为动员群众消灭刘湘，各县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和其他各种会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6页。

⑤ 中共平昌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平昌县大事记（1921—2011）》（内部资料），2012年，第13页。

⑥ 李玉南：《川陕时期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35页。

乡、村的妇女代表人数更多，仅南江、长赤两县，女工农兵代表有 5600 人，女委员有 1560 人，女干部有 2500 人。^①

广大妇女在选举运动中用选票真正体现自己的意志，体现出她们对选举的主动参与和重视，加深了她们对苏维埃政府的信任度与休戚感，也使苏维埃政府具有合法合理性。

为尽快改变妇女干部严重缺乏的状况，川陕省苏维埃的选举并不完全实行苏区民众直选制。其时，党对于苏维埃的委员选举有拟定名单权，但不直接干预选举结果，各级政权、社会组织有推荐权。1934 年 3 月，川陕省总工会发出《通告——为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运动事》提到：“把顶积极勇敢的妇女工人提到选举大会上，要求大家选举她，当代表当委员等。”^② 但有一点值得肯定，经过组织推荐或提名的候选人要经过群众选举才有效。周纯全在川陕省党员代表大会上讲话强调：“苏维埃一定要经过选举。选举以前，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协会都提出名单，经过群众的通过。”^③

二、吸收妇女积极分子入党

妇女参政的骨干成员和核心成员均为党员。其时，党内有一种说法：“没有妇女的党，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④ 为加强党对广大妇女的领导，鼓励妇女积极参政，扩大妇女党员十分重要且必要。川陕省委在印发的文件、决议中多次强调要吸收劳动妇女入党，并建立支部，参与政权建设。比如 1933 年 7 月，川陕省委在印发的《对川陕白区工作决议

① 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7 页。

② 《通告——为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参加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运动事》，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368 页。

③ 《川陕第四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总结》，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27 页。

④ 《四川省委关于接受国际十三次全会提纲与五中全会决议的决定》，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87 页。

(草案)》中强调:“在各种群众斗争中,在反帝反日及拥护红军运动中,必须□积极勇敢的……劳动妇女介绍加入党,建立支部,逐渐形成这些地方的区委及县委组织。”^① 川陕省委宣传部还在各种纪念日发布反映党的方针、政策的标语,鼓励并吸收积极的女工农妇加入共产党。^② 当时发展党员的方式、程序以及批准权限为:“部队政治机关和工作队除个别考察教育吸收(一般是给红军带路、送情报和打土豪中的积极分子)外,还采取了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性质和主张,让群众自愿报名的办法。……开完大会后,将报名入党的人登记下来,进行谈话和调查,经政治机关审查批准,即履行入党手续,宣誓入党。”^③

由于中共的重视,要求加入共产党的妇女群众越来越多,妇女党员数量得到迅速发展,不少妇女积极分子在这一时期光荣入党。比如1933年1月,张庭福经袁克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④ 1933年初,肖志珍经陈光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⑤ 1933年2月,姚明善因成分好、工作积极,在通江参加“三八”纪念大会时,被批准为共产党员。^⑥ 1933年3月,14岁的刘坚由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经川陕省委书记袁克服和省团委书记郭先富介绍,由共青团员破格批准转为中共党员。^⑦ 1934年李玉南因在童子团、川陕少共省委妇女部、刘华工厂、新剧团表现优异,于当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⑧

① 《对川陕白区工作决议(草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② 《“八一”反对战争日和中国红军成立纪念日的标语大纲》，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8页。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8页。

④ 张庭福：《我当上了川陕省第一任妇女部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⑤ 肖志珍：《我的回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41页。

⑥ 姚明善：《在川陕省委宣传部工作的日子》，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⑦ 《刘坚——在艰难中磨砺自己》，瞭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传》，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页。

⑧ 李玉南：《我当上了少共省委妇女部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三、党政军群领导机关中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干部和工作人员

为提高妇女政治地位，中共在川陕苏区十分注意鼓励吸收积极的劳动妇女直接参加和领导各种相关工作，十分重视对妇女干部的培养。因此，川陕苏区妇女的参政状况得到很好的改善。川陕苏区党政军群领导机关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干部和工作人员。据不完全统计，川陕苏区政府机关中妇女干部将近占 25% 的席位。在省苏维埃政府中的省苏委员和内务委员中的妇女领导同志有 10 余人；省苏维埃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妇女委员、各部委的所有委员会干事等大小职员有 150 多名女同志。^① 苏维埃各级政府的内务、婚姻登记和文教部门，特别是在乡、区两级，妇女占绝对优势席位，而且多为相应机构的负责人。例如张庭福、姚明善、刘坚等先后担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吴朝祥、刘坚、李玉兰等先后担任少共省委妇女部长，李远清任省工会妇女部长，杨文局、雷明珍、赵映兰先后担任中共绥定道委妇女部长，彭玉儒担任中共红江县委妇女部长。当时各县均有妇女干部。据李秀珍回忆，川陕省苏维埃为支援前线，调集各县妇女干部组成妇女运输队，向万源前线运物资。^② 曾广澜曾任巴中市委书记，雷明珍曾任达县苏维埃主席。赤江、长赤、巴中、万源、仪陇等县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都是由女同志担任，杨文局、雷明珍、赵映兰先后担任中共绥定道委妇女部长，赵映兰担任中共宣汉县委妇女部长，彭玉儒担任中共红江县委妇女部长，赵玉香担任中共赤江县委妇女部长，殷秀山、康定珍先后担任中共南江县委妇女部长，吴朝祥、冯明英、尹洁尔、付文翠先后担任中共巴中县委妇女部长，殷秀山担任中共长赤县委妇女部长，熊明珍担任中共赤北县委妇女部长，尹洁尔担任中共江口县妇女部长，邹定朝、罗德英（又说是卢德英）先后担任中共红胜县委妇女部长，何莲芝、熊文珍、肖志珍、

① 不包括革命法庭、保卫局女警察和政府各部处的女子宣传队员和勤杂等工作人员。但并不表示革命法庭等机构中没有女性。比如 1934 年红胜县委革命法庭的主席就是一姓赵的女子。覃天佑：《宣汉早期革命的记述》，选自中共宣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宣汉党史资料》第 2 辑（内部资料），1983 年，第 81 页。

② 李秀珍：《从通江向万源前线运送弹药物资》，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曹锐先后担任中共万源县委妇女部长。^① 在各苏维埃政府后勤部门中，妇女的比重也很大，比如总供给部缝纫厂职工六百余人全是女同志。

具有一定的文化教育水平是妇女参政的前提，为保证广大妇女更好地履行参政权，提高参政议政水平，中共在川陕苏区十分重视妇女的教育问题，在颁发的各种斗争纲领、发布的标语口号、各种大会形成的决议中都明确提到妇女与男子一样享有教育权。例如《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广元县第一次党团代表大会决议（草案）》就明确提出“提高妇女文化教育政治水平线，热烈来参加苏维埃政权”^②。同时，中共通过举办各种训练班，选拔妇女干部到各学校去深造等办法，加速培养和锻炼妇女干部。

我们看到，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和激剧发展的革命洪流中，中共在川陕苏区推出的关于妇女参政的诸多举措实际上是围绕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而展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川陕苏区妇女以独立的政治主体身份参与各项社会工作，对于调动妇女的革命积极性，激发妇女的政治自觉、民主意识、主体意识和自身解放与发展意识具有极强的促进作用。

川陕苏区妇女的参政权在法律上有了保障并在实践中予以落实，极大地激发了妇女参与革命的热情，使她们在巩固后方安全，保证前线胜利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她们在政治生活中日渐活跃，广泛参加到各级苏维埃政权中，把坚决勇敢的分子和青年妇女选进苏维埃工作，把苏维埃中的腐败分子清除出去，使其成为真正代表群众的政权，要求政府颁布保护妇女的法令，恢复妇女在社会上应享有的一切权利等。她们承担后方大量的繁重工作，比如洗衣队、担架队、缝纫队、警卫、剿匪、通讯、运输军需物资，保证前方供应等，特别是这一时期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成建制的正规妇女武装——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因此，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川陕苏区妇女参政水平和程度“已经快要达

① 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77～78页。

② 《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广元县第一次党团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页。

到了列宁同志所说的‘要使每个厨房里面的妇女脱离管家婆的生活，直接参加管理国家’的任务。”^①

第五节 婚姻自由的实践探索

中国旧式的婚姻家庭制度，实行包办买卖婚姻，子女对婚姻没有自主权，家庭关系中，男女不平等。中共历来十分重视婚姻、家庭问题。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废除旧的婚姻制度，建立新式婚姻制度，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区域内社会改革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婚姻问题的法律法规，建立起一套与旧的婚姻观念、习俗不同，适应革命政权的新式婚姻制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地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③ 这就为苏区新式婚姻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宪法基础。其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法大纲》继续明确地表示承认婚姻自由：“为了全面地确保实现妇女解放的目标，苏维埃承认在婚姻选择方面的自由，它将实施各种计划来保护妇女。”^④ 1931年11月28日，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这个条例共分7章23条，包括总则、结婚、离婚、离婚后小孩抚养、财产的处理等内容。《条例》要求

① 《关于妇女工作》，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7页。

② 汤水清：《苏区新式婚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党的文献》2010年第4期。

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页。

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法大纲》，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297~298页。

废除封建残余，明确规定婚姻自由。强调“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条例》制定了结婚、离婚条件。规定：“结婚的年龄，男子须满二十岁，女子须满十八岁”；“男女结婚须双方同意，不许任何一方或第三者加以强迫”；“禁止男女在五代以内亲族血统的结婚”；“禁止花柳病、麻风、肺病等危险性的传染病症的结婚，如上述病症经医生验明许可者，可以结婚”；“禁止精神病及风瘫的结婚。”“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维埃或城市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废除聘金、聘礼及嫁装（妆）”；“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行离婚。”^①《婚姻条例》的颁发实行，使苏区妇女地位得到提升。“从前讨老婆要钱，现在可以自由结婚，自由离婚，不准男子压迫妇女，妇女得到了解放。”^②毛泽东对这种新式婚姻制度作了高度评价：“打碎了数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③1934年4月8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总结《婚姻条例》实践基础上发布命令，正式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共6章21条，包括总则、结婚、离婚、离婚后男女财产的处理、离婚后小孩的处理、私生子处理等内容。《婚姻法》肯定了由《婚姻条例》所确立的婚姻原则和制度，即“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④可以说，《婚姻法》是对《婚姻条例》的适当修改、补充和丰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婚姻条例》《婚姻法》，从国家意志层面以法

① 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选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2~233页。

② 《两年来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07页。

③ 毛泽东：《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江西省档案馆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页。

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红色中华》第180期，1934年4月26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227页。

律、法令的形式确定新的婚姻制度，成为苏区建立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的民主婚姻制度的权威依据，为广大苏区人民尤其是妇女反对封建的婚姻压迫和旧礼教的束缚，追求婚姻自由和在婚姻、家庭中的平等地位提供了法律保障。

川陕地区的妇女特别吃苦耐劳，温顺、俭朴、节省，而且是家庭内外劳动的主力，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婚姻家庭生活各方面，她们却没有自主性。婚姻自由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自从红四方面军进入通南巴，建立川陕苏区后，川陕省委、省苏顺应民意，践行推进妇女解放的政治承诺，将妇女解放问题列为社会革命的中心任务之一，翻印并下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等有关废除包办买卖婚姻制度，实现男女婚姻自由的婚姻法律制度。

1934年1月14日，川陕省委翻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①同年4月24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翻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婚姻条例》明确指出，女子要实现婚姻自由的保障或者说前提是进行土地革命，使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相当的自由。提出男女婚姻的原则：“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在结婚条件方面，《婚姻条例》第四条规定：“男女结婚须双方同意，不许任何一方或第三者加以强迫。”第八条规定：“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维埃或城市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在离婚上，《婚姻条例》确定离婚自由原则，但男女离婚需向所在地苏维埃登记。第九条规定：“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行离婚。”第十条规定：“男女离婚须向乡苏维埃或城市苏维埃登记。”关于离婚后的义务和责任，体现了对妇女和小孩的保护。比如夫妻离婚后小孩的抚养方面，《婚姻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所有归女子抚养的小孩，由男子担负小孩必需的生活费的三分之二直到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页。

十二岁为止，其支付办法，或支付现金，或代小孩耕种分得的田地。”第十五条规定：“女子再行结婚，其新人愿养小孩的，小孩的父亲才不负小孩的生活费之责。”离婚后夫妻财产的处理方面，《婚姻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男女同居所负的公共债务，归男子负责结偿。”第十九条规定：“离婚后男女均不愿意离开房屋时，男子须将他的一部分房子，赁给女子居住。”第二十条规定：“离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结婚，男子须维持其生活，或代种田地，直至再行结婚为止。”若男女未在苏维埃进行结婚登记而生育孩子，孩子的抚养费、生活费由男子负担三分之二，这在《婚姻条例》第二十一条有明确规定。不仅如此，对于违反《婚姻条例》的行为，苏维埃政府将依照刑法进行处理。^①

《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对各级苏维埃的婚姻登记机构及其职能作了明确规定。区苏由内务委员负责，县苏由内务委员会负责，省苏由内务委员会下设的婚姻登记处负责。^②

值得注意的是，《婚姻条例》虽然提倡男女婚姻自由，但是为解除红军将士的后顾之忧，激发他们向上进取、献身部队、建功立业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通过法律条例对军婚实行特别保护，体现了苏区对红军将士婚姻权益的高度重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红军伤亡抚恤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凡红军在服务期间，其妻离婚必先得本人同意，如未同意，政府得禁止之。”^③

中共在川陕苏区构建的新式婚姻制度，有利于突破传统的家庭结构和社会观念的束缚，同时，在贯彻《婚姻条例》的过程中，川陕苏区各级党政军群组织中的许多妇女干部常常深入农民家庭，启发妇女觉悟，与其丈夫、公婆谈心，参与调解婚姻家庭矛盾，使许多妇女摆脱了旧式封建婚姻的痛苦，极大地激发了她们的革命积极性。这些冲破封建婚姻

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7~59页。

② 《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149页。

③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红军伤亡抚恤条例》，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页。

家庭制度而获得新生的妇女们，从男人和家庭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把全部精力投入革命洪流中，普遍参与到中共领导的革命中，实现了从“家里的人”到“国家的人”这一过程的转变。徐向前对川陕苏区的婚姻制度及其作用作了全方位评价：“就拿婚姻自由来说，同过去的封建买卖婚姻比较，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苏维埃政府规定，凡男女双方办理结婚手续，必须做到‘男从女愿’。政府工作人员要当面问清，才予批准。如先问男方：‘你从的她啥？’男答：‘我从她人品好，劳动好，是穷苦人。’再问女方：‘你为啥愿他？’女答：‘我愿他人老实，心地好，打土豪积极。’审查时一定要妇女开腔，表示自愿才行，否则就不准登记结婚，得调查清楚再说。别看是个婚姻问题，动员妇女的作用可了不起。妇女们觉得自己的地位改变了，被当人看待了，生活有了希望。所以，她们的革命积极性很高，不愧是土地革命运动和反封建的先锋。斗地主、拥军、生产、戒鸦片烟、参加苏维埃和地方武装等活动，妇女都站在前列。第一次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有三十名妇女代表出席，有十一名被选进省苏维埃机构工作。有的妇女白天出来参加活动，晚上被封建家庭捆打、饿饭，第二天照样跑出来干。不屈不挠的精神，实在可嘉。她们在妇女组织领导下，担负起为红军做衣服鞋袜、看护伤病员、侦察敌情、运送粮食物资、代耕军属土地、动员扩红等任务，搞得十分出色，是党和红军的得力助手。”^①

虽然川陕苏区广大妇女的婚姻自由在法律上、文件上得到充分的保障，但由于所在区域农村传统的婚姻观念、家庭观念、宗法观念、地方观念浓厚，其长期耳濡目染的习惯礼俗仍然影响着她们的选择。因此，广大民众并非毫无保留地拥护苏区政府提出的婚姻自由政策，包办买卖婚姻并未能完全禁绝。1934年2月，在中江县委给省委的关于政治、组织路线和群众斗争的总结报告中有这样一个典型案例：

一个妇女群众自小即已订婚（包办的），今年已订期要结婚了，她因为对方是一土劣，同时不满意包办，即提起反对。县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页。

委对于这一斗争的策略路线是站在争取群众观点上，决定动员该地群众起来认识这一斗争，一方面是反封建，一方面是反豪绅，并极力援助，使这一斗争扩大起来。由于女子的母亲（是一同志）的反复不定，致婚期已迫近而无具体办法，女子只得自动走出来找组织帮助。县委即决定去一同志，召集群众，解释这一斗争的意义，并鼓动起来援助，一直走到杀豪绅的道路。殊因该地群众大都与豪绅及婚姻对象是同族关系，一方面宗法观念的浓厚和为封建思想所蒙蔽，只赞成反捐税，而不赞成反包办婚姻反豪绅，并且与组织形成对立，要求组织上把女子交出，交与别人接亲，否则破坏组织亦不顾惜。^①

该案例充分说明，其时婚姻自由以及《婚姻条例》并不易被部分农村地区的民众接受。因此，为尊重风俗习惯，团结广大穷苦劳动人民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中共在川陕苏区虽然极力提倡婚姻自由，但同时又规定党领导农村妇女婚姻解放和婚姻自由的界限，作出“党不应去启发农妇对农民婚姻斗争”的指示。^②可见，对于中国长期的习俗传统的改革，不是单纯政治力量的推动就可以一劳永逸的，而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才能成功。换言之，在传统的乡村伦理力量面前，即便是阶级斗争，也可能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六节 政治动员的效应分析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川陕苏区高度重视妇女这支力量，十分关心和支持妇女运动。在残酷战争环境下，中共发挥政权的主导作用，

① 《中江县委给省委的报告（新编中字第一号）——关于政治、组织路线和群众斗争的总结》，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40~641页。

② 《四川省委给中江县委的信——关于形势的分析和今后工作的指示》，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17页。

通过普遍建立妇女组织、提升妇女经济地位、发展妇女教育事业、提高妇女参政度、婚姻自由的实践探索等五维路径，对广大妇女进行了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动员，使其无论在扩红、生产、支前、战勤方面还是直接组织妇女武装方面，都发挥了潜能，并在这一过程中向世人展示了巾帼风采。正如黄道炫研究指出，苏区的建立，中共对妇女采取种种政治动员举措，妇女权利、地位发生极大变化，是中共最受广大妇女拥护的重要原因。^①

不断的战争及随之而来的进退，不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导致川陕苏区地域的“变定不居”，而且在整个时期成为影响苏区军民生存的主要矛盾，这也就决定了中共在川陕苏区对妇女的政治动员必须围绕着支持战争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也正因为如此，直到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之时，反复反思、摸索经验和逐步行进，成了中共在妇女运动中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特征。

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四川的妇女运动并未认真开展起来，妇女工作的成效不显著。“四川妇女运动向来是不注意的，自省委至支部是少有讨论到这一问题。”^② 成华反战运动时，党领导广大农妇、贫民妇女参加“吃大户”运动时，工作方式方法不正确，导致妇女们误解了共产党提出的“吃大户”的口号。^③ 即使在某些兵工厂妇女支部能够发动群众，组成几个人的姊妹团或者发展部分团员，但这主要由支部成员自己组织，而作为领导这些支部、群团组织的区委、县委则没有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比如成华区委不积极组织女工演讲，在领导妇女工作时不积极主动作为、

①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② 《秋霞致中央的报告——关于政治、组织、军事、工运、农运、C. Y.、妇运等工作情况》，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61页。

③ 《秋霞致中央的报告——关于政治、组织、军事、工运、农运、C. Y.、妇运等工作情况》，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2页。

存在官僚主义、关门主义的倾向。^① 1933年2月14日通过的《四川省委政治决议——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四川党的任务》，强调妇女工作对推动革命工作的重要作用，对过去四川党忽视妇女工作的工作作风进行严厉批评，并将之认为是“重大错误”，提出以后的中心工作之一是组织上加紧党的妇女工作。^②

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后，虽然提出关于妇女工作的各项主张和措施，也采取了多种形式对妇女进行动员，但川陕省委对妇女工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妇女工作开展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实质进展缓慢，川陕省“党的领导表现了落后，不能适应各种的方式组织广大劳动妇女的斗争，党的妇女部没有系统的工作”。^③ 各种机关中的妇女太少，妇女组织并未真正运转起来切实开展有效的工作。为巩固苏区和粉碎国民党四川军阀新一轮进攻，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对妇女工作了反思，号召川陕省委所辖各级党部“注意争取妇女特殊利益，从斗争中扩大党员中的劳动妇女数量，并注意吸收积极的劳动妇女参加各种领导机关工作”，要求“省委妇女部的工作要确实建立起来，加强对妇女的宣传教育，领导斗争”。^④ 在审定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中进一步强调要保护女工；重申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并真正将这些组织的工作开展起来，为红四方面军的前线战斗服务的指示。^⑤ 1933年7月，川陕省委印发的《对川陕白区工作决议（草案）》中又强调积极吸纳广大妇女加入工会、农民会组

① 《团成华中区区委一月份工作报告》，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98～599页。

② 《四川省委政治决议——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四川党的任务》，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③ 《关于妇女工作》，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7页。

④ 《中共川陕省党第二次大会组织问题决议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⑤ 《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

织，并切实建立妇女部的工作。^① 其时，根据中央组织局的指示，川陕省委要求下辖各级党部的“支部委员会必须经常分别地检查和讨论……贫农团妇女代表会工作以及反帝拥苏同盟和互济会等工作。在各个干事领导之下经过每个群众组织的积极分子把支委的决定运用到各个群众组织中去”。^② 同年12月11日，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特别将妇女运动单独作为讨论的议题，并通过《川陕省党在工会工作中的任务》，提出党要加强对劳动妇女的领导工作，健全妇女部的工作。^③ 川陕省委在1934年4月12日翻印中共中央1931年12月21日印发的《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和目前的工作决议》，重申和强调加紧女工工作的重要作用，要求在各级工会中，设立女工部，吸收女工加入工会，召集女工大会及代表会议，规定女工特殊要求的纲领，反对忽视女工的工作，提高女工的政治水平。^④ 1934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川陕省委对广元、南江、赤北、赤江、巴中等县的团部的妇女工作作了反思：“少先队、童子团内没有青年妇女参加，这是不好的。团对青年妇女发动工作非常不够，在广暴内要把青年妇女组织到少先队、童子团内去。”^⑤ 同年10月，周纯全在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川陕省委在党的群众工作包括妇女工作方面存在很多缺点，并强调重视妇女组织在分田分地、苏维埃选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求各级党组织、苏维埃要重视妇女的诉求。^⑥

与此同时，川陕省委、省苏下属各级组织也对妇女工作作了反思。

① 《对川陕白区工作决议（草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② 《中央组织局给苏区各级党部的指示信——关于健全地方支部生活的问题》，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4页。

③ 《川陕省党在工会工作中的任务》，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页。

④ 《苏区赤色工会的任务和目前的工作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7~268页。

⑤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川陕省委关于少先队、童子团的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5页。

⑥ 《川陕第四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总结》，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6~1127页。

比如1933年8月，赤北县苏在反思时承认，赤北县及下辖五区的妇女会等组织“大半没有，即有是形式的，十家人中选一代表”。^①广元县下辖各乡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在广元县第一次党团代表大会之前并未完全建立起来。^②

其时，中共领导的妇女运动的一大特色即是“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国家民族复兴”相融相嵌。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军阀的战争，不仅是军事战争，更是政治战争，而这种战争的胜负主要是由正确的政治策略与广大的民众力量来决定。这就决定了川陕苏区的妇女运动必须配合着前线军事战斗，服从并服务于苏维埃运动的总目标。对广大妇女自身而言，她们参与中共革命的初衷和原动力是获得自身解放，中共提出的男女平等为她们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机会。然而，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在政治动员的紧张节奏中，在国家和阶级利益至上的原则下，妇女运动并未给她们带来个性解放，女性空间的营造多依赖于革命活动。正如黄金麟所说，妇女运动“可能只是政治宰制和纪律化身体的重复操作”，“同时也是一次对身体的刻意雕琢和宰制。不管在战略和战术上，这种雕琢和宰制都是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③

由于传统乡村社会是一种以土地和血缘为纽带而结成的相对独立、稳定的复杂社会结构，导致了在中共革命进程中政治动员策略与实践之间存在着落差，政治启蒙与引领并不那么顺利，加之，中共选择的上述政治动员路径的时间是短暂的，因此，从实践上看，川陕苏区的妇女解放离文件上的宣言还有一定距离。在西达·斯考切波看来，“乡村的阶级关系和政治结构的永久性变革几乎或者根本没有发生，因此共产党也就无法最大限度地调动经济源泉和农民的人力资源。因为苏维埃的行政机

① 《赤北县工作情形和错误的报告》，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42页。

② 《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广元县第一次党团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页。

③ 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65页。

构比较初级，从未直接深入到地方基层去取代地方精英。并且，根据地的安全没有得到有效保障，也就没有为攻击地主和富农、分享共产党干部所没收财产的农民提供可靠保护。”^① 特别是传统习俗、乡村社会关系等乡村传统伦理逻辑的改变，例如上文所提到的婚姻习俗的彻底改变，非凭借中共的单向努力而能毕其功于一役，仍需要逐步渐进，经历一段时期的过渡与消融才能实现。

另外，川陕苏区肃反扩大化也对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产生一些阻滞作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在全党、各个苏区都在搞肃反并发生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对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在肃反工作中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致使一些人被无辜错杀。在这些被错杀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党的好干部、好战士和工农积极分子有的甚至是党政军的领导同志。他们被错杀，是革命的重大损失。”^② 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开展了针对外部敌人的社会镇反运动和反对“右派”“托陈取消派”“AB团”等为主的内部肃反斗争。在肃反中，许多优秀的妇女工作者和革命者被认定为反革命而被关押、审查、批斗或被杀害。如杨文菊因在一次党代会上为一位川北地下党同志辩护作证而几乎被清洗。^③ 史群英因读过书被认定为“AB团”分子，差点被处死。^④ 时任巴中道革命法庭看守队长曲飞因将自己的一条裤子给一位被审问的红军女战士而受到怀疑和审查。^⑤ 从而造成了打击面过大，影响了妇女工作的开展。

① [美]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7页。

② 《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人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民政部法规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法规大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793页。

③ 杨延礼：《杨文菊——幸存依然多壮志》，瞭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传》，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页。“杨文菊”也作“杨文局”。

④ 葛象贤：《史群英——在长征路上成长》，瞭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传》，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398~399页。

⑤ 宋冬昀：《曲飞——长征路上的红小鬼》，瞭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传增补本》，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页。

总之，在战时条件下，中共在川陕苏区对广大妇女进行政治动员的路径选择总体上看还是反映着依靠、发动妇女群众的立场。川陕苏区妇女在较短时间里获得解放，在经济上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和支配权，在政治上有了自己的地位，在文化教育上得到了与男子同等享受教育的权利，在组织上有了自己的团体，在法律上婚姻自由有了保障。当时的一份文件显示：川陕苏区妇女“得了完全的解放，分得了田地，找到了活路，当了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委员。他们有开会、结社、说话、婚姻的自由权。他们不受丈夫的气，实现了真正的男女平等。”^① 文件内容不免夸大之辞，但大体能反映苏区妇女精神的风貌、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实质性转变。正如有学者研究表明：“苏维埃时期所有的社会变化中，妇女地位的改变可以说最为引人注目。”^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川陕苏区妇女很大限度地实现了自身解放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良性互动，成为地位上升最快的群体。

① 《四川省委为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告劳动妇女书》，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4页。

②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页。

第四章 川陕苏区各种组织中的 女同志及其作用

川陕苏区大量党政军群组织中均设有专门做妇女工作的妇女组织或部门，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密切。不仅如此，在党政军群的各级机构中还有大量女同志从事战斗和工作，例如当时解决军民物质保障问题的造币厂、兵工厂、子弹厂、炸弹厂、脚码子厂、斗笠厂、被服厂、织布厂、制药厂、盐厂、农具厂等工厂里有大量女工人。^① 据李玉南回忆：“在红四方面军中，哪个部门没有妇女！妇女独立团就不用说了，全部是妇女；兵工厂、新剧团、被服厂、担架队、运输队、总医院、洗衣队、经济公社等部门妇女可能在一半以上。还有村一级、乡一级、区一级、县一级、省一级的政府，哪里没有妇女？哪里不是妇女与男同志一起工作，一起战斗？哪里不是半边天？村苏维埃妇女组织叫‘生活改善委员会’，乡区苏维埃叫‘内务’，县苏维埃叫‘妇女部’，省苏维埃叫‘内务部’，虽然名称不同，都是妇女的组织机构，都是做妇女工作的。这些组织机构充分调动了妇女的积极性，在革命中涌现了很多英雄人物。”^② 她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宗旨、方针政策，动员群众积极拥红拥苏，成为战勤工作战线上得力的生力军。她们在战火的洗礼与考验过程中，革命意志、政治思想素质、组织纪律性、军事能力得到锤炼和加强。鉴于妇女组织或部门的相关内容已在前面章节有具体而微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页。

② 李玉南：《要吃通江饭 妇女打前战》，中共通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2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77～78页。

的讨论，为避免冗杂，此处从略。本章重点对川陕苏区各种组织中的女同志及其在组织中发挥的作用进行阐述。

第一节 共青团、童子团、 少年先锋队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

共青团担负着动员女团员、女工、农妇来巩固红军后方的工作任务。1934年7月30日，少共川陕省委在翻印的《团在苏维埃中的任务决议》中提出，苏区团的战斗任务有组织女团员去看护队，吸收青年女工、农妇参加妇女运动，帮助党举行女工农妇代表大会，提出劳动妇女的特殊要求。^① 共青团发出动员口号：“穷苦青年妇女都要加入少先队，童子团！”^② 制定“告妇女群众书”，动员劳苦青年妇女姐妹拥护红军。比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川陕省委宣传部印发《为组织慰问队等告妇女群众书》号召：“劳苦青年妇女姐妹们：赶快组织慰问队、做鞋队、洗衣队，加紧拥护红军。鼓动自己的丈夫亲哥哥去参加红军，很快的消灭我们的敌人来纪念‘三八’。”^③ 川陕共产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号召劳动妇女动员其家人和亲戚参加红军。^④ 童子团、少年先锋队是以共青团为领导核心，主要由红军中的共青团员和原少共国际团的成员协助建立，从而把广大青少年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

童子团的任务是打土豪，站岗放哨，昼夜巡逻，检查路条，报告敌

① 《团在苏维埃中的任务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6~299页。

② 《动员穷苦青年消灭刘湘残部粉碎“川陕会剿”中心口号》，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2页。

③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川陕省第四次团员代表大会关于童子团工作决议（节录）》，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6页。

④ 《接受党二次大会决议和川陕共产青年团今后的任务》，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情，防止坏人破坏，抓恶霸地主，看管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传送文书，帮助困难户和红军家属担水砍柴耕地，积极参加扩红，认真学习文化，开展文娱活动等。^①李秀珍回忆：“在童子团里，……白天训练，我跟伙伴们扛着木头枪，从这山跑到那山，有的装成敌人，有的扮演红军，练习打仗，最后总是演红军的打了胜仗。晚上，我们就站岗放哨，查验路票。没有任务的时候，就集体唱歌，互相比赛，非常热闹。”^②为此，少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和中国共产青年团川陕省委宣传部分别印发《童子团站岗读本》及《童子团、少先队站岗问答》，用通俗易懂、浅白有趣、便于记忆的语言文字，将童子团的任务、纪律、政策、活动方法、注意事项等内容表述得清楚、简洁、明确，用以指导童子团站岗、查路票及盘问检查东西。^③比如在《童子团、少先队站岗问答》中规定了童子团站岗需要遵守的五条纪律：“（一）不准要过路人的东西、银钱。（二）不要睡觉。（三）不要离开岗棚，不要随便回家。（四）换岗的没有人来接岗以前，不准随便离开岗棚。（五）队长要负责经常查岗。”^④

童子团分男女两队，有青年女子担任童子团团长的情形。例如李玉南曾担任通江县童子团团长，领导团员四十余人。^⑤童子团中有不少女队员。杨清香十五岁加入童子团，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检查路条。^⑥卢勤先十四岁加入童子团，每天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看路条。^⑦王绍莲十二岁加入童子团，曾在长胜县保卫局看押犯人。^⑧邓秀英十三岁加入童子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页。

② 李秀珍：《从通江向万源前线运送弹药物资》，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童子团站岗读本》，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3~1084页。《童子团、少先队站岗问答》，共青团四川省委青运史研究室、四川省青运史研究会编：《川陕革命根据地青年运动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6年，第103~105页。

④ 《童子团、少先队站岗问答》，共青团四川省委青运史研究室、四川省青运史研究会编：《川陕革命根据地青年运动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6年，第104页。

⑤ 李玉南：《我当上了少共省委妇女部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⑥ 杨清香：《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保卫后方》，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⑦ 卢勤先：《宣传队冷场天也要下乡》，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⑧ 王绍莲：《我家四口人都参加了红军》，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团。^① 李秀珍十七岁加入童子团。^②

有亲人的童子团女队员往往跟在自己亲人身边，并在成人的部队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王绍莲跟随其母亲许才英在妇女独立团生活，经常执行把武器弹药运到前线，再把伤兵抬下来送往后方医院的战勤任务。^③

童子团肩负有宣传作用，其宣传内容主要是中共、红军和苏维埃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在宣传过程中，一般采用歌曲俚语的形式。方桂英回忆，红军解放巴中后第一个春节，在当时繁华的文庙街、草坝街、龙母宫挤满了看节目的群众，她当时在文庙街唱了一首《划彩船》：“往年过年苦情多哇，柳哇灯儿柳连柳哇，眼泪滚滚落哇，荷花柳灯儿海棠花。今年过年庆得欢哇，龙灯狮子连彩船啊，红军来了大翻身哇，红军是我们大救星啊，鞭炮阵阵响连天哇，快快乐乐过新年啊！”在龙母宫人群聚集处唱了一首《工农当红军》：“工人和农民，大家来革命。打倒土豪们，齐把政权争。穷人掌政权，一律都平等。要想政权稳，就要当红军。男女上前线，勇敢杀敌人。消灭国民党，就要靠我们。白军士兵们，劝你仔细听。都是穷苦人，何必去卖命。拖枪投红军，那才是正经。共同打军阀，中国才太平。”晚上在龙母宫举行“欢庆红军胜利解放巴中县城文艺晚会”上，通过演出歌曲宣传红军、党的纲领政策，歌词具体内容如下：

（领）霹雳一声震乾坤啦

（合）震乾坤啦

（领）打倒土豪和劣绅啦

（合）打倒土豪和劣绅啦

（领）往日穷人矮三寸啦

（合）穷人矮三寸啦

（领）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啦

① 邓秀英：《长征中我家八人死的死散的散》，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李秀珍：《从通江向万源前线运送弹药物资》，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王绍莲：《我家四口人都参加了红军》，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合) 如今是顶天立地的人啦
(领) 天下的农友要翻身啦
(合) 要翻身啦
(领) 自己当家作主人啦
(合) 自己当家作主人啦
(领) 一切权利归农会啦
(合) 权利归农会啦
(领) 共产党是我们的引路人啦
(合) 共产党是我们的引路人啦
(领) 粗黑的手掌大印啦
(合) 掌大印啦
(领) 共产旗帜照人心啦
(合) 共产旗帜照人心啦
(领) 梭镖梭镖握得紧啦
(合) 梭镖握得紧啦
(领) 坚决革命向前进啦
(合) 坚决革命向前进啦^①

童子团还担负动员自己的母亲拥护红军的任务。1934年通过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川陕省第四次团员代表大会关于童子团工作决议》规定：“童子团要劝自己的爸爸妈妈做鞋、打草鞋拥护红军。”^②

少年先锋队又称少先队，是工农劳苦青年的半军事与文化教育组织，也是红军后备军。其任务是：除了站岗执勤之外，平时主要开展军事训练和文化学习，战时则负责送信、运输，配合红军作战。李明贵回忆：“我们少年先锋队参加了三次进攻战役中的通讯与后勤供应服务。……苏区内的反革命和匪徒的活动十分猖獗，我们少年先锋队配合正规红军、

① 方桂英：《我是红军新剧团的女演员》，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川陕省第四次团员代表大会关于童子团工作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6页。

地方部队、游击队和赤卫队清剿土匪，缉拿反革命。我虽然没有真枪实弹拼杀，但通报情况，送信联络，也付出了极大的艰辛。”^① 杨洪玉回忆：“兴隆场乡的少先队，在巴中通向恩阳的大道上日夜不停地巡逻，警惕国民党的探子混入苏区。”^②

少年先锋队中有不少女队员。根据少共川陕省委的要求，16~23岁的女青年工农可以参加这一组织。^③ 1934年初，李玉南兼任少年先锋队总指挥长。^④ 李秀珍回忆：“我后来参加了少先队，少先队一共有三个班，吃饭的时候一个班一桶稀饭，也没什么菜，四周的豌豆尖才长出来就被吃光了。”^⑤ 女队员怎样站岗放哨？这在中国共产青年团川陕省委宣传部印发的《童子团、少先队站岗问答》中有规定：“问：少年先锋队怎样站岗呢？答：少年先锋队的女队员白天和童子团一路站岗放哨，身体强健的队员拿起刀枪梭（标）〔镖〕和赤卫军一路站岗。”^⑥

第二节 新剧团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

苏区时期，对广大民众而言，艺术和宣传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⑦ 可见，文艺工作的本质是政治宣传工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主要是围绕革命的中心

① 李明贵：《我终于把铜砖背到了通江苟家湾》，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杨洪玉：《我参加了仪阆县游击队》，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红色战士必读》，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58页。

④ 李玉南：《我当上了少共省委妇女部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⑤ 李秀珍：《从通江向万源前线运送弹药物资》，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⑥ 《童子团、少先队站岗问答》，共青团四川省委青运史研究室、四川省青运史研究会编：《川陕革命根据地青年运动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6年，第104页。

⑦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任务，进行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斯诺的夫人尼姆·威尔斯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戏院断乎不仅是娱乐，或一种唤醒社会意识的宣传工具。它是革命本身不可分的一部分。”^① 曾任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刘瑞龙指出：红四方面军的文艺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宣传红军政治主张、方针政策的基本工具。……其本质是宣传工作的一种形式”^②。在川陕苏区，专业性的文艺团体是新剧团^③，剧团的活动，“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战争的需要”^④。“所编节目现实性很强，和生活的距离很近，大都是红军的中心任务在舞台的反映。”^⑤

红四方面军每个军、师都有一个剧团。比如 1933 年 9 月程桂曾在红九军新剧团工作^⑥；反三路围攻胜利后，方桂英被编入红四军十二师新剧团当女演员，开始专职从事宣传工作。^⑦ 省苏所辖部分县苏亦成立有新剧团。比如 11 岁的孙克曾参加她家乡所在地的县苏维埃新剧团。^⑧ 总医院也有新剧团，规模与总政新剧团差不多。据熊云回忆：“总医院住通江县王家坪，下属九个医院，所以新剧团的规模很大，下设话剧队、舞蹈队、音乐队、新剧队、旧剧队……编制和总政新剧团差不多，也有较好的武器装备。在那里，主要是为伤病员演出，也为群众演出。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同志走到哪里把我们带到哪里。”^⑨

① [美] 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陶宜、徐复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5 页。

② 刘瑞龙：《红四方面军文艺工作略谈》，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54 页。

③ 因为新剧团演的反映穷人要求翻身解放的戏，与过去只演古代戏有区别，故称新剧团。程桂：《回忆在新剧团和妇女独立营的一段战斗经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 年，第 160 页。

④ 张星点：《忆红军时期的歌舞》，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73 页。

⑤ 赵明珍：《曲折的征程》，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30 页。

⑥ 程桂：《回忆在新剧团和妇女独立营的一段战斗经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 年，第 162 页。

⑦ 方桂英：《我是红军新剧团的女演员》，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⑧ 孙克：《红军和藏胞是一家人》，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⑨ 熊云：《红四方面军文艺宣传工作琐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82 页。

这些新剧团中，以红四方面军总政新剧团及其后来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社会教育科剧团合编成的“工农剧团”最为有名。1933年2月，川陕省委成立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把总政的十多个宣传队员组织起来，成立总政新剧团，即“蓝衫剧团”。4月，总政新剧团发展到20多人。5月，发展到50人左右。剧团为军事编制，导演任弼璜。下辖两个班，即男班和女班，其中，女班班长为施兰清，副班长为闽洪慈。剧团设扮演股、布景股和音乐股。9月，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总政“蓝衫剧团”与省苏维埃政府社会教育科剧团合编为“川陕苏维埃工农剧团”，简称“工农剧团”，群众称其为“新剧团”，直属川陕省委宣传部领导。任弼璜、杨中行、李维实、古安东先后担任新剧团负责人。^①此时，剧团专业人员保持六七十人左右的编制。随着苏区的扩大，对文艺宣传工作需求加大，1934年9月下旬，新剧团与政治部宣传队合并，扩编为四个分团，成立话剧队、舞蹈队、音乐队、旧剧队、歌咏队、宣传队（专写标语）等十余个队，人数约300余人，^②仍直属川陕省委宣传部领导，不久取消第三分团的番号。新剧团各分团按正规军队编制管理，一个分团大抵相当于一个连的编制，整个新剧团相当于一个营的编制。李玉南回忆，“新剧团中男女娃儿都有，一般十六、七岁，最小五、六岁。”^③其中，女队员占绝对优势。“剧团战士因常去各地演出，穿着比较整齐，女战士一律穿蓝、黑二色的尖领子列宁服，腰系皮带，头戴大八角帽，上缀红五星，打绑腿，穿草鞋，行军时腰挂手榴弹，干部挂匣枪，背上马刀和竹斗笠，英姿飒爽，健步如飞。”各分团均设队长、政委、总导演一人，导演若干人。以第四分团为例，“设队长、政委各一人。导演有于实甫、刘文泉、李忠渝、赵明珍、汪显臣等，于实甫为总导演。下面分话剧股、跳舞股、

① 李玉南回忆，余世恩也担任过新剧团负责人。李玉南：《川陕时期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38页。

② 熊云：《红四方面军文艺宣传工作琐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页。

③ 李玉南：《川陕时期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38页。

音乐股、道具股、化妆股，各设股长一人。跳舞股长黄光秀，音乐股长秦永厚，道具股长王定国，化妆股长李敏”^①。

新剧团的女演员一般具有活跃的特点且有一定表演天赋。方桂英因在童子团时能歌善舞，1933年春节在舞台和市集通过《工农当红军》《农友歌》宣传红军政策，受到上级领导肯定，在反三路围攻胜利后，她被编入红四军十二师新剧团当女演员，开始专职从事宣传工作。据方桂英回忆道：“从此，我挂上小锣鼓，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在巴城的每条街道我都向群众宣传过，巴城不少人都知道我是红军新剧团的女演员。”她经常在纪念日大会时，上台演唱《八月桂花遍地开》《红军最爱穷人家》《吃水不忘挖井人》《革命就要革到底》等红军歌曲，鼓舞和感染广大群众和将士。^②

新剧团的作用是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纲和主张，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红军的胜利。程桂回忆，其时新剧团宣传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宣传革命战争和建立苏维埃的伟大胜利，号召广大群众踊跃支前、参军；宣传红军和地方武装作战的英勇事迹，号召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保卫赤区。二、宣传各个时期红军和苏维埃的中心任务。如戒烟、分配土地等。三、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对广大劳苦群众残酷剥削压迫的种种罪行，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③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一）扩红宣传

新剧团主要通过演出题材新颖、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的歌剧《送郎当红军》、歌谣《扩红谣》《十劝夫》《少年先锋队》《共产青年团》《近卫军》、话剧《打土豪》《参加红军》《活捉田颂尧》、活报剧《庆祝川陕省苏维埃成立》《反动派吵嘴》、舞剧《农民舞》《儿童舞》《海军舞》

① 吕莹：《红四方面军总政剧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95～401页。

② 方桂英：《我是红军新剧团的女演员》，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程桂：《回忆在新剧团和妇女独立营的一段战斗经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60～161页。

《乌克兰舞》《工人舞》等等进行扩红宣传。在演出中，还散发红军政治部印发的宣传参加红军十大好处的传单，内容为：“1. 参加红军，分好田地。2. 参加红军，有人代耕。3. 参加红军，打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4. 参加红军，打国民党，不当发财人牛马。5. 参加红军，人人尊敬、拥护。6. 参加红军，家属受苏维埃优待。7. 参加红军，子子孙孙不出款子。8. 参加红军，保护穷人自己的利益。9. 参加红军，穿吃不愁。10. 参加红军，穷人坐天下。”^① 这些政策宣传方式对于红四方面军的扩大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程桂回忆：“记得第一次扩红宣传演出结束，立即就有几十人报名参军。”^②

（二）戒烟宣传

川陕边区，鸦片烟毒十分泛滥。种鸦片、吸鸦片、迷信鸦片的人特别多。徐向前回忆：“男女老少，不论生大病小病，都靠吸鸦片治疗。敬神敬祖，也把鸦片当供品，庙里的菩萨、土地老爷，嘴上抹的尽是烟膏子。”^③ 因此，红四方面军占据通南巴，建立川陕苏区后，立即开展戒烟运动，召开戒烟会议。而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妇女最相信红军和政府的宣传，最拥护戒烟的号召，成为戒烟运动的急先锋。新剧团中的部分女同志根据中共的指示，专门成立戒烟宣传队，召开各种形式的群众大会，除进行正面宣传外，还请一些人现身说法，讲吸食鸦片的危害和痛苦。通过宣传，很多吸鸦片烟成瘾的人都自愿接受戒烟治疗，从而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程桂回忆：“通江县第一次接受戒烟治疗的有一百多人，第二期就参加到千余人。区乡如洪口、王坪、永安、麻琢石、长滩河、毛浴、沙溪、镇龙、苦神滩等地参加戒烟的有七百多人。通过多种渠道的工作，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戒烟运动。一些吸食鸦片的壮年参加红军后在新兵营里戒烟，一般只要一期（2~3个月）即见成效，从而增强了部队

① 《红军政治部扩军传单》，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78年，第185页。

② 程桂：《回忆在新剧团和妇女独立营的一段战斗经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女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61~162页。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页。

的战斗力。”^①

（三）宣传苏维埃的政策及其伟大胜利

新剧团通过演出宣传苏维埃的政策及革命政权之不易。“剧团还配合新区土地改革作打土豪分田地的宣传演出。还派出小分队到支前运输队伍中去作宣传鼓动慰问演出。剧团还为苏区召开的各种大会演出，如召开川陕省全苏第三次妇女代表大会时，剧团和省委宣传部为大会联合演出了由何柳花（即廖承志）编导的话剧《黑暗里的红光》，反映地下斗争，有胜利，有牺牲。”^② 新剧团演出歌剧《八月桂花开》等节目，让广大群众懂得苏维埃是为工农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权。

（四）提升将士士气

新剧团善于运用文艺武器去提高部队战斗力和将士士气，注重行军中和战场上的鼓动工作。张星点回忆：“在行军途中，经常在人们疲劳的时候，就听到剧团或宣传队的锣鼓声，男女团员或宣传员的歌声和口号声；在战场上，可以经常听到剧团和宣传队响亮的喊话声。”^③

（五）瓦解敌军

1934年1月，红四方面军在东线战场与刘湘集团形成对峙局面。为揭穿刘湘军队中军官对士兵的反动宣传，新剧团女队员奔赴前线向敌军喊话，喊话内容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三省已被日本侵占了，蒋介石不抗战，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你们不爱国也算，可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当兵后，你们的老婆、孩子怎么受保长、甲长的欺侮？怎么受保长、甲长的压迫剥削？”有时，女队员们也用娓娓、凄凉的声调

① 程桂：《回忆在新剧团和妇女独立营的一段战斗经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61页。

② 吕莹：《红四方面军总政剧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02页。

③ 张星点：《忆红军时期的歌舞》，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页。

向白军唱歌，其歌词为：“穷人生的……唉，没有粮食卖，只好上山去砍柴，挑到街上卖。早起未天光，落雨又落霜，一路走来一路晃……”同时，女队员们除政治宣传外，还唱一些民歌以勾起敌军的思乡之情，比如《十把扇子恋恋》。这些宣传攻势在敌军中产生很大影响，东线一些战场的国民党士兵“对我军的政策加深了了解，跑过河来和我们讲话，给我们送子弹。以后敌军官强迫他们进攻时，好多人抵制上级的命令，红军一追击，马上举枪当俘虏”。^①

新剧团在宣传时还制作了许多特殊“传单”。熊云回忆：“这种‘传单’是把竹子锯成一尺多长，再破成二指多宽，晾干后，把我党、我军的纲领、政策和主张写在上面，再用桐油漆好，晾干了撒放到河里去，让它顺流而下。”这种方式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极大地扩大了中共、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在一定程度瓦解了敌军的斗志。^②

（六）教育感化俘虏

反六路围攻期间，红四方面军先后共毙伤俘敌八万余人，基本上恢复了川陕苏区鼎盛时期的辖区。此时，新剧团的文艺宣传工作之一是教育感化俘虏。例如1934年9月，新剧团队员在巴中东门外和得胜山为被关押的2000多名俘虏演出《苛捐杂税》《拉夫》和《优待红军家属》等剧目，启发其阶级觉悟。演出结束后，剧团男女队员又分别给俘虏作思想工作，产生了显著宣传效果，“有的当场退还了发给他们的资遣费，要求参加红军；去打地主、老财和吸血鬼”^③。队员们还到营山县为大约3000名俘虏兵演出新编歌剧《劝郎回头》，节目使在场俘虏心灵深受触动，全剧结束后，1000多名俘虏兵报名参加红军。^④

① 熊云：《红四方面军文艺宣传工作琐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381页。

② 熊云：《红四方面军文艺宣传工作琐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81页。

③ 吕莹：《红四方面军总政剧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01页。

④ 熊云：《红四方面军文艺宣传工作琐忆》，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82~384页。

第三节 各级宣传队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

红军不仅是战斗队，还是宣传队、工作队。正如西达·斯考切波所指出的，“为了建立‘军民鱼水关系’，红军不但从事战争，同时还承担了经济与政治宣传活动。”^① 红四方面军入川，开辟川陕苏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宣传队（工作小分队），为群众“挑水、砍柴、背粮、背煤、烧饭、肩娃儿、扫院子、修房子、喂猪喂牛……不论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干起来又内行”，从感情上同群众打成一片，短时间内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② 目前，学界关于川陕苏区宣传工作的研究取得部分成果^③，然而，就笔者目力所及，这些成果对川陕苏区各级宣传队中的女同志这一群体关注和研究不够。鉴于此，笔者尝试运用有关川陕苏区的文献资料和口述回忆资料，对川陕苏区各级宣传队中的女同志这一群体及其在川陕苏区发展壮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探讨。

川陕苏区的宣传系统，既包括中共川陕省委领导下的各级党政地方宣传教育机构和红军内部的宣传教育机构等专门的宣传机构，也包括承担部分宣传教育工作的其他机构。这两大宣传机构中存在数量巨大的专门宣传队和临时宣传队，且女宣传队员占有相当的比例，保障了党的宣传工作和革命事业的有效开展。

红四方面军及下辖各军、师有宣传队，分别隶属于总政治部及各军、

① [美]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05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7页。

③ 主要成果有：牟锦德、朱华：《川陕苏区时期的宣传工作》，《宜宾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施诗然：《从档案看川陕苏区的宣传教育工作》，《四川档案》2011年第4期；张国新：《川陕红军石刻：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独特形式和文化景观》，《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李万斌、陈岗、何志明：《刘瑞龙与川陕苏区宣传工作成效简论》，《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6期；徐林轩：《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述论》，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朱晓舟：《川陕革命根据地“扩红”运动宣传试探》，《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2期；等等。

师政治部，其中女队员所占比例很大。吴朝祥回忆：“在军队中各级宣传队……工作的，大多数也是女同志。”^① 红四方面军进入通江后，成立总政治部宣传队，共有四五十人，下分为粉笔队（用石灰或颜料在墙上写标语）、张贴队、钻字队（将标语钻在石崖或大石头上）、宣传队。第一任队长是陶万荣，^② 后为陈五洲。^③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的宣传队由军的医院剧团和军政治部所属的宣传队合并组成，共有三个分队，第三分队共10人，其中女队员有6人，年龄均为12岁左右。^④ 红三十一军扩红宣传队有三四十人，其中一半是女同志，女宣传队员班长严勇，此外，女队员还有边程贤、张欣义、罗思婷等同志。^⑤ 伍兰英担任过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宣传队长。^⑥ 卢勤先所在的宣传队一直跟着红三十军。^⑦ 红三十三军宣传队有50多人，里面绝大部分宣传队员都是女性，比如郭长春、王秀英等人。刘湘集团组织“六路围攻”期间，红三十三军宣传队每五六个人为一组，组织成十几个火线宣传组，郭长春负责的第一组有4人，其中3人是女同志。^⑧

中共川陕省委领导下的各级地方党政专门负责宣传工作的机构是设立于中共川陕省委、县委和区委下的宣传部。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中有专门的宣传队，有200余人，由青年、妇女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宣传党、苏维埃和红军的政治主张。省、县、区、乡苏维埃有宣传队。苟兴寿回

① 吴朝祥：《巴山妇女在战斗中成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页。

② 陶万荣：《忆在烽火弥漫中的巴山妇女》，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女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25页。

③ 解成秀：《回忆当宣传员的片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13页。

④ 冉光照：《为了理想的社会——忆红军时期宣传队的一段生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88页。

⑤ 史群英：《“八月的桂花”》，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50页。

⑥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页。

⑦ 卢勤先：《宣传队冷场天也要下乡》，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⑧ 志文、金晖：《红军女连长——郭长春》，菡子主编：《女兵列传》第3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167、170、171页。

忆：“曲家山的苏维埃政府成立起来了，苏维埃的宣传队配合红军的宣传队，到处开会到处宣传。”^① 1933年2月，14岁的周明在南江县宣传队当宣传员。^② 姚明善回忆：“区苏维埃派来宣传队讲打土豪、分田地，穷人要当家做主，妇女要翻身解放的道理，发动群众建立乡苏维埃。”^③ 另外，各级工会、青年团等群团组织中也有宣传队，且女同志占有较大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宣传队因相应部队整编或机构调整而时有兴废。比如红三十三军整编后，宣传队被编为军部女子警卫连，郭长春任连长。^④

宣传队的女队员一般具有唱歌、跳舞等兴趣爱好和表演天赋。王希云回忆：“我从小爱唱爱跳，嗓音又好，听见红军唱歌我也跟着唱，在童子团站岗的时候，一有空就唱。”^⑤ 刘绍映回忆：“在部队里，我机灵活泼，能歌善舞。”^⑥ 红四军宣传队舞蹈组组长王新兰“念过书，聪明伶俐，长得非常可爱，性格也十分活泼，舞蹈跳得最好，是我们队女孩子中的佼佼者”。^⑦ 卢勤先因“精灵，爱说爱笑，爱唱爱跳”，在童子团不到两月就被调到红三十军宣传队。^⑧ 史群英想加入红三十一军扩红宣传队，时任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张成同问的问题就是“当宣传队员？你会唱歌、跳舞吗？”^⑨ 杨清香回忆：“我听见别人唱歌的时候，也跟着哼起来，由小声唱到放声高歌。真没想到，我有一个甜甜的清脆的嗓子，一开口唱，

① 苟兴寿：《曲家山的苏维埃成立起来了》，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周明：《我到南江县宣传队当宣传员》，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姚明善：《永不忘艰苦的岁月》，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91页。

④ 志文、金晖：《红军女连长——郭长春》，菡子主编：《女兵列传》第3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⑤ 王希云：《我们在巴中搞了很多次扩红宣传》，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⑥ 刘绍映：《我是个不怕死的哈》，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⑦ 冉光照：《为了理想的社会——忆红军时期宣传队的一段生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88页。

⑧ 卢勤先：《宣传队冷场天也要下乡》，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⑨ 史群英：《“八月的桂花”》，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50页。

就把周围的人吸引住了。”于是她被调到红三十一军宣传队工作。^①

宣传队员很辛苦，他们每天登台演出、走乡串户、在路边显眼的岩石上和群众住户的墙壁上书写标语口号，天天都是早出晚归。王希云回忆：“当场天在台子上搞宣传，为了吸引听众，先要敲锣打鼓，人多了先唱歌、跳舞或打一段快板，之后才正式讲演。”那时，经常唱的快板是《红军到》，歌谣则是《送郎当红军》《十送红军》《妇女参军歌》《戒烟歌》等。^②表演节目后，宣传队负责人就向群众宣传，宣传的主要内容：“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幸福的，工农群众只有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拧成一股绳，消灭军阀田颂尧，打倒土豪劣绅，穷人才能过上好日子。”^③冷场天，宣传队则是提着石灰桶跟着会写字的队友在墙壁上、石岩上写标语。^④

宣传队表演的节目形式丰富多样，脍炙人口、喜闻乐见、通俗易懂，有活报剧、双簧、歌剧、舞蹈、顺口溜、快板书等。史群英回忆：“我们表演的节目，有自编自演的，也有根据传统剧目、民间小调、山歌重新改编的。有小歌舞，也有顺口溜，快板书，形式多样，生动活泼。我记得当时经常表演的节目除了《八月桂花遍地开》^⑤以外，还有歌颂党的领导的自编歌曲《共产党真正确》；有歌颂徐向前总指挥的春节小调《划龙船》；有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的顺口溜《问老王》；有瓦解敌军的快板书《消灭刘湘三字经》。”^⑥这些节目内容都是紧紧围绕当时的中心工作而编排，对宣传革命思想和激发革命斗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刘绍映回忆，宣传队“主要任务是围绕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采用唱歌、跳

① 杨清香：《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保卫后方》，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王希云：《我们在巴中搞了很多次扩红宣传》，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史群英：《“八月的桂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48~349页。

④ 王希云：《我们在巴中搞了很多次扩红宣传》，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⑤ 关于《八月桂花遍地开》这首歌谣的诞生地有湖北红安说、安徽金寨说、河南商城说、河南新县说。参见桑俊：《红安革命歌谣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第110~119页。

⑥ 史群英：《“八月的桂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51页。

舞等形式，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宣传红军的宗旨和方针政策，动员青年报名参军”。^①

具体而言，各级宣传队中的女同志在川陕苏区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扩红拥军宣传

川陕苏区所辖区域进行过多次扩红拥军宣传，动员贫下中农的子弟去参加红军，号召广大妇女给红军做军鞋、打草鞋、做衣服。田国伦回忆：“打下营山、达县之后，到处宣传扩大红军。”^②反刘湘集团六路围攻期间，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群众，武装群众，扩大红军。”^③卢勤先回忆：“1933年冬天敌人对我们发起围攻，我们宣传队的首要任务是，一方面向老百姓报告红军打胜仗的好消息，一方面动员贫下中农的子弟去参加红军。当场天我们也要搭起台子搞宣传，演唱《送郎当红军》、《十送红军》、《妇女参军歌》等，老百姓都很喜欢听，喜欢看。一场宣传完了之后，报名参加红军的很多。”^④史群英回忆：“我们常常分散到各村各户去做扩红的宣传工作。每到一地，先敲锣打鼓，表演节目，把群众吸引过来。等人来多了，就发表讲演，宣传革命道理，讲军阀田颂尧，刘湘如何欺压百姓，讲共产党如何正确，讲参加红军的好处。然后，号召青少年自愿报名当红军，遇有报名参军的，当即就派人送政治部审查后编入部队。”^⑤14岁加入南江县宣传队的宣传员周明回忆：“贴标语，喊口号，动员群众起来闹革命，打倒地主恶霸，支持红军和参加红军。”^⑥张永芳回忆：“我经常到响滩子、黑水滩召集贫下中农开会，还到大柏垭、龙背场、双凤场、马鞍场，还到大罗、鼎山、青龙坎，每到一个地

① 刘绍映：《我是个不怕死的哈》，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田国伦：《打恩阳时天天都要送信》，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史群英：《“八月的桂花”》，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50页。

④ 卢勤先：《宣传队冷场天也要下乡》，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⑤ 史群英：《“八月的桂花”》，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50页。

⑥ 周明：《我到南江县宣传队当宣传员》，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方，先召集苏维埃干部研究，再定时间定地点召开群众大会。每次开会前宣传队都要演节目，比如《送郎当红军》、《十送红军》、《妇女参军歌》，在会上多半是讲红军打胜仗的消息，动员贫下中农的子弟参加红军。”^① 当时有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的快板书《消灭刘湘三字经》：“同志们，加紧干，灭刘湘，在眼前。大家来，武装起，当红军，打游击。……同志们，共上前，灭刘湘，要争先。”^② 宣传队进行扩红宣传时，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采取灵活多变的宣传策略。卢勤先回忆：“有的贫下中农家的子弟，他本人想参加红军，就是家中的老人舍不得。这时候我们就要向老人耐心宣传，以前的日子为什么这样穷？是因为有军阀、财主他们不甘心，他们又要回来像从前一样整我们。我们怎么办？只有参加红军同他们斗争，我们的好日子才保得住。一些老人家经过我们这样一宣传，都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娃儿送去当红军。”^③ 王希云回忆：“你愿不愿意参军啊，在红军里吃平等，穿平等。”“我们向他们讲国民党的坏处，整老百姓，派军款，修洋房，军阀土豪欺压穷人。穷人没吃没穿，财主吃好穿好，穷人要想过上好日子，只有拥护红军，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④ 各级宣传队中的女宣传队员又是战勤工作中的生力军，她们积极动员广大群众拥军支前和参加战勤工作。卢勤先回忆：“那时我们宣传队下乡的时候，还要求家家户户凡是会做鞋的，都要给红军做军鞋。老百姓都很积极，都拥护红军，我们宣传队离开的时候，老百姓用滑竿抬着满满的鞋子、满满的猪肉，同我们一路送到红军的部队里。”^⑤

通过深入的宣传，父母送儿女参军、妻子送丈夫参军的事例层出不穷。驻扎在玉井寺一带的红十二师三十六团在玉井寺举行的扩红大会之后，“就有两三千名青壮年来报名参加红军，出现了父送子、母送子、妻

① 张永芳：《长胜县扩红工作受到了川陕省的表扬》，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消灭刘湘三字经》，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8页。

③ 卢勤先：《宣传队冷场天也要下乡》，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王希云：《我们在巴中搞了很多次扩红宣传》，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⑤ 卢勤先：《宣传队冷场天也要下乡》，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送郎、父子、夫妻报名的动人情景。还有的放牛娃、童养媳正在坡上干活，听说红军招兵，扔掉放牛鞭、草背篋就跑去报名参军。玉井乡土庙村一个姓杨的童养媳，正背着背篋割草，听到垭口上几个女红军宣传参加红军能吃饱饭，不挨打骂，当时就光着两只脚板跟着红军走了。”^① 张永芳回忆：“不少十六七岁的男孩子、女孩子参加了红军，我们长胜县的扩红工作还受到了川陕省的表扬呢。”^② 刘桂芳所在宣传小分队在下八庙宣传一个多月，使 100 多人加入红军。^③ 史群英回忆：“有一段时间，我差不多每天都要扩大两三个红军。”^④ 为此她受到宣传队的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刘坚和宣传队在德石山等地宣传，使四十多名男同志、十多名女同志加入红军。^⑤ 解成秀回忆：“五、六天时间我们便动员了青年男女三十余人参加了红军，我一人在一个村子里就动员了五个女同志。并动员了群众支援红军的粮食、柴草和草鞋各一部。”^⑥

（二）宣传中共的宗旨、基本纲领和方针政策

有不少女宣传队员通过在当场天演唱快板《红军到》宣传中共的基本纲领和方针政策，其词云：“公鸡叫，红军到，太阳升，穷人笑。麻耳鞋，八角帽，手榴弹，盒子炮。倒苦水，把仇报，斗劣绅，打土豪。苏维埃，成立了，分田地，真热闹。爷爷喜，婆婆笑，妈熬夜，做军袄。姐妹们，绣荷包，童子团，放岗哨。严盘查，看路条，是坏蛋，跑不掉。

① 张友慧：《我去太平山送情报》，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张永芳：《长胜县扩红工作受到了川陕省的表扬》，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刘桂芳：《我特别爱唱〈戒烟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史群英：《“八月的桂花”》，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52 页。

⑤ 《刘坚——在艰难中磨砺自己》，瞭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传》，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52 页。

⑥ 解成秀：《回忆当宣传员的片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14 页。

一条心，家乡保，苏区里，真美好。”^① 张庭福回忆：“红军是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当家作主，妇女翻身求解放的。……我连同自己的苦难生活也讲给她们听。”^② 张永芳回忆：“我还到川陕省去开过三次大会，去一次要六七天才能转来。散会回来以后，立马就去宣传，召开村、乡大会，扩大红军。”^③ 孙开美回忆：“（宣传队）主要就是写一些标语，到百姓家中去为他们讲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说我们的红军好，红军是来解放贫苦农民的，又给他们的家长做工作，让家长叫自己的娃儿去参加红军。”^④ 王绍莲回忆：“红军就讲穷人为什么没饭吃的原因，讲只有革地主豪绅的命，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粮食土地分给穷人，才会有饭吃，有衣穿，才再不会给富人抬滑竿。”^⑤ 杨清香回忆：“每天在街上，红军宣传搞得热火朝天的，向大家宣传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为穷人闹翻身的队伍，只有打倒土豪劣绅，平均分配土地，穷人才能过上好日子。”^⑥

（三）提升将士士气

为鼓舞将士士气，女宣传队员还在部队行军中执行宣传鼓动的任务，经常演唱《八月桂花遍地开》以及表演军人舞等。^⑦ 冉光照回忆：“宣传队最经常的任务是部队行动中的宣传鼓动。每次行军，部队首长派一个连队和宣传队一起提前出发，在部队经过的山顶、路口设鼓动站，当部队最疲劳的时候，我们就喊口号，打金钱板，说三句半，演奏乐器。……我

① 卢勤先、王希云、杨清香在口述回忆中均提到宣传队曾通过演唱快板《红军到》宣传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基本纲领和方针政策。参见卢勤先：《宣传队冷场天也要下乡》，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杨清香：《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保卫后方》，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王希云：《我们在巴中搞了很多次扩红宣传》，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张庭福：《我当上了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张永芳：《长胜县扩红工作受到了川陕省的表扬》，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孙开美：《我就是不同意回家去》，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⑤ 王绍莲：《我家四口人都参加了红军》，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⑥ 杨清香：《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保卫后方》，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⑦ 刘绍映：《我就是个不怕死的哈》，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们经常演奏的是民谣，还有《马赛曲》。七八根笛子的合奏，也颇为动人。一面洋鼓一敲，也能振奋士气，疲劳不堪的队伍，顿时鼓足了劲头。”^①

（四）戒烟宣传

川陕边区鸦片烟毒十分泛滥。王希云回忆：“当时四川军阀、财主豪绅强迫人民种植鸦片烟，老百姓被害苦了。”^② 因此，红四方面军占据通南巴，建立川陕苏区后，立即开展戒烟运动。苏维埃各级政府运用川北当地的民歌俚曲、民间小调创作大量戒烟快板、《戒烟歌》，派遣宣传队到处宣传、演唱。王希云、刘桂芳均回忆，她们在宣传队时给抽鸦片的人演唱过关于戒烟的快板：“鸦片烟，毒最深，吸了它，要成瘾。既花钱，又损身，一害己，二害人。身体瘦，一把筋，走起路，没精神。哪有劲，把田耕，日愈久，家愈贫。损家业，短寿命，幸福日，难享成。劝告父老们，赶快戒烟瘾，身体健康了，一家喜盈盈。”^③ 女宣传队员经常在新兵入伍联欢会上演唱《戒烟歌》。^④ 不仅如此，宣传队在戒烟宣传中，还到处书写戒烟标语：“穷人吸上鸦片烟，面黄肌瘦，消磨斗志，哪能去打匪首刘湘”。^⑤

由于川陕省委、省苏、红四方面军及其各自下属机构采取系列有效举措，加之广大女宣传队员的积极宣传，使戒烟运动短期内收到良好效果，^⑥ 通南巴一带吸烟的人大大减少。徐向前回忆：“仅巴中县城，戒烟的人数即达千人以上。”^⑦

① 冉光照：《为了理想的社会——忆红军时期宣传队的一段生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89页。

② 王希云：《我们在巴中搞了很多次扩红宣传》，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王希云：《我们在巴中搞了很多次扩红宣传》，刘桂芳：《我特别爱唱〈戒烟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172页。

⑤ 刘义先：《我们到处书写禁烟标语》，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⑥ 关于川陕苏区戒烟运动的研究，可参考何先成：《再论川陕苏区的戒烟运动》，《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⑦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页。

（五）瓦解敌军

宣传队经常冒着敌人的炮火进行战地宣传。其时，川陕省委号召各地积极从政治上瓦解敌军。根据省委指示，中共苍溪县委决定从少共苍溪县委和扩大红军宣传队里抽出部分人员组成火线宣传队，在与敌军对峙时上前线发传单，进行战地宣传。女宣传队员们在战壕里拿着话筒向敌军喊话。王希云回忆当时向国民党军队喊话的主要内容是：“国民党，没名堂，派军款，修洋房，洋房修起了，接来太太把福享。当兵的，真作难，当兵当了十几年，身上没有半文钱。”天天对着川军唱快板书：“川军兄弟们，你们都来看，帝国主义坏，我们要推翻。跟着共产党，穷人掌政权。共产党，要成功，帝国主义不中用，穷人夺政权，人人都有功。当兵莫当军阀兵，当官的军阀要打人。努力努力向前进，打倒不平等，不平等要除尽，还要把土地分，创造新世界，革命要完成。”^①这些宣传攻势使部分川军倒戈投诚。解成秀回忆：“由于我们经常性的瓦解敌军工作开展较好，经常有向我投诚的敌人，还有敌人多次向我缴械。”^②王希云回忆：“有一天晚上，有一个连的川军带着枪过来了，参加了红军。”^③郭长春回忆：“据后来俘虏的敌士兵说，他们听了我们女战士的宣传，脑袋瓜开了不少窍，都不愿意在国民党部队中当兵，想通过各种办法早日离开，有的虽然还继续当白军，但也只是为了‘关饷’顾家糊口，可一听到枪响，就撒腿往后跑。”^④

总之，川陕苏区宣传队中的妇女围绕当时的政治、军事斗争，每天登台演出、走乡串户，采用双簧、歌剧、舞蹈、顺口溜、快板书等节目形式，或在路边显眼的岩石上和群众住户的墙壁上，书写标语口号，天天都是早出晚归，十分辛苦。她们为支持革命战争、拥护红军、维护苏

① 王希云：《我们在巴中搞了很多次扩红宣传》，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解成秀：《回忆当宣传员的片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页。

③ 王希云：《我们在巴中搞了很多次扩红宣传》，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志文、金晖：《红军女连长——郭长春》，菡子主编：《女兵列传》第3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

区付出巨大牺牲，体现了妇女在伟大社会变革中的奉献精神和战斗力量。

第四节 工厂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

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川陕苏区后，为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巩固和发展川陕苏区，中共川陕省委、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省苏维埃政府以军办、军政合办、政府筹办等形式建立和发展苏区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

1933年1月、2月，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组建被服厂、纺织厂、染整厂、脚码子厂、斗笠厂和总医院被服厂等6个工厂。同年4月，川陕省苏维埃总工会建立以刘华烈士命名的“刘华工厂”。据统计，到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含军、师、团）直接办的工厂有19个，工人达2500多人；军政合办（含省、县）的军需工厂有5个，工人达1000多人；县苏办的军需工厂10个，工人达500多人。^①川陕苏区军需工业的最高管理机构是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后改为总供给部），各军、师、团设有经理处和供销部。民用工业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川陕省苏维埃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的建设局，建设局领导各地开办铁厂、盐厂、锅厂、煤厂、缝纫厂等。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均主要是支援革命战争，围绕着军事战争而存在。由于大量的青壮年男子在前线作战，除开一些技术性很强的工种是男子外，工厂中大部分工人是女子，她们成为后方工厂生产的主力军。

下面重点对红四方面军被服总厂中的妇女工兵营、刘华工厂、红三十军被服厂、绑腿厂等工厂中的女工及其在工厂中发挥的作用进行讨论。

一、红四方面军被服总厂中的妇女工兵营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在通江南岭上成立被服厂，当时

^① 《川陕苏区的军需工厂》，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军需工厂简介（1927—1949）》（内部资料），1988年，第33页。

被服厂只有张茶清、何福祥和刘照林三人，这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建立的第一个被服厂。2月，被服厂与兵工厂分开，驻蹇家山。不久，为确保反三路围攻期间前方的供给，总经理部将林月琴、赵正富、刘伯兴、郑克明、邓廷郁、李志明等几十人调进被服厂，并成立红四方面军被服总厂，共300余人。被服总厂分男工厂和女工厂。林月琴、王泽南、刘伯兴等100多名女同志组成女工厂。总经理部将女工厂编为一个连。刘照林回忆了女工厂组建时的情况：“林月琴任连长，王泽南任指导员。下面分三个排，每个排又分三个班，我当一班班长。人越来越多了，编到十八个班，每个班二十多人。我从一班班长当到十八班班长，又叫我当排长。”^①10月，宣达战役缴获刘存厚军需工厂的全部机器设备和军需物资，总经理部用这些设备充实被服总厂，工厂人数随即增加。因女工厂的作风很像战斗部队，总经理部部长郑义斋等决定增加女工厂编制，并将其改名为妇女工兵营，驻通江，共200余人。营长林月琴，政委王泽南，副营长刘伯兴（即刘伯新），秘书、教员杨文局。工兵营除一名管理排长为男同志外，其余全为女同志。^②工兵营最初设两个连：一连连长邓廷郁、指导员吴兰英；二连连长贺福祥（开始是何文青）、指导员舒秀英（后为赵顺德）。随着苏区面积扩大，红军人数成倍增长，被服总厂的生产能力已无法满足主力红军的需要，因此，被服总厂派遣张茶清、赵正富和刘照林三人到恩阳河组建被服分厂。

恩阳被服分厂设在恩阳河东北面靠巴中城方向的一座三合面大院里。后来该厂发展到女工120余人。由于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1934年6月，恩阳被服分厂转移到通江与妇女工兵营合并，成为工兵营第三连，张茶清任连长，赵正富任指导员。不久，三连部分同志调至总医院，其余人员合并至一、二连。一连由营长林月琴负责，随总厂行动，驻通江苦草坝生产；二连由政委王泽南负责，随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经理处驻洪口特区。反六路围攻胜利后，妇女工兵营随被服总厂迁到瓦室铺，不久，又

① 刘照林：《我当娘子军》，中共通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2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69页。

② 林月琴：《回忆妇女工兵营》，《解放军报》1982年3月9日。

迁回通江生产。1934年12月，工兵营随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迁到旺苍黄泽乡。1935年4月，随军长征。^①

妇女工兵营主要任务是生产被服。郑光明回忆：“当时也没有机器，主要是手工缝制，每人每天可缝一件单衣，一个班一天能缝20多件，另外我们厂还做棉衣、帽子、鞋子，我们女工厂不裁只缝，男工厂负责裁好，并把里子、面子做好，女工厂负责铺棉花、贴包包、锁眼、钉扣、缝合。”^② 杨文局回忆：“妇女工兵营实际上还是总经理部被服女工厂，其主要任务是生产被服，负责供应全军需要的军衣、军帽、军鞋等用品。全营没有缝纫机、全靠手工缝纫，裁剪由男工厂负责。在战争环境中，做衣服的布匹是很缺乏的，主要依靠总经理部的纺织厂生产一部分；依靠红军解放一个城镇后，从地主、资本家、军阀库存中缴获一部分；依靠当地采购一部分。布料多时，我们的工作就紧，甚至加班加点。”^③

妇女工兵营经常根据作战需要，还担负着运输物资、抬担架、护理伤员、开展宣传扩红工作、帮助老百姓种地等任务。^④ 例如万源保卫战期间，“供给紧张，需要大量物资运往前线，工厂（营）组织女工日夜兼程赶运物资，把物资及时运到各作战部队”^⑤。特别是扩红宣传，动员了一大批男女青年参加红军，有力支援了前线作战。工兵营排长张茶清在恩

① 以上内容参见赵正富：《红军恩阳河被服厂的建立及其发展》，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57～159页。《杨文局回忆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妇女工兵营情况》，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生产历史回忆资料（1927—1949）》（内部资料），1990年，第133页。《川陕苏区的军需工厂》，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军需工厂简介（1927—1949）》（内部资料），1988年，第36页。

② 《郑光明回忆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被服厂情况》，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生产历史回忆资料（1927—1949）》（内部资料），1990年，第126页。

③ 《杨文局回忆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妇女工兵营情况》，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生产历史回忆资料（1927—1949）》（内部资料），1990年，第133页。

④ 《杨文局回忆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妇女工兵营情况》，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生产历史回忆资料（1927—1949）》（内部资料），1990年，第133页。

⑤ 《川陕苏区的军需生产》，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军需生产综述（1927—1949）》，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

阳河扩红宣传成效显著。据林月琴回忆：

她去的那一天正逢赶场，街上有许多人是背着背篓来卖山货的童养媳。张茶清往八仙桌上一站，还没有开口，有的老乡就发现她是个女红军，可有的老乡不信。张茶清听到他们议论，就说：“老乡们，我是个女红军。”桌前几个小媳妇看见她的穿着打扮和头上的短发同男同志完全一样，便怀疑地望着她，一面笑一面摇头。张茶清见她们不信，弯下腰去让她们看自己戴耳环的耳朵眼，她们才信了。大家都对这位女红军发生了兴趣。张茶清直起腰，爽朗地说：“乡亲们，姐妹们！我是湖北黄安人。我父亲给财主当长工，累病了，我九岁那年他就死了。到我十二岁我娘又死了。我哥哥养不起我，就把我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和这里的童养媳一样，当牛作马，挨打受骂。红军一来，我就当了红军。在我们队伍里，象我这样童养媳出身的红军战士多得很。如今她们抬起头来，再也不受财东的剥削、公婆的打骂了。”她的话引起许多童养媳的共鸣，当场就有十几人报了名。到傍晚，集合起了一支有七八十人的队伍。^①

妇女工兵营还关注全国大势的发展，积极捐款援助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运动，她们集体捐赠大洋十八元零十二串。1934年2月22日，《少先先锋》第35期对此事作了报道。^②

妇女工兵营的生产时间紧、任务重，生活条件艰苦。刘照林回忆：“开始我们是住在厕所上头，就是老百姓喂猪那个粪坑房子里面。”^③但女工们克服重重困难，并未因之而愁眉苦脸，整个被服厂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欢乐景象。^④

① 林月琴：《回忆妇女工兵营》，《解放军报》1982年3月9日。

② 《援助开滦罢工的热烈》，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8页。

③ 刘照林：《我当娘子军》，中共通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2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69页。

④ 赵正富：《红军恩阳河被服厂的建立及其发展》，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58页。

二、川陕省总工会刘华工厂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

1933年2月川陕省总工会在巴中县城内桂花井建立被服厂，称刘华工厂。关于刘华工厂的来历，吴朝祥回忆：“有一天，省委周书记找我谈话，要我接任刘华工厂厂长的职务。当时我对刘华工厂这个名称的来历也还弄不清楚，就问他，他说，刘华是个工人，领导工人暴动英勇牺牲了，我们为了纪念他，所以把工厂取这个名称。”^①工厂有200多人，按部队进行编制，被编为一个营三个连，总负责人是川陕省总工会委员长李维海，具体负责人是川陕省委秘书长吴永康，一连、二连连长分别为李玉南和王定国，三连连长为男同志。李玉南回忆：“（工厂里）绝大多数是女的，除了一个连长外，排长都是女同志。”^②

刘华工厂的主要任务是为部队和机关提供后勤保障。李玉南回忆：“工厂共有缝纫机10多架。生产分工是男工裁剪、缝纫；女工纺线、染布、锁眼、糊布壳、绗棉花、做浆糊、钉扣子等，并全是手工操作。工厂生产的产品有军服、大衣、帽子（大八角帽、小八角帽）、米袋、布袜、袜底、鞋子、绑腿带、子弹袋等等。”^③

三、绑腿厂中的妇女

1933年6月，毛浴区第三苏维埃在刘二沟王家河建立绑腿厂。妇女独立营一连连长苟大清担任厂长，李朱氏、杨王氏、林李氏任副厂长。绑腿厂共有工人100余人，全是妇女，其中纺线的70人，打绑腿的30人。另外，王家河还有20个妇女在家纺线。该厂使用小型的腰带机打制绑腿，一天一夜能生产绑腿60双。“为了完成任务，妇女们白天参加农业劳动，晚上纺线编织绑腿。有的把家里棉絮拆了，纺成线子，编织绑

① 吴朝祥：《从通江到大藏寺》，张云逸：《星火燎原·未刊稿》第2集，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页。

② 李玉南：《川陕时期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女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36页。

③ 《李玉南回忆刘华工厂情况》，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生产历史回忆资料（1927—1949）》（内部资料），1990年，第145页。

腿。在妇女们的艰苦努力下，大都超额完成任务。”^①

四、红三十军被服厂中的妇女

为供给部队被服需要，1933～1934年，红三十军供给部先后在南江、长赤、朱陵宫和恩阳县张爷庙设立被服厂。工人约有200多人，实行军事编制分组作业。厂长为周明扬。女工有一连人，连长由妇女担任，管理妇女生产。妇女主要是缝制新衣和将没收的地主豪绅衣被改缝成衣帽、鞋袜。^②

第五节 医院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迅即在各处设立医院。军队医院有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及其分医院，各军、师医院，地方医院主要是川陕省工农总医院。^③无论是军队医院还是地方医院，医务人员中妇女均占有相当的比例，在缺医少药的艰苦条件下，她们帮助一批又一批的红军战士恢复伤病，重新走向战场。为避免繁冗起见，下面重点讨论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中的妇女及其作用，以见豹斑。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根据形势需要，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总指挥部医院为基础，再从十师、十一师、七十三师中抽调部分医务人员，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医院，即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驻泥溪场。1933年2月，总医院迁至毛浴镇。反三路围攻期间，迁至泥溪场竹子坎。8月，迁至通江以西的鹦歌嘴。10月，迁至沙溪嘴王坪，并在此地将近

① 杜中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345～346页。

② 《红三十军被服厂》，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生产历史回忆资料（1927—1949）》（内部资料），1990年，第144页。

③ 郭际富、向思第、赵宗映纂辑：《通江苏维埃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37～458页。

一年。^①总医院编制相当于一个军，院部设在当地大财主王笃之的大院里。^②由于严峻的军事形势，总医院是一个医、政、军三者合一的机构。院长周光坦负责医院全面工作，秘书汪荣先负责管理印章、油印、收发和处理日常事务。医院下设政治部、医务部、总务处以及分医院。其中政治部设组织科、宣传科和保卫科，医务部设西医部、西医分部、护士学校、中医部，总务处设贩卖部、总工厂、被服厂、洗衣队、担架队。另外，总医院还在周围地区设置了七个分医院。

总医院的医务工作人员中，妇女占多数。医务处、西药房、敷料股、卫生大队、看护营、卫生材料股、仓库、炊事排、贩卖部、洗衣队、被服厂、担架队、采药队、运输队、生产队，均有妇女。钱桂英回忆：“总医院也是个‘女儿国’，从医生、护士、炊事员、运输员、勤务员等等，几乎是清一色的女兵。”^③

总医院护士学校有卫生大队，人数不稳定，最少时有4个连，最多时达10多个连。卫生队员按班、排、连进行编排，女孩占多数，其主要任务是服侍彩号病员。^④

总医院看护连（又叫护理连）下设四个排，其中一个女看护排（又叫护理排）有32人，孙克^⑤、伍荣芳^⑥、刘桂芳^⑦、李琳^⑧、张天早^⑨、何建贵^⑩等人均曾在总医院女看护排做过看护或卫生员。中药部有妇女工作

① 四川省通江县卫生局编：《通江卫生志（1912—1935）》（内部资料），1988年，第19页。

② 王文珍：《曾传六局长为我主婚》，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蒋志敏：《钱桂英——一生在默默奉献》，瞭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传增补本》，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

④ 郭际富、向思第、赵宗映纂辑：《通江苏维埃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47页。

⑤ 孙克：《红军和藏胞是一家人》，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⑥ 伍荣芳：《红军总医院是张琴秋领导建立起来的》，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⑦ 刘桂芳：《我特别爱唱〈戒烟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⑧ 李琳：《我成了妇女独立营的女战士》，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⑨ 张敏：《鼓励我走出草地的首长是王树声同志》，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⑩ 何建贵：《我在总医院学了不少技术》，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人员，伍荣芳曾被上级调到中药部熬中药。^①女看护和女卫生员主要负责给受伤的战士换药、熬药、喂药。当时总医院的医务人员和病号住的比较分散：“病号及医护人员散居在王坪和廖坪的大小村庄及单家独户家中，彩号（伤员）住王坪，病号住廖坪。”^②女看护和女卫生员们服务伤员时往往比较辛苦，需要上坡爬坎，走村串户。伍荣芳回忆：“我们排又分八个换药组，每组四个人，配上一个医生。我们每天都要抬着药箱去给受了伤的战士换药。”^③王文珍回忆：“我所在的看护排分八个换药组，每组四个护理员，配上一个医生。我们每天都要抬着药箱上坡爬坎，走村串户，前往各休养连为彩号换药。”^④刘桂芳回忆：“我们班四个人一个组，每天抬着药箱，陪同医生给伤员换药。伤员分散住在农民家里，我们抬着药箱，每天来回要走一二十里路。那路又是山间小路，很不好走，不小心就会摔跤。”^⑤伍荣芳回忆：“我熬好药就给病人送，能动的自己喝，重病号我就一调羹一调羹地喂。”^⑥在战斗激烈的时候，她们还组织担架队赴前线抬运伤员。何建贵回忆：“在仗打得特别激烈的时候，我们卫生员还要上前线，抬担架。有一次，红军向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兵分两路同时向朱家坝和白石岩进发，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这次反攻以后，战场上下来的伤病员多得很。我们组织的担架队把伤病员一个一个送到王坪总医院，伤病员感激得不得了。”^⑦

总医院总务处下设的洗衣队有150多人，成员全是妇女，加上不占编制的医院、工厂附近的家庭妇女共有300余人，被编为4个连，大队长李健，指导员李金平，副队长李元秀、陈学秀、马玉珍、李元发，副指导

① 伍荣芳：《红军总医院是张琴秋领导建立起来的》，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王文珍：《曾传六局长为我主婚》，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伍荣芳：《红军总医院是张琴秋领导建立起来的》，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王文珍：《曾传六局长为我主婚》，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⑤ 刘桂芳：《我特别爱唱〈戒烟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⑥ 伍荣芳：《红军总医院是张琴秋领导建立起来的》，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⑦ 何建贵：《我在总医院学了不少技术》，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员陈元秀。洗衣队的主要任务是为医院和伤病员洗衣被，轻病连每七天洗一次，重病连三天洗一次，特别连和干部连有固定的洗衣排，随换随洗。当时没有肥皂，一般是用火灰浸水后的灰水来搓洗衣物。^①洗衣连一个排每天要洗几百件衣服。^②洗衣队在战时还为红军运送粮食、药品，李健回忆：当时洗衣队“往来于中巴、后巴之间，翻山越岭，给红军运粮食，送药品”。^③

总医院总务处下设的被服厂有缝衣排，男女共30余人，被分为三个班，分别为四班、五班、六班，班长均为妇女。金秀英回忆：1934年6月、7月间，“医院伤员用的纱布、绷带、药捻布困难，拿钱也买不到了，上级确定由（三分院）缝衣连抽出一个排织纱布。因为我们排长是织布工人出身，连里便确定由我们二排织纱布。我们排男、女共三十余人，分三个班：我任四班长，副班长孙九珍；五班长李发芳，副班长金一香；六班长朱姜莲。”^④

战时，总医院还负责宣传动员广大妇女支援前线，组成慰问队、宣传队慰问伤病员。张庭福回忆：“后来我们在王坪总医院住了一段时间，配合总医院的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发动妇女做鞋袜，募集粮食布匹等支援前方红军，鼓励女同志组成宣传队到王坪总医院慰问‘病号’（伤病员）。”^⑤

第六节 运输队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

川陕地区，山川纵横，险峰交错，路隘林深，交通运输极为不便，

① 郭际富、向思第、赵宗映纂辑：《通江苏维埃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449页。

② 蒋志敏：《钱桂英——一生在默默奉献》，瞭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传增补本》，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

③ 《李健——她从雪山草地走来》，瞭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传》，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380页。

④ 金秀英：《红军缝衣连》，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页。

⑤ 张庭福：《我当上了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运送和转移粮食、弹药、物资和伤病员，主要靠人力背、抬、挑。运输队在保证军需物资供应和提高部队机动力、战斗力方面作用巨大。徐向前指出：“没有必要的物资供应和运输能力，就会大大削弱部队的机动力、战斗力，要打赢一场战争是不可能的。”^① 因此，组建强大的运输队就显得尤为重要。据不完全统计，反三路围攻期间，运输队伍多达数万人。整个川陕苏区时期，参加运输队伍的群众达二百万人次以上。运输队伍由省苏维埃和红军统一组织，按军事化组织编制县、区、乡、村的运输队伍。徐向前对运输队的作用给予很高评价，称其是“前线和后方一体化的血脉”^②。

由于苏区内的绝大部分青壮年男子都在前线，所以妇女就成了运输队的主力。许世友回忆：“特别是那些妇女同志，一点也不亚于男子汉……为了保证前方供应，她们常常背着上百斤重的物资，昼夜不停地跋山涉水，送上阵地。返回时，又抬着、背着伤病员到后方医院。她们的英勇事迹，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③ 1933年5月，反三路围攻进入关键时期，为保证前线弹药和军粮的供应，省苏维埃主席熊国炳号召各县妇女干部组成一百人左右的妇女运输连。她们从红三十军供给处接受任务。有的背米，有的背枪，有的背炮弹，当天下午5时出发。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跌倒了又爬起来，有的摔得鲜血直流。大家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早晨8点钟，终于胜利地到达了红三十军前线阵地——黄钟铺。此后，这支妇女运输连，在这条运输线上来回运送粮食、弹药和伤员，直到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④ 1934年，妇女工兵营由三个连合并为两个连，其中第一连由营长林月琴负责，继续领导广大女工承担被服生产任务，第二连编为运输连，由原工兵营政委王泽南负责。据王泽南回忆：“我们运输连有二百来人，除了管理员和炊事员是男同志外，其余都是穷苦人家出身的女同志，大的不过三十来岁，小的才十几岁，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8页。

③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70页。

④ 李萍：《钢铁意志——忆红军时代的妇女运输连》，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64~166页。

组成了一支红军女运输连。运输的物资主要是粮食，还运输布匹、军衣、枪支和弹药。”^①李文清回忆：“初入红军，我们被称为女儿兵，妹妹人太小，是嫂子背在背上走的。我们三姊妹一起加入了运输队，主要任务就是向前线运送子弹，几百人一路。”^②张万兴回忆她参加红军兵工厂运输队时说：“运输队男女都有，共两三百人。砍柴、背水、背枪。那几年粮食多，雨水好，外头巴中等地的粮食都往这里运。……炸弹厂要‘柳炭’做炸药，我白天搞运输，晚上把我院坝边的一根大柳树砍了，用了5个晚上烧成炭，给厂里送去。”^③

为保证前线军需物资供应，她们用坚强的意志和饱满的革命热情做支撑，不怕苦、不怕累，克服种种困难。李文清回忆：“我们整天吃的都是糊米，啥子是糊米呢？就是把大米放在清油锅里炸，炸到焦黄，装在干粮袋子里，用细绳子拴成小格，一个小格装一两，每人每天只吃一格。这是红军为了节约粮食，方便行军，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一路上饿了就吃一把糊米，喝几口冷水，吃也是一顿，不吃也是一顿。”^④李秀珍回忆，反六路围攻期间，川陕省委为支援前线，调集各县妇女干部组成妇女运输队，向万源前线运物资。“从通江洪口到万源黄钟堡，有两百多公里，沿线尽是崎岖的山道，还要经过敌人的封锁线，女同志每人要背大米七十多斤，步枪一捆四支，迫击炮弹每人背一箱。我们走荒山野岭，攀山越岭，忍饥挨饿，大步前进，手脚挂出了血，肩膀磨起了泡，克服了难以忍受的艰辛，一夜行军五十多公里，按时把物资、弹药送到了万源前线，保证了反围攻战斗的胜利。在通江洪口到万源的运输线上，往来穿梭，我不知摔伤了多少次，但从来没有叫过一声苦。”^⑤

① 王泽南：《在妇女运输连里》，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27页。

② 李文清：《我们三姐妹在梓潼加入了红军运输队》，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郭际富、向思第、赵宗映纂辑：《通江苏维埃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42页。

④ 李文清：《我们三姐妹在梓潼加入了红军运输队》，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⑤ 李秀珍：《从通江向万源前线运送弹药物资》，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第七节 特殊组织中的女同志及其作用

一、各种经济公社中的女同志

川陕省经济公社有总社和分社。唐朝明回忆：“川陕省经济公社总社先后驻通江城隍庙街、得汉城和苦草坝街上，分社在全县各个乡镇都有。川陕省苏维埃在区以上设经济公社二十多个，通江地区设经济公社的地方有通江城、毛浴镇、杨柏河、涪阳坝、泥溪场、钢溪河、新场坝、陈家坝等十几处，经济公社下面还分了药物、百货、消费、粮食、纺织等许多行业，都设了单独的经营机构。”^① 经济公社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女同志，有些女同志还担任经济公社的负责人，比如王定国在反六路围攻期间，从川陕省经济委员会被派到卢森堡经济公社任主任。^② 她们主要是做后勤工作，保障红军战士们的生活和物资供应。据姜道珍回忆：“我和张元珍留在了苦草坝经济公社的消费合作社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办食店，做磨豆腐、搅凉粉等后勤工作。为了改善红军战士们的生活，我们每天起早摸黑，不畏艰辛，不怕天寒地冻。”^③

二、保卫局中的女同志

川陕省政治保卫局，成立于1933年春，初驻毛浴镇，后迁通江县城旧县署衙门，省保卫局先后任局长的有袁克服、余洪远、李维海、郑其行、曾传六。省政治保卫局下设女看守队，有150多人，是一个连的编制，队长李选才（后来是丁武选的夫人），^④ 罗屏也曾任川陕苏区保卫局

① 唐朝明：《我在毛浴杨柏经济公社当服务员》，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王定国：《忆琴秋同志》，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

③ 姜道珍：《我丈夫吴绍林任经济公社主任》，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寇庆延：《在川陕苏区保卫总局的三年》，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通江党史资料丛书》第6辑（内部资料），1984年，第101页。

妇女看守队工作。^①女看守队的任务是看守女犯、监管苦工队的女犯。省政治保卫局下设执行科、交通排等机构也有妇女。曾广澜曾担任过川陕省政治保卫局执行科副科长。^②据王文珍回忆：“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渡江西进时，红军总医院也开始转移。我被调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保卫局交通排任排长，在曾传六局长身边工作。”^③川陕苏区各级政治保卫局中有不少女同志，时任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曾广澜回忆：“记得此时有许多当地妇女参加这方面工作。”^④据不完全统计，其时川陕苏区各级政治保卫局共有470余人，其中可确定姓名的妇女有吴开容、朱家连、李菊好、赵清香、陈新民、刘清成、苏国连、曾秀连、黄玉莲、杜贵莲、高操陲、苟美之等十余人。^⑤

① 《红四方面军中的妇女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82页。

② 寇庆延：《在川陕苏区保卫总局的三年》，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通江党史资料丛书》第6辑（内部资料），1984年，第101页。

③ 王文珍：《曾传六局长为我主婚》，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曾广澜：《回忆妇女独立团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页。

⑤ 何大地编著：《川陕革命根据地政治保卫志（1932.12—1935.4）》（内部资料），2014年，第73~106页。

第五章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①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成建制的正规妇女武装，“在川陕时期、长征途中以及西路军的艰苦岁月里，顽强战斗，英勇不屈，在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上，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② 其事迹和精神值得大书特书。

目前，学界对川陕苏区妇女独立团的研究尽管有一些论著^③，但总的说影响有限，大多着眼于基本史实的梳理，缺乏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成果。由于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缺乏，有些口述回忆录说法不统一，在一些重要的史实上存在较多错讹或混淆不清的现象，因此，其中有相当部分的成果在探讨妇女独立团（营）成立和发展、妇女独立团是否由妇女独立营扩编而来、妇女独立团是否存在一团和二团、妇女独立师是否存在、妇女独立团是否直接参加前线战斗、妇女独立团女战士如何处理革命与性别意识之间关系等问题时，可谓众说纷纭。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学界并未清楚完整地呈现妇女独立团的面貌，忽视了对长征

① 本书的妇女独立团是一个整体概念，包括川陕苏区时期妇女独立团成立前的妇女独立营、妇女独立团（一团、二团）、西路军时期的妇女独立团（抗日先锋团或先锋团）等。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页。

③ 元江：《对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若干问题的考订》，温贤美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王玉兰：《川陕苏区妇女武装在革命战争中的特殊贡献及历史地位》，《达县地区党史资料》（内部资料）1989年第1期；徐峰：《性别视域下川陕妇女的解放与革命——以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为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5期；徐峰：《剪发与革命：苏区革命妇女的身体政治史研究——以妇女独立团剃光头为例》，《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时期、西路军时期妇女独立团的讨论。^① 鉴于此，本章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考辨与研究，希冀较为全面展现妇女独立团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妇运史中的地位，从而深化对妇女独立团及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认识。

第一节 妇女独立团成立背景

一、川北妇女劳动地位与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

鼎盛时期的川陕苏区辖区面积有4.2万平方公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第二大苏区，但其人口却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辖十四大苏区内最多的，有500余万人，比全盛时期的中央苏区多了50余万人。^② 其中，妇女占半数。由于民国时期四川烟毒泛滥，种鸦片、吸鸦片、迷信鸦片的现象极度普遍，川北地区“没有多少成年男子不吸鸦片烟的”^③，导致他们身体虚弱，干不了家里家外的重体力活。因此，不管是在家庭内部，还是田间劳作，妇女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劳动力。吴朝祥回忆：“耕田抄地，栽秧打谷，挑水煮饭，喂猪养牛，里里外外的重活累活，大都落在了妇女的肩上。”^④ 徐向前回忆：“田野里、山坡上，见到的多是妇女在劳动、砍柴、背粮、挑粪、耕田……有些妇女身后背着娃娃，照样干活。后来我们才知道，这里的妇女从小就参加劳动，是主要劳动力。”^⑤ 然而，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权力支配下，她们从事繁重的家庭劳动并不能改善生存环境，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命运十分悲惨。在通江县一

① 目前研究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代表性论文有董汉河的《西路军妇女先锋团考略》，《党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② 《赣南红色旅游》编写组编：《赣南红色旅游》，红旗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

③ 李定灼：《特殊的一课》，《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5页。

④ 吴朝祥：《巴山妇女在战斗中成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⑤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0页。

带，“马有笼头猪有圈，婆娘有个男子汉”曾是当地妇女地位的真实写照。据吴朝祥回忆：“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穷得穿不起裤子，十冬腊月，围块棕片片，出不了门，见不得人。”^①

二、川陕苏区卓有成效的政治动员工作

川陕苏区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妇女成分主要是挨打受骂的童养媳、地主老财的丫头、无依无靠的孤女。她们有着苦难的经历，出身赤贫，来自旧社会的最低层。据伍兰英回忆：“我家是川北昭化人，祖祖辈辈给人当牛做马，缺吃少穿。我从七岁起就给地主家放牛，做小活，受尽了奴役和欺凌。”^② 据吴朝祥回忆：“童养媳的日子实在可怜，先当奴隶，后作人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睡的是草窝窝，吃的是残汤剩水，一天到晚累死累活不说，动辄还要挨打受气，不少女孩子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生活待遇，逼得跳河投井，悬梁自尽，结束了她们年轻的生命。”^③ 这些条件赋予了她们吃苦耐劳的特性和革命的坚定性。红四方面军入川开辟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委、苏维埃政府颁布执行了一系列文件和决议，大力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平等，婚姻自由，男女同工同酬，妇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运用诸如唱歌、演戏等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在群众中进行贫富对比、谁养活谁、诉苦等教育，揭露旧社会对妇女的迫害，引导和鼓励妇女们组织起来作为革命力量走上政治舞台，为推进川陕苏区妇女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婚姻自由在动员妇女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社会潮流对于妇女“服役”的规模和形式有着决定作用。^④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要通过 1931 年 12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

① 吴朝祥：《巴山妇女在战斗中成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8 页。

②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90 页。

③ 吴朝祥：《巴山妇女在战斗中成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8 页。

④ 〔美〕查尔斯·H·科茨，罗兰·J·佩里格林：《军事社会学》，北京大学国防学会译，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79 页。

执行委员会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1934年4月在修订《婚姻条例》基础上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来保护广大妇女的婚姻自由。婚姻法的实施，使童养媳、买卖婚姻等现象在一定程度被禁止。不仅如此，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规定，苏区男女办理婚姻登记手续时，必须遵循“男从女愿”的原则。政府工作人员在审查时，要当面问清男女双方是否自愿结婚，而且一定要女方点头同意才予以登记。提倡婚姻自由对于动员妇女的作用，徐向前对之评价非常之高，他说：“别看是个婚姻问题，动员妇女的作用可了不起。妇女们觉得自己的地位改变了，被当人看待了，生活有了希望。”^① 她们的革命热情就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纷纷走出家门加入红军队伍，踊跃参加赤卫军、独立营等地方武装组织，成为土地革命运动和拥军、生产、戒鸦片烟、参加苏维埃和地方武装等活动的先锋。在这种形势下，红四方面军领导层逐渐意识到，妇女武装是妇女寻求自身解放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赢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力量之一。正是在这种广泛的群众基础上诞生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营）。^②

第二节 妇女独立团详考

一、妇女独立营广泛存在

（一）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妇女独立营

关于红四方面军总部妇女独立营成立时间及成立时的人数，老红军们的回忆并不一致。刘永福回忆，妇女独立营成立时有400多人。^③ 据刘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页。

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金昌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金昌文史》第3辑（内部资料），1989年，第40页。

坚回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成立于1933年8月，人数共200余人。^①学界相关研究成果或一些有关革命史的工具书对这一问题也没有定论。比如王虹生等人主编的《工青妇大辞典》认为妇女独立营成立于1933年3月，人数共300人。^②《通江苏维埃志》认为妇女独立营成立于1933年3月下旬，成立时的人数有400余人。^③《妇女词典》在编写“妇女独立团”这一词条时，述及妇女独立营的人数沿用了刘坚的回忆。^④但是，学界大部分观点认为，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妇女独立营成立于1933年3月，成立时的人数约300余人。笔者在此赞同并沿用此观点。

1933年3月，为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发动的三路围攻，集中主力部队，加强警备力量巩固后方，中共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部抽调机关妇女干部百余人 and 妇女群众积极分子二百余人，在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通江县成立妇女独立营。^⑤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是在通江县城东门大操坝宣告成立的^⑥，徐向前总指挥发表讲话，女战士们进行了阅兵仪式。^⑦但是，妇女独立营成立之初，并未明确建制和归属。直到1933年6月底木门会议后，才明确规定妇女独立营属于红四方面军直辖部队^⑧，直属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领导。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军事教员秦基伟。妇女独立营上面主要负责人实际上是张琴秋，有重大事情向她汇报请示。要注意的是，妇女独立营并非全是女同志，比如军事教员秦基伟就是男同志。

① 刘坚：《妇女独立团二三事》，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② 王虹生等主编：《工青妇大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页。

③ 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办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④ 《妇女词典》编写组编：《妇女词典》，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⑤ 也有学者认为，红四方面军总部妇女独立营是在各县妇女武装的基础上成立的。参见张静如、梁志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9页。

⑥ 张庭福：《我当上了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金昌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金昌文史》第3辑（内部资料），1989年，第40页。

⑧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9页。

妇女独立营成立之初有三个连的编制，每连约七、八十人，其中一连的人数最多，有一百多人。据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张庭福回忆：“训练结束后组织把我们编成三个排，我任独立营一排排长。”^① 从中可知，每连下辖三个排。

各连主要领导如下表：

表 5-1 各连主要领导情况表

	连长	指导员
一连	向翠华（一说向翠花）	刘桂兰
二连	詹应香（一说詹映香）	侯守玉
三连	马正英	胡玉兰

表格根据陶万荣《忆在烽火弥漫中的巴山妇女》中的回忆内容制作而成。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26页。

妇女独立营成立后不久，就扩编为四个连。据陶万荣回忆，鹰龙山战斗时，妇女独立营一连立即控制山口要道，二连、三连看管俘虏，四连打扫战场。^② 林江回忆：“我参加红军后，被分配在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当时我十四岁，我所在的那个连的连长是潘家珍。”^③ 从中可以推知，四连连长应为潘家珍。

红四方面军总部妇女独立营下辖各连连长并非一成不变。洪江县妇女独立连并入妇女独立营后，其连长张克勤被任命为二连连长；谢成明担任过三连连长。^④

妇女独立营中不仅有营长、连长、排长、班长，还有副营长、副连

① 张庭福：《我当上了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中共通江县党史办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

③ 林江：《滔滔江水永向东》，四川省妇联：《巴蜀巾帼壮歌——红四方面军女战士革命斗争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

④ 西路红军在青老战士姚芝珍：《被活埋而又幸存的女俘》，朱广振、周桂英编：《浩气壮河湟——西路红军在青老战士》（内部资料），1991年，第103页。

长、副排长、副班长。据向翠华回忆，妇女独立营成立时，她并非一连连长，而是副连长，连长姓张，不久调至医院工作，她才升任连长。^①其后，向翠华升任副营长兼一连连长。^②陈怀秀也担任过妇女独立营副营长。^③

在严峻的战争形势下，妇女独立营的营长、政委等要职均由总部直接任命。据陶万荣回忆，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张琴秋让她去当营长，同时组织任命曾广澜作政委。^④被组织任命的人员，大多具有相当过硬的军事素质，比如营长陶万荣可以打双枪。^⑤营长、营政委和部分连排干部来自鄂豫皖根据地，战士大多为川北边区苦大仇深的穷苦妇女、童养媳、妇女积极分子。

最初，妇女独立营建制不完善，没有女号兵。其后，川陕省委妇女部长肖成英（刘坚）将红十一师的周苦娃带到妇女独立营营部当号兵兼通信员。^⑥

妇女独立营中有宣传队。据张显明回忆，她曾在由吴朝祥任队长的妇女独立营宣传队工作。^⑦

值得一提的是，妇女独立营的人数并非一直是300人。其后，妇女独立营吸收、合并部分地方妇女独立营、独立连，例如洪江县妇女独立连与其合并。^⑧因此，直到妇女独立营解散前，其人数当不止300人。

① 《关于妇女独立团情况的谈话纪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12页。

② 四川大学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3页。

③ 邹开志：《我亲身经历了鹰龙山战斗》，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陶万荣：《忆在烽火弥漫中的巴山妇女》，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女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25页。

⑤ 《红四方面军中的妇女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87页。

⑥ 刘坚：《妇女独立团二三事》，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

⑦ 《一个“共产婆”（张显明）的自述》，彭俊礼主编：《通江女红军》，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42页。

⑧ 《女连长——西路红军妇女独立团在青连长张克勤》，朱广振、周桂英编：《浩气壮河湟——西路红军在青老战士》（内部资料），1991年，第158页。

总部妇女独立营存在仅七个月。1933年10月，妇女独立营被撤销编制，大部分指战员被分配至各军，专门从事后勤、医院护理、工厂等部门工作。其解散原因有三：第一，1933年10月，三大战役的胜利，使苏区扩大到十几个县，各地方机关需要妇女同志参加具体工作，建立地方苏维埃，发展革命力量。第二，妇女独立营内部流行一种麻疹传染病，为防止大面积传染，红四方面军总部在了解情况后，决定分散妇女独立营的女同志。^① 第三，国民党组织了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策略，军委决定把妇女独立营分散到各军以及地方苏维埃的后勤、医院、工厂工作。^②

（二）川陕苏区所辖各地方存在大量妇女独立营、连

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几乎都将红四方面军总部妇女独立营与各地方的妇女独立营（连）混为一谈。但笔者通过研读大量关于川陕苏区女红军的口述回忆资料发现，其时，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妇女独立营只是众多妇女独立营中的一支。在它成立前后，苏区所辖各地方存在大量不脱产、半脱产、脱产的妇女独立营、连等妇女武装。即使直属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妇女独立营在1933年10月解散后，各地方仍然存在妇女独立营（连）等妇女武装。这些地方妇女武装一般由各县成立的赤卫军指挥部直接指挥。^③ 据陶万荣回忆，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妇女独立营成立之前，各县亦有妇女武装，少先队、儿童团、赤卫队中妇女的人数至少有一个排，多者一个连。^④ 1932年底，洪江县委组织不脱产的妇女独立连，张克勤任连

① 曾广澜：《回忆妇女独立团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1页。

② 陶万荣：《忆在烽火弥漫中的巴山妇女》，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26页。

③ 吴朝祥：《巴山妇女在战斗中成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页。

④ 陶万荣：《忆在烽火弥漫中的巴山妇女》，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25页。

长。^①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占领南江长赤，该地区的妇女群众积极响应红军所领导的“打土豪，分田地，扩红军”的斗争。反三路围攻期间，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暂时退出南江。长赤妇女为保卫革命果实，抵抗国民党还乡团的大屠杀、大镇压，于同年4月，自发组织成立长赤妇女独立营。独立营成立时举行特别的宣誓仪式，全营的将士在当地牛市梁上喝了公鸡血酒。长赤县妇女独立营成立之初，由中共长赤县委妇女部长殷秀山（1934年牺牲）负责。其后，红四方面军重占长赤，妇女独立营被编入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的妇女独立团。^② 南江县有妇女独立营，下辖三个连，营长姓李。据赵秀英回忆，她曾是南江妇女独立营二连三排的战士。^③ 万源苏维埃政府组织的武装游击队中，以何莲芝为女队长的女游击队有十多个女游击队员。^④ 1933年10月营山战斗后，鼎山独立营四、五连的女战士留下一个连的人数，成立鼎山妇女独立连。^⑤ 1933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大会期间，广元县七区有四名妇女加入独立连，^⑥ 说明广元县存在妇女连。各地存在的脱产地方武装组织中，妇女所占比例也很大。据吴朝祥回忆，万源的赤卫军（类似于现在的民兵）、模范连（类似于现在的基干民兵）中妇女占总人数的40%，有的地区赤卫军中妇女能占到总人数的50%以上。另外，长赤、红江、万源、巴中和南江等地，都先后组建了不脱产的妇女独立连、营。有的女同志因素质高甚至在地方独立连、营中担任领导职务，例如

① 《女连长——西路红军妇女独立团在青连长张克勤》，朱广振、周桂英编：《浩气壮河湟——西路红军在青老战士》（内部资料），1991年，第158页。

② 南江县妇联：《长赤县妇女武装——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长赤妇女的武装斗争》，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84~85页。

③ 《关于妇女独立团情况的谈话纪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12页。

④ 何莲芝：《芬芳馥郁的兰蕙》，四川省妇联编：《巴蜀巾帼壮歌——红四方面军女战士革命斗争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⑤ 吴朝祥：《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4页。

⑥ 《在大会上扩大党员团员》，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4页。

1933年9月成立的鼎山独立营，由吴朝祥担任营长。要注意的是，此独立营并非全由妇女组成，不过女同志所占比例很大，其中四连、五连全是女同志，连长分别是张清华和许世品。

由于复杂的战争形势，其时地方妇女独立营（连）的领导干部不是由战士们推选，而是实行任命制，即红四方面军总部派遣工作人员到地方武装中出任要职并指导工作。吴朝祥最初在省委工作队工作，经吴先恩的介绍而被任命为独立营营长。她能成为至少辖五个连的鼎山独立营的营长，统管由男同志和女同志混合组成的独立营，可见她具有很强的领导才能且被红四方面军总部所信任。^①

除上面所举的之外，其时各地还存在一些妇女独立营（连），见下表：

表 5-2 各县妇女独立营、独立连、侦探队等地方武装组织情况表

组建时间	名称	人数	营长/连长
1933年9月	万源县妇女独立营	200人	杨桂英
1933年10月	万源县妇女赤卫军连	200人	何莲芝
1933年10月	江口县妇女独立营	200人	尹洁尔
1933年11月	营山县妇女独立营	300人	王定国
1933年	长胜县妇女独立营	200人	吴朝祥
1934年3月	苍溪县妇女独立连	260人	覃帮秀
（不详）	赤北县妇女独立营	900人	（不详）

据中共巴中市委巴中市人民政府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简史》（内部资料），2005年，第262页，整理而成。

二、川陕苏区时期的妇女独立团

反六路围攻期间，川陕苏区面临严峻挑战，红四方面军收缩阵地，转入内线防御。为了打一场持久防御战，动员根据地广大军民全力投入

^① 吴朝祥：《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4页。

到“保卫赤区，消灭刘湘”的战斗中，苏区掀起参军参战，扩大地方武装的热潮。其时，边沿区大批妇女干部撤退到中心区来，革命热情高涨，纷纷要求上前线直接参加战斗。为便于直接领导，红四方面军总部、川陕省委、省苏维埃决定将各地妇女武装及各部门机构中的妇女（比如各县县委部分妇女干部或工作人员）抽调出来，成立妇女独立团。

妇女独立团的成立有一个过程。首先，利用纪念广暴日活动广泛宣传成立妇女独立团的重要性。1933年11月，广暴纪念日临近，此时刘湘正准备发动对川陕苏区的第一期进攻。川陕省委宣传部发布《纪念广暴消灭刘湘标语大纲》，其中的标语之一：“纪念广暴要成立妇女独立团！”^① 在一份名为《关于妇女工作》的文件中指出：“最近期内完成妇女独立团。”^② 川陕省委喉舌《共产党》发表《广暴纪念前扩大红军潮，各地群众风涌参加革命战争，阆南工人师已完成一连》，号召省委附近各县和绥定所属各县执行省委的决定，动员群众，在广暴纪念日成立一个妇女独立团。^③ 其次，组织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并下发成立妇女独立团的文件。1933年12月11日至20日，刘湘第一期进攻期间，川陕省委在巴中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进一步强调成立脱产的妇女武装——妇女独立团的重要性，提出当前最要紧的事之一便是“组织妇女侦探队，脱离生产，去和敌人作战。……按县为单位或一区为单位，要组织多数的独立团、独立营、少先队的模范营、游击队、妇女侦探队”。^④ 为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川陕省委会发布《动员青年群众消灭刘湘工作决议》：“坚决完成少年先锋团与工人师、妇女独立团，各县

① 《纪念广暴消灭刘湘标语大纲》，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3页。

② 《关于妇女工作》，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8页。

③ 《广暴纪念前扩大红军潮，各地群众风涌参加革命战争，阆南工人师已完成一连》，四川档案馆编：《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④ 《在中国共产党川陕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张国焘同志的演说词——为保卫赤区，消灭刘湘而战》，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33页。

要马上乡乡送来，坚决完成这一任务，丝毫不能放松这一工作。”^① 同月，川陕省巴中道苏维埃主席召开联席会议，形成《川陕省巴中道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决议》，《决议》进一步明确了在反六路围攻期间的具体工作：“各县要加紧扩大地方武装，猛烈成立新的独立团、独立营、赤卫军、游击队、袭击队、妇女侦探队、妇女独立团、独立营，一律脱离生产，马上拿起刀矛到前线上同敌人作战。”^② 但是由于前方战事密集，妇女独立团并未在广暴纪念日和川陕省委党的第三次代表会结束后成立。

1934年3月^③，红四方面军总部经过充分准备，在长赤成立妇女独立团，直接隶属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总指挥长是徐向前，副指挥长是王树声^④。妇女独立团后来迁驻巴中。^⑤ 张国焘对妇女独立团的成立评价很高，他在《我的回忆》中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单独的女子军。”^⑥

学界有观点认为，妇女独立团是由妇女独立营扩编而来。^⑦ 由前述关于妇女独立营的史实考证，可知妇女独立团成立前，妇女独立营已经于

① 《动员青年群众消灭刘湘工作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页。

② 《川陕省巴中道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页。

③ 有学者认为，妇女独立团成立于1934年5月。马宏伟、张铁志：《长征中的女红军》，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关于妇女独立团成立时间及成立时的人数，扩编的时间等问题，既有研究成果也没有定论。有学者认为，妇女独立团是在1934年3月由原妇女独立营扩编而来，成立之初有2000多名红军女战士。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8页。这种说法明显不对，因为红四方面军总部妇女独立营在1933年10月已经解散，而且众多老红军的回忆都表明，妇女独立团成立时的人数约为一千多人。

④ 在有些老红军的口述回忆中，存在妇女独立团属于红三十一军的说法。比如林桂珍回忆，妇女独立团成立时隶属于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林桂珍口述，林作栋整理：《我参加红军长征的经历和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内部资料），1999年，第139页。曾代理过妇女独立团团长的徐美莲回忆，妇女独立团成立时隶属于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编：《豪情忆征程》，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6页。

⑤ 《摸哨棚》，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250页。

⑥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⑦ 四川大学川陕革命根据地科教研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概述》：“于1934年3月，在长赤县将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3页。

1933年10月解散。因此，这种说法不符合史实。

妇女独立团成立之初，下设三个营。不久，整编了长赤妇女独立营、万源妇女独立营和鼎山妇女独立连等部分县里组织的地方妇女武装。迟至1934年夏天，妇女独立团发展为四个营。^① 每营有三个连，共十二连，一千多名女战士。^② 妇女独立团下辖的营、连主要以数字编号命名。如一营、二营、三营、一连、二连等。有的连队为突出特定的职能，有具体名称，比如妇女独立团中有侦察连。侦察连的女战士基本上全是川籍，年龄一般不超过20岁。据赵玉香回忆，侦察连战士的选拔有两条标准：“第一，侦察连的战士平时要扮成要饭的，让敌人看不出来；第二，侦察连的战士不能说梦话，不能在睡梦中泄露秘密。”^③

妇女独立团团长和政委不是张琴秋就是曾广澜，但具体谁是团长和政委，老红军的回忆并不一致。陶万荣回忆，妇女独立团成立时，曾广澜为团长，张琴秋任政委。^④ 华全双回忆，妇女独立团第一任团长是张琴秋，第二任团长是曾广澜。^⑤ 李玉南回忆，妇女独立团成立时团长是张琴秋，政委是曾广澜。^⑥ 杨清香回忆说，妇女独立团团长先是曾广澜，后是张琴秋。^⑦ 徐美莲回忆，张琴秋是妇女独立团第一任团长，副团长有两名，分别是郝桂芝和廖大柱，参谋长是吴朝祥。^⑧ 曾广澜回忆，她在独立团中担任政治委员。^⑨

① 徐美莲：《长征中的女红军——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妇女独立团战斗生活散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编：《豪情忆征程》，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4页。

② 杨清香：《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保卫后方》，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赵玉香：《那个岁月生与死》，《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500页。

④ 陶万荣：《忆在烽火弥漫中的巴山妇女》，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25页。

⑤ 华全双：《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88页。

⑥ 李玉南：《川陕时期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37页。

⑦ 杨清香：《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保卫后方》，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⑧ 徐美莲：《长征中的女红军——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妇女独立团战斗生活散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编：《豪情忆征程》，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页。

⑨ 曾广澜：《回忆妇女独立团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1页。

这些口述回忆录的差别给研究者造成了困难。有学者直接判断妇女独立团第一任团长为曾广澜，张琴秋是第二任；^①也有学者认为妇女独立团的团长是张琴秋，政委是曾广澜。^②因相关材料缺乏，笔者对老红军的口述回忆难以遽下定论，只将相关史实列举出来，存而不论。

妇女独立团中的团、营干部基本上是跟随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苏区的干部，连排干部和战士则以通南巴籍为主。^③由于行军紧张，妇女独立团的领导直接由总部任命。曾广澜回忆说：“一切工作都是由军参谋部组织好后，才调我去任团政治委员兼主任。”^④

值得一提的是，妇女独立团并非全部是女同志。据曾广澜回忆，当时总参谋部派了一个男同志来指挥军事。^⑤徐美莲回忆，因为女同志体力弱，难以胜任繁重的运输任务，所以，妇女独立团的每个连都有一个由男同志组成的运输队。^⑥

团长、营长、连长等领导干部一般要配备战马。赵玉香在长征期间曾担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一连连长，骑的白马。^⑦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很少骑马。徐美莲回忆：“我当了营长以后，部队配备给我一匹马，但行军中不是给运输队驮东西，就是给有病、体弱的同志驮行李。要么就是‘强迫’那些身患重病走路实在困难的同志骑，我仍然替他们背行李和枪，牵着马。”^⑧

红四方面军粉碎六路围攻不久，为应对国民党部署的川陕会剿，

① 尚伟、徐军主编：《军旗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② 《妇女词典》编写组编：《妇女词典》，求实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页。

③ 杨清香：《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保卫后方》，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曾广澜：《回忆妇女独立团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1页。

⑤ 曾广澜：《回忆妇女独立团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1页。

⑥ 徐美莲：《长征中的女红军——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妇女独立团战斗生活散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编：《豪情忆征程》，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

⑦ 赵玉香：《那个岁月生与死》，《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页。

⑧ 徐美莲：《长征中的女红军——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妇女独立团战斗生活散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编：《豪情忆征程》，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

1934年10月19日，川陕省委在巴中召开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的《开展游击战争》文件中有“发展妇女游击队和妇女独立团”的内容。^①同年11月，清江渡军事会议后，全军进行整编，规定妇女独立团保留原建制，进一步明确了妇女独立团正规军的地位。^②这两次会议为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西渡嘉陵江前对妇女独立团进行扩编提供了依据。

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以及各部转移至广元旺苍坝，并在此地对妇女独立团进行扩编。原妇女独立团改称为妇女独立团一团。川陕省委和总部的女同志以及各县的妇女部长（随军西撤的地方女干部）等集中起来组成妇女独立二团^③，如反帝拥苏大同盟联络部长吴朝祥所带的一排人被编入妇女独立团二团第一连^④，又如，当时在省财委会工作的伍兰英与李保珍、吴英、宋学珍、孙桂英等五人在1935年大年初一被分配至妇女独立团第一连，其中伍兰英任七班班长。^⑤

据吴朝祥回忆，二团成立时，曾传六明确指出二团由军委直接领导，党政工作归总政领导，供给由总经理部提供。其主要任务是保卫后方机关、医院、仓库，清剿土匪，运输武器、弹药等物资，转运伤兵。^⑥二团并非全是妇女，其副团长由一名男子担任。^⑦

妇女独立团在旺苍整编后，每连人数基本保持在120~140人。比如西渡嘉陵江时，由潘家珍任二团某担架连连长的连队承担了转移伤病员的任务，该连被分配转运伤员的任务是抬三十副担架，每副担架配四个

① 《开展游击战争的决议》，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5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3页。

③ 有工具书认为妇女独立二团于1934年6月在南江成立。王虹生等主编：《工青妇大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89页。也有学者认为妇女独立二团成立的时间为1934年秋。张静如、梁志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79页。

④ 吴朝祥：《从通江到大藏寺》，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⑤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⑥ 吴朝祥：《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6页。

⑦ 刘照林：《我当娘子军》，中共通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2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70页。

人，从中可以推知，该连有 120 人。扩编后的妇女独立团一团、二团共有两千多人，但在长征初期，两个团的人数已达到几千人，据 18 岁就加入妇女独立团的张秀英回忆：“我入伍时妇女独立团就已经有了，大概有几千人。”^①

亲历的老红军关于谁是妇女独立团一团、二团的团长和政委的口述回忆不一致。为便于观察比较，笔者现将老红军对此问题的口述回忆列表如下：

表 5-3 老红军回忆妇女独立团领导情况表

一团		二团		回忆人
团长	政委	团长	政委	
		张琴秋		陶万荣 ^②
张琴秋		刘伯新		刘照林 ^③
张琴秋	张琴秋	曾广澜	曾广澜	赵兰 ^④
张琴秋		刘伯新		吴朝祥 ^⑤
王传野		刘伯新	曾广澜	华全双 ^⑥

笔者根据部分女红军的口述回忆发现，妇女独立团扩编后一团和二团团长还有一种可能性，即一团团长为刘伯新、二团团长为张琴秋。据伍兰英回忆，1935 年 3 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之前，总部规定妇女

① 《妇女独立团的影子张秀英》，杨高峰主编：《选部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0 页。

② 陶万荣：《忆在烽火弥漫中的巴山妇女》，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1982 年，第 127 页。

③ 刘照林：《我当娘子军》，中共通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 2 辑（内部资料），1982 年，第 70 页。

④ 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79 页。

⑤ 吴朝祥：《从通江到大藏寺》，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⑥ 华全双：《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89 页。

独立团担任转运伤员的任务，传达命令的是团长张琴秋。^①而妇女独立团扩编后，一团主要负责上前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二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后方机关、医院、仓库，清剿土匪，运输武器、弹药等物资，转运伤兵。^②换言之，张琴秋极有可能是给二团传达总部命令。由此可以推断张琴秋是二团团长。而吴朝祥的回忆则进一步印证张琴秋担任的是二团团长。吴朝祥回忆说，长征开始，张琴秋带领独立二团的干部战士，进行了多项战勤任务。^③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之战，妇女独立团参加了这次战斗，根据妇女独立团一团、二团的主要分工，可以推知参战的是一团，而指挥一团作战的团长是二十来岁的刘伯新（欣/兴）。^④因一手资料不足，这个问题尚难考证清楚，笔者在这里推断出的结论只作参考。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川陕苏区时期妇女独立团在旺苍扩编后是否存在妇女独立师的问题，老红军在口述回忆文章中的说法颇不一致。曾在川陕苏区战斗过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回忆：“各县先后即组织妇女独立连、营等战斗组织，以至后来发展成为川陕边妇女独立师。”^⑤吴朝祥回忆说，1935年春妇女独立团在旺苍坝扩编为妇女独立师，师政委是张琴秋。^⑥王秀英回忆说，妇女独立团在旺苍坝扩编为妇女独立师。^⑦李萍回忆说，川陕苏区时期存在妇女独立师。^⑧华全双回忆说，1935年2月，在旺苍坝将妇女独立团扩编为妇女独立师，辖妇女第一团和第二团，

①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② 吴朝祥：《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6页。

③ 吴朝祥：《红色女战士》，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76页。

④ 刘坚：《妇女独立团二三事》，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页。

⑤ 傅钟：《红四方面军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及长征情况概述》，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⑥ 吴朝祥：《从通江到大藏寺》，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⑦ 王秀英：《妇女独立团在旺苍坝扩编为妇女独立师》，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⑧ 艾芜：《艾芜全集》第17卷《日记（1963—1965）》，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张琴秋任师长。全师 2500 余人，直属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① 然而奇怪的是，傅钟后来修正了他的说法，1986 年 8 月 21 日，他通过秘书张文苑转告成都军区元江，说川陕苏区时期只有妇女独立团，没有妇女独立师。^② 对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最有发言权的徐向前和张琴秋均未提到过妇女独立师的存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一书中没有一处提到妇女独立师这个建制。张琴秋本人在后来的回忆中对是否成立过妇女独立师一事也持怀疑态度。她向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提供的材料中，只是说当时妇女独立团一团、二团对外号称师，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妇女独立师番号。^③

目前学界关于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是否存在这一问题也缺乏一致的结论。有不少党史研究者、爱好者在叙述川陕苏区历史时认为，红四方面军存在妇女独立师。比如王玉兰认为，妇女独立师辖两个团，直属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张琴秋任妇女独立师师长兼第一团团团长。^④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21 辑记载：“1935 年 2 月，妇女独立团扩编为妇女独立师，辖两个团。”^⑤ 《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中的《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战的娘子军——红四方面军的妇女独立团简介》认为，妇女独立团曾扩编为妇女独立师。^⑥ 《达州市军事志》认为存在妇女独立师，后随红军转移。^⑦ 《军旗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记录》中记载，1935 年 2 月，扩编后的妇女独立一团、二团在广元旺苍坝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师长张琴秋，

① 华全双：《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88～389 页。

② 元江：《对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若干问题的考订》，温贤美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42～344 页。

③ 张琴秋：《关于妇女独立团的情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88 页。

④ 王玉兰：《川陕苏区的妇女武装》，《川陕苏区历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第 30 页。

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 21 辑，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71 页。

⑥ 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 年，第 79 页。

⑦ 达州军分区编：《达州市军事志》，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60 页。

独立师人数最盛时近万人。因战争原因,1936年4月,妇女独立师被缩编为团。^①《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中刊载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在北川》记载,1935年,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妇女工作人员和原来的妇女独立团,合编成妇女独立师,直属红四方面军总部,全师共有2500余人,师长曾广澜,政委张琴秋。^②《蔡申熙传》提到曾广澜曾担任妇女独立师第二团团长的。^③从这些有关妇女独立师的表述来看,存在相互转抄的情况。也有研究成果认为红四方面军中并没有成立妇女独立师。比如《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军队序列中始终没有妇女独立师。^④董汉河《西路军妇女先锋团考略》认为,1935年春,广元旺苍坝妇女独立团扩编时并没有成立妇女独立师,当时只有妇女独立一团、二团之分。^⑤

笔者在这里赞成徐向前和张琴秋对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相关内容的口述回忆,以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西路军妇女先锋团考略》的结论,即红四方面军并没有妇女独立师的番号,其时只存在妇女独立团一团、二团,为壮大声势才对外号称师。因为笔者在现存有关川陕苏区时期扩红及组建、扩大地方武装的近70份文件中,没有发现一份文件中有关于妇女独立师的内容。那么,曾在妇女独立团中担任过干部或士兵的部分女红军口述回忆时认为妇女独立团在广元旺苍扩编后存在妇女独立师,又该作何解释呢?其时,妇女独立团对外又号称师,大部分妇女独立团女战士年纪较小,且没有文化,对这一事实真相的理解难免会有出入。因此,她们过了五六十年以后回忆红四方面军中存在妇女独立师的建制,是可以理解的。

① 尚伟、徐军主编:《军旗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

② 孙寒清、刘洪友:《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在北川》,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内部资料),1990年,第48页。

③ 马德俊:《蔡申熙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27页。

④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86~498页。

⑤ 董汉河:《西路军妇女先锋团考略》,《党史研究》1987年第3期,第71~74页。

三、长征时期和西路军时期的妇女独立团

1935年4~5月，长征初期红四方面军仍然存在妇女独立团一团、二团。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总部进驻茂县，对妇女独立团进行整编，二团的女战士被编为两个连、一个营，一部分被分配至各部队医院工作^①，一部分在绵阳地区开展宣传、组织群众及筹军粮等地方工作。^②茂县军队整编宣告了妇女独立二团的解散。此时妇女独立团不再有一团、二团之分，仅有妇女独立团的建制，张琴秋担任团长。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从中央机关女红军中挑出王泉媛、谢飞、危秀英、刘彩香、谢小梅、钟月林、廖似光、彭儒、黄长姣、李伯钊、刘英、甘棠、周越华、吴仲廉、萧月华、吴富莲、李桂英、杨厚珍、危拱之等加入妇女独立团。^③不久，张琴秋离开妇女独立团到在杂谷脑地区临时成立的波巴省委当妇女部长。^④10月，妇女独立团南下至四川芦山、天全、雅安，张琴秋回归。其间，妇女独立团二营营长徐美莲代理团长。^⑤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行军至炉霍，并原地战略休整训练，妇女独立团减员严重，只剩下1000余人，总部决定取消妇女独立团的编制，并将这些女战士分散至各军和机关。其中，张琴秋、刘桂兰、康克清、陶万荣等人去了党校。^⑥据赵兰回忆：“（妇女独立团）选出二个连，成立川陕妇女团员学校，每个连一百四十人左右，都是挑的党团员；其余人员分配到兵

① 刘照林：《我当娘子军》，中共通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2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71页。

② 孙寒清、刘洪友：《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在北川》，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内部资料），1990年，第49页。

③ 张崇鱼：《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历程大事记》（内部资料），2006年，第325页。

④ 李玉南：《川陕时期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女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35页。

⑤ 徐美莲：《长征中的女红军——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妇女独立团战斗生活散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编：《豪情忆征程》，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5页。

⑥ 陶万荣：《忆在烽火弥漫中的巴山妇女》，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女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27页。

站、医院和后方机关工作。我被分配到妇女团员学校第一连。”^① 因此，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谈及炉霍整编时并未提及妇女独立团。^② 尽管妇女独立团的建制被撤销，但女战士们在独立团中的军营生活使她们已具备过硬的政治、军事素质。而且，被选入妇女团员学校的280人在学校里主要上军事课，学射击，练战术，抢山头。^③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时虽无妇女独立团之名，却有妇女独立团之实。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后，为了打通与苏联的交通线，成立妇女抗日先锋团。当时三大主力中的女战士分布在卫生部、供给部、政治部及各军之中，共有1500多人。她们之中有不少本来就是原妇女独立团或团员学校里的女战士。军委将这些女战士集合起来，按个子高矮站队^④，经过简单体检，最终挑选了约1300余名女战士，^⑤ 年纪在13~22岁。她们跟正规军一样，全部武装。而未入选的女战士大部分被编到运输连，没有随妇女先锋团西渡黄河。^⑥ 10月29日，红三十军、九军、五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共二万一千八百人西渡黄河。11月8日，中央军委提出《作战新计划》，电令河西部队称为西路军。此时又将妇女抗日先锋团改为妇女先锋团。

值得注意的是，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提及，西路军政委员会对部队进行整编时的建制中称西路军的妇女武装为妇女独立团。^⑦ 而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团长以及部分干部在口述回忆时均称西路军妇女武装为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口述这段历史时，有时也将西路军妇

①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2页。

③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页。

④ 李琳：《我成了妇女独立营的女战士》，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⑤ 关于妇女先锋团的人数问题，老红军们的回忆有差别。先锋团团长王泉媛回忆先锋团有1300多名女同志，先锋团特派员曾广澜回忆有900多名女同志，先锋团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回忆有1000多名女同志。冯亚光：《西路军：生死档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198页。

⑥ 李琳：《我成了妇女独立营的女战士》，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⑦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05页。

女武装称为女子先锋团。^① 笔者认为，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最高军事将领，对军队建制情况十分熟悉，因此，他的口述回忆较其他老红军更可信。另外，会宁会师后，成立的妇女武装叫妇女独立团更能体现与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时期成立的妇女独立团的承继关系。至于“妇女先锋团”或“妇女抗日先锋团”，是为了与当时整个国内国际形势结合起来，部分人一时的称呼。^② 为便于统一行文，笔者在下面的叙述中一律将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称为西路军妇女独立团。^③

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成立时团长王泉媛，政委朱良才，副团长兼特派员曾广澜，副政委吴富莲，副团长刘伯兴，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秘书李开芬，组织干事张怀碧，宣传干事兼团支部书记赵应兰。^④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述及西路军妇女独立团的领导班子结构时说，团政治委员是吴富莲。^⑤ 而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特派员曾广澜、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口述回忆到，当时吴富莲是副政委。他们口述回忆不一致的原因是什么呢？通过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和老红军口述回忆录发现，其时团政委是朱良才，副政委是吴富莲。因朱良才兼任妇女独立团、男子青年团和教导团三个团的政委^⑥，妇女独立团的政治工作实际上是由副政委吴富莲负责，因此，徐向前以及部分老红军五六十年以后回忆那段历史时认为吴富莲为妇女独立团政委。

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副）政委等主要职位均是上级任命、组织

① 李小江认为，王泉媛本人的口述将西路军妇女武装称为女子先锋团，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王泉媛本人文化水平的问题。《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1页。

② 董汉河：《七十五年来西路军研究述评（下）》，董汉河、朱永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论文卷（下）》（内部资料），2014年，第334页。

③ 由于过黄河后妇女独立团与五军同行，因此有老红军在口述回忆这段历史时，认为妇女独立团隶属于红五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大通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7年，第96页。

④ 《访华全双同志》，中共甘肃省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红西路军史料》第4辑（内部资料），1987年，第20页。

⑤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05页。

⑥ 《访华全双同志》，中共甘肃省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红西路军史料》第4辑（内部资料），1987年，第21页。

派遣。王泉媛回忆说：“由连到团，全部编制都安排好了，就派我和吴富莲去，吴富莲任政委，我担任团长。”^① 组织干事张怀碧则是由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介绍。^② 何福祥在独立团成立后，由组织派至独立团二营任营长。^③

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成立时辖三个营九个连，各营营长、副营长及人数见下表。^④

表 5-4 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情况表

	营长	副营长	人数
一营	马金莲		300 余人
二营	何福祥	姜菊昆	近 500 人
三营	李桂英	张玉莲	400 余人

妇女独立团中并非清一色的女同志，但男战士并不多。据王泉媛回忆，妇女独立团中只有一个号兵是男的。^⑤ 然而，她的回忆并不精确。据有关资料显示，妇女独立团团部的通讯班、炊事班都是男同志。^⑥

11 月，古浪、土门一仗，妇女独立团牺牲 300 多女战士。^⑦ 山丹战役后，西路军总部根据战争形势暂时撤销了妇女独立团的建制，女战士们

① 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01 页。

② 董汉河：《西路军沉浮录》，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6 页。

③ 王文焕：《党，永远在她心中——记红西路军妇女独立团二营营长何福祥同志》，中共酒泉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1）（内部资料），1987 年，第 272 页。

④ 《访华全双同志》，中共甘肃省张掖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红西路军史料》第 4 辑，（内部资料），1987 年，第 20 页。

⑤ 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01 页。

⑥ 王明超：《智取土门镇》，郝成铭、朱永江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0 页。

⑦ 《一个“共产婆”（张显明）的自述》，彭俊礼主编：《通江女红军》，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42 页。

被分配至各军从事后勤保障工作。^①高台和临泽之战后，西路军主力退守倪家营子，又恢复妇女独立团的建制，但团的编制大为缩减。此时许金彪（男，湖北孝感人）担任妇女独立团团长，在倪家营子战斗中带领妇女独立团女战士担任后援工作。^②梨园口战役后，妇女独立团只剩300多人。1937年3月14日，石窝分兵会议后，由于伤亡很大，总部决定将集中在石窝一带的妇女工兵营，分散在各军、各医院、总供给部的所有女同志组织起来，全部编入妇女独立团，^③人数仅有300余人，隶属于张荣支队。^④陶万荣任团长^⑤，冯明英任副团长。妇女独立团进入祁连山打游击后，随着伤兵逐渐增多，掉队的女战士也越来越多，部队被整编为两个连。^⑥最终，妇女独立团在与总部失去联系后，遭遇马家军包围而失败。

四、妇女独立团部分基层普通岗位和武器装备

妇女独立团配有团长、副团长、团政委、营长、副营长、营政委等干部，以及与团部对接工作的下属各级部门基层军官岗位，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不为人熟知的基层普通岗位。为进一步明晰妇女独立团的建制，有必要对这部分岗位择要进行简单介绍。

① 有的口述调访资料认为，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是在古浪土门、永昌战役后被撤销的。《女连长——西路红军妇女独立团在青连长张克勤》，朱广振、周桂英编：《浩气壮河湟——西路红军在青老战士》（内部资料），1991年，第160页。但笔者更倾向于独立团是在山丹战斗后被撤销。因为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第307页）中说：“古浪战斗之后，西路军后来作战主要靠三十军。再剩下的机关人员、医护人员、妇女独立团等，战斗力毕竟有限的。”从徐向前的回忆可以看出，古浪战斗之后，西路军总部并未立即撤销妇女独立团的建制。

② 丁星、郭加复主编：《新四军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页。

③ 冯亚光：《西路军：生死档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④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22页。

⑤ 也有老红军的回忆显示，石窝会议后，妇女独立团剩余女战士和部分伤病员是在团长王泉媛的带领下坚持在祁连山中打游击。中共酒泉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1）（内部资料），1987年，第274页。

⑥ 陶万荣：《忆在烽火弥漫中的巴山妇女》，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29页。

通讯员。林桂珍参加妇女独立团之初，在团内当通讯员。^① 未满九岁的苏力曾在妇女独立团中给团长张琴秋当通信员。^②

司务长。李从正曾被妇女独立团团团长张琴秋调至独立团任司务长。^③

司号员。又称号兵。主要负责吹冲锋号，鼓励军队士气，向敌人冲锋，以及通过军号发出各种军事信号。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某营二连司号员为何连海。^④ 地方妇女独立营中亦有司号员。比如镇龙关战斗期间，程桂就在吴朝祥领导的鼎山独立营中当司号员。^⑤

炊事员。又称伙夫。妇女独立团中有专门负责女战士生活的炊事员。^⑥

勤务员。妇女独立营中的指导员配备有勤务员。^⑦

卫生员。王明超曾在西路军妇女独立团中担任卫生员。^⑧

妇女独立团使用的武器主要是马刀、长矛、梭镖、马枪、土枪、土火药炮，还有少量汉阳造的机关枪。当时分发给战士们的枪、手榴弹、子弹等弹药武器很大一部分是假的。据林江回忆，开始连队给每名战士十枚“手榴弹”，一支“枪”，一大把“子弹”。^⑨ 王绍莲回忆：“子弹带

① 林桂珍口述，林作栋整理：《我参加红军长征的经历和见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内部资料），1999年，第139页。

② 《苏力：九岁走过二万五》，《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82页。

③ 南江县妇联：《女儿不减男儿志——记川陕苏区老红军妇女独立团司务长李从正同志》，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1982年，第260页。

④ 《被活埋而又幸存的女俘》，朱广振、周桂英编：《浩气壮河湟——西路红军在青老战士》（内部资料），1991年，第102页。

⑤ 程桂：《回忆在新剧团和妇女独立营的一段战斗经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62页。

⑥ 艾芜：《艾芜全集》第17卷《日记（1963—1965）》，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⑦ 《关于妇女独立团情况的谈话纪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页。

⑧ 郝成铭、朱永江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⑨ 林江：《是“琼花”也是“小花”》，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

是二十四匣的，看起来是满满的，实际上，多半是用高粱秆和纸填满伪装的。”^① 杨清香回忆，最初，由于子弹缺乏，发给战士们的子弹中，每排五颗，其中只有一颗是真的，剩下四颗是用苞谷秆做的。^② 独立团（营）的装备会根据缴获敌人武器情况而有所变化，比如红四方面军总部将妇女独立营在鹰龙山战斗中缴获田颂尧军队的几百支钢枪用于装备独立营，使其武器装备有了质的提升。^③

枪支根据妇女独立团干部级别和战士个子高矮的原则来分配。排级以上干部配备的武器比普通士兵要先进，一般背马枪。^④ 西路军妇女独立团成立时，干部的武器有手枪，战士配有步枪。^⑤ 妇女独立团二团成立时，根据战士个子高矮来分配枪支。赵兰回忆：“不久，枪运来了。团副让大家站好队，高的发长枪，矮的发短枪，身体棒的发机关枪。此外，还发给每人二十发子弹和两颗手榴弹。”^⑥

从上面的考证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妇女独立营刚成立时，并未明确建制和归属。直到1933年6月底木门会议后，才明确规定其属于红四方面军直属部队。1933年10月，妇女独立营被撤销编制。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妇女独立营只是众多妇女独立营中的一支，在其成立前后，苏区所辖各地方存在大量不脱产、半脱产、脱产的妇女独立营、连等妇女武装。红四方面军在广元旺苍坝扩编以后，存在妇女独立团一团、二团，并没有妇女独立师的番号，其时，只是为壮大声势才对外号称师。长征时期，茂县军队整编宣告了妇女独立二团的解散。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炉霍战略休整训练，总部决定取消妇女独立团的编制。会宁会师后，成立

① 王绍莲：《我家四口人都参加了红军》，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杨清香：《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保卫后方》，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陶万荣：《妇女独立营》，《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页。

④ 王绍莲：《我家四口人都参加了红军》，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⑤ 王明超：《智取土门镇》，郝成铭、朱永江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0页。

⑥ 赵兰：《妇女独立团生活片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的妇女武装叫妇女独立团，更能体现与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时期成立的妇女独立团的承继关系。山丹战役后，西路军总部根据战争形势暂时撤销了妇女独立团的建制。西路军主力退守倪家营子又恢复其建制，但团的编制大为缩减，许金彪（男）担任团长。石窝分兵会议后，总部决定将集中在石窝一带的妇女工兵营、分散在各军、各医院、总供给部的所有女同志组织起来，全部编入妇女独立团，隶属于张荣支队。其后，妇女独立团在祁连山游击战争过程中失败。

第二，妇女独立团团、（副）政委等主要职位均由总部直接任命、组织派遣，团、营干部基本上是跟随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苏区的干部，连排干部和战士则以通南巴籍为主。团中有很多不为人熟知的基层普通岗位。独立团战士并非全由女同志组成。

第三，妇女独立团使用的武器主要是马刀、长矛、梭镖、马枪、土枪、土火药炮，还有少量汉阳造的机关枪。当时分发给战士们的枪、手榴弹、子弹等弹药武器很大一部分是假的。枪支根据妇女独立团干部级别和战士个子高矮的原则来分配。

第三节 妇女独立团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一、政治教育

在战时条件下，妇女独立团的政治教育主要目的是使女战士增强政治意识，提高阶级觉悟，严肃组织纪律。徐向前回忆，政治教育“着重解决为什么要当红军和怎样才能当好红军的问题”。^① 妇女独立团女战士李秀英回忆：“首先我们要明确自己当红军是为什么，我们拥护的是谁，要知道我们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将来的新生活。”^② 政治教育形式、内容都十分丰富。其形式主要有：学习报纸、文件，组织讨论会；指导员早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页。

^② 李秀英：《妇女独立营的生活非常丰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晚讲话，喊口号、唱歌、做游戏；聆听并学习领导讲话等。例如妇女独立营成立后，营长陶万荣每次带队喊了口令后，都要给女战士们讲话，提升她们的政治思想觉悟、素质。冯秀珍回忆，陶万荣讲话的内容是：“我们都是从苦海里走过来的，现在，我们获得了解放，再也不受穷了。虽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但是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了，我们共同的革命目标就是打垮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今天，我们要拿起枪杆子，为解放天下的穷苦老百姓和解放受苦受难的女同胞奋勇战斗吧！”^① 教材内容主要有：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共产党》《苏维埃》《干部必读》《红军报》《党员须知》《红军须知》《连指导员须知》《红色战士必读》《红色战士读本》《劳动法令》《土地法令》《红色战士丛书》《捷报》等报刊、文件，这些读物要求文字通俗化、简单化、形象化。^②

为使妇女独立团开展有效的政治教育，独立团确定团政委全面负责政治工作制度。独立团设有政治处和团党委会。独立团的党总支书记和团支书主要职责是领导各营教导员、连指导员具体实施各项政治工作，直接指导各连党支部在党政方面的工作，以保证党的各项决议的执行。

政治教育的教员主要有团政委、党总支书记、团支书、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等。为加强女战士的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水平，有时张琴秋、陶万荣、曾广澜等人也抽时间亲自给她们上课。妇女独立团领导还邀请红军高级将领或川陕省委高级干部授课。时任川陕省委书记周纯全就给妇女独立团讲“当前形势、党的工作”。^③

红四方面军总部成立学校对妇女独立团干部和战士进行政治教育。其时军队成立女子学校，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不定期分批“随军女子学校去学习”。^④

① 冯秀珍：《我们兄妹在战场上相会》，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王玉兰：《川陕苏区的妇女武装》，《川陕苏区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③ 陶万荣：《川陕苏区妇女学校》，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32页。

④ 赵兰：《妇女独立团生活片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

但是，妇女独立团的干部、战士绝大部分是没有文化、目不识丁的劳动妇女，她们不会认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为提高她们的政治素质、阶级觉悟，需要让这些女战士识字、写字。当时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委、省苏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将不识字的干部、战士混合编组，每天认几个字，逐步达到能看懂报纸和写家信的水平。”^① 在繁重的战勤工作之余，妇女独立团女战士首先学认自己的名字，主要以死记苦学为主。川陕苏区妇女独立团女战士赵正富回忆：“我们还学文化，学认自己的名字，开始记多久，都记不住。我说，叫我做事吧。他们说像一天吃三餐饭一样，常常学。……我下决心三天把名字记住了。可又写不来，政委把着我的手教我学，……晚上三个五个在小油灯底下学，有时用电筒照着学。”^②

部队有专门的文书教女战士读书认字。^③ 团、营、连各级干部有时也充当识字教师。赵兰回忆：“过了一个月，领导上让我当二连连长，说实在的，心里着实有些慌。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文化，点名呀，写口令、看报告啦，不识字真是干瞪眼。于是我就去找营长吴朝祥同志。……以后，每天晚上她都抽时间教我，先教口令，后教人名，慢慢地我能点名了，也能看口令了。”^④

徐向前评价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政治教育的效果时说，当时红四方面军存在政治教育上的形式主义，简单化的现象。^⑤ 因此，就此而言，妇女独立团的政治教育的效果或许值得商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政治教育和文化扫盲的一系列活动对提高妇女独立团政治意识、阶级觉悟，保证军事训练的成效，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二、军事训练

妇女独立团女战士大多缺乏军事常识，对军事战略、战术，作战原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页。

② 艾芜：《艾芜全集》第17卷《日记（1963—1965）》，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

③ 赵楚碧：《正月间取龙背那是一场恶仗哦》，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赵兰：《妇女独立团生活片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201页。

⑤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页。

则和方式方法，武器的使用等几乎一无所知。军事训练是女战士获得军事常识，提高军事素质、军事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红四方面军总部对此十分重视，强调入伍的女战士都要接受军事训练。军事训练的纪律要求十分严格。每天拂晓，起床号吹响，十分钟内就得整理完毕，到红场上早操，晚上还要点名。杨清香回忆，每天天不亮都要集合、整队，背上武器比赛爬山，看谁爬得快。^① 吴朝祥回忆：“妇女连、营部设哨，班长值班，早有早操，晚上点名。”^② 最初，大部分被编入妇女独立团（营）的女战士十分不习惯紧张而严格的军事管理生活，甚至连最基本的队列都不会站。据赵兰回忆，妇女独立二团成立后第一次训练时，女战士十分自由散漫，“真是又兴奋又热闹。跑步时不但步调象下饺子似的参差不齐，而且还杂着唧唧嘎嘎的谈笑。”她们因而被部分男兵们奚落为“样子兵”。^③

经过一段时间刻苦的锻炼，她们逐渐适应了军事生活。伍兰英回忆：“天不明，我们就起床出操、爬山。早饭后作队列教练，练习瞄准、射击、投弹、刺杀，有时还到野外去演习。”^④ 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前的那段时间，每天都进行军事训练，据赵正富回忆：“学打枪骑马，和男的一起练。……学立射坐射跪射，甩手榴弹，爬山，跑步。”^⑤

妇女独立团军事训练的课目很多，主要包括紧急集合、队列、防空、刺杀、射击、战术等军事知识和军事技巧方面的严格训练以及体育锻炼。这些课目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 队列训练方面：队列训练是基础。张庭福回忆，女战士每天训练

① 杨清香：《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保卫后方》，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页。

③ 赵兰：《妇女独立团生活片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④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⑤ 艾芜：《艾芜全集》第17卷《日记（1963—1965）》，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

的内容之一是集合。^①李秀英回忆说，独立团要训练队列下操。^②吴朝祥回忆，女战士要进行基本动作训练。^③

2. 武器装备的操作方面：有实弹射击、掷手榴弹、用枪等内容。据陶万荣回忆：“女战士们学习的劲头也都很足，练投弹，很多人胳膊都练肿了，但没有一个叫苦的；练射击，因为当时人多枪少，常常是歇人不歇枪，夜深人静时，还有人对着星星练瞄准；练刺杀，女战士们还在草靶子上画了蒋介石、田颂尧、刘湘等人的头，带着对敌的仇恨，杀声震天，苦练猛刺。全营指战员们最感兴趣的要数野外演习。”^④用枪练习打靶时，由于条件简陋，就在墙上画上圆圈，然后在圆圈正中点一点作为靶心。^⑤1934年11月清江渡会议后，各部队制定《军事教育计划大纲》，掀起新的练兵热潮，妇女独立团也不例外。据徐向前回忆：“这次练兵，在技术上，以射击、投弹为主要内容。射击训练，由过去的三角瞄准练习为主，改为着重对隐现目标和活动目标的瞄准练习。要求既能正确瞄准目标，又能缩短瞄准时间，竞赛标准提高到三秒钟活靶、二百米距离、三发子弹命中二十环以上。投弹训练，着重于持枪、背枪和冲锋条件下的投掷，竞赛及格标准要求每连人均达三十米。”^⑥其中学习枪的使用有三个步骤，即“上枪，把子弹推上，瞄准，练习打靶”。^⑦

3. 单兵作战和战术训练方面：妇女独立团还从单兵动作学起，反复演练班排进攻、退却、攻坚、敌火力下土工作业。还组织对抗演习，学习侦察和抓“舌头”等。有时也到野外去进行实战演习。她们手持笨重的长枪、大刀、长矛，奔跑在崎岖的山道上，累得气喘吁吁。为尽快提

① 张庭福：《我当上了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李秀英：《妇女独立营的生活非常丰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吴朝祥：《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5页。

④ 陶万荣：《妇女独立营》，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办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160页。

⑤ 赵楚碧：《正月间取龙背那是一场恶仗哦》，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⑥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3页。

⑦ 赵楚碧：《正月间取龙背那是一场恶仗哦》，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高训练效果，独立团战士在特定时候和男战士们一起训练。清江渡军事会议后，妇女独立团以夜间战斗作为战术训练的主要内容。^①

4. 体育锻炼方面：妇女独立团对体育锻炼抓得很紧。其项目主要有跳高、跳远、跳木马、单双杠、爬杆、摔跤、长跑、短跑、拔河、爬山、翻越障碍等训练。据赵兰回忆：“我们特别喜欢的是赛跑，它可以帮助我们行军和冲锋。有一次我们比赛长跑，眼看要跑到终点的红旗跟前，前头的同志为了抢先抓住红旗，猛地来个卧倒，身子象闪电似的扑过去，死死抓住红旗不放。她就这样得到了胜利，逗得大家肚子都笑痛了。”^②

阅兵也是军事训练的一种方式。1935年元旦，妇女独立团参加了在巴州市举行少先队检阅大会。^③

在战时体制下，军营中的军事训练是艰苦的，然而，军营生活给这些被周而复始的日常家庭生活所束缚且没有社会地位的妇女们带来新鲜的、有趣的经历，使之感到苦中有乐。伍兰英回忆：“天不明，我们就起床出操、爬山。早饭后作队列训练，练习瞄准：射击、投弹、刺杀，有时还到野外去演习。这种崭新的生活，很紧张、很严格，开始不大习惯，但大家心里非常高兴，劲头十足，一空下来就唱家乡小调，到处洋溢着歌声，充满着欢乐、活跃、朝气蓬勃的情绪。”^④ 林江回忆：“紧张的战前训练开始了。刚开始时，姑娘们这也新奇，那也好笑，叽叽喳喳，吵个没完，练习列队行走，‘噼噼啪啪’像下饺子。”^⑤ 华全双回忆：“崭新而紧张的生活，使得女战士们处得十分亲密，尤其大家围在一起擦枪时，谈笑风生，歌声不断。”^⑥ 从上面所举的妇女独立团女战士口述回忆录的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3页。

② 赵兰：《妇女独立团生活片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③ 《巴州市举行少先队检阅大会》，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7页。

④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192页。

⑤ 林江：《滔滔江水永向东》，四川省妇联编：《巴蜀巾帼壮歌——红四方面军女战士革命斗争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7页。

⑥ 华全双：《长征中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88页。

内容看，正是军营生活的“集体欢腾”^①给她们提供了认识丰富多彩社会、理解革命和妇女解放理论的机会，推动她们走出家庭和原有的生活圈参加革命。

妇女独立团有负责军事理论与军事训练的教员^②，他们多为富有战斗经验的红军干部、老战士或具有一定军事基础与知识的国民党俘虏。

妇女独立团的领导还亲自担任军事训练教员。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与军事指导员秦基伟给大家耐心讲解军事训练要领，反复示范，与女战士们一起练。不仅如此，她们亲自带队进行军事演习。陶万荣回忆说：“演习时，经常是我与秦基伟各带一队，有时是一方攻，另一方守；有时是双方共同抢占一个山头。”^③妇女独立团成立后，张琴秋经常带领女战士学军事、学瞄准射击、摸敌人的“夜螺蛳”。^④有一次，她命令某精干班到雷破石沟、八大王沟摸土匪的“夜螺蛳”，因寡不敌众，没有完成任务。她亲自帮助该班总结经验，并详细地讲了战术，女战士们经过进一步严格政治军事训练，顺利完成任务。^⑤

妇女独立团中有老战士担任军事教员，负责教授新战士枪械等武器的使用。入伍时间较长的领导干部逐级教授武器装备的使用，比如团长教营长、营长教连长、连长教排长、排长教班长、班长教士兵。^⑥

妇女独立团中也有被俘虏的国民党将官担任军事训练指导员。据曾广澜回忆：“因我们不大懂军事，就抽俘虏中的班、排长当教练。”^⑦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战争形势严峻，妇女独立团成立时整训时间大

① [法] 皮埃尔·布迪厄、[美] 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② 艾芜：《艾芜全集》第17卷《日记（1963—1965）》，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

③ 陶万荣：《妇女独立营》，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办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④ 《琴秋大姐在川陕苏区》，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76页。

⑤ 《摸哨棚》，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250页。

⑥ 赵楚碧：《正月间取龙背那是一场恶仗哦》，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⑦ 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页。

约只有两星期，且在川陕苏区时期整训时间十分分散，其战力到底有多强，值得思考。妇女独立团女战士相关回忆表明，她们屡次主动请缨上前线战场，总部在一般情况下都没有同意。可见，妇女独立团战力是弱于红四方面军主力军队的。但是，军事训练使女战士们对作战、防卫的基本要领有所掌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节 妇女独立团对革命的体验

一、妇女独立团在各时期的任务

在川陕苏区时期、长征时期和西路军时期，上级考虑到妇女们生理上的差异或是出于照顾和保护的原因，除了紧急军情外，一般情况下不让妇女独立团直接参与作战。“自从妇女独立团成立后，我们几次要求到前线去，但领导上考虑到我们刚武装起来，没有批准。”^① 因此，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并不经常有机会上前线通过战争来锤炼或证明自己。她们更多的是通过执行内防任务、担负各种战勤任务，以及大造革命舆论、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等方式来实现对革命的体验。

（一）执行内防任务

1. 保卫后方机关。鼎山独立营在营山战斗期间主要任务是清剿杨森军队的残兵，建立苏维埃政权，保卫后方医院、仓库。^② 据曾广澜回忆，妇女独立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后方。^③ 程桂回忆，镇龙关战斗后，部分妇女独立营战士担任总部的保卫工作。^④ 伍兰英回忆，妇女独立团曾掩护兵

①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② 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0页。

③ 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1页。

④ 程桂：《回忆在新剧团和妇女独立营的一段战斗经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63页。

工厂、银行到旺苍坝。^①长征途中，独立团一连二排担任过保卫省委、银行等机关的任务。^②

2. 保卫供给线，负责前后方通信联络。据陶万荣回忆：“敌人搞飞机来轰炸，还派奸细来破坏交通要道，我们就要保卫这些地方；或直接到一个地方守一个阵地；负责前后方的通信联络”^③。

3. 后方警戒、肃反、剿匪。妇女独立营一连连长向翠华回忆，当时妇女独立营的主要任务是担负警戒。^④据张德回忆：“城口、万源大山是王三春地方势力的土匪窝，土匪人多，我们人少。要求袭击土匪，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由于广大女战士精明、勇敢，迅速派小分队绕到敌后侧打击。这股土匪最后被剿灭。”^⑤据张桂香回忆，妇女独立营曾配合县里游击队在平溪坝等地打过土匪。^⑥陕南战役期间，妇女独立团第二团在川陕省委、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广元旺苍坝一带担任后方警戒和肃清反动武装的任务。^⑦据曾广澜回忆，妇女独立团成立后，“在南江县管的一个大寨子地方，担任第二道警界〔戒〕线的防守工作。”^⑧长征期间，妇女独立团仍然参与剿匪任务。据伍兰英回忆，1935年夏，独立团一连曾在汉藏杂居的理县杂谷脑地区参与攻打喇嘛寺土匪的战斗，其中第二排担任警戒桥梁的任务。^⑨红四方面军在江油的半个多月里，妇

①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页。

②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页。

③ 陶万荣：《忆在烽火弥漫中的巴山妇女》，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女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26页。

④ 《关于妇女独立团情况的谈话纪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12页。

⑤ 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

⑥ 《关于妇女独立团情况的谈话纪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页。

⑦ 潘家珍：《妇女担架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

⑧ 曾广澜：《回忆妇女独立团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1页。

⑨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页。

女独立团曾参与在江油后山打土匪、捉地主的斗争。^①

4. 看守犯人。长征途中，妇女独立团在喇嘛寺剿匪战斗后，某营一连二排曾担任看守保卫局的犯人的任务。^②

（二）担负各种战勤任务

由于大量成年男子参加红军在前线作战，有的成年男子又参加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导致从事战勤工作的男兵较少。因此，妇女独立团女战士承担了大量的战勤工作。

1. 运输军需物资，保证给养供应。妇女独立团在川陕苏区时期承担了大量运送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食品、粮食、茶砖、棉衣等物资的任务。由于川东北、川北地处大巴山和米仓山山麓，路隘林深、险峰交错、沟壑纵横、山大岩险，只有一些崎岖的山道与外界相通，主要运输工具是人力和牲畜。1933年5月竹峪关战斗中，独立营女战士把缴获的几百条枪搬回至通江苦草坝。^③据杨清香回忆，反六路围攻期间，总部规定妇女独立团必须在两天两夜将旺苍的几千斤粮食和枪支弹药、棉衣等物资运到南江、长赤，来回路程有六十公里。全团一千多名女战士在团长张琴秋的带领下，每次背的粮食不低于七八十斤。衣服全被汗水浸透了，脚上也起了血泡，肩也背肿了。^④同样参与此次运输任务的王秀英回忆说：“反敌六路围攻的西线战役一开始，我们独立团一边抵抗刘湘部队的追击，一边从旺苍坝等地抢运武器弹药，向南江转移，每人背运七八十斤，往返一二百里路，全身被汗水湿透，未曾干过，终于全部完成了抢运任务。”^⑤据伍兰英回忆，独立团女战士曾将盐巴从旺苍坝运至一百二

①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

②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页。

③ 余洪远：《巴山女红军》，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办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④ 杨清香：《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保卫后方》，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⑤ 王秀英：《妇女独立团在旺苍坝扩编为妇女独立师》，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十里外的永宁铺兵站。^① 据吴朝祥回忆，独立团女战士曾经把盐巴、弹药、枪支和粮食从庙儿湾运到永宁铺^②。据曾广澜回忆，独立团曾去供给部担任军需运输工作。^③ 据刘坚回忆，1934年2月，妇女独立营一连二排在排长廖其华的率领下去清江渡运送盐巴。^④ 红四方面军撤离旺苍坝前，独立团的战士把大批弹药武器、粮食、棉衣盐巴等物资向后方转运六十里。^⑤ 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妇女独立二团在张琴秋的带领下，协助地方武装、担架队完成了转运总经理部、总银行、总医院的物质等多项战勤任务。^⑥ 长征时期，妇女独立二团曾将中坝的许多粮食运往北川。不仅如此，她们还组织当地妇女参加运输队。据留落在北川陈家坝的女红军张杨氏回忆，红军还从她所在的妇女独立二团某连队里，抽出了背得起两斗粮食的妇女五十多人，往返于中坝北川之间运粮。她们还在北川龙凤乡组织了五十多名妇女，到中坝往北川运粮，直到红军撤离中坝后，她们在途中遭到川军截击。^⑦ 西路军没有专门的运输部队，也缺少运输车，据许春贵回忆，当时部队的子弹、武器都是女红军战士背。^⑧ 1936年11月古浪战斗，独立团负责将弹药送到九军的阵地上。^⑨ 倪家营子战斗期间，独立团某连连长张克勤率连队晚上为主

①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

② 吴朝祥：《从通江到大藏寺》，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曾广澜：《回忆妇女独立团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1页。

④ 刘坚：《妇女独立团二三事》，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

⑤ 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页。

⑥ 吴朝祥：《红色女战士》，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76页。

⑦ 孙寒清、刘洪友：《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在北川》，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内部资料），1990年，第49页。

⑧ 许春贵：《子弹武器都是女红军战士在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⑨ 谢杰同、李引进：《战火中的青春——记西路红军妇女独立团排长刘永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金昌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金昌文史》第3辑（内部资料），1989年，第45页。

力部队挖冰送水^①。

2. 负责伤病员的抢运，救护伤病兵。战时，妇女独立团女战士通常是将武器弹药运送到前线，然后从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将伤病员抬到后方医院。1933年5月，竹峪关战斗期间，战士们从战场上抬下800多名伤员送到百里外的洪口医院。^②据杨清香回忆：“（我们）提前到达指定的地方等候，等到枪声一响，就立即赶往前线，一见到伤员，就争先恐后地扑上去，背的背，抬的抬，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把伤员运下火线，等卫生员及时包扎后，立即放在担架上，抬着就走。”^③“全团上阵，组织力量，大个子3人一副担架，小个子4人1副担架。……先到指定地点等候，等到枪声一响，她们分别到火线上抢运，抬着就走。”^④妇女独立二团一营一连连长刘照林与指导员潘家珍在连里的工作是“天天抬担架”。^⑤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时，总部给妇女独立团二团分配的任务是担任转运伤员的任务。^⑥潘家珍任连长的担架连将五十名伤病员从总医院抬送至一百多里外的永宁铺。^⑦据曾广澜回忆，妇女独立团曾承担“后方医院护理工作，如抬担架，护理伤员等。”^⑧1937年2月，西路军在困守倪家营子的40多天里，独立团的主要任务是在火线上抬担架、救伤员，比如独立团某连连长张克勤率连队白天上火线抢运伤员。^⑨

① 《女连长——西路红军妇女独立团在青连长张克勤》，朱广振、周桂英编：《浩气壮河湟——西路红军在青老战士》（内部资料），第160页。

② 余洪远：《巴山女红军》，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办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③ 杨清香：《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保卫后方》，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张琴秋：《关于妇女独立团的情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

⑤ 刘照林：《我当娘子军》，中共通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2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71页。

⑥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页。

⑦ 潘家珍：《妇女担架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

⑧ 曾广澜：《回忆妇女独立团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1页。

⑨ 《女连长——西路红军妇女独立团在青连长张克勤》，朱广振、周桂英编：《浩气壮河湟——西路红军在青老战士》（内部资料），1991年，第160页。

3. 支前工作。妇女独立团女战士经常通过做布鞋、打草鞋、做军服、缝被褥、造币等战事服务来支前。^① 据吴朝祥回忆：“支前工作比较重，因当时红军只有一个经理处，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工厂和政府。红军需要的要后面供给。妇女大部分是做鞋、做袜、打草鞋。我们四川女同志都会打草鞋，白天做活，晚上打草鞋。”^②

4. 打扫战场、修路搭桥。镇龙关战役后，妇女独立营的一部分在营长陶万荣率领下打扫战场。^③ 据吴朝祥回忆：“部队要行军，那些枪炮、小炮在山区很不好带，小路只有一点点宽，过沟沟，要搭桥，就组织妇女们修路搭桥。”^④ “从马尔康到大藏寺的要道，被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分割成了几段。河水虽不很深，但流速很快，部队无法通过。女兵们接受了架桥的任务，经过几天几夜的连续战斗，战胜了激流，把路接了起来。”^⑤

5. 挖战壕、守城门。1936年11月，红三十军攻克永昌后，妇女独立团某连三排的任务是挖战壕。1937年1月21日，马家军围攻临泽县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负责守卫东门，妇女独立团把守西门，并日夜修补被马家军炮火炸塌的城墙。^⑥

（三）大造革命舆论，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

据徐向前回忆：“红四方面军有个好传统：部队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满街满墙，都是我军张贴的传单和涂写的标语；街头巷尾，均有指

① 王秀英：《妇女独立团在旺苍坝扩编为妇女独立师》，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页。

③ 程桂：《回忆在新剧团和妇女独立营的一段战斗经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63页。

④ 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页。

⑤ 吴朝祥：《巴山妇女在战斗中成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7页。

⑥ 谢杰同、李引进：《战火中的青春——记西路红军妇女独立团排长刘永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金昌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金昌文史》第3辑（内部资料），1989年，第45页。

战员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宗旨”^①。妇女独立团有宣传队，其主要任务是扩红宣传，传播胜利消息，提战斗口号，进行战场鼓动，提振军将士气，传送捷报，通讯联络，张贴标语，向敌军喊话，瓦解敌军。^② 工作人员称为宣传干事。

1. 扩红宣传。反三路围攻胜利后，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苏区面积达三万平方公里，所辖人口有二百多万，苏区进入巩固和发展的时期，此时扩红工作尤为艰巨。妇女独立营组织专门的宣传队、演唱队，劝自己的丈夫及周边的青壮年参加红军，为红四方面军的扩红宣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据时任独立营排长的陈焕英回忆：“我带着女战士徐荷莲做扩红的宣传工作。我们俩经常提着烧红苕当干粮，拿着棍子，一为防滑，二为防狗，不光是到人户集中的地方，还到高山边远地区去宣传扩红。一天我和徐荷莲到五十多里远的草池坝、观音岩一带，挨门串户地宣传，以我们自己的苦难生活为例子，诉说妇女受压迫的痛苦，大力宣传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的道理。好多人听了我和徐荷莲的宣传，走上了革命道路。一天，在我和徐荷莲的动员下，草池坝就有一个吴妈妈带着一双儿女三人同时参加了红军。”^③ 妇女独立团的宣传干事胡秀英与同事们在巴州县白庙子、沙牛坪和邻县走家串户，七个月共动员 1100 余名男女青年参加红军。^④

2. 通过舆论心理战来瓦解白军。妇女独立团通过向敌军喊话，发宣传传单等形式积极开展火线瓦解白军的工作。据解成秀回忆：“1934 年 4 月，我们收紧阵地时，在巴中曾口场打田颂尧和杨森的战斗中，由蔡干事带领我们宣传员十多人，在前线进行了瓦解敌军工作。敌与我们相隔一道小河。我们分成几处，利用战斗间隙便向敌人喊话：‘老乡们，不要打自己人！回家去与你们的父母妻子团圆！’、‘我们是穷人！不要为富人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3 页。

② 《三斗魔鬼的女强人》，朱广振、周桂英编：《浩气壮河湟——西路红军在青老战士》（内部资料），1991 年，第 94 页。

③ 陈焕英：《死也要跟着红军闹革命》，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三斗魔鬼的女强人》，朱广振、周桂英编：《浩气壮河湟——西路红军在青老战士》（内部资料），1991 年，第 94 页。

卖命!’等。蔡干事晚上还亲自到敌阵地前撒标语。由于我们经常性的瓦解敌军工作开展较好,敌人经常向我军投诚,多次向我军缴械。”^①攻打芝包口土匪时,妇女独立营用政治宣传展开攻势,经过一天一夜,顺利收编了这支大部分由穷苦农民组成的土匪部队。^②据程桂回忆,得胜山战斗时,“我们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派出宣传队到阵地宣传,唱《反动派吵嘴》等歌,还喊话,宣传党的政策,所以仅二、三天就打下来了。”^③

3. 宣传动员群众。妇女独立团二团在平时通过演活报剧《活捉邓猴子》,演唱《创立十二功》,书写标语等形式,向当地穷人宣传红军的《十大政纲》。^④长征期间,当红四方面军路过民族聚居区时,独立团的宣传队挨村逐户向群众宣传中共的民族政策,在密切汉藏关系、军民关系方面做了重要贡献。^⑤

(四) 其他任务

妇女独立团还曾担负照顾童子军团日常生活的任务。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之后,组成一个530多人的童子军团,军团被编为两个营,行军、宿营跟随妇女独立团,生活由妇女独立团照管。^⑥

二、妇女独立团参与前线战斗考

关于妇女独立团是否参与前线战斗的问题,因相关老红军的口述回忆和文献记载存在一些难以证实或错讹之处,学界观点不一。学界争论

① 解成秀:《回忆当宣传员的片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14页。

② 程桂:《回忆在新剧团和妇女独立营的一段战斗经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63页。

③ 程桂:《回忆在新剧团和妇女独立营的一段战斗经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63页。

④ 孙寒清、刘洪友:《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在北川》,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内部资料),1990年,第49页。

⑤ 《三斗魔鬼的女强人》,朱广振、周桂英编:《浩气壮河湟——西路红军在青老战士》(内部资料),1991年,第94页。

⑥ 张中式:《红西路军的童子军团》,张掖地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张掖地区文史资料》第1辑(内部资料),1999年,第76页。

焦点主要集中在川陕苏区时期妇女独立团是否参加过前线战斗。曾经于1983年12月15日在辽宁省大连市采访过陶万荣的元江,对陶回忆中提到妇女独立营女战士与田颂尧部队交过手,以及在剑阁消灭敌人一个旅的事件表示了怀疑,认为妇女独立营在川陕苏区时期并没有直接参与战斗。^① 叶芳认为,川陕苏区时期,苏区军力比较充备,妇女参加前线作战的需要比较小。^② 而四川大学川陕革命根据地教研组编写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概述》认为,妇女独立团在川陕苏区时期参加过战斗。^③ 据现有资料看,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川陕苏区时期妇女独立团作为补充军力参加过前线战斗。据杨清香回忆,妇立独立团要参与战斗。^④ 鲜平文回忆:“她们当女兵的也要打仗,也要守城门,她们多勇敢的。”^⑤ 程桂回忆:“(妇女独立团中)年龄大一些的同志就参加正规部队直接打仗,还有一部分同志专门在晚上行动,摸到敌人后方去骚扰敌人。”^⑥ 长赤妇女独立营曾配合红十一师三十二团在中魁山一线与田颂尧作战。^⑦ 1933年9月,妇女独立营配合红九军、红四军各一部攻打驻扎在平昌镇龙关的邓锡侯部队。^⑧ 吴朝祥为营长的鼎山妇女独立营,参加了平昌镇龙关战斗,此役的胜利使国民党第三期总攻失败。妇女独立营在通江附近的鹰龙山

① 元江:《对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若干问题的考订》,温贤美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47页。

② 叶芳:《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妇女社会地位变迁(1932.12—1935.4)》,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31页。

③ 四川大学川陕革命根据地教研组:《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201页。

④ 杨清香:《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保卫后方》,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⑤ 鲜平文:《我们游击队的队长叫王大春》,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⑥ 程桂:《回忆在新剧团和妇女独立营的一段战斗经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62页。

⑦ 南江县妇联:《长赤县妇女武装——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长赤妇女的武装斗争》,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84~85页。

⑧ 程桂:《回忆在新剧团和妇女独立营的一段战斗经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62页。

击溃了田颂尧左纵队一个团的残部，这是该营第一次正面接触敌人。^①反三路围攻期间，妇女独立营在毛浴镇遭到田颂尧部队突袭，“全体同志非常勇猛，打退了敌人两次冲锋，邻近兄弟部队听到枪声赶急来支援，两面夹攻，全歼敌人一个营。”^②在反三路围攻进入大反攻时，独立营排长张庭福带领女战士配合红军在闪塘湾战斗中俘虏田颂尧军一百多人。^③同年5月，妇女独立团的一营和赤江县游击队奉命配合红二六四团守卫鹰龙山阵地，7月1日夜，妇女营击溃驻在蛮坡岩的唐式遵部一个侦察排。7月2日，妇女营配合红二六四团一个排取得阴灵庙战斗的胜利，此役，歼敌数百，缴获长短枪200余支、迫击炮12门、轻机枪5挺。7月4日，妇女营配合红二六四团、游击队击退杨森、李家钰、唐式遵三路三次集团冲锋，此役歼敌1400余人，缴获甚多。^④1934年4月，红四方面军为粉碎国民党川军在东线夺取四川万源的第三期作战计划，再次收紧阵地。同年夏，妇女独立团在阴阳河地区与胡宗南部队打了一次恶仗。^⑤妇女独立团在巴州三江坝、官渡口，通江磨盘寨，南江长赤、木门等地，配合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打了很多胜仗。^⑥在反六路围攻东线全面反击时，妇女独立团配合主力部队追击敌人。^⑦为打破国民党军阀布置的川陕会剿计划，妇女独立团于1935年春配合红三十军的几个团在嘉陵江畔牵制川军的战斗。“敌人凭着人多武器好。组织起来对妇女团发起了三次冲锋，但都被英勇的女战士们打了下去。敌人的死尸一片片地留在了阵地前沿。”

① 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办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162页。

② 陶万荣：《忆在烽火弥漫中的巴山妇女》，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26页。

③ 张庭福：《我当上了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办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

⑤ 徐美莲：《长征中的女红军——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妇女独立团战斗生活散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编：《豪情忆征程》，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4页。

⑥ 杨清香：《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保卫后方》，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⑦ 王绍莲：《我家四口人都参加了红军》，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此役，独立团女战士坚持一天一夜，战后，受到总部表扬。^① 但并非每名妇女独立团女战士都直接参加过战斗。独立团（营）中的小女红军一般不上前线参加战斗，她们主要在后方给部队战士或医院里的伤病士兵洗衣服。^② 张永芳回忆：“反六路围攻期间，我没有直接参加战斗，都是同红军机关和伤员一起走，……我们同红军机关一起退却、转移、反攻，一直战斗了八个多月。1935年4月初离开川陕苏区，渡过嘉陵江西征，我们一直跟随红军医院保护伤病员。”^③

关于妇女独立团在随后的长征和西路军征战史中直接参与前线战斗的问题，老红军们的口述回忆与学界的研究成果是一致的。长征和西路军时期，妇女独立团参加过吴家山、一条山、道孚、炉霍、名山县百丈关、永昌、高台、山丹城、古浪、临泽、梨园口等多场战斗。据许春贵回忆，西路军时期，独立团的女战士跟男同志一样要参加战斗。^④ 坚守高台之战，独立团第三营与马家军进行肉搏战，几近全部牺牲。临泽一战，妇女独立团损失近400人。1937年2月，倪家营子之战，“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争为先登。”^⑤ 可见，其时妇女独立团直接参与了这场保卫战。据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副营长向翠华回忆，在梨园口战斗中，独立团担任了掩护西路军总部主力撤入祁连山的军事任务^⑥，她们与马家军进行残酷的肉搏战。^⑦ 此役，独立团四十多名指战员牺牲，很多女战士

① 刘坚：《妇女独立团二三事》，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

② 李秀英：《妇女独立营的生活非常丰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张永芳：《长胜县扩红工作受到了川陕省的表扬》，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许春贵：《子弹武器都是女红军战士在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⑤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8页。

⑥ 《她从巾帼群中奋起》，朱广振、周桂英编：《浩气壮河湟——西路红军在青老战士》（内部资料），1991年，第90页。

⑦ 谢杰同、李引进：《战火中的青春——记西路红军妇女独立团排长刘永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金昌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金昌文史》第3辑（内部资料），1989年，第46页。

被俘。^① 妇女独立团某连连长张克勤率连队与马家军鏖战，掩护总部撤进祁连山，最后，该连仅存活 20 人。^② 这些都是妇女独立团直接参战的鲜活例证。

三、性别意识下妇女独立团女战士对革命的体验与理解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妇女独立团女战士一改传统中国女子羞涩娇柔的形象，克服生理弱势，以坚韧忠贞的品格，通过执行内防任务，担负各种战勤任务，大造革命舆论、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等艰苦繁重的工作以及直接配合主力部队参与前线战斗来体验革命，为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牺牲。运输物资时，她们每次要背负几十斤上百斤的军需品。“行军时我们只能抬担架，运干粮，背茶砖，挑担子，整天在崇山峻岭中转来转去。……肩头压得又红又肿，火辣辣的难受。……初夏时节，太阳晒得皮肤发烫。”^③ “从旺苍坝等地抢运武器弹药，向南江转移，每人背运七八十斤，往返一二百里路，全身被汗水湿透，未曾干过。”^④ 过草地时，女战士们行经期间，“水面上是红腥腥的水漂起走。女的两面腿磨破。”^⑤ 从执行战勤任务来说，抬运伤兵比运送粮食、盐巴、武器弹药等军需物资更为艰难。“有的个子小的，四个人都抬不动。山路不好走，抬起来很吃力，流一身汗。……有的女的行经，劳动就崩血。”^⑥ “好多人脚上磨起了

① 《被活埋而又幸存的女俘》，朱广振、周桂英编：《浩气壮河湟——西路红军在青老战士》（内部资料），1991 年，第 102 页。

② 《女连长——西路红军妇女独立团在青连长张克勤》，朱广振、周桂英编：《浩气壮河湟——西路红军在青老战士》（内部资料），1991 年，第 160 页。

③ 赵兰：《妇女独立团生活片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01 页。

④ 王秀英：《妇女独立团在旺苍坝扩编为妇女独立师》，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⑤ 艾芜：《艾芜全集》第 17 卷《日记（1963—1965）》，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6 页。

⑥ 艾芜：《艾芜全集》第 17 卷《日记（1963—1965）》，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4 页。

泡，还是坚持。”^①“肩上压得又红又肿。”^②独立团潘家珍所在连队本来只有三十副担架的任务，但她们不畏艰难，以超常的毅力，承担了五十副担架的任务。^③在运送物质、抬运伤病员过程中，她们用歌声互相鼓励，缓解身心的疲惫、疼痛。歌词主要是关于妇女解放、土地革命、送亲人参加红军等内容。比如“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唱一个国际歌，出现了苏维埃！”^④“红军都是工农子弟，受了豪绅多少气。掠夺我政治，剥夺我经济，屠杀我人民。我们团结起来一条心，打倒豪绅地主不留情。”^⑤“红军哥哥你莫哭，转个弯来就到屋；红军哥哥你莫愁，进了医院治伤口；红军哥哥你莫急，下次我来迎接你。”^⑥都是她们经常唱的歌曲。

在时间紧、任务重和地理社会环境恶劣的条件下，女战士们若没有坚强的意志和饱满的革命热情做支撑，是不可能完成运输军需物资、转移伤病员等艰巨任务，因为这些任务已经远远超过了她们生理上的承受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革命对妇女独立团女战士而言，更多在于心理和意志层面上的感悟和理解。

其时，由于整个社会话语背后普遍的男权立场，导致了女性主体性的“虚弱”。妇女独立团女战士在追求男女平等和求证自己价值的革命实践中，把男女平等片面理解为无性别差异的男女一致，抹杀了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实践中她们不断表现出丝毫不逊于男人的勇敢和机智：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做到，甚至要做

① 张琴秋：《关于妇女独立团的情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

②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

③ 潘家珍：《妇女担架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

④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3页。

⑤ 潘家珍：《妇女担架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

⑥ 刘坚：《妇女独立团二三事》，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

得更好。据王秀英回忆：“妇女独立团的指战员无论做什么事，都积极勇敢和负责，都敢于同男同志比高下。”^① 李萍回忆：“女的什么都来，北方人叫四川女的是蛮子。四川妇女上进心强。”^② 徐美莲回忆：“在战斗中，我们这些女干部，不仅要指挥作战，而且还要带头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有时还要背着伤员撤退。粮食和饮水缺乏时，我们忍饥挨饿把自己省下的干粮和水给伤员、病号。下雨露天宿营，我们用自己的雨布搭成棚子让伤病员睡，自己淋雨休息。爬雪山时，天气特别冷，我们干部把伤病员围在中间，用身体为她们挡风寒。在过草地时，有一次突然下起冰雹来了，我们用身体掩护伤病员免受冰雹的袭击。”^③ “总之，任务来了她们都抢着去做，从来没有讨价还价，从来不知什么叫苦。妇女独立团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像个革命军人一样，坚决执行命令。”^④ 王泉媛回忆：“当时想，我们妇女万一（被）捉到，也不会全部牺牲，还可以化装，可以走。男同志就变不得什么，这是一个条件。另外，我们女同志牺牲不要紧，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男同志，更勇敢地跟敌人斗争，宁可牺牲自己，因为他们的战斗力更强，我们要保护他们。我们的思想、目的就是这样，做了自我牺牲的准备，一定要掩护我们的主力西进。”^⑤ 这些独立团女战士的口述回忆无疑体现了她们对个人价值的一种特殊体认，同时也反映了在革命战争年代，不仅匹夫对天下兴亡有责，匹妇亦有责。

在革命战争年代，女战士们不但要扮演与其家庭身份相适应的各种家庭角色，比如贤妻良母、女儿、媳妇等，而且还将这些角色延伸至革命公领域，负责照顾男性革命伴侣和同志的生活。妇女独立团战士不仅

① 王秀英：《妇女独立团在旺苍坝扩编为妇女独立师》，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艾芜：《艾芜全集》第17卷《日记（1963—1965）》，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页。

③ 徐美莲：《长征中的女红军——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妇女独立团战斗生活散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编：《豪情忆征程》，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

④ 张琴秋：《关于妇女独立团的情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

⑤ 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3页。

要自己背行李、枪支、子弹、干粮袋，还要给红军主力做饭、洗衣服。“到达宿营地后，女同志当大师傅，替全连人做饭。”^① 据吴朝祥回忆：“每到休息的时候，战士们一放下担架，马上就去找粮食、挖野菜，拾柴打水，垒灶生火。”^② 徐美莲回忆：“部队宿营后，我就和炊事员同志一起给大家烧水、做饭，有时还要抽空给一些小战士补鞋子、缝衣服。”^③

值得注意的是，妇女独立团剃光头或留短发的现象为我们理解女性的性别意识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④ 妇女独立团一般要求剃光头或留短发。据吴朝祥回忆：“干部战士不蓄头发。”^⑤ “整个团从政委、团长直到号兵、伙夫都是剃的光头。”^⑥ 对于妇女来说，剪发或剃光头作为一个向旧日之我的告别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她们从事革命工作的表征，濡染了革命的色彩。当然，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女战士剃光头除了具有革命的象征意义之外，主要是出于“安全、卫生、作战方便”考虑。张琴秋认为女战士剃光头有三大好处：第一，山地雨水多，战争形势严峻，没有时间洗梳头发，剃光头可避免长虱子。第二，战争中负伤，剃光头可避免头发粘在伤口上，导致伤口化脓。第三，剃光头后，装扮成与男战士一样，有利于行军作战，给敌人更大的心理威慑。^⑦ 赵玉香回忆时谈及妇女独立团剃光头有两大好处：一是与敌人搏斗时，

① 张琴秋：《关于妇女独立团的情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88页。

② 吴朝祥：《巴山妇女在战斗中成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页。

③ 徐美莲：《长征中的女红军——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妇女独立团战斗生活散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编：《豪情忆征程》，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页。

④ 关于妇女独立团剃光头现象的研究，可参考徐峰：《性别视域下川陕妇女的解放与革命——以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为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5期；徐峰：《剪发与革命：苏区革命妇女的身体政治史研究——以妇女独立团剃光头为例》，《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⑤ 吴朝祥：《巴山妇女在战斗中成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⑥ 吴朝祥：《从通江到大藏寺》，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⑦ 吴朝祥：《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的斗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6页。

头发不容易被敌人抓住；二是战争期间不用洗头，可以将节约的水用来喝。^①但是，长发是当时女子和男子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的性别特征。因此，当剪发或剃光头的命令下达后，很多女战士十分不理解并有抵触情绪，不愿意剃。她们说：“剪掉头发，是当尼姑，还是当和尚？”“革命还在乎一绺头发吗？真是的！”^②“剪了发，姑娘没个姑娘样，像个出家的尼姑，多难看！”^③事情弄得很僵，“姑娘们谁也不肯，有些人甚至躲了起来。……任务无法执行。”^④为改变她们的观念，独立团领导干部做了思想动员。张琴秋在动员独立团女战士剪发和剃光头时说：“红军就得像个红军样，不能像个大小姐，耳朵上戴耳环，腕子上戴镯子，留着很长的发……”^⑤部队连长做剪发思想动员时说：“我们是红军战士，……留着长发……怎么能打好仗？……今天剪发放脚，这也是反封建！”^⑥不仅如此，干部们还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剪掉自己的辫子。处于群体中的个人，因其个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即使没有任何外力强制的情况下，也会情愿让群体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从而表现出明显的集体心理。最终，为了更好地适应战斗需要，她们在独立团干部的带领下，选择了服从革命大义，压缩自己作为女性的性别身份特征，将长发一刀“咔嚓”掉了。据杨清香回忆：“见团长、营长、连长都带头剃光头了，大家也就全剃了。”^⑦林江所在的连队，“在连长的带动下，姑娘们到底行动起来了”，全连战士都剪了发，放了脚。“几天之后，我们接到新的指示，为

① 赵玉香：《那个岁月生与死》，《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页。

②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

③ 林江：《是“琼花”也是“小花”》，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

④ 林江：《是“琼花”也是“小花”》，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

⑤ 赵兰：《妇女独立团生活片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199页。

⑥ 林江：《红四方面军妇女连生活片断》，张云逸、杨至成等：《星火燎原·未刊稿》第2集，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250页。

⑦ 杨清香：《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保卫后方》，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了更好地适应战斗需要，全连一律剃了光头。”^①但女战士们内心却非常难过，林江回忆：“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觉，抱着门前的皂角树痛哭了一场。”^②张先秀和几个小女兵剃光头后，“互相对看着，一个个宽衣大袖，头皮青光，心里都很不好受，不由得眼泪就流下来了。”^③

女战士被编入妇女独立团时都被要求剃光头，但她们并非一直保持光头的形象，平时可以留短发。据王绍莲回忆：“女战士的服装与男战士一样，头发留得很短。”^④赵正富回忆：“正式进草地之前，我们学军事。还学打枪骑马，和男的一起练，人家认不出我是女的，我头发剪的很短。”^⑤遭遇硬仗时，避免被敌人发现才需要剃光头。倪家营子之战，向翠华带领全连战士执行任务，为壮大声势，蒙混敌人，她让战士们装扮成男子，剃光头发。除了剃光头、留短发之外，独立团中也流行毛盖发型，其时苏区传唱着一首扩红的红军歌谣：“脚不缠，发不盘，剪个毛盖变红男，跟上队伍打江山。”^⑥另外，独立团中的小战士不用剃光头。

战争年代大多数穷苦家庭物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女子第二性别特征发育不明显，女战士们剪发或剃光头后，其外在性别特征逐渐模糊，她们“加上新穿的军服，齐膝的短袄，过膝的绑腿，带绒耳的草鞋，背上的斗笠，肩上的枪，俨然和男红军一模一样了”。^⑦“妇女独立团全是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身体健壮，不留长发，英姿飒爽，俨如男兵。”^⑧“我们都把头发剃得光光的，穿起新军装，打起绑腿，戴上斗笠，背上步枪，

① 林江：《是“琼花”也是“小花”》，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

② 林江：《是“琼花”也是“小花”》，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页。

③ 宣奉华：《张萍——脚印留在历史的长卷上》，瞭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传》，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429页。

④ 王绍莲：《我家四口人都参加了红军》，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⑤ 艾芜：《艾芜全集》第17卷《日记（1963—1965）》，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

⑥ 陈焕英：《死也要跟着红军闹革命》，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⑦ 赵兰：《妇女独立团生活片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199页。

⑧ 刘坚：《妇女独立团二三事》，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页。

同男战士一模一样。”^① 据赵玉香回忆：“着装和男兵一样，尤其是打仗时表现出的英勇顽强，根本看不出是一群十七八岁的姑娘。”^② 这时，耳洞和声音成为男女性别区分的重要特征。据伍兰英回忆：“记得我们到村子里去宿营时，老乡们还真认为我们是男人，不让走进妇女的房里去，也不让和妇女接近，妇女见了我们也躲躲闪闪。我们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后，有的还不相信，我们就将耳朵给她看，她看到耳朵上有带耳环的眼，才相信我们真是女红军。”^③ 赵玉香回忆：“剃成光头的女战士在冲锋时，通常是不出声的，怕敌人听出我们是女兵。”^④ 李玉南曾对徐安恒说：“当年打硬仗时，她和很多女战士都剃成光头，英勇作战，闷不出声，就怕敌人听出她们是女兵。”^⑤

女战士们的性别意识受到战争这种政治生态的规训，当她们因剪发和剃光头使自己的外在特征逐渐隐退，趋于与男子一致时，其性别意识并没有被抹除，而是与革命维持某种平衡，以一种潜意识的方式继续存在并体现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据赵兰回忆：“我们是很知道爱护武器的，常常到处询问保护武器的方法。有一次我们看到男同志的枪口上都有布做的小帽，一打听，原来是防灰尘的。回来大家一商量，东拼西凑，搞了些五颜六色的丝绒，用梳子通一通，敝出不少色彩鲜艳的小绒珠，这些小绒珠塞在枪口上，又防尘土又漂亮。男同志看了非常羡慕，不断夸我们：‘妇女们真是手巧心灵。’……一天，我们正在屋里打草鞋，收拾脚码子，张团长和军事教员检查内务来了。宿舍里很整齐，挂在墙上的米袋子、挂包，一条线似的溜直。张团长各处看了看，然后满意地点

①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② 赵玉香：《那个岁月生与死》，《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页。

③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1页。

④ 赵玉香：《那个岁月生与死》，《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页。

⑤ 彭俊礼主编：《通江女红军》，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70页。

点头，转过身来问我：‘瞄准练得怎么样？’”^① 上述女战士们在军营中更加爱美、爱整洁，比男战士更利索等都是女性性别意识的体现。

可见，一方面，革命对妇女独立团女战士而言，更多在于心理和意志层面上的感悟和理解，她们通过执行内防任务，担负各种战勤任务，大造革命舆论、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等艰苦繁重的工作，以及直接配合主力部队参与前线战斗等方式来实现对革命的体验。另一方面，女战士们的性别意识并未因受到战争这种政治生态的规训而被抹除，而是与革命维持某种平衡，以一种潜意识的方式继续存在并体现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

^① 赵兰：《妇女独立团生活片断》，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页。

第六章 川陕苏区的巾帼英杰

中共在川陕苏区高度重视妇女这支力量，十分关心和支持妇女运动，运用有效的政治动员方式和路径，保障妇女的地位和权益，充分调动妇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了她们的革命热情。她们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大义凛然、坚定信念，积极投身妇女运动，在经济建设、参军参战、支前服务、粉碎敌人进攻中，充分发挥了妇女“半边天”的作用，成为后方工作的主力军、革命事业的贤内助、思想工作的好助手，不愧为巾帼英杰。

川陕苏区的巾帼英杰各有不同的典型意义，本章选取部分当年在川陕苏区战斗或工作过并有一定影响的巾帼英杰，根据她们的口述回忆，结合历史文献资料、档案资料，力图站在她们的角度，再现她们在川陕苏区妇女运动和川陕苏区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与贡献，以及革命本身对她们自身的影响。

第一节 川陕苏区巾帼英杰的来源及群体形象

大体而言，川陕苏区巾帼英杰的来源有两种类型：

一是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建立川陕苏区的妇女干部或妇女工作人员，如张琴秋、林月琴、曾广澜、陶万荣、刘伯兴、向翠华、刘桂兰、侯守玉、詹应香、陈五洲、张茶清、何福祥等人。这些巾帼英杰中有部分是中央派遣到鄂豫皖苏区的妇女领导干部，一般具有良好家境，拥有

较高文化水平，甚至有的还有出国留学经历，在进入鄂豫皖苏区时已经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如张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生活长达5年，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军事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同时，积极参加劳动，向工人、干部学习纺织技术和管理知识，使她从一个普通革命青年成长为杰出的革命领导者。还有部分巾帼英杰的革命伴侣是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受其熏陶与影响，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较早，容易接受新鲜事物，革命经验丰富。如曾广澜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其丈夫蔡申熙的影响下，积极从事革命工作，在进入鄂豫皖苏区之前已具有很高的革命意识和工作热情。这些巾帼英杰来到鄂豫皖苏区后，走进乡村，积极从事妇女工作，动员并培养了一批当地深受苦难且认同、向往革命的妇女积极分子加入革命洪流。而这些受到动员、教育、感化的妇女群众，在鄂豫皖苏区参加红军，经过妇女工作的锤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成为妇女骨干，如汪荣华在鄂豫皖苏区担任过英山县第五区少共妇女部长；陶万荣在鄂豫皖苏区当过红安县儿童团团长，参加了无线电训练班的学习。因此，当她们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后，普遍具有知识、信念和经验等优势，已然能够率先垂范，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动员和鼓舞川陕苏区的广大妇女群众投入革命斗争的洪流，在川陕苏区的妇女运动中发挥中坚骨干作用。

二是随着川陕苏区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许多出生和生活于川陕边区的妇女经张琴秋、林月琴、曾广澜、陶万荣等人的动员和影响融入革命并得到成长，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王定国、吴朝祥、姚明善、肖志珍、张庭福、杨文局、李玉南、李健、林江、郭长春、赵正富、程桂、李萍、伍兰英、刘照林、王泽南、赵兰、孙克、史群英、刘坚、潘家珍、杨磊、李光明、张苏、李开英、贾德福、张文、杨素珍、彭克昌、苏智、杨林平、梁金玉、王能香、唐树林、杨柏、赵玉香、叶冰、叶琳、向玉文、徐荷莲、刘汉润、周怀女、吴清香、王桂兰、邓秀英、张显明、林桂珍、胡桂香、朱世清、何克春、李林、严诚、刘文治、吴秀英、杜芝田、杨琴、岳琴、吴秀林、王秀英等人。

本地巾帼英杰大都出身贫苦之家，吃苦耐劳，诚恳朴实。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刘坚的家只有一分地，吃不饱，穿不暖，父母常为锅里没米发愁。^① 曾任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的张庭福回忆：“在旧社会，我家很穷，我从懂事起就在家割草、打柴，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② 程桂回忆：“由于家境贫穷，六姊妹中先后死去了三个姐妹，七岁那年即死了母亲。父亲以教书为业，1931年（即我十一岁那年）被大地主程元通活动国民党军队以‘通共’罪名活活打死。父亲死后，哥哥给地主当背老二，我给地主放牛割草维生。我们干的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受尽了旧社会的折磨，产生了对那吃人社会的仇恨。”^③ 伍兰英七岁起就给地主放牛，受尽了奴役和欺凌。^④ 许贵春回忆：“小时候家里十分贫寒，自己只念了一年私塾，才几岁的时候，父亲就被疯狗咬伤，得狂犬病去世了，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一家人陷入了窘迫的境地。”^⑤ 正因为本地贫苦女子在物质生活和精神方面遭受了极大痛苦，当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经过外来巾帼英杰的动员，她们的革命热情被激发，毅然坚定地投身到自我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在中共举办的各种训练班或妇女干部学校的培养下，文化水平得到提升，性格变得开朗，积极为党的事业鼓与呼，成为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重要力量。

本地巾帼英杰多有当过童养媳的苦难经历。刘坚、李玉南、杨清香、刘桂芳、周明、陈焕英、李光明、杨素珍、刘照林、肖志珍、杨林平、唐树林、叶琳、张显明、冯新、安秀英、苏琴、李天秀、杨磊、吴秀英、张云、张静、陈再如、贾克林、唐照国、黄琳、童云、谢元珍等都当过童养媳，她们过门后，在家庭中不得不承担媳妇、奴婢和劳力等

① 刘坚：《童养媳、丫头、女兵》，菡子主编：《女兵列传》第2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② 张庭福：《我当上了川陕省委第一任妇女部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③ 程桂：《回忆在新剧团和妇女独立营的一段战斗经历》，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60页。

④ 伍兰英：《参加妇女独立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0页。

⑤ 许贵春：《子弹武器都是女红军战士在背》，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多重角色，常遭公婆歧视、虐待，过着非人的生活，命运十分悲惨。“童养媳的日子实在可怜，先当奴隶，后作人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睡的是草窝窝，吃的是残汤剩水，一天到晚累死累活不说，动辄还要挨打受气。”^① 这些经历也使她们具有勤劳、肯吃苦、反抗性强、渴求自由解放的特点。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区，建立川陕苏区后，在中共政策的动员下，以及经张琴秋、汪荣华、曾广澜、林月琴等外来巾帼英杰的创造性工作，这些具有童养媳背景的女子在共同理想的凝聚下，绝大多数后来成为川陕苏区的革命积极分子、女英雄。如女红军张茶清到恩阳河进行扩红宣传，现场就有十几个童养媳报名参加红军。^② 据吴朝祥回忆，曾当过童养媳的苏大芳，“在毒打和恫吓面前，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动摇，没有悔恨，相反，更加坚定了‘生为红军人，死做红军鬼’的决心。她趁家里的人离开的时候，挣断了绳索，忍受着浑身伤痕的疼痛，再次逃跑出来，到大寨乡参加了红军。当时，像苏大芳这样的妇女，何止她一人啊！她的斗争经历，只是巴山千千万万妇女反封建、求解放的缩影。”^③

本地巾帼英杰参加革命时普遍年龄偏轻，不到 30 岁，绝大多数年龄在 20 岁以下（见表 6-1）。尤其是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年龄最大的二十来岁，最小的才十三四岁，人称她们是“女娃娃兵”。^④ 据金秀英回忆，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缝衣连二排除排长外，其余女工全在 25 岁以下，最小的仅有 14 岁。^⑤

① 吴朝祥：《巴山妇女在战斗中成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8 页。

② 林月琴：《回忆妇女工兵营》，《解放军报》1982 年 3 月 9 日。

③ 吴朝祥：《巴山妇女在战斗中成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79～180 页。

④ 刘坚：《妇女独立团二三事》，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94 页。

⑤ 金秀英：《红军缝衣连》，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15 页。

表 6-1 部分川陕苏区本地巾帼英杰参加革命时的年龄表

姓名	籍贯	出生年份	参加革命年份	参加革命时的年龄
万曼琳	四川南江	1926	1933	7 岁
苏力	四川青川	1927	1934	7 岁
李登玉	四川万源	1925	1933	8 岁
王新兰	四川宣汉	1924	1933	9 岁
苟维芳	四川阆中	1924	1933	9 岁
陈其	四川巴中	1924	1933	9 岁
邓秀英	四川通江	1922	1932	10 岁
曲飞	四川苍溪	1923	1933	10 岁
牟炳贞	四川宣汉	1922	1932	10 岁
杨琴	四川通江	1922	1932	10 岁
赵明光	四川阆中	1923	1933	10 岁
史群英	四川旺苍	1922	1933	11 岁
王桂兰	四川苍溪	1921	1932	11 岁
侯正芳	四川阆中	1922	1933	11 岁
王克	四川平昌	1921	1933	12 岁
孙克	四川巴中	1921	1933	12 岁
李光明	四川通江	1921	1933	12 岁
李琳	四川南江	1921	1933	12 岁
张苏	四川通江	1921	1933	12 岁
冯新	四川巴中	1921	1933	12 岁
李鸿翔	四川通江	1920	1932	12 岁
张甦	四川通江	1921	1933	12 岁
华全英	四川巴中	1920	1933	13 岁
刘坚	四川通江	1919	1932	13 岁
张萍	四川阆中	1920	1933	13 岁
孟瑜	四川阆中	1920	1933	13 岁
冯苏	四川万源	1921	1934	13 岁

续表

姓名	籍贯	出生年份	参加革命年份	参加革命时的年龄
冯辉	四川阆中	1920	1933	13岁
李玉兰	四川营山	1920	1933	13岁
杨磊	四川通江	1920	1933	13岁
张静	四川阆中	1921	1934	13岁
钱桂英	四川平昌	1920	1933	13岁
童云	重庆城口	1920	1933	13岁
鄢秀英	四川巴中	1921	1934	13岁
刘春	四川宣汉	1920	1933	13岁
华全双	四川巴中	1920	1933	13岁
权卫华	四川阆中	1919	1933	14岁
吴朝祥	四川通江	1918	1932	14岁
张文	四川通江	1919	1933	14岁
郭长春	四川阆中	1919	1933	14岁
唐树林	四川通江	1918	1932	14岁
王顺洪	四川宣汉	1919	1933	14岁
邓远征	四川阆中	1919	1933	14岁
叶林	四川巴中	1919	1933	14岁
刘文泉	四川阆中	1919	1933	14岁
安钦林	四川阆中	1919	1933	14岁
李健	四川巴中	1919	1933	14岁
李涵珍	四川达州	1919	1933	14岁
宋南珍	四川阆中	1919	1933	14岁
岳琴	四川通江	1921	1935	14岁
雷秀珍	四川巴中	1919	1933	14岁
黎萍	四川巴中	1919	1933	14岁
吴桂莲	四川南江	1919	1933	14岁
林江	四川阆中	1918	1933	15岁

续表

姓名	籍贯	出生年份	参加革命年份	参加革命时的年龄
岳克	四川南江	1918	1933	15岁
秦仪华	四川平昌	1919	1934	15岁
蒲文清	四川平昌	1918	1933	15岁
叶琳	四川通江	1918	1933	15岁
苏琴	四川巴中	1918	1933	15岁
李萍	四川巴中	1918	1933	15岁
李朝春	四川阆中	1918	1933	15岁
杨征鹏	四川达州	1918	1933	15岁
张庭福	四川通江	1917	1932	15岁
孟青	四川苍溪	1918	1933	15岁
赵惠兰	四川阆中	1918	1933	15岁
伍兰英	四川苍溪	1916	1932	16岁
刘立清	四川万源	1917	1933	16岁
李开芬	四川达州	1917	1933	16岁
蒲云	四川巴中	1917	1933	16岁
叶冰	四川通江	1917	1933	16岁
刘汉润	四川通江	1917	1933	16岁
严荣	四川南江	1917	1933	16岁
吴顺英	四川通江	1917	1933	16岁
张云	四川万源	1918	1934	16岁
张正秀	四川巴中	1916	1932	16岁
张兰	四川万源	1918	1934	16岁
姚树兰	四川苍溪	1917	1933	16岁
贾克林	四川绵阳	1917	1933	16岁
陶才楨	四川达州	1919	1935	16岁
黄琳	四川通江	1917	1933	16岁
廖殿明	四川阆中	1917	1933	16岁

续表

姓名	籍贯	出生年份	参加革命年份	参加革命时的年龄
谭新华	四川宣汉	1917	1933	16岁
刘钊	陕西镇巴	1918	1934	16岁
王长德	四川阆中	1916	1933	17岁
尹清平	四川旺苍	1916	1933	17岁
刘天佑	四川巴中	1916	1933	17岁
张明秀	四川昭化	1918	1935	17岁
赵明珍	四川达州	1916	1933	17岁
赖清林	四川万源	1916	1933	17岁
潘家珍	四川通江	1916	1933	17岁
冯明英	四川巴中	1916	1933	17岁
李玉南	四川通江	1916	1933	17岁
杨林	四川巴中	1916	1933	17岁
杨国钦	四川巴中	1916	1933	17岁
何克春	四川通江	1916	1933	17岁
梁金玉	四川通江	1917	1934	17岁
谢元珍	四川南江	1915	1932	17岁
卢桂秀	四川苍溪	1916	1933	17岁
刘学芝	四川剑阁	1915	1933	18岁
严诚	四川通江	1915	1933	18岁
李秀英	四川通江	1914	1932	18岁
何炽	四川南部	1915	1933	18岁
何锐	四川旺苍	1917	1935	18岁
赵珠明	四川阆中	1915	1933	18岁
贺林	四川达州	1915	1933	18岁
唐照国	四川营山	1915	1933	18岁
彭少华	四川阆中	1915	1933	18岁
李自珍	四川达州	1914	1933	19岁

续表

姓名	籍贯	出生年份	参加革命年份	参加革命时的年龄
安秀英	四川阆中	1914	1933	19岁
苟兴珍	四川阆中	1914	1933	19岁
赵碧轩	四川阆中	1914	1933	19岁
彭克昌	四川通江	1913	1932	19岁
马奎宣	四川开江	1912	1932	20岁
王定国	四川营山	1913	1933	20岁
杨文局	四川达州	1913	1933	20岁
何子友	四川苍溪	1913	1933	20岁
王志成	四川旺苍	1913	1933	20岁
王德银	四川阆中	1913	1933	20岁
李天秀	四川通江	1914	1934	20岁
朱映明	四川旺苍	1913	1933	20岁
刘照林	四川通江	1912	1933	21岁
吕明珍	四川达州	1912	1933	21岁
刘文治	四川通江	1912	1933	21岁
周明	四川南江	1913	1934	21岁
胡桂香	四川通江	1912	1933	21岁
王永忠	四川苍溪	1910	1932	22岁
陈再如	四川万源	1911	1933	22岁
吴秀英	四川旺苍	1909	1933	24岁
何连芝	四川万源	1905	1933	28岁
姚明善	四川南江	1903	1933	30岁

资料来源：1. 王友平主编：《长征中的川籍女红军》，四川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2. 何光表：《川陕苏区的妇女状况》，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3. 彭俊礼主编：《通江女红军》，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4. 李芝兰编著：《巾帼壮歌——川陕苏区女红军纪实》，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5. 瞭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传》，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6. 王毅主编：《红色档案》（内部资料），2010年。

川陕苏区绝大多数本地巾帼英杰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前或之初，文化程度很低或几乎是文盲。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川陕边区文盲达到90%以上，劳动妇女则几乎百分之百是文盲。仅有少数本地巾帼英杰在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已参加革命工作且有一定文化水平。比如杨文局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至1932年被组织派遣到宣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协助杨克明发动群众参加革命，1933年10月，她作为地下党员和游击队联络员迎接红四方面军进入达县县城。又如王维舟的夫人马奎宣1931年在开江县广福学校读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组织妇女协会，协助王维舟发展川东游击军。由于教育的不普及，她们的才智便不能得到开发，应有的知识和能力得不到培养。据陶万荣回忆：“由于妇女普遍文化低，通南巴的妇女文盲多。”^①为此，中共在川陕苏区把教当地妇女识字作为妇女教育的首要任务。妇女工兵营把不识字的同志分成班，组织她们利用工余时间进行学习，开展了“识五”运动。^②“通过四五个月的学习后，就渐渐收到效果。进步快的同志可以写家信，有的可以记学习心得，有的还能为壁报写稿。”^③华全双原来是文盲，经川陕省委开办的妇女学校培养，加之她自身很刻苦，利用别人休息时间进行文化学习，不懂就问，进步很快，结业后，就留在了少共省委妇女部工作。^④文化扫盲和政治教育等一系列活动对提高广大妇女的政治意识、阶级觉悟，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本地巾帼英杰大多性格开朗、口才良好、吃苦耐劳、聪明能干。刘坚的宣传水平很高，被提拔为川陕省委妇女部长；方桂英因在童子团时能歌善舞，在反三路围攻胜利后，被编入红四军十二师新剧团当女演员，从事宣传工作；王希云从小爱唱爱跳，嗓音好；刘绍映在部队里机灵活

① 陶万荣：《川陕苏区妇女学校》，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32页。

② 林月琴：《回忆妇女工兵营》，《解放军报》1982年3月9日。

③ 《杨文局回忆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妇女工兵营情况》，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生产历史回忆资料（1927—1949）》（内部资料），1990年，第134页。

④ 陶万荣：《川陕苏区妇女学校》，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32页。

泼，能歌善舞。反六路围攻期间，总部规定妇女独立团必须在两天两夜将旺苍的几千斤粮食和枪支弹药、棉衣等物资运到南江、长赤，全团一千多名女战士在团长张琴秋的带领下，每次背的粮食不低于七八十斤，衣服全被汗水浸透了，脚上也起了血泡，肩也背肿了。

从以上对川陕苏区巾帼英杰群体形象的阐释可知，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基于共同的革命理想，川陕苏区的外来巾帼英杰与本地巾帼英杰构成了对川陕苏区妇女运动起着重要作用的一个群体，为支持战争、拥护红军、维护苏区，以及实现自身解放付出巨大牺牲，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广大巾帼英杰通过心理、意志和实践层面实现对革命的理解和感悟，勇于突破女性传统的价值取向、角色定位，彰显出她们的理想信念、坚韧意志、英勇顽强和务实担当。就此而言，她们的光辉业绩和历史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引以为傲，也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铭记！

第二节 张琴秋对川陕苏区的贡献^①

张琴秋，1904年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石门镇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1920年夏，考入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开始接受新思潮，宣传倡导剪发并带头示范。1922年初，转学上海爱国女学。1923年，在桐乡县立石湾振华女子小学代课，深感广大妇女受压迫深重。她在给沈泽民的一封信中说：“妇女处于水深火热之黑暗深渊，同学杨秀珍、沈杏娟等均因不满封建买卖婚姻被迫投河溺水而亡……平时与学友同事谈及此情此景，莫不痛心疾首。”^② 1924年春，经沈泽民介绍，考入上海大学，同年4月，加入共青团。她在学校召开大会声援保定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发通

^① 本节内容除标注的注释或参考文献之外，还参考了吕莹：《张琴秋传略》，《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第54～65页；钱青：《红军女杰张琴秋》，菡子主编：《女兵列传》第3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6页。

^② 桐乡市政协文教卫体与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张琴秋纪念文集》（内部资料），2006年，第350页。

电、通告，编印保定女师学潮特刊。后在上海创办一所平民夜校，给女工讲课，启发她们阶级觉悟。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1925年两年中，她经常出现在沪东、沪西棚户区里，深入女工群众做工作。在斗争实践中，她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名骁将，而她的表现也得到中共党组织的认可。有研究表明，在五卅运动前后，张琴秋在思想上已经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① 1925年冬，中共决定派张琴秋和一批革命进步青年去莫斯科学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5年间，她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军事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同时，在休假期间，积极参加劳动，向工人、干部学习纺织技术和管理知识。这为她回国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使她从一个普通革命青年成长为杰出的革命领导者。1930年秋，张琴秋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委员，承担妇女工作。1931年3月中旬，党中央派遣她前往鄂豫皖苏区，以加强党对该地区的领导。5月上旬，到达苏区中心、特委所在地金家寨后，经组织决定，她被分配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到任后，她从制订教育方针、教学计划到落实教学环节，都身体力行。在反四次“围剿”中，她被鄂豫皖中央分局派往黄陂以北、红安以西五十里外的河口县任县委书记。在任上，组织一支专事破坏敌人交通的铁路工程队和一支便衣交通队，积极配合主力红军的反“围剿”战争。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台台长的宋侃夫回忆：“在鄂豫皖苏区，琴秋同志是第一位女县委书记……她一到任就一面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解决群众的迫切要求，一面动员青年踊跃参军，组建地方武装，赤卫队，独立团，铁路工程队（专事破坏敌人交通）等人民武装组织像雨后春笋，相继成立。琴秋同志还以她特有的胆识和才干，组织了一支勇敢机智的便衣交通队伍……为苏区购运军用物资、通讯器材、布匹食盐等军需品，同时，还收集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为反‘围剿’的胜利做出了出色的贡献。”^② 由于张国焘

① 钟桂松：《张琴秋传》，华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0页。

② 宋侃夫：《一位红色娘子军的英雄战士——忆张琴秋同志》，《人民日报》1979年6月23日。

“左”倾领导的错误，红四方面军未能在内线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被迫西征，实施战略大转移，此时，张琴秋调任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1932年12月，张琴秋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小河口会议后不久，红四方面军于12月下旬翻越大巴山，进入通南巴地区，并于1933年2月，创建川陕苏区。此后，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战斗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共实施多项巩固和发展川陕苏区的举措并取得显著成效。其中，作为杰出的革命领导人，在川陕苏区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江县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团团长等职务的张琴秋，对川陕苏区的妇女运动以及川陕苏区的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川陕苏区留下了不朽功勋。

一、动员群众，重视并做好宣传工作

张琴秋在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和巩固川陕苏区方面，做了许多出色的工作，深得广大指战员和群众的爱戴。

她亲自组织宣传队，并亲自给宣传队员上课，教她们如何搞宣传，鼓励她们学文化。带领宣传队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和老大娘拉家常、诉穷人的苦情，讲红军是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部队，红军队伍里男女平等，妇女要参加革命、参加红军，争取自己的解放。据李玉南回忆：“我们那时能走出家门，走上革命的道路，与红军的宣传教育，与琴秋大姐对我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①白显中回忆：“张琴秋最爱宣传演说，每逢沙溪当场，她都要在街上公开演讲。”^②

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初，张琴秋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亲率由女红军组成的宣传队伍，在两河口、泥溪场一带开展工作。这支女红军宣传队用标语、口号、唱歌、跳舞、演讲、同老百姓聊家常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1933年1月中共在泥溪场建立川北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赤北县苏维埃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

^① 《访通江李玉南》，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72页。

^② 白显中：《张琴秋毅然起用杨成元》，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1933年2月底，川陕省第一次雇工代表大会在通江召开，张琴秋出席并讲话。她的讲话通俗易懂且动人。她说：“……到会的代表中，现在还有人不知道红军、共产党是干什么的。简单地说，红军、共产党就是为了穷人的翻身事业，向土豪劣绅作斗争。穷人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吃尽了苦，尽管日日夜夜劳动，还是穷得很……红军来了，我们今天帮长年的，干月活的要敢于起来斗争。穷人要怎样斗争呢？首先在建立苏维埃。苏维埃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工农兵劳苦大众的政府。……现在省工会成立了，代表们回去要迅速把县、区、乡的雇工会成立起来，团结广大群众，掀起土地革命高潮。……我们要大力扩大红军，这项工作是全党、全军的中心工作，也是雇工会的中心工作。到会代表应积极带头报名参军，才能巩固我们的胜利果实。”当时参加过这次雇工代表大会的赤江县总工会委员长赵友义回忆说：“张主任讲的都是我们穷人的话，我们听得懂，听起来入耳。”^①

据王定国回忆：“琴秋同志能歌善舞，每到一地，她就被围起来。她为伤病员跳高加索舞、乌克兰舞，带领大家唱革命歌曲。她唱歌我们都喜欢听。我记得她经常唱的有《八月桂花遍地开》，还给我们唱过湖北民歌《穷人打柴歌》。她的声音非常委婉，她把歌声唱到人们心窝里，唤起人们战斗的力量。”^②在重大纪念节日、党团大会、工农兵代表大会时，她亲自上台表演节目，宣传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拥军，激励广大红军将士斗争士气。比如1933年纪念八一建军节时，红四方面军在巴中北门广场举行了第一次全军阅兵仪式，阅兵式之前，张琴秋亲自上台演唱了《八月桂花遍地开》《红军最爱穷人家》《吃水不忘挖井人》《革命就要革到底》等红军歌曲，博得了红军官兵热烈鼓掌喝彩。^③她经常通过教唱《国际歌》动员广大民众参加红军。李玉南回忆：“（张琴秋）最爱唱的歌是

① 《通江县妇联访春在公社光辉大队赵友义（原赤江县总工会委员长）》，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77页。

② 王定国：《忆琴秋同志》，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页。

③ 方桂英：《我是红军新剧团的女演员》，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每次开党团大会、工农兵代表大会，她都要在台上教大家唱”，“她的歌声清脆嘹亮，每遇开什么大会，都欢迎她唱歌。”^①

二、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川陕省委宣传部长刘瑞龙和张琴秋一道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新剧团看望队员时，当她知道队员们对学习文化有畏难情绪时，便及时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张琴秋给战士们讲话：“你们是以文艺形式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队伍，完全不同于旧戏班子，不是为了糊口而蹦蹦跳跳；你们是党的宣传战士，有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可是，你们的文化程度都很低，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演戏首先要能读台词；没有文化，台词的意思你就理解不深，又怎能表达出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呢？所以，你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才能完成好党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从此，剧团制订了严格的学习制度，认真刻苦地学文化，读台词，互教互学。一年后，多数战士都能单独看剧本了，演出水平大有提高。^②

张琴秋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期间，为总医院工作人员和训练班学员、看护营讲授政治课和文化课，讲课内容主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道理，党和红军的方针、政策，国际、国内形势，前方战斗的消息，四川的山川河流等。据伍荣芳回忆，张琴秋经常给她们讲革命道理，“穷人为什么要受苦？因为有军阀财主的压迫剥削。怎样才能不受苦？只有跟着红军干革命。”^③李明芹回忆：“总医院的政治部主任叫张琴秋，……她对我们很和善，大家都很敬重她，她经常给我们讲革命道理。”^④在每月召开的红色战士委员会上，张琴秋主动倾听党员、团员、群众、老师、

① 《访通江李玉南》，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78页。

② 吕莹：《红四方面军总政剧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96页。

③ 伍荣芳：《红军总医院是张琴秋领导建立起来的》，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④ 李明芹：《我在王坪总医院看护排当排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学生、炊事员的意见。张琴秋还带新剧团深入重病连为走不动的彩病号慰问演出，唱《伤员十二功》。张琴秋和伤病员谈话，拉家常，询问他们的家庭情况，安慰他们好好养伤治病，给他们讲当前革命形势，选读报纸和前线战斗捷报等。许多彩病号听了张琴秋的话，在伤愈归队后，革命斗志更加高昂。

三、培养妇女干部，组织妇女武装

1933年3月，川陕省苏维埃编印《怎样分配土地？》的小册子，用以指导土地革命。时任红江县委书记的张琴秋首先响应号召，在红江发动和依靠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同时开展春耕生产运动，组织代耕队帮助红军、游击队战士代耕。

四、响应省委号召，积极开展土地革命

1933年3月，川陕省委为了加强后方警卫工作，在通江成立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政治委员曾广澜。最初，陶万荣从总政治部宣传队调任妇女独立营时有些胆怯，怕担不起这付重担。张琴秋找她谈话，鼓励她勇敢地担起担子，动员她：“你还是去吧！”其后，妇女独立团成立，张琴秋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带领女战士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摸爬滚打、瞄准射击、摸敌人“夜螺蛳”。^①

1934年，为培养妇女干部，川陕省委在通江建立妇女学校，张琴秋为学员讲授妇女运动方面的课程。

五、直接抓医院工作

为了解决中药医生短缺的问题，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根据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颁发的《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②的规定和具体情况，大量吸收当地中医药人才，并给予特别的优待。其中力

^① 关于红四方面军妇女立团的研究，请参考本书的第五章内容，此处不再赘述。

^② 《优待专门人才暂行条例》，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5~416页。

排众议，毅然重用中医妙手杨成元，极大地改善了总医院医疗人才紧缺的状况。时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护士白显中的口述回忆，将张琴秋起用杨成元的来龙去脉讲得十分清楚。他的口述回忆很长，但颇有价值，记录如下：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下设医务部，医务部下设中医部、政治处、医务处等机构。中医部驻廖坪，就是中医院，当时中医部共有一百一十余人，病号、彩号分开诊治和护理。我在中医部当护士，并跟着老中医杨成元学习医术。我师傅杨成元是沙溪嘴街道人，继承祖业开药铺行医，教出的徒弟十多人，都成了很有名气的医生。民国十五六年时，师傅受当地何、阎、王三姓举荐，曾经当过团正，所以1932年红军来了后，按惩治反革命条例，团正在惩治之列，师傅怕遭杀，就逃到深山，隐居在一个岩洞里。

1934年春天，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迁到王坪。当时反六路围攻，正打得激烈，伤员很多，加之疟疾、伤寒等病疫流行，部队犯病的越来越多，而医生又很少。在中医部里，仅有一个本地医生阎文仲主治疟疾，尽管他起早贪黑，甚至通宵达旦，一个人无论怎样都忙不过来，更何况药物紧缺，设备低劣，所以伤病员死亡越来越多。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阎文仲推荐，张琴秋通过串乡走户，调查分析，毅然决定起用杨成元，并委托中共沙溪嘴区委书记阎仕金去请杨成元出山。阎书记三顾岩洞，阐明红军政策，陈述病员情况，转达张琴秋对他的问候和期望，鼓励他救死扶伤，立功补过。推心置腹的思想工作，使杨成元疑虑渐消，他决心追随红军，于是结束了一年多的隐居生活，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年逾七旬的杨成元入院第一天，他了解伤病员情况后，立即诊脉处方。由于他行医三十余年，临床经验丰富，对地方病治疗比较熟悉，仅大半天时间就给患者处方九十多剂，做出样

板，招呼队员传授熬药方法。几天以后，药品渐渐缺乏，杨成元托人取回他原来隐藏的药，并发动亲朋好友在农村收集散存药物，又带领招呼医护人员上山采挖，缓解了药物的供求矛盾，此后他又积极试配新方剂，力求药到病除。经过我们的大力抢救，医院伤病员的死亡率急剧下降，大多数病员很快好转，重返前线。杨成元因为治病有功，被任命为中医部副主任。

杨成元一面精心治病，一面毫无保留地向医务人员传授医药知识，他既授课，又仔细批改作业认真辅导。总医院给他发一百二十元的月工资，他主动要求减少到六十元，最后要求减少到三十元。他常对我说：“红军是一支好部队，你要永远跟着。”我难得碰到这样的好师傅，我一边悉心照料师傅的生活起居，一边认真跟着师傅学艺，一共在中医部学习了两个月。

1935年春，红军撤离通江，中医部从廖坪直接出发。我师傅杨成元深知只有跟红军走才有出路，于是不顾家人的劝阻，坚持跟红军北上。他说：“我古稀之年遇知音，难得。幸喜参加革命，即便是死，也死而无憾。”临走时，张琴秋把她心爱的战马送给了杨成元，师傅迟迟不肯接受，战马也依依不舍，张琴秋轻轻地拍了几下战马，战马才走了，后来当地老百姓把这里称为“打马山”。^①

一些国民党投诚过来的医生，经过教育以后，张琴秋也大胆使用，有些医生经过锻炼后，成为总医院的骨干，如学西医的医生向桂林，后来就担任红三十三军医院院长。^②

反六路围攻时期，红四方面军总医院伤病员增加到五千以上。张琴秋和全院工作人员一起，依靠群众，采取分散的办法解决住房不足的问题。对于缺乏医药的情况，张琴秋和总医院工作人员通过缴获、购买、

① 白显中：《张琴秋毅然起用杨成元》，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② 钟桂松：《张琴秋传》，华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15～116页。

栽植、自制等办法战胜困难。^①

总医院刚迁至王坪时，蔬菜缺乏。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张琴秋带领总医院各伤病连利用一些闲散的荒地种粮、种菜1至2亩，并在贩卖部喂猪30至50头。^②张琴秋还和院部的同志一道，带领工作人员到医院附近支农，帮助住地附近的群众背水砍柴、放牛喂猪、管理菜园、打扫清洁。1934年春天，王坪一带伤寒、痢疾和疟疾病流行，总医院抽出医务人员给群众治病，还组织卫生队给儿童种牛痘，向群众宣传卫生知识，积极帮助他们预防疾病。^③

六、关爱伤员

时任卢森堡经济分社主任的王定国回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王坪、沙溪嘴地区军民的生活极为艰苦。没有米粮，只能把黑豆、蚕豆磨成粉当主食，没有盐巴，只能吃白水煮野菜。为了使伤病员早日康复，必须尽一切办法改善医院的伙食。她给炊事员讲，怎样做黑豆米饭才适合伤病员的胃口。她还通过各种渠道，派人给伤病员买盐吃。她说：‘别的开支都能省，给伤病员买盐的钱不能省。’”^④向云高回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经常在警卫员的陪同下到各个分医院看望伤员。^⑤因此，她也得到伤病员的爱戴，当时好多拄拐杖的伤员听到她来总医院所属医院检查工作，都自动到门口欢迎。

张琴秋出色的工作，使总医院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鱼水关系。“妇女们不但给伤病员缝补衣服，还帮助洗衣队给医院洗浆衣被；有时又扎出许多袜底、鞋子，打出很多草鞋送给伤病员。当地苏维埃政府经常组

① 四川省通江县现代革命史资料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1辑（内部资料），1981年，第43~45页。

② 《访通江沙溪李士俊》，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188页。

③ 四川省通江县现代革命史资料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1辑（内部资料），1981年，第54页。

④ 王定国：《忆琴秋同志》，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

⑤ 向云高：《通江的乡场都是我送信跑遍了的》，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织群众为医院砍柴、做杂活、搬运东西。各地送给总医院的粮食、蔬菜、鸡、鱼、面、蛋、肉等物资无法计算。”^①

第三节 部分本地巾帼英杰略传

本地巾帼英杰各具特点，她们在革命中展现了坚定信念与意志，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以及艰苦奋斗、无怨无悔的革命情操。因篇幅所限，本节仅选取4位巾帼英杰代表在川陕苏区时期及其之前的事迹进行描述，希望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

一、姚明善^②

姚明善，1903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江县，世代受穷。其父早逝，母亲眼瞎，14岁的妹妹是童养媳。她在家服侍母亲。那时，军阀混战，恶霸逞能，土匪多如牛毛，人民受苦受难，正如一首民歌唱的：“军阀梳子梳，豪绅篦子篦，甲长、排头刀子剃，收款委员来剥皮！”就是当时贫苦农民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她们母女俩交不起田赋，更交不起苛捐杂税，便搬到赶场溪街上，佃个后房，靠推豆腐卖维持生活。可是，脚不停手不住地一年忙到头，做点钱不够交租纳税。

后来，姚明善与一名长工结婚。婚后，丈夫在地主的引诱下学会了抽鸦片烟，无法干重活，鸦片瘾发了就像个死人。结婚，不但没减轻她生活上的困苦，反倒增加了更多的困难。她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其中不满一周岁的男孩在饥寒中死去。地主还在逼债，她一气之下吞了大烟，幸亏邻居发现得早，把她救了过来。

1933年初春，红四方面军解放了南江。红军来到了赶场溪，穷人获

^① 四川省通江县现代革命史资料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1辑（内部资料），1981年，第55页。

^② 此部分内容主要根据姚明善的个人口述回忆整理编辑而成。姚明善：《永远不忘艰苦的岁月》，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第89~95页。

得解放。一天，红军来到姚明善家，叫她丈夫背上铁锅，她带上铁铲，红军背上她的小女儿，一同到十多里外的山上给打仗的红军打饼子。后来红军终于打赢了，赶走了白军。红军送给她一头小猪，还有一些米和面，并向他们宣传红军是人民军队，还叫他们到地主家去背粮。当时她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不久，区苏维埃派来宣传队讲打土豪、分田地，穷人要当家做主，妇女要翻身解放的道理，发动群众建立乡苏维埃。宣传队的同志讲地主、资本家的罪恶，讲穷人所受的苦难。通过宣传队的启发教育，姚明善逐步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从此，她为红军当向导，介绍情况，忘记了白天黑夜，忘记了饥饿疲劳。很快，乡苏维埃建立起来了，同时还建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她被选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宣传委员。从此，便开始了革命生涯。

乡苏维埃成立后，姚明善带领宣传队便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村苏维埃。她们去到村里，召集群众大会，讲过去穷人所受的痛苦，讲穷人为啥没吃没穿？这么一讲，群众就发动起来了。姚明善原来是个家庭妇女，见了别家的男人就得低着头，不敢在人前说话。被选为宣传委员后，就得向群众作宣传，一些参加革命较早的同志就教她讲过去的苦，现在要起来革命，将来要实现男女平等，人人有饭吃，有衣穿，在政治、经济上都一律平等。这样，她下到村里也就有话讲了，讲得具体，群众就爱听了。村苏维埃建立起来以后，赤卫队、少先队、代耕队、童子团、妇女生活改善小组等群众组织也跟着建立起来。这些组织建立以后，就发动群众参军，做鞋垫、打草鞋支前，搞代耕，让红军战士在前方安心打仗。

1933年2月，姚明善被选为代表到川陕省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3月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当时的南江县委书记胡朗清同志。3月8日，她和其他参会妇女步行到了川陕省委所在地通江县城，参加了劳动妇女的光荣节日——“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当时作她们接待员的是只有十三四岁的廖赤健同志。

“三八”节后，姚明善被调到川陕省委宣传部工作。部长刘瑞龙特别

关心她们新去的同志，一再叮嘱老同志要带好新同志。带她的是川陕省少共书记葛贤福，才近二十岁，很会讲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道理，很能抓住听众的心理，善于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她便诚恳地向他学习。她和宣传部的其他同志到了不少地方，教群众唱革命歌曲，向群众讲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的革命道理，动员了不少群众参加红军。

3月下旬，省保卫局需要女同志管女犯人，姚明善和李先才被调到省保卫局工作。6月，川陕省召开党团代表大会，姚明善被省保卫局选为代表，到省里参加大会。会上，她被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接任原省委妇女部长张庭福的职务）。

当时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支援战争，保卫苏区。姚明善把整个身心都投入这一工作中。她先被派到长赤县做发动群众工作，主要是号召妇女群众努力生产，节衣缩食，打草鞋，织袜子，积极支前等，同时还检查群众拥军，做军鞋，以及代耕的情况。长赤县是模范县，各方面工作都做得好，多次受到省委、省苏的表扬。不久，姚明善又被派到南江县作训练赤卫队、儿童团、少先队的工作，同时慰问红军家属，也检查分田分地的情况。她还教妇女唱《送郎当红军》《送子上战场》等歌曲，动员妇女送自己的亲人参加红军，扩大红军队伍。随着战争的需要，她们还组织了妇女运输队，为前线运送武器弹药、粮秣给养，保证战争的胜利。还组织妇女当看护，精心护理伤病员，并组织宣传队到医院慰问伤病员，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早日重返前线杀敌。

1933年下半年，红军打下万源城后，组织上派姚明善等人去做发动群众、筹建县苏维埃的工作。走进万源城时，敌人逃跑前进行的破坏随处可见，敌人放火烧毁的房屋还在燃烧，她们立即投入了救火、救伤病员的工作。经过发动，群众提高了觉悟，抬着肥猪，放着鞭炮拥护红军，欢迎宣传队。

在万源工作不久，姚明善被通知回省委机关。她立即放下发动群众支援红军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以及筹建县苏的工作，独自一人牵条毛驴回到了通江。组织上找她谈话：“要你脱下军装，重新当老百姓干不干？”她回答说：“党叫干啥就干啥嘛，有啥不能干？一切听从组织上的

安排，为革命，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干！”组织上非常满意她的回答，便马上叫她同中央派来的王天洪见面。王天洪是中央交通局长，他高兴地对她说：“姚明善同志，组织决定你到重庆做地下交通站的工作。这个工作十分重要，又十分危险，那是在敌人的虎口中工作呀，随时都可能牺牲，你愿意做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工作吗？”她笑着回答：“只要党需要，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王天洪说：“好吧，你立刻去脱下军装，马上出发！”

姚明善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后便立即出发。就这样，她离开了川陕苏区的首府——通江，到重庆做地下交通站工作。

二、刘坚^①

刘坚，1919年8月出生于四川通江县大黄坝肖家湾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叫肖春长，大革命时期参加过抗捐，思想进步。母亲是家庭妇女，生了七个孩子，因家境贫寒，有的送人，有的夭折，最后就剩下三个。7岁，她被三姑父骗去卖给别人当童养媳，8岁至12岁，又给了一个团总当丫头，受尽了人间苦难。1932年12月参加红军，那时她13岁。参军后，别人给她取名肖成英，1938年在抗大作保卫工作时改名刘坚。

到了部队就像到了一个新天地，什么事情都觉得新鲜。刘坚开始还有点想家，但部队官兵一致、男女平等的新风尚，给她以家庭般的温暖和友爱，使她从心底感到高兴。

刘坚被分到团宣传队。宣传队的任务就是宣传组织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让他们成立苏维埃，当家做主，同时动员他们，把自己优秀的子弟送到部队当红军，把财主的粮食分给群众，支援红军。开始外出做群众工作时，她跟随一些老同志，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他们怎么做，将耳朵竖得直直的，听他们怎么讲，心里牢牢地记着他们的方法。

后来团政治处曾主任派她和另外两个同志为一组，前往驻地附近的

^① 此部分内容主要根据刘坚的个人口述回忆整理编辑而成。刘坚：《我在红军里》，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187页。

瓦石铺去宣传。瓦石铺是个集镇，南边临河，北边靠山，是个水旱码头，有四五十户人家。镇上的房子多是木板房，镇外农村的房子多是些草棚，老百姓穿的都是补丁加补丁的破烂衣服。当地的有钱人见红军来了就都跑了，有些不明真相的穷人也躲了起来。来到镇上，她们先挨家宣传，见了长辈就称表爷、表叔、表婶，见了平辈就喊表哥、表姐、表嫂，说明她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谋利益求解放的，动员他们到河坝坪开大会，成立苏维埃，报名当红军。群众见她们讲的在理，态度和蔼诚挚，吃罢午饭后，便陆续来到坪里，附近一户人家还搬来自己家的桌子当讲台，搬来椅子让她们坐。

当群众三五成群地来到河坪时，她们就和群众拉家常、摆龙门阵，说说笑笑，非常热闹。人越来越多，逐渐到了四五十人，刘坚原准备站在坪上讲，但当时她年龄小，个子又矮，觉得在坪里讲，后面的群众听不见，就爬到桌子。她整了整衣服，清了一下嗓门，高声讲道：“各位乡亲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谋利益、求解放的，是打富济贫的队伍。国民党反动派田颂尧说我们红军‘打富人’是打‘妇人’，抢去做老婆。这是诬蔑，你们不要上当。打富人就是打土豪财主，不是打妇人，我们是要保护和解放妇女的。为了保卫咱们的胜利果实，今天大会的任务有两个，第一是成立苏维埃，选举你们自己信得过，能为你们谋利益的人当苏维埃主席和土地委员、粮食委员、内务委员。你们可以想一想，看哪个可以当？第二件事就是报名当红军。红军官兵一致，男女平等，团结友爱，不打人不骂人，是革命大众的队伍。你们愿意参加红军的，可以自愿报名。”她用右手指了指事先安排的“参加红军报名处”，“到那儿去登记报名。”

起初群众见她人小，还有些交头接耳、嘀嘀咕咕，当听到她讲的话句句在理时，全场鸦雀无声。接着，她又说：“乡亲们，我就是本县广纳区大黄坝肖家湾佃农的女儿，家里穷得叮当响，兄弟姐妹七人病死饿死五个。我7岁就被卖出当童养媳，也是受苦人。国民党和老财把什么门头税、人头税、土地税、保厂税、抽壮丁、拉夫子都往咱们穷人头上摊，压迫剥削咱们穷人，弄得咱们吃不饱，穿不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现在，共产党红军来了，咱们翻身解放了，我就是前几天逃出虎口参加红军的。”

她的讲话赢得了群众的掌声和赞扬，不少群众边听边流泪。有的群众说：这个小女红军，过去多苦啊！现在当红军多有出息，讲得多好啊！

这次宣传活动搞得很成功。瓦石铺的苏维埃成立了，还有五男二女报名参加红军。会后她们又到这七个人的家庭走访，看看他们的家境身世，征求他们父母妻子的意见，最后决定把一位年纪较大的长工和一个女的留下做苏维埃工作，吸收了四男一女到部队当红军。当她们带着五人回到部队时，受到了领导的表扬：“你们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初出茅庐就旗开得胜啦！”刘坚心里高兴极了，干革命的劲头越来越足，胆子也越来越大了。

1933年过了春节，她们宣传小组被派到一个大镇——德石山去宣传。这里过去驻有团防局，就是她曾伺候过的陈团总家的所在地。这里曾发生过农民暴动，杀过保长，群众的觉悟比较高。她们来到后，首先找到一户比较熟悉的苦大仇深的人家，说明来意。这户人家见她来了很热情，主动说去敲锣，通知群众集合开会。这次开会的方法和宣传的内容与上次大同小异，但到会的人数比较多，共有二百多人，把地坪挤得满满的。虽然人多，她也不怯场，站在事先搬来的桌子上大声讲，大家听得都入了神。她讲完后，群众争先报名参加红军。这次报名的竟有五十多人，其中有十几个女的。当她们带着浩浩荡荡的新兵回到驻地时，又受到了领导的赞扬，并受到战友们的迎接。

刘坚曾经担任过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长。省委妇女部第一任副部长是陈映民，后来是姚明善当部长。姚调走后，由张庭富接任，张调走后，就由她接任。

1933年“三八”节，部队派她出席省的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会后，她就留在妇女部工作。省委妇女部长是省委常委，下面各级妇女部长也都是同级党委常委。

省委妇女部有30多位同志，设有秘书、巡视员，还有宣传队。陶万荣是妇女部的第一任秘书，赵明珍是第二任。那时经常打仗，妇女部的

工作就是围绕战争，为前方服务。她们动员妇女参军参战，发动妇女打土豪、分田地，做军鞋、军袜、军棉衣，抬担架，搞粮食。妇女部的同志经常到下面了解情况，巡视员要参加县委的会议，根据县委的安排开展工作。下去的同志少则十来天，多则一两个月才回来进行汇报和学习。有时一个战役打下来，还要分片汇报。同志们对工作都十分负责，对当地的情况基本做到了如指掌，也能自觉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参加劳动，在群众家吃饭自觉交钱，并把打土豪没收的财物分给群众，不让群众吃亏。县委对下去的同志还要做出正确评定，因此，同志们工作是很努力的。

对上级交给的任务，妇女部的同志都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去完成。打毛儿盖时，她在万源，上级要她们组织 120 副担架。当时正流行伤寒病，群众中几乎每家都有人害病，人员组织不起来。她一面向领导反映情况，一面和少先队、儿童团配合，组织人员抬担架。这一仗打下来，许多同志都累垮了，她也累得吐了血，又由害疟疾转为伤寒，组织上把她送到沙溪嘴王坪总医院治疗。

1933 年 3 月，部队准备在空山坝打一仗。她和妇女部的彭玉如、崔秀珍等 7 位同志发动妇女支援前线，筹粮运粮，抬担架，送俘虏，给伤员换药。有一天，她们向一家群众打听地主窝藏粮食的情况。这家男人怕红军走后地主回来找他算账，不敢说。他的女人却说：“你就是不说，地主也照样欺压咱们。红军没吃的，不能打仗，咱们也活不成！”说着，就带她们找出了几十担粮食和几十块腊猪肉。她们分了部分粮食给群众，又组织群众把苞谷磨碎后送到部队。

三、李玉南^①

李玉南，1916 年生于四川省通江县沙溪乡。1932 年，红十师的一支部队来到沙溪街道，一边刷标语，一边打土豪，把豪绅家的粮食拿来，在街上煮起给穷人们吃。她当时 15 岁，也跟着大人们跑到沙溪街上去吃

^① 此部分内容主要根据李玉南的个人口述回忆整理编辑而成。李玉南：《我当上了少共省委妇女部长》，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红军煮的大米饭。她看到红军队伍里有好几个英姿飒爽的女兵，想起以前父亲讲过的花木兰从军的故事，就动了想参加红军的念头。她大起胆子去找女红军陈武州、闵红齐、殷秀山等，提出要求参加红军被批准了。

不久，李玉南被叫到了在区苏维埃经理部工作的傅崇碧同志处领了两串钱，一部分缴纳团费，剩下的一部分用来买了牙膏和肥皂。那是她当红军后第一次领到的津贴，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了这样的“奢侈品”。

红四方面军中有不少的女战士，都特别勇敢，同男兵一起训练、打仗。随后，李玉南跟随部队到了通江县城，扎营在城北，被分到童子团任团长，她领导的童子团共有40余人。红军交给童子团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看管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1933年初，经红十师、红江县苏维埃负责人姚铁红、石铁钢介绍，李玉南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时，她没有文化，但她不怕苦，不怕累，学军事，学文化，样样工作抢着干，经常受到首长和战友的好评。

1933年3月，李玉南所在的童子团16岁以上的团员不断补充到正规部队后，又接收了15岁以下新的一批童子团员。不久，她被调到毛浴镇红江县少共妇女部工作。6月，组织派她参加了红军在赤江县新场乡召开的党团员代表大会，会上，她被选为川陕少共省委常委、少共省委妇女部长，副部长是廖赤建，秘书长杨中行，还有肖成英、华双全等近20名成员。1934年初，她还兼任了少年先锋队总指挥长。

李玉南在担任少共省委妇女部长期间，主要任务是到各县、区、乡做发动妇女支前和扩大红军工作，分配各县、区苏维埃妇女给红军洗衣服、做鞋子、扎袜底和组织妇女担负运输工作等。当时，通江的妇女支前是非常积极的，民间流传着“要吃巴山饭，妇女打前战”的歌谣。在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中，她所在的川陕少共省委妇女部协助红军总经理部担负繁重的后勤运输保障工作，如组织运输队给红军运送粮食、弹药，组织担架队抬伤员、救彩号（伤号），与总医院配合，组织看护队帮助总医院看护伤员等。

1934年上半年，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川陕省委个别领导听说

她干爹张国树参加过反动会道门组织，就认为她也有问题，撤销了她的少共川陕省委常委及妇女部长职务，并开除团籍，罚她在巴中桂花井刘华工厂做苦工。下半年，在川陕省委委员、总工会委员长李维海的关心下，通过调查澄清了事实，证明张国树没有问题，才恢复了她的团籍。恢复团籍后，组织任命她为刘华工厂一连连长。刘华工厂既是工厂，也是部队编制，为一个营三个连，总负责人是李维海。刘华工厂基本和部队一样，主要任务是为部队和机关提供后勤保障工作。

不久，她和刘华工厂二连连长王定国同志一起被调到新剧团，新剧团的负责人是余世恩，以后是李伯钊，政委易维均，她在新剧团担任团委书记职务。新剧团不仅要演出，还要担负写标语、喊口号等大量的宣传任务。那时，粉笔和墨都很缺乏，她们就去刮铁锅上的锅墨子，兑水写标语，同时，还协助地方苏维埃政府做扩大红军及支援前线等工作。1934年10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四、刘照林^①

刘照林，1912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通江县大石桥刘家梁。6岁时，父亲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妈妈又是小脚，没法生活，就把她给了人家当童养媳。妹妹只有2岁，也给了人家。她那一家的人很多，地很少，全凭种白耳子。白耳子出来，就卖了买粮食。也有一点田，都种了大烟，她公公是个吃大烟的。她在那家里，天天挨打，也不给她吃的，骂她长不大。

红军来时，刘照林把打土豪分得的粮食等往家里背，背回去公婆仍然什么都不给她吃，那时正是腊月间，她到马家坪去卖柴，回去已是大半夜，也没给她留晚饭。

有一次打土豪、团正刘光珍，刘照林看到刘光珍家有个夹墙。她原先曾经给他家打过猪草，拣过耳子，看见过这个夹墙，估计里面可能藏

^① 此部分内容主要根据刘照林的个人口述回忆以及笔者2018年10月3日在武汉海军工程大学访问刘照林的大女儿李军教授所作的笔录整理编辑而成。刘照林：《我当娘子军》，中共通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2辑（内部资料），1982年，第66~71页。

得有东西，晚上就跟婆母一路去背了两大背鸦片烟回来。她准备给母亲拿两个饼，哪知那一天她刚从外面回家，看到公公准备了好多青杠树棒棒，说她偷的家里的，把她绑到柱子上打。那一天又不给她饭吃。她想来想去，决心第二天跑去找红军。

参加红军后，刘照林被组织派到南岭上工厂。她到南岭上工厂里是1933年正月。开始成立被服厂时，只有她和张茶清、何福祥三个女同志，张、何二人是鄂豫皖过来的。到了农历二月，被服厂与兵工厂分开，刘照林单独住在蹇家山。这时，又调来了林月琴、赵正富。收阵地时，又来了刘伯兴、郑克明、邓廷郁、李志民等几十个人，人多了，编成一个连，林月琴任连长，王泽南任指导员。下面分三个排，每个排又分三个班，她当一班班长。人越来越多了，编到十八个班，每个班二十多人。她在一班班长当到十八班班长，后又当排长。1933年9月，她在蹇家山经王泽南介绍入了党。

开始她是住在厕所上头，就是老百姓喂猪那粪坑房子里面。把门板放下来叫她们学做衣服、做帽子。她从小就给人家当童养媳，做的笨重活儿，刚到工厂时，做不来针线活，张茶清、林月琴就教她做。以后她做来做去就做得挺好了，不论是衣裳或是裤子，一天能够做三件。

做的衣服，要求针脚均匀，如做歪了，就要拆了重做。做裤子，裤裆前面不能有包挺起，如穿起前面有个包，也要拆了重做。全部是手工做，一般一天缝一套，慢的缝一件，完成任务好的还可以得奖，奖衣裳和裤子。战士们都想早点完成任务，星期天都不休息。做衣服的布是从街上买来的窄口面土布，由男工染成草灰色，裁好后送到她们那里缝。缝好了，就十套一捆地捆好送到经理部去，再分发给前线的战士。夏天做单衣，冬天做棉衣，没有布的时候，就把碎布拿来扎鞋子。

第一次收紧阵地时，被服厂搬到得汉城。第二次收阵地，住苦草坝街上，以后又搬下来，搬到瓦室铺，在瓦室铺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被服厂以后分成了两个厂，一厂在通江，二厂在巴中恩阳河。

1935年春，被服厂跟随部队经流二沟到新场，开始撤离通南巴。到了苍溪，她们住在烂泥沟。

妇女独立团二团成立后，刘照林在二团一营一连当连长，代理指导员。以后指导员来了，她就只当连长，指导员叫潘家珍。她们两个一直在连里工作，天天抬担架。

第七章 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 妇女运动的比较分析

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苏区中极其重要的苏区，在中国革命史上地位突出，十分具有代表性。

川陕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领导下，由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边区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建的一块重要革命根据地，以四川北部的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其存在的时间为1933年2月至1935年4月。^①对川陕苏区的政治意义和历史地位，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 and 意义。”^②

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全国最大、最主要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主体由赣西南、闽西两块苏维埃区域组成，以瑞金为中心。其发展鼎盛时期，总面积为8.4万平方公里，人口有453万，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省60个行政县。从时间上来看，中央苏区的历史，以1927年赣南、闽西农民武装暴动开始，到1937年赣粤边、闽西等地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结束，历经10年。^③对中央苏区的历史定位，毛泽东曾指出，中央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

① 关于川陕苏区存在的时间的探讨，参见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前言》，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10页。

②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苏维埃中国》第2集（内部资料），1957年，第249页。

③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0页。

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① 本章所讨论的时间范围主要是 1927 年 8 月至 1934 年 10 月，即中央苏区的奠基开创阶段、初步形成阶段、正式建立阶段、鼎盛发展阶段和受挫转移阶段。

两大苏区的妇女运动都开展得如火如荼，并取得成功。目前，学界对两大苏区妇女运动研究的成果颇丰，主要从三大主体入手：一是从中共主体切入，研究分析中共是如何在川陕苏区和中央苏区动员、组织妇女参与革命，以及中共对妇女参与革命的态度和认识。如胡军华、唐莲英的《论中央苏区的妇女政治动员》，指出中央苏区以天足体健的客家妇女为主要动员对象，成功地把占人口一半的妇女动员起来，为革命增添了巨大力量^②；邓美英的《中央苏区妇女政治动员探析》，认为劳动妇女的政治动员，一定程度上感染和带动了非劳动妇女的进步^③；何先成的《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路径及效应》，指出为了激励妇女参与革命，中共在川陕苏区通过普遍建立妇女组织、提升妇女经济地位、发展妇女教育事业、提高妇女参政度、婚姻自由的实践探索等五维路径，对广大妇女进行政治动员，使她们在扩红、生产、支前、战勤和组织妇女武装方面发挥了作用^④；刘冲的《中央苏区妇女组织研究》，抓住妇女组织这一主题，探究了中央苏区妇女组织的构成要素以及建立妇女组织对革命的影响等^⑤；等等。二是从妇女主体角度，探讨妇女群体对妇女革命的态度、参与革命的方式等。如汤水清的《乡村妇女在苏维埃革命中的差异性选择——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内容十分创新，改变以前我们研究妇女运动的固有思维，从中共动员妇女参与革命过程中的阻力入手，主要揭示了苏维埃运动时期，在中共提出具体解放措施后，中央苏区的乡村妇女在面对革命时的差异化选择和原因^⑥；胡军华的《中央苏

① 《红色中华》（第二次全苏大会特刊）第 3 期，1934 年 1 月 26 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569 页。

② 胡军华、唐莲英：《论中央苏区的妇女政治动员》，《江西社会科学》2013 年第 3 期。

③ 邓美英：《中央苏区妇女政治动员探析》，《苏区研究》2016 年第 6 期。

④ 何先成：《川陕苏区妇女运动中的政治动员路径及效应》，《苏区研究》2019 年第 6 期。

⑤ 刘冲：《中央苏区妇女组织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 年。

⑥ 汤水清：《乡村妇女在苏维埃革命中的差异性选择——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2 年第 11 期。

区时期客家妇女对革命的贡献》，从客家妇女主体入手，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了客家妇女参与革命的原因以及客家妇女对中央苏区建立的贡献^①；等等。三是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中国化的视域，探讨妇女运动的实践价值和现实启示。如吴丹的《川陕苏区妇女教育问题研究（1932—1935）》，揭示了中共在川陕苏区开展的妇女教育现状并总结了经验教训，为新时代妇女教育提供了经验借鉴^②；梁洋洋的《中央苏区妇女干部教育的历史考察与启示》，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下，中共开展的妇女教育为革命需要培养了大量妇女干部，推动了苏维埃革命的顺利进展^③；等等。另外，以“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立意的著作，有张雪英的《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④、胡军华的《异军与正道：对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考察》^⑤等专著，至于以“中央苏区妇女运动”为主题的研究论文，除上述提到的，还有很多。^⑥然而，以“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立意的论文与著作则较为缺乏。总而言之，经过笔者对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目前学界尚没有对两大苏区妇女运动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⑦鉴于此，本章拟对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的妇女运动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探讨

① 胡军华、唐莲英：《中央苏区时期客家妇女对革命的贡献》，《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② 吴丹：《川陕苏区妇女教育问题研究（1932—1935）》，四川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③ 梁洋洋：《中央苏区妇女干部教育的历史考察与启示》，江西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

④ 张雪英：《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 胡军华：《异军与正道：对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⑥ 主要成果有：〔美〕凯塞L·M·瓦尔克：《中国共产党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曾成贵译，《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年第2期；吴小卫、杨双双：《中央苏区婚姻制度改革与妇女解放》，《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林颂华：《中央苏区妇女问题初探》，《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张玉龙：《中央苏区时期妇女教育略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12期；李霞、尹士风、邱祥莺：《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妇女解放运动》，《党史文苑》2009年第2期；苗伟东、江静：《中央苏区农村妇女参政叙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1期；郭璐：《论中央苏区妇女地位的演变》，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陈华：《中央苏区妇女社会生活的变迁研究》，赣南师范学院硕士论文，2008年；李如英：《中央苏区妇女权益保障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何莉：《中央苏区妇女教育问题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王景璐：《中央苏区妇女革命动员工作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⑦ 刘佩芝对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妇女工作作了比较研究，参见刘佩芝：《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妇女工作比较研究》，《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第85~89页。

两大苏区妇女运动的特点，希冀更多的人投入苏区妇女运动史的研究，推动苏区史研究走向纵深。

第一节 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开展的背景

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开展和其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土地革命战争之前，赣西南、闽西妇女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压迫。传统中国妇女是男人的附庸，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既要担负养育儿女的职责，还要承担家里大部分农活。据毛泽东《寻乌调查》显示：“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说来，她们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犁田、耙田、挑粪草、挑谷米等项，虽因体力关系，多属男子担任，但帮挑粪草，帮担谷米、蒔田、耘田、捡草、铲田塍田壁、倒田、割禾等项工作，均是男子作主，女子帮助；耨谷、踏碓、淋园、蒔菜、砍柴割草、烧茶煮饭、挑水供猪、经管头牲（六畜叫头牲）、洗裙荡衫、补衫做鞋、扫地洗碗等项工作，则是女子作主，男子帮助。加以养育儿女是女子的专职，所以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① 除去身体上的压迫，广大妇女还要受“三从四德”“贤妻良母”等礼教束缚，长期以来精神极度压抑，被封建礼教和繁重生活压力逼得自杀的农村妇女屡见不鲜。如下才溪有个妇女，上圩场途中偶遇一个男子，同行不到十步远，不巧被地主豪绅撞见，认为其伤风败俗，品行不端，活活将其拖死。^② 永定太平区三个劳动妇女因不堪忍受婆婆封建礼教的束缚服毒自杀。^③ 在同样时代大背景下，川陕边区妇女的命运也很悲惨，以1932年的南江为例，“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以前，大河全乡童养媳约有300人，其中被拐卖的约占十五分之二，当女奴的约占十五分之一，当丫环的约占十五分之二，

① 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240页。

② 张雪英：《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2页。

③ 张雪英：《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被残害至死的约占百分之三十，被吊打的约三分之一，被坠河的约百分之二。”^① 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两大苏区建立之前，各自区域妇女的悲惨境遇和不平等遭遇，塑造了她们的反抗意识，使其反抗的呼声愈发响亮。正如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所说：“特别是妇女，革命积极性甚高，能吃苦耐劳，是相当活跃、得力的革命力量。”^②

两大苏区妇女运动开展的另一大动因是农民土地占有的不平衡。整体上来看，川陕苏区建立以前，川陕边区以农业经济为主，农村人口占多数，且土地大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以通江县为例，北部高山区，占总人口 8% 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田地比重高达 60% 以上；南部低山区，占总人口 12% 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田地的比重高达 70% 以上。^③ 又如陕南镇巴一带，占总人口 20% 左右的地主富农，占有 75% 的土地。^④ 中央苏区亦然，据黄道炫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央苏区建立前，地主与贫农平均占地比在 10 倍以上，很多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不能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使得农民与地主关系恶化，形成强烈对立关系。^⑤ 面对两大苏区都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的情况，中共在两大苏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土地革命，满足了包括妇女在内的广大农民群体的需求。同时，土地革命的顺利开展助力了两大苏区妇女运动的开展。

第二节 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共同点

中共在两大苏区针对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婚姻等方面的

① 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6 页。

②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45 页。

③ 中共通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24 ~ 225 页。

④ 杜中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99 页。

⑤ 黄道炫：《一九二〇—一九四〇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历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不平等待遇，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改变了妇女的悲惨命运，获得解放的广大妇女积极支持战争、拥护红军、维护苏区，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两大苏区妇女运动存在诸多共同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共的高度重视和努力

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自建立起就十分注重妇女运动的开展。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的革命主要表现为农民运动。对于农民的重要性，毛泽东曾指出：“农民成就了多年来未曾成就的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① 而在中国农民群体中，女性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意味着如果能动员妇女参与革命，将能大大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对于妇女的重要性，毛泽东曾指出：“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② 妇女的重要地位又使中共认识到必须要动员广大妇女积极参与革命。在《中央关于扩大劳动妇女斗争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在苏区内应加紧领导劳动妇女参加土地革命的斗争，利用各种组织的方式，尽量发展她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组织并领导她们拥护苏维埃、红军，改良自己的生活！”^③ 为了让妇女在革命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共提出一系列措施，比如政治上妇女和男子一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经济上妇女和男子同样有分得田地的权利；文化教育上享有同等教育的机会；婚姻上提倡婚姻自由，妇女有结婚、离婚的自由。这些措施极大地改善了苏区妇女的困境。

川陕苏区建立以后，川陕省委在借鉴以往鄂豫皖苏区开展妇女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十分注重妇女运动的开展。川陕省委宣传部在印发的口号中指出：“彻底改造和巩固各级苏维埃，多多选举积极勇敢的劳动青年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9页。

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99页。

③ 《中央关于扩大劳动妇女斗争决议案》，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和妇女代表！……青工女工做同样工作得同样工资！……劳动妇女加入共产党，领导女工农妇的斗争！”^①除了口号的宣传，在具体实践中，川陕省委还根据川陕苏区妇女的实际生活情况，提出要从提升妇女经济地位、健全妇女组织、提高妇女政治地位等多种途径对妇女进行政治动员。可以说，两大苏区妇女运动的蓬勃开展，离不开中共的高度重视和努力。

二、重视妇女干部的培养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更好推动苏区妇女运动的开展，两大苏区都重视妇女干部的培养。

中共在川陕苏区建立了形式多样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一是通过创办各类学校，培养各类型专门干部。比如1933年7月中共在通江县创办的东皋书院考棚，就是川陕苏区时期的唯一一所党校，目的是培养县委、区委干部。二是开设各类短期培训班，培训各岗位干部。为推动本地干部的培养，巴中曾创办多个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三是开展实践教育，普及文化知识。主要形式是开办识字班，帮助妇女干部识字以提高其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四是进行军事教育，提高军队干部战斗力。要求每天各部必须花两个小时进行军事训练等。^②

中央苏区培养妇女干部主要途径如下：一是通过干部学校教育，成立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主要有中央干部学校，地方干部学校和职业干部学校三种类型。二是开办妇女教育训练班。早在1929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一军来到连城新泉镇，了解到闽西妇女所受的压迫程度和她们的愿望之后，亲自指示要在新泉创办一所工农妇女夜校，组织妇女学习革命理论，培养妇女人才，让她们获得政治上、文化上的解放。^③训练班作

① 《“八一”反对战争日和中国红军成立纪念日的标语大纲》，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3~1288页。

② 李承潞：《川陕苏区干部培养问题研究》，西华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第22~27页。

③ 连城县妇女联合会、连城县妇运史编写组：《连城县妇运史资料选》（内部资料），1988年，第92~93页。

为中央苏区妇女干部教育中最常见的教育形式，以时间短、见效快著称，聘请有经验的人从事教学，培养的妇女干部水平较高。优秀干部李美群就是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三是进行实践教育。为大规模培养妇女干部，兴国县妇女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除了班级教育，还要借助各种会议资源，让妇女在会议中积极发表言论，从中寻找思想觉悟较高、性格开朗的妇女干部，进行个别培养，主要培训她们阅读文件的能力和工作觉悟，还主张妇女干部要深入基层，在实践中锻炼和培养自己的能力。时任江西省妇女部部长的蔡畅就经常深入基层调研，并亲自教导危秀英等优秀妇女学习文化知识。

三、川陕苏区和中央苏区的妇女运动都取得了成功

（一）政治地位的提高

为了落实妇女的各项政治权益、尽最大可能调动妇女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卓越成效。在川陕苏区，中共重视用法律保障妇女权利以及赋予妇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调动妇女参政积极性在川陕苏区得到落实。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翻印的《妇女斗争纲领》中规定：“劳动妇女有参加政权机关的权利，与男子同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① 工农兵代表大会作为苏区最高权力机关，在历次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均占有一定比例。如川陕苏区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中，参会人数共计 1800 余人，其中男代表 1440 人，女代表约 360 人。^②

在中央苏区，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范乐春、赖芹香、付才秀当选为省苏执委委员，赖月华为候补委员。范乐春任省苏土地部部长，赖月华任妇女部部长。1933 年各地妇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比例，已经超过中共提出的 25% 的号召，其中兴国超过 30%，共选举 20 多个妇

^① 四川大学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下），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681 页。

^② 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89 页。

女为乡苏主席；上杭才溪区的上才溪乡为 54.6%，下才溪乡为 64.8%。^①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月林、金维映、黄茂桂、谢玉钦、黄长娇、蔡畅、张琴秋、刘群先、范乐春、李坚真、张云仙、关春香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美群、康克清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妇女的参政权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保护青年妇女条例》等法律与条例中得到具体保护。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赋予妇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中共动员妇女参与革命的一大创举。

随着两大苏区相关文件的颁布，越来越多的妇女参与苏维埃政权建设，为苏区建设选拔了一批优秀妇女干部，使苏维埃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 and 替人民群众干实事的政权。

（二）经济地位的独立

传统中国妇女经济地位十分低下，土地分配上长期处于弱势地位。一般来说，农村妇女获得土地的可能性极小，几乎没有生产资料，只能依附于男子生活。中共深刻认识到经济上的不独立是开展妇女运动的一大阻碍。为了推动妇女积极参与革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规定：“雇农、苦力、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限。”^②其时，中央苏区大部分青壮年都被动员成为红军战士，发动妇女参与农业生产，成为中共动员广大妇女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在 1933 年 11 月的《长冈乡调查》中指出，长冈乡的全部青壮年共计 733 人，当红军的有 320 人，在乡的 413 人中，其中男子只有 87 人，女子多达 326 人。^③由此可见，妇女在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在给予妇女土地所有权后，中央苏区在男性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在经济建设中取得突出成绩。在妇女的辛勤劳动下，中央苏区的粮食产量不减反增，1933 年比 1932 年

① 梁柏台：《今年选举的初步总结》，《红色中华》第 139 期，1934 年 1 月 1 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601～2602 页。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7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77 页。

③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1 页。

增加了15%，广昌县粮食亩产量从160斤上升到300斤，黄坡区也平均达到240斤。^①这些数据都充分证明了妇女在生产中起到“半边天”的作用。

为了高效开展土地革命，中共在川陕苏区编印了《怎样分配土地?》《平分土地须知》《平分土地办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具体指导，而且在实践中得到落实。据《江口县观音庵分田方案花名册》记载：“赵李氏（子参加红军），五十六岁，男丁四女二，贫农，七背八升。……向林秀，四十五岁，男三女一，……进胡坤益四十二背。”^②中共通过向妇女分配土地，不仅最大限度上满足了妇女对土地的需求，还推动了川陕苏区农业的发展，助力了妇女经济地位的独立。据调查，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土地革命后，每亩粮食增产1至2倍。毛泽东曾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称赞：“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③

为了保障妇女的经济利益，两大苏区均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妇女的法令、条例。比如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有特别保护女工的专门条文。^④

（三）受教育意愿的提升

土地革命前，女子基本上没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为了适应妇女运动的需要，中共提出苏维埃政府的重要任务是要提高苏区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对此，中共在川陕苏区发出指示：“在目前……党对妇女的工作应是：细心研究劳动妇女的痛苦与要求，提出具体的纲领。……耐心的教育说服广大劳动妇女群众参加消灭刘湘的激烈的战争。……党要大大加紧文化教育工作，提高妇女的政治水平，启发劳动妇女的阶级觉

① 许毅主编：《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7页。

② 《江口县观音庵分田方案花名册》，杜中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184页。

③ 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④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08~709页。

悟。”^① 川陕省委针对当地实际出版大量书籍，充分发挥《革命三字经》《列宁学校读本》《红色战士必读》《共产主义 ABC》等教材的宣传作用。

中共在中央苏区提出要从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两方面来提高妇女的知识水平。妇女教育主要是为战争服务，满足战争需要，以实现夺取革命胜利为目的。中共通过开办夜校、半日学校、识字班、俱乐部等形式，帮助妇女学习文化的同时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中央苏区主办的党校、列宁学校都有大量妇女参加。此外，中央苏区还建立有一些专门的女子职业学校，培养妇女职业专门人才。如兴国夜校学生 15740 人，女性占 69%；识字组组长 22519 人，女性占 60%。^② 闽西新泉一区有 18 所妇女夜校，女学员 700 余人。^③ 正如毛泽东在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在兴国等地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解放，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妇女不但自己受教育，而在〔且〕已在主持教育，许多妇女是在作小学与夜校的校长，作教育委员会与识字委员会的委员了。”^④ 广大妇女接受教育后，积极投入革命浪潮中，成为有力的战斗员，有的妇女留在本地积极参加当地的生产活动，保障了苏区经济生产的顺利进行；有的妇女积极参加地方政权工作，推动中央苏区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和完善；有的妇女做军鞋送红军，争当扩红女英雄；有的妇女踊跃购买公债，为红军筹集军费。

虽说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的妇女教育都具有战时性的特点，但不可否认，妇女教育为促进妇女解放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婚姻地位的平等

早在 1929 年 4 月，红四军政治部发布的《红军标语》中就提出：

① 《关于妇女工作》，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17～1218 页。

② 娜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妇女》，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73 页。

③ 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闽西革命根据地史》，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91 页。

④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30 页。

“要废除压迫妇女的旧礼教、打破包办婚姻、禁止童养媳、男女平等”等口号,^①主张废除落后的婚姻形式,要求苏维埃政府颁布妇女婚姻解放的相关法令、条例,以求把中共宣传的各种政策落到实处。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共计7章23条,第一次明确宣布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②条例的颁布极大地激发了中央苏区广大妇女的革命积极性,引导妇女走上了婚姻自主的新道路,为妇女解放打下基础。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颁布,确保了苏区的婚姻制度变革有法可依。这种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③苏区妇女果断冲出封建牢笼,如武平中山新城妇女王细莲,5岁被卖为童养媳,受尽凌辱,在争取婚姻自由的精神鼓舞和同志的引导下,毅然决定参加革命,后与上峰赤卫队队长潘其行相爱结婚,婚后夫妻二人并肩作战为革命作出了贡献。^④

中共在川陕苏区也十分注重女性的婚姻问题。1933年4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翻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有力地推动了川陕苏区妇女的婚姻解放。

不可否认,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倡导妇女离婚绝对自由过于激进,造成一些失误。比如在兴国龙沙上社等地,出现妇女因不能获得婚姻自由及遭政府禁闭而毒死丈夫的事件。^⑤胜利江口区一妇女与其丈夫因吵架而要求离婚,其后,该妇女又不愿离婚,当地政府遂将该妇女关禁闭,

① 张雪英：《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红色中华》第2期，1931年12月18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8页。

③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页。

④ 张雪英：《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⑤ 《临时中央政府文告人民委员会训令》，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页。

罚苦工，逼迫其离婚。^① 瑞金某些地方存在强迫妇女结婚，保障买卖婚姻的现象。^② 不过好在中共发现问题后及时做了深刻的反思纠正，并特别加强了对红军战士婚姻的保护。

总之，两大苏区开展妇女运动后，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婚姻等多方面的地位开始发生改变，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广大妇女积极参与革命，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第三节 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特色比较

总体来说，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的妇女运动可谓同中有异。中央苏区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其妇女运动突出表现是理论化程度高，制度严谨，规范化强；川陕苏区妇女运动在开展的过程中结合川陕边区的实际，尤其注重开展戒烟宣传与妇女军事能力的培养。

一、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的特色

（一）妇女构成的特殊性——客家妇女

1931 年秋赣南、闽西两大块苏区连成一片，正式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鼎盛时期的中央苏区设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 5 省 60 个行政县，若以现行政区域来认定，大致包括现江西、福建、广东、湖南 4 省 86 县（市、区）。这几乎包括了闽粤赣边区所有客家人居住的地区。^③ 其中，江西省的寻乌、安远、信丰、南康、上犹、崇义、大

① 《江西省苏报告》，《红色中华》第 41 期，1932 年 11 月 21 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801 页。

② 《中央执行委员会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红色中华》第 16 期，1932 年 4 月 6 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86 ~ 287 页。

③ 贺新：《客家人在中国的分布地域》，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1994 年版，第 74 页。

余、定南、龙南，福建省的宁化、长汀、上杭、武平、永定，广东省的大埔、龙川、梅县、兴宁、平远为纯客住县；其余区域大多为客家人与其他民系或民族杂错居住。^①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客家人成为中央苏区的主要民众和依靠力量，他们和非客家人在这些客家地区演绎出光辉的革命历史篇章。

追溯历史，客家人大约是西晋时迁移而来，受战乱、天灾和人祸的影响，是从中原迁到这片土地上的一支特殊民系，他们是中华民族的精华。客家人是汉族中富有特色的一支民系^②，形成于唐末至北宋这一历史时期。^③ 美国学者韩廷敦研究指出，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④

客家文化的精彩，有一半是由客家妇女书写的。客家妇女具有勇挑重担、贤惠孝顺、刻苦耐劳、勤劳俭朴、任劳任怨、豁达开朗等群体特征，她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事农耕，创造家园，精到地料理“田头地尾”“家头窖尾”“针头线尾”“灶头锅尾”，^⑤ 堪称中国劳动妇女的典范。客家学奠基人罗香林对之评价道，客家妇女在中国可说是于社会、于国家都最有贡献，而最足令人敬佩的妇女了。^⑥ 世界著名客属女作家韩素音对客家妇女的品质作出高度评价：“长期居住在南方山区的客家妇女，迫于生活，她们不贪求享受，不讲究吃喝穿戴、打扮，只求温饱，而且由于近几百年来，南方山区人口暴涨和其他原因，家庭中男子多是漂泊海外南洋各地，家庭之重任自然落在妇女的肩上。她们除一年四季在田间劳作外，在家还得奉侍公婆，养儿育女，待人接物……客家人有这种贤惠勤劳的女性乃一大光荣和骄傲。客家妇女这些好作风、好风格、好传统，是多次迁移中磨炼出来的，使之他们成为世界女性中的佼佼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5~81页。

② 舒龙：《客家精神与红军的英雄气概》，舒龙主编：《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③ 吴福文：《试论客家民系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客家学研究中心编：《首届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选编》（内部资料），1991年，第15页。

④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0页。

⑤ 伍启芳：《什么是客家精神》，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66页。

⑥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1页。

者。”^①在客家地区居住多年的美国传教士罗伯·史密斯认为：“客家妇女，真是我们所见到的任何一族的妇女中最值赞叹的了；在客家中，几乎可以说，一切稍为粗重的工作，都属于妇女们的责任。你如果初到客家地方住居的话，一定会感到极大的惊讶，因为你将看到市镇上做买卖的，车站及码头上的苦力，在乡村中耕种田地的，上深山去砍柴的，乃至建筑房屋时的粗工，灰窑瓦窑里的工人，几乎全是女人。她们做这些工作，不仅是能力上可以胜任，而且在精神上亦非常愉快的，因为他们不是受压迫的。反之，她们是主动的。原来客家因山多田少的关系，大部份男子壮丁，都到南洋去谋生，或是到军政界去服务了，在家中多数是只有老年人或幼小的孩子。因此，妇女在家中，便成主干。”^②英国人爱德尔评价，客家妇女是中国最优美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人的光辉，至少有百分之七十是应该属于客家妇女的。^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摆脱封建礼教、“三纲五常”束缚的中央苏区客家妇女，在中央苏区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传承和张扬其传统美德，竭力争取自身在政治、经济生活、文化教育上的独立平等和婚姻上的自由自主，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政治方面，中央苏区客家妇女与男子一样成为苏维埃国家的主人，不仅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有参政议政的权力。据统计，在苏区城乡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客家妇女代表一般占代表总数的25%以上，而上杭的上、下才溪乡，妇女代表分别占60%和66%。^④经过不懈的努力，大批客家妇女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兴国县全县有30多名妇女被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在1934年第二次全苏大会上，中央苏区有17位妇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其中包括江西省妇女部部长

① 丘菊贤：《韩素音论客家》，《客家人》1997年第3期。

② 《外国人对客家人的评价》，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87~288页。

③ 《外国人对客家人的评价》，程志远编：《客家源流与分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91页。

④ 娜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的妇女》，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8~169页。

李美群等赣南客家妇女。

在经济生活方面，客家妇女普遍取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并且成为农业生产所依靠的一支主力军。1934年，上杭才溪区能劳动的妇女有1991人，比男子多了1/3，其中能犁田耙田的有733人。^①江西省苏维埃妇女一年左右的时间开垦荒田20万石。^②兴国县参加生产事业的妇女超过2万人，学会犁田、耙田的超过8000人，可以说，在广大男子赴前线英勇作战的情况下，兴国的农业生产几乎全由妇女承担。^③汀东红光区的劳动妇女在春耕运动中主动学犁学耙，学习浸谷种的方法以及加肥料等技术，1934年春，该区20%以上的劳动妇女能够犁田耙田。^④宁化县苏工农检委会副主席刘正先的老婆自愿开垦十五担荒田，而且还鼓励其邻居去开垦荒田。^⑤

在文化教育方面，客家妇女享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她们绝大多数参加了夜校和识字班的学习，基本上扫了盲。在兴国，有将近半数的女孩入了学。

在婚姻家庭方面，由于废除或摆脱了买卖和包办婚姻、童养媳制度、翁姑丈夫对妻媳的虐待等，客家妇女真正实现了男女平等基础上的婚姻自由，使苏区的两性关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客家妇女有个重要标志是喜欢唱山歌。客家人喜爱唱山歌，唱着上山，唱着下河。对山歌是客家妇女的传统习俗，也最能表现其卓越的才华与高度的智慧。刘英回忆说：“江西老乡喜欢打山歌，一打山歌，劲头

① 《才溪妇女积极参加春耕》，《红色中华》第168期，1934年3月29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007页。

② 娜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妇女》，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页。

③ 王首道：《模范红军家属运动》，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页。

④ 《汀东红光区劳动妇女热烈参加生产》，《红色中华》第157期，1934年3月3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57页。

⑤ 《生产战线上的女英雄》，《红色中华》第166期，1934年3月24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79页。

就来了。”^① 在中央苏区，听山歌和唱山歌已经变成生活日常，客家山歌为革命文化提供源泉，其动员广大妇女投身于革命斗争实践的效果十分显著。1933年2月，中共为了适应革命战争需要提出要抓紧扩充红军的号召。为迅速动员广大青年参与革命，中央苏区领导人十分注重借助客家山歌的艺术形式进行动员，使中央苏区形成上至部队首长下至普通百姓，人人参与改编、创作和歌唱的盛景，并伴有大量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的革命山歌问世，如《消灭白狗子》《送郎参军》《土豪恶》等。“客家山歌以腔从词，即兴行腔为歌，人们可以根据情景、情绪、对象和兴趣的不同填上相应的歌词来行腔歌唱，随编随唱。”^② 能够为大众所理解、传诵，是广大民众欣赏的艺术。其时，涌现出许多优秀客家山歌女歌手，如兴国的曾子贞、谢水莲。她们把战争和山歌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用一首首质朴亲切的山歌表现内心的革命激情，鼓励人们奋力支前，英勇杀敌。客家山歌为革命鼓与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引领着广大客家妇女为革命而艰苦奋斗。在经过中共改编过的客家山歌积极动员后，广大客家妇女从传统家庭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毅然走出家庭和男子一起投身于苏区生产建设的浪潮中，促进了苏区经济建设的发展。

客家妇女还是扩红、慰劳的模范。早在1933年，中共提出当前首要任务是要维护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以及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扩充百万红军以增加兵源是革命顺利进行的前提。这一举动得到客家妇女的广泛支持。她们深知目前身份地位的提高归功于苏维埃政府的解放措施，一旦苏维埃政府被破坏，她们的悲惨命运将会再次降临，所以她们果断支持中共的扩红工作。由于夫妻、母子关系是最密切的，妇女宣传扩红工作也是最有效的。1933年9月，兴国县妇女动员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离家当兵的有625人，完成与超过了三个月的扩红计划，鼓动归队

① 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② 胡军华：《异军与正道：对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页。

120名,打布草鞋和套鞋2050双,麻草鞋4907双慰劳红三军团。^①据《红色中华》第76期报道,红二十三军成立时,赣南各县客家妇女做了3000双大布草鞋进行慰问。^②江西客家妇女大力开展节省运动,节省2000多元帮助革命战争。^③1933年10月,在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各县出席的妇女代表积极订立扩大红军竞赛条约,自动承认扩大红军6253名。^④这些数据都说明了妇女在扩红中的重要作用。扩红过程中还出现很多模范妇女。例如永丰石马区刘桂英鼓动自己丈夫及6个青年加入红军,长汀红坊区苏坊乡钟玉英鼓动自己儿子及9个青年参加红军,新泉南区南坑乡曾凤玉、苏保珠鼓动自己丈夫及3个群众加入红军,^⑤兴国的夏侯招鼓动丈夫及15名群众参加红军,胜利的王秀陈与钟桂香分别动员14人当红军^⑥,公路县东古区的杨书佐、李战春3天就动员69名工农群众参加红军。^⑦

(二) 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具有指导性和引领性

中央苏区开展的妇女运动对其他苏区妇女运动具有指导性和引领性。在中央苏区,对如何开展妇女运动毛泽东作了一系列指示,如在动员妇

① 《战争动员中的革命妇女》,《红色中华》第128期,1933年11月23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19~2420页。

② 《赣南群众的慰劳热》,《红色中华》第76期,1933年5月5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4页。

③ 《江西劳动妇女节省二千六百余元》,《红色中华》第184期,1934年5月4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275页。

④ 《各县扩大与慰劳红军的竞赛》,《红色中华》第116期,1933年10月6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31~2232页。

⑤ 《在扩大红军战线上光荣的模范女鼓动家》,《红色中华》第101期,1933年8月13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2页。

⑥ 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137页。

⑦ 《扩大红军的女鼓动家》,《红色中华》第111期,1933年9月21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42页。

女参加经济建设方面，他强调：“有组织地调剂人工与推动女子参加生产，是不可分离的任务。”^① 还提出要使妇女获得解放必须使妇女拥有土地，妇女解放的关键在于阶级解放。在妇女运动的具体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妇女的主动性，发挥法律的保障作用，注重妇女人才的培养。他深入中央苏区的寻乌、才溪乡、长冈乡等地做了具体调查和动员工作，写出《寻乌调查》《才溪乡调查》《长冈乡调查》等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在才溪乡召开的妇女代表座谈会上，他详细调查了革命后的生产、生活情况，强调在生产中要把妇女很好组织起来，教会妇女犁田、耙田、蒔田，会后各乡要成立生产教育组，专门学习耕耘技术。^② 毛泽东在实践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基本理论和中央苏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著名论断，为中央苏区妇女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撑，为苏区妇女的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胸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优秀妇女干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多次发表有关如何开展妇女运动的宣传文稿，提出很多指导性意见，为中央苏区妇女的解放作出了出色贡献。蔡畅，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为了调动妇女们的生产积极性，打破“妇女犁田遭雷打”的封建迷信思想，率先垂范，亲自向老农请教，学会了犁田、耙田等多种农活。在她的影响下，妇女们纷纷下地学习犁田、耙田等难度较大的体力农活，甚至连小脚女人都参加了生产活动。她们在蔡畅的领导下，开展了军鞋竞赛活动。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的一次做草鞋慰劳红军竞赛中，蔡畅做了7双草鞋，宣传别人做了38双；危秀英做了10双，宣传别人做了4双；谢鸣凤做了9双，宣传别人做了6双；黄长娇做了5双，宣传别人做了6双；陈得旭做了5双。^③ 对于未接受过教育的妇女，蔡畅还手把手地指导其写自己名字，比如江西兴国县妇女部部长李美群就曾得到蔡畅的指导。康克清为了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大力培养妇女干部，为土

①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② 张雪英：《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117页。

③ 阿陵：《三十万双草鞋慰劳红军运动的模范》，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130页。

地革命贡献力量。她还十分注重开展群众活动，在工作的地方广泛进行政治宣传，没收地主财产，分给穷人。在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秘书长兼妇女委员的邓颖超，关心、热心妇女工作，在《红色中华》第130期上发表了题为《怎样领导各省第一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的文章，强调要把代表大会开成广泛深入的战斗政治动员会，进一步提高广大妇女的革命积极性和竞赛精神，激发她们以实际行动完成党和苏维埃的每个战斗号召，努力为粉碎第五次反围剿决战做好充分准备。^① 1933年11月召开的各省女工农妇代表会的扩大会议上，邓颖超代表中央要求各级党政部门、工会加强女工农妇代表大会的领导，在妇女代表大会的基础上来动员劳动妇女，并要求把这一工作当作党的整个工作来看待。由于邓颖超的努力，在这次大会上，中共决定派代表检阅各省妇女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妇女运动的开展。蔡畅、邓颖超等妇女干部深入农村实践了解了当地开展妇女运动的阻碍和实际，针对具体现实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妇女干部，比如谢玉钦、李美群、谢佩兰、赖月明、曾碧漪、邓六金、危秀英、黄长娇、王泉媛、钟月林等，健全了妇女组织，从政治、经济、教育、婚姻等多方面发力，提升妇女地位，为广大妇女参与革命提供了现实条件。而他们领导妇女运动的实践和经验为其他苏区妇女运动提供了经验。

二、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独特之处

（一）重视开展戒烟运动

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以前，四川的社会治理是极其混乱复杂的。1918年四川开始进入防区制，各地军阀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连年混战抢夺地盘，造成地方财政濒临瘫痪，沉重财政压力又转嫁到百姓头上。从1912年到1933年，四川军阀混战共有470多次，算起来达到平均每月

^① 颖超：《怎样领导各省第一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红色中华》第130期，1933年11月29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央档案馆编：《〈红色中华〉全编》（整理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52~2453页。

两次，时间之久，次数之多，世所罕见。^① 连年战争导致民不聊生，残酷剥削使百姓苦不堪言。除了常见的苛捐杂税外，各军阀还在防区内普遍实行田赋“预征制”，且次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如川陕边区邓锡侯防区在1931年的田赋就已经预征到1961年。百姓的痛苦可谓是极重的。鸦片种植致使男子普遍染上鸦片瘾，男子体力受到极大损害，妇女成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土地革命战争以前，四川作为国内最大产烟区，鸦片种植在四川农业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烟毒残害四川男子。文献记载：“四川为特别产烟区，遍于省内，无地无之，农田被占，政府以烟款为主要税收，人民大半皆烟寇。”^② 受到鸦片种植暴利的诱惑，各地军阀普遍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成片的鸦片种植也致使川北男子吸食成瘾。鸦片的长期摄入使川陕边区男子无法从事家庭农业生产，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妇女必须承担起农业生产的重担。如果说中央苏区客家妇女不裹脚的原因是生计所迫，为了更好适应农业生产，那么川陕苏区妇女释放双足则是因为男子普遍染上鸦片瘾，导致劳动能力低下，她们被迫担负家里的主要劳动，但是她们仍然要遭到丈夫的打骂、婆婆的嫌弃。因此，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苏区后，立即开展戒烟运动，而广大妇女最拥护戒烟的号召，成为戒烟运动的急先锋。

（二）川陕苏区组建了妇女独立团

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相比，川陕苏区一大特色是成立了妇女武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第一支成建制的正规妇女武装，其成立原因是反六路围攻期间，川陕苏区面临的战争形势严峻，为了有效作战，保存军队实力，川陕苏区领导人积极动员广大民众参与革命以图合力消灭刘湘军队。广大妇女接到号召后，革命热情被点燃，要求直接参与战斗，形成了一股扩大妇女武装的热潮。为了便于军队领导，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成立妇

① 叶芳：《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研究（1932.12—1935.4）》，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14页。

② 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62页。

女独立团。妇女独立团在中共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川陕时期、长征途中以及西路军的岁月里,顽强战斗,英勇不屈,在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上,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① 为了增加妇女独立团的战斗力,川陕省委提议除了要对妇女独立团成员进行常规的政治教育外,还要着重妇女军事素养的培养。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大多是来自川陕苏区的农村妇女,在参军前她们大多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和养育儿女,可以说对军事技能和作战策略一窍不通。针对这种情况,中共要求每个入伍的女兵都要接受军事训练,遵守严格的纪律。每天早上,一旦起床号吹响,必须迅速起来整理内务,十分钟之内到指定位置早操,晚上还要点名。正如女战士杨清香回忆说:“每天天不亮的时候就要起来集合,整队,背上武器比赛爬山,比赛看谁爬的快。”^②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后,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军事能力得到较大提升,再也不是男战士讥笑的“样子兵”了。受过教育后的红军女战士很快就投入革命浪潮中,她们不仅参与支前运动,做好后勤保障工作,还拿起武器组成巡逻队,清剿川陕边区的土匪;组成护卫队,保卫川陕苏区后方的安全;组成运输队,为奋战在前线的红四方面军送弹送粮;组成生产队,为红军战士筹备物资和粮食;组成担架队,抢救战争前线的受伤士兵;组成宣传队,动员川陕苏区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红军进行革命。在妇女独立团中还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女革命家,如著名红军女将领张琴秋,她在川陕苏区推动了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建立,还倡议和建立了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唯一一所烈士陵园即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曾广澜曾带领妇女独立团保卫地方军政机关、清剿土匪、配合红四方面军主力作战等,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美名长存。百岁老人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在川陕苏区曾担任中共营山县委妇女部部长、妇女独立营营长,领导营山的妇女革命运动,对川陕苏区的巩固、发展作出重要贡

①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页。

② 杨清香:《妇女独立团主要负责保卫后方》,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132009。

献。^①虽然，妇女独立团最后在祁连山之战中失败了，但作为川陕苏区一支富有特色的妇女武装，妇女独立团是川陕苏区妇女运动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进程。

三、两大苏区妇女运动差异形成的原因

两大苏区的妇女运动既有相似性，又富有各自的特色。究其原因，大体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两大苏区存在地域差异。中央苏区位于江西的南部、福建的西部，以瑞金为中心。中央苏区地域大体上来说，和客家居住区一致。中央苏区妇女运动一大特色就是妇女主要成分是客家妇女。据相关资料记载：“中央苏区妇女成分构成主要为客家妇女，土著妇女和畲、瑶少数民族的劳动妇女，客家妇女人口比重大，大约占95%以上。”^②客家人作为汉民族中的一支特殊民系，因其历史源流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客家精神前文已经提到，此处不再赘述。中共充分认识到客家妇女这一群体的特殊性，深入农村做了大量调查。如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通过调查了解了客家妇女的生活现状和真实需要，从实际出发颁布相关解放妇女的条例，满足了客家妇女的需求，同时还结合客家妇女爱唱山歌等习俗进行扩红和战争动员，取得显著效果。而川陕苏区因所处地域不同又形成了自己的民俗民情，如前文所说，中共在川陕苏区结合具体实际动员妇女组织开展了戒烟运动，创立妇女独立团等。可以说，两大苏区的地域差异是两地妇女运动形成各自特色的重要因素。

其二，两大苏区妇女干部文化水平存在差异。妇女干部水平的差异造成两地妇女运动存在差异。两大苏区妇女干部的来源构成都具有“内外结合”的显著特点。即妇女干部的构成一部分来自本地培养的妇女，另一部分是外来的妇女干部。虽然说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中央能派遣的妇女干部人数较少，但中央苏区作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领域，具有

① 毕瑛涛：《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妇女运动与妇女工作的历史特点与分析》，《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② 舒龙：《客家与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特殊的地位，加之1933年，中共中央又迁到中央苏区，使中央苏区在获得外来女干部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与川陕苏区妇女干部相比，中央苏区外来妇女干部数量更多。其中，外来干部如蔡畅、邓颖超、周月林等人较早就参与社会活动，大革命期间就十分活跃。她们中有人还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如邓颖超是北京师范附小的教师，蔡畅去法国留过学等。她们在中国妇女解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理论指导，并对中央苏区的妇女运动进展进行了实际调查和研究，用理论指导实践，水平高、效果好。如周月林在长期从事妇女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了宣传群众，帮助基层妇女干部开展工作，她经常带队巡查，给下级妇女干部作报告，为文化水平低的妇女干部开展工作提供帮助。川陕苏区的妇女干部少部分是跟随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的，大部分是从本地劳动妇女中培养提拔起来的，如邹映兰、杨素珍等。她们以前未接受过系统教育，所学知识是通过苏维埃政府开办的夜校或识字班中学习而来，对革命理论缺乏系统认识，她们开展妇女运动的经验是一步一步摸索而来的。因此，比较而言，中央苏区在开展妇女运动方面，比川陕苏区更有经验，其理论化和规范化程度更高。

总之，川陕苏区与中央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大代表性苏区，对中共革命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两大苏区的妇女运动都开展得如火如荼，取得显著成效。中央苏区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苏区，在积极动员本地客家妇女参与革命的基础上，其妇女运动突出表现是规模大、理论性强，十分具有指导性和引导性；而川陕苏区则有机结合了川陕地域特色和实际，十分重视开展戒烟运动和妇女军事才能的培养，成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成建制的正规妇女武装——妇女独立团，别具一格。笔者在借鉴前人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法对两大苏区妇女运动的异同点及其存在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探讨。然而，两大苏区的妇女运动史内容丰富，涉及面极广，笔者毕竟学识精力有限，本章只是一次浅显的尝试，对两大苏区妇女运动的特色挖掘还不够深入，仅希望能够以此抛砖引玉，求教于同行专家，引起更多学者关注苏区妇女史的研究。

结 语

第一节 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历史定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川陕苏区高度重视妇女这支力量，十分关心和支持妇女运动。在残酷战争环境下，中共发挥政权的主导作用，通过革命纪念日和农历节令日动员，革命歌谣动员，媒介动员，会议动员，发布法令、文件、布告、条例、规定或斗争纲领动员等方式，采取普遍建立妇女组织、提升妇女经济地位、发展妇女教育事业、提高妇女参政度、婚姻自由的实践探索等五维路径，对广大妇女进行了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动员，使她们在政治地位、经济生活、婚姻生活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把她们的命运与红军和苏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政治动员主要通过中共在革命中创造的一套“党团——支部——组织——群众”的政治动员模式来实现。即中共将党、红军和苏维埃的宗旨、方针政策和各种有关妇女的方针政策通过各级党、团、工会、贫农团、乡苏代表会、妇女组织的支部逐级传达到乡苏一级的各种组织，并经他们用简单明了、群众易于接受的语言传达到该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又最终经该组织的成员传达到周围的妇女群众中去。这种动员模式有效地整合了乡村社会的各种资源，使革命政权和革命观念深入到广大妇女之中，激发了她们积极投身革命的热情，在革命中涌现出一批巾帼英杰，使之无论在扩红、生产、支前方面还是直接组织妇女武装方面，都发挥了潜

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向世人展示了巾帼风采。

其一，推进扩红运动。

川陕苏区的广大妇女是扩红运动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为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巩固和扩大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需要不断扩充兵源。在中共的政治动员下，广大妇女通过政治上、组织上的宣传动员，召集红军家属开联欢会，加紧优待红军家属等方式进行扩红运动。例如罗显德的母亲罗王氏是刘坪区尖包岭乡的妇女代表，她积极宣传党的“打富济贫”政策，动员15个妇女参加红军或苏维埃地方工作。^①苏区妇女都把动员亲人参军参战作为头等光荣的大事，她们将丈夫、父子、兄弟送到前线，有些是把全乡全村全家勇敢的男子都一齐送上前线，并鼓励他们英勇杀敌，报效党和苏维埃政府。因此，当时在苏区区域内出现了妻送郎、母送子、兄弟争当红军、父子同参军的动人场面。

其二，做好生产、支前工作。

随着战争的加剧，苏区青壮年男子都上前线去了，于是后方的大量工作就落到广大妇女群众的身上。

中共十分重视妇女在生产中的作用。在农业方面，妇女们在男劳动力缺乏的情况下，成了农村劳动生产的主力。她们积极参加春耕、秋收运动，担负起替红军家属代耕的任务。正是在中共的领导下，经过苏区广大妇女的艰苦努力，川陕苏区夺得了农业生产的丰收，保证了军需民用，从而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②显而易见，川陕苏区农业生产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广大妇女功不可没。

战争的消耗巨大，红军的供养主要靠苏区人民提供。在中共的领导下，川陕苏区妇女广泛参加革命斗争的各种组织，从政权机构到群团组织，从战斗组织到生产组织，参加的人数多、规模大。新剧团、医院、运输队、担架队、被服厂、地方赤卫军、少先队、童子团中女同志占有

① 罗显德口述：《尖包岭乡我家三人被害》，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通江党史资料丛书》第6辑（内部资料），1984年，第125页。

② 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页。

相当比例。省、县、区有妇女部，乡有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后改为女工农妇会），村里有妇女协会小组。各种各级妇女组织努力动员，把苏区广大妇女联系在一起，组成一支强大的后勤保障队伍。广大妇女以极大的热情支援前线，担负着侦察、站岗放哨、向导、兵运、宣传、运输、武装交通、担架、救护、后方警戒、巡逻、策反瓦解敌军士兵等各种工作。她们还为红军赶制军鞋、袜子、衣服和被褥，组成洗衣队、补衣队、慰劳队为红军战士们服务。其时有一首《我为红军补衣衫》深情地唱道：“我为红军补战袍，心甜哪觉五更寒。飞针走线寄深情，缝进穷人心一片。又避风雪又避雨，子弹见了也转弯。”^①

其三，积极参军参战。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组建的妇女独立团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成建制的正规妇女武装。关于这支妇女武装，本书第五章作了详细探讨，其主要结论是：木门会议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妇女独立营才明确建制和归属。在其成立前后，苏区所辖各地方存在大量不脱产、半脱产、脱产的妇女独立营、连等妇女武装。红四方面军旺苍扩编后，只存在妇女独立团一团、二团，并没有妇女独立师的番号。1936年3月，炉霍军队整编，妇女独立团的编制被撤销。会宁会师后，成立的妇女武装叫妇女独立团更能体现与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时期成立的妇女独立团的承继关系。石窝分兵会议后，总部决定将集中在石窝一带的女同志全部编入妇女独立团，隶属于张荣支队。妇女独立团主要职位均由总部直接任命、组织派遣，团、营干部基本上是跟随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苏区的干部，连排干部和战士则以通南巴籍为主。妇女独立团进行了政治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女战士们更多的是通过执行内防任务，担负各种战勤任务，大造革命舆论、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等艰苦繁重的工作以及直接配合主力部队参与前线战斗等方式来实现对革命的体验，其女性性别意识与革命之间维持某种平衡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① 《我为红军补衣衫》，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征编委员会编：《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6页。

因此，从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和战勤工作的角度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川陕苏区妇女是“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但是，在充分肯定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效果和作用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不断的战争及随之而来的进退，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导致川陕苏区地域的“变定不居”，这也就决定了中共在川陕苏区对妇女的政治动员必须围绕着支持战争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也正因如此，直到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苏区之时，反复反思、摸索经验和逐步行进，成了中共在妇女运动中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特征。

传统乡村社会是一种相对稳定且复杂的社会结构，政治逻辑在这里并不能完全取代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而结成的传统乡村情感，导致了在中共革命进程中政治动员策略与实践之间存在着落差，加之，中共选择的上述政治动员路径的时间是短暂的，因此，从实践上看，川陕苏区的妇女解放离文件上的宣言还有一定距离，特别是传统习俗与社会关系的改变，例如婚姻习俗的彻底改变，非凭借中共的单向努力而能毕其功于一役，仍需要逐步渐进，经历一段时期的过渡与消融才能实现。

另外，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在政治动员的紧张节奏中，妇女解放很大程度上服从于革命需要，女性空间的营造多依赖于革命活动。对此，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很明显的，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①

总之，在战时条件下，中共在川陕苏区对广大妇女进行政治动员的方式、路径选择总体上看还是反映着依靠、发动妇女群众的立场，也使女性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得到充分彰显。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② 川陕苏

① 毛泽东：《妇女们团结起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

区妇女在较短时间里获得解放，在经济上有了更多自主权和支配权，在政治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在文化教育上得到了与男子同等享受教育的权利，在组织上有了自己的团体，在法律上婚姻自由有了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川陕苏区妇女很大限度地实现了自身解放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良性互动，成为地位上升最快的群体，并在革命中展现出伟大力量。

第二节 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现实启示

川陕苏区妇女是革命的重要力量，中共在川陕苏区根据当地妇女的实际情况，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开展妇女运动的伟大实践，推动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使川陕苏区广大妇女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并对川陕苏区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这一伟大实践丰富了我国妇女运动的时代内涵，也为新时代中国妇女工作的高效开展留下了宝贵的现实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妇女工作，妇女事业取得历史性新成就，广大妇女进一步实现平等发展、全面发展，展现了“半边天”的别样风采，创造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光辉业绩。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我国妇女事业发展与新时代新要求新期盼相比，还面临不少挑战。比如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有待深入落实，一些落后陈腐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依然存在，妇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基层地区妇女的民生保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保障妇女权益的法治建设需要持续推进，等等。^① 这些情况表明，促进妇女事业全面发展的工作决不能削弱放松。在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积极保障妇女权益和创造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国际环境。”^②

① 李克强：《在第六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1日。杨昊：《推动妇女儿童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21年10月25日。

② 《习近平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并发表讲话 强调要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人民日报》2015年9月28日。

新时代开创妇女工作新局面，推动妇女事业迈上新台阶，既要铭记历史的经验，也要牢牢把握以下几个基本要求。

一、必须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坚持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

中共在川陕苏区开展的妇女运动，使川陕苏区广大妇女摆脱家庭束缚，积极走上革命道路，为川陕苏区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共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论指导下，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并在实践中一步一步落实，助力了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求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基本观点。^① 川陕苏区广大妇女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把自己的命运与革命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到妇女解放运动，成为推动妇女运动的主体力量，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实妇女发展的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妇女发展的客观实际、社会关系的和谐需求、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集中体现^②，也为促进新时代妇女全面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③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进一步加强党对妇女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写入党的十八大、十九大、

①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最核心的理论意义是从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双重层面，确立了分析解决妇女问题的科学方法，即始终是在社会物质生活的现实中把握性别压迫的存在本质与变化机制，始终是以“永恒发展”与“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妇女解放过程中不断产生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始终把改造不平等的父权世界与构建两性平等和谐的伙伴关系当作自身首要理论任务。潘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内涵精髓与当代价值》，《光明日报》2019年3月8日。

② 潘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内涵精髓与当代价值》，《光明日报》2019年3月8日。

③ 马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的特质》，《光明日报》2019年3月8日。

二十大报告，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和内容。建立完善人大立法保障妇女权益、政协协商推动妇女事业发展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政府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工作机制，强化妇联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桥梁纽带的工作机制，为妇女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和制度机制保障。推动完善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把促进妇女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把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同促进妇女全面发展紧密融合。^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妇女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妇女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一是保障妇女权益的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我国形成并完善了以宪法为依据、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 100 多部单行法律法规在内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2020 年颁布民法典，明确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增加防止和制止性骚扰等条款，进一步提高了妇女群体的保护水平。^② 二是妇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半边天”作用更加凸显。近年来，我国更加重视促进男女平等就业，推动妇女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建设的热情更加高涨。三是妇女政治地位显著提高。据统计，2017 年，全国党政机关女干部人数达到 190.6 万，占干部总数的近 30%。2018 年全国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中，女性比例为 22.2%。2019 年，女党员占党员总数的 27.9%。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 24.9%，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女委员占委员总数的 20.4%。四是妇女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男女受教育差距进一步缩小。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中女生占比为 51.7%。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数占研究生总数的比重达到 50.6%。随着多层次、多渠道的女性人才培养体系逐步建立，我国女性科技工作者已增至约 3600 万人，占比近四成，是我国科技大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 70 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人民日报》2019 年 9 月 20 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人民日报》2021 年 8 月 13 日。

五是妇女健康状况得到极大改善。2018年，全国共有妇幼保健机构3080家、妇产医院807家、妇幼保健工作者近64万人，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的10个国家之一。实施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检查项目，将宫颈癌和乳腺癌纳入国家大病救治范围。^①六是妇女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七是妇女在家庭文明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70%以上妇女参与家庭重大事务决策，越来越多的妇女平等分享家庭资源，越来越多的夫妻共担家务、平衡家庭和工作，男女两性家务劳动时间差距逐步缩小。八是妇女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中国妇女事业实现了引领全球妇女发展的历史性飞跃，目前我国已与145个国家，429个妇女组织、机构以及联合国相关组织和专门机构保持友好交往。^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这是实现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正确道路。”^③大量客观事实与翔实数据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妇女发展实际的唯一正确道路，新时代中国妇女工作的深入开展，必须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党要积极引领广大妇女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以党的奋斗目标为共同追求，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人民日报》2021年8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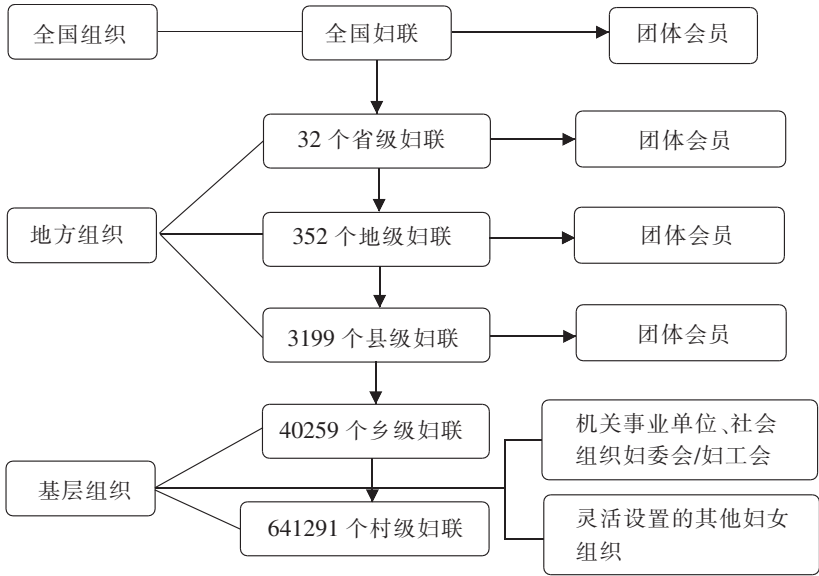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

③ 《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发挥我国妇女伟大作用》，《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日。

二、建立健全妇联组织，充分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

建立和完善妇女组织是保障妇女权利的重要途径。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和艰难的环境，中共在川陕苏区十分注重发挥妇女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各级各类妇女组织在革命中的作用，多方面保障妇女权益。

当前，妇联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是各族各界妇女为争取进一步发展而联合起来的群团组织，拥有政治地位的合法性和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化渠道。妇联组织有着统筹城乡、纵横交错、条块结合、立体开放的组织网络。依托党和政府的行政架构，从全国、省（区、市）、市（地、州）、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六级组织，每一级都建立了妇联组织，为妇联充分发挥沟通上下、联系左右的牵头协调职能创造了广阔空间。^①



妇联组织体系结构图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 70 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人民日报》2019 年 9 月 20 日。

^①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人民日报》2018 年 11 月 9 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党的妇女工作事关团结占我国人口半数的妇女群体，广大妇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我们要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新时代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努力实现各方面男女平等，激发妇女参与社会治理活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妇女走在时代前列，在新时代各项建设中发光发热。”^① 一直以来，妇联组织根据不同时期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依照章程，积极履行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基本职能，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凝心聚力、建功立业，为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历史性贡献，成为党开展妇女工作最可靠、最有力的助手。党的十八大以来，妇联组织通过改革创新，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妇女，有效开展引领、服务、联系妇女群众工作，^② 更是成为党开展妇女工作的“坚强阵地”和妇女群众的“温暖之家”。^③ 比如，近年来，妇联组织推动并参与反家庭暴力法、“全面两孩”配套措施等法律政策的制定修订。^④ 又如，近年来，妇联组织大力开展“巾帼脱贫行动”，积极探索“连环扶贫”“小额信贷扶贫”“基地+贫困妇女”等扶贫模式，助推妇女精准脱贫。各级妇联在贫困地区创建了2万余个妇字号基地，带动近500万名贫困妇女发展增收，成为乡村振兴事业的重要力量。妇联组织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发挥妇女优势，建设地方特色产业，以掌上手机连接广大市场，利用网络电商、农产品直播等方式，帮助农村妇女实现脱贫增收。^⑤

在新时代，为了更好地维护妇女权益，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妇联组织，创新工作方式，充分发挥其桥梁与纽带作用。

① 《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 组织动员妇女走在时代前列建功立业》，《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

③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人民日报》2018年11月9日。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平等 发展 共享：新中国70年妇女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

首先，要主动适应网络智能社会的发展。中国正处于新发展阶段，同时也是信息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系列变化对妇联组织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信息智能技术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女性通过互联网和现代通信工具获得学习的机会、沟通的渠道和信息服务。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妇联组织在开展妇女工作时，要积极适应智能信息社会的发展，创建与之相匹配的新的妇女工作方式。

其次，要注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当今世界，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举措。中国自身的发展不仅对中国广大人民，同时对全世界人民来说也是有益的。因此，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的新征程中，妇联组织要在组织形式、工作内容、秉持理念等方面注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而成为推动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力军”。

第三，要夯实党执政的妇女群众基础。妇联组织要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关心关爱城乡低收入妇女、进城务工妇女、农村留守妇女、老年妇女、残疾妇女等困难群体，实施好巾帼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开展好寒暑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积极地引导广大妇女参与现代化建设。通过实打实的排忧解难，使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更畅通、纽带更稳固。

三、开展高效的妇女教育，提高妇女的整体素质

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往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妇女教育既是实现男女平等、促进社会和谐公平的关键，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就注意到开展妇女教育的重要性，曾提出：“必须将苏维埃的理论和实际，经过苏维埃学校、训练班、读报会、识字班、戏剧、画报等，使广大群众了解。”^① 妇女想要获得彻底解放，在政治上、经济上与男子做到真正的平等，首先需要有过硬的自身素质。中

^①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

共在川陕苏区开展妇女工作时，就十分注重提高妇女自身素质，从政治思想、文化素养、劳动技能等多方面着手，增强妇女自信心和实践能力。中共在川陕苏区针对妇女实际情况开展的妇女教育，尤其是开办识字班、读书班和夜校等有效地配合了革命战争的发展。妇女识字明理，就能够有效地参与苏区政治生活，这是实现妇女政治平等的关键一步；妇女掌握了更先进的劳作技术，就能够更有效率地进行农业生产，逐步获得经济独立，提高其家庭和社会地位。虽说川陕苏区妇女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革命战争等客观现实限制，但总体来看成效颇大。

新时代妇女教育虽较以前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然存在些许问题，如教育水平发展不平衡，偏远山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妇女难以得到平等教育，尤其是农村妇女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等。针对这些问题，要在借鉴川陕苏区妇女教育的成功实践基础上，结合当代我国农村妇女教育的实际，因地制宜地对妇女开展高效的教育，如针对欠发达地区和偏远山区，国家应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帮助其完善相关妇女教育体制等。

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引导广大农村妇女学习新的知识技能，促进妇女就业，也成为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如在新疆的南疆四地州建立的培养妇女美容美发技能“靓发屋”，帮助近 5000 人就业；贵州的“锦绣计划”通过企业帮扶和网络平台宣传，搭建起妇女创办特色手工企业，帮助妇女就业；在内蒙古蓝旗村，村主任曹桂梅带领农村妇女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通过与技术部门的合作开展技术培训，培养了一批种养女能手，带领妇女增加家庭收入。农村妇女学会新劳动技能，在特色养殖、乡村旅游等方面大显身手，不仅实现了妇女的经济独立，还大大地提升了农村的生产力。

在促进妇女整体素质全面提升的过程中，还要特别重视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重视女干部培养选拔工作。要通过召开专题会议、制定政策文件、明确目标要求等措施，持续加大培养力度，不断提高女干部和女党员比例。拓宽妇女干部的来源渠道，提升妇女干部对妇女事业全面发展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只有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素质高、本领强的妇女干部，在妇女群体中起到带头作用，才有

利于妇女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四、注重性别特点，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中共在川陕苏区为保障女工的权益颁布了相关法令，规定“女工与男工应得同样工资！女工不做粗重、妨碍身体的工作和夜工！……女工月经五天内停止工作，工资照给！”^① 这种对妇女生理特点的关怀，为新时代妇女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女性和男性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广大妇女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条战线展现巾帼风采、贡献巾帼力量。然而，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妇女事业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一些落后陈腐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依然存在，城乡、区域间妇女发展仍不平衡，基层地区妇女保护和服务资源相对匮乏，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现象时有发生。^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发展妇女事业、做好妇女工作的重大意义，加大重视、关心、支持力度，严厉打击侵害妇女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维护妇女权益。”因此，在新时代妇女工作实践中，应该坚持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尊重妇女的主体地位，了解妇女需求，关心妇女疾苦。国家在这方面已有探索 and 关注，如国家 2019 年发布《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提出不断加强制度、政策和服务保障，力争让每一位妇女儿童都能公平可及地享受到妇幼健康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章专章规定对女职工的特殊保护，比如第七章第六十条规定：“不得安排女职工在经期从事高处、低温、冷水作业和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③ 各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和当地现实情况，制定相应的保护妇女身心健康的政策，加强妇女的健康保障。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充分

① 《妇女斗争纲领》，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6 页。

② 李克强：《在第六次全国妇女儿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11 月 21 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本书编写组编：《劳动合同法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汇编》，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6 页。

考虑两性的现实差异和妇女的特殊利益，从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妇女生命健康权保护等方面细化法律法规，切实优化妇女发展环境，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

五、突出妇女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 充分发挥其“半边天”作用

中共在川陕苏区十分注重调动妇女的积极性，从政治、经济、文化、婚姻等多方面发力，改善了妇女的现状和悲惨遭遇，把妇女从传统观念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妇女从男人的附庸逐渐走向独立，撑起了革命事业的“半边天”。如“万源县玉带乡佃农的女儿邹映兰，在中共的积极动员下，与父亲一起投身革命，宣传鼓动白军一个排向红军投降，后还被选为县苏维埃的妇女部长。”^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在各行各业书写着不平凡的成就。”^② 在决战脱贫攻坚战场的“她奉献”，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的“她力量”，在重大科技攻关前沿的“她智慧”，在社会服务各领域的“她精神”，新时代的中国女性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四自”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以执着、坚韧、严谨和奋斗诠释巾帼担当。

在推进妇女事业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必须突出妇女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其“半边天”作用。为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③

一是促进妇女平等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逐步提高女性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比例，大力推动基层妇女广泛参与协商议事。

二是完善妇女权益保障制度。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检察机关积极

① 中共万源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巴山英烈传》，四川师范大学电子出版社2016年版，第55~65页。

② 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日。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人民日报》2021年9月10日。

探索开展相关领域公益诉讼，不断提高参与立法决策的女性比例。

三是保障妇女人身权利。倡导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的新型家庭文化。预防和制止针对妇女的一切形式家庭暴力。提升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法律意识，有效遏制针对女性的性骚扰。保护妇女免遭网络违法犯罪行为的侵害。

四是保障妇女财产权益。保障妇女在家庭关系中的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保障妇女对婚姻家庭关系中共同财产享有知情权和平等处理权。保障农村妇女平等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不动产权益，平等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征用安置补偿权益。

五是保障妇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依法保障女性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及高等教育的权利。数据表明，当前全国科技工作者中女性占比约 45.8%，但专业技术职务越高，女性占比越少；2019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女性占比分别为 6% 和 5.3%。^①要从阻碍女性科技人才成长发展的“难点”“堵点”“痛点”出发，制定一系列更为合理、更为公平的具体措施，提高女性科学素养，培养女性科技人才，为女性终身学习提供支持。

六是保障妇女平等就业权利。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将就业性别歧视问题纳入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之中。坚决纠正查处发布含有性别歧视内容招聘信息的行为，对涉嫌就业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开展联合约谈。在政策、培训、服务、保障等方面综合发力，促进妇女平等就业。聚焦女大学生重点群体，进一步完善女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支持举措。

七是促进工作场所性别平等。用人单位建立健全劳动就业、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生育保护以及帮助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预防和制止职场性骚扰等工作场所性别平等制度机制，推动建立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支持和帮助女性实现家庭和工作的平衡。

八是缓解妇女的家庭育儿负担。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着力补齐农村地区和城市新增人口集中地区资源短板，进一步完善普惠性学前教

① 赵永新：《展示出“巾帼不让须眉”的创新实力》，《人民日报》2021 年 8 月 30 日。

育保障机制。加强中小学课后服务，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九是保障妇女享有卫生健康服务。加大妇女常见病防治力度，完善宫颈癌、乳腺癌综合防治体系和救助政策。探索开展青春期、育龄期、孕产期、更老年期保健专科服务，提供妇女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巩固母婴安全五项制度，确保全国孕产妇死亡率持续稳中有降。加强符合妇女需求的母婴室、卫生厕所建设。

十是关心关爱困境妇女。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建立常态和非常态相结合的特定群体权益保障机制，确保低收入、残疾、患重病、留守、单亲母亲等困境妇女享有相应的权益保障，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救助和关爱服务。

另外，要坚决落实《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从健康、教育、经济、参与决策和管理、社会保障、家庭建设、环境、法律8个领域提出的75项主要目标。^①

总之，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把中国发展进程同促进男女平等发展的历程紧密融合，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妇女民生，推动新时代妇女工作守正创新发展，不断丰富妇女事业发展的时代内涵，更好激励亿万妇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②

行文至此，重构川陕苏区妇女运动的精彩场景的任务就过程而言已经暂时告一段落。然而，“历史的回廊是如此曲折，个人的认知又是如此有限，因此，过程的完成远远不意味着认知的终结。”^③ 笔者愿意将此论题作为以后进一步深挖的方向之一，为深化中共党史相关研究付出自己的努力。

① 《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人民日报》2021年9月28日。

② 本报评论员：《谱写新时代中国妇女事业发展新篇章》，《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

③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9页。

参考文献

一、报刊、档案资料

《红色中华》

《斗争》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解放军报》

《国闻周报》

《四川日报》

《成都日报》

巴中市档案局藏“红色档案”

二、史料汇编

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边区川陕边区史料》（内部资料），1954年。

黄自敬：《川陕区革命根据地资料选辑》，《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内部资料），1978年。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1979年。

四川省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石刻标语选编》（内部资料），1979年。

四川大学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四川省通江县现代革命史资料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1辑（内部资料），1981年。

四川省妇联达县地区办事处编：《达县地区妇运史资料选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部份）》（内部资料），1982年。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共通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通江现代史资料选》第2辑（内部资料），1982年。

林超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2年。

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共宣汉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宣汉党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1983年。

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选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中央档案馆、四川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年—1927年）（内部资料），1984年。

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通江党史资料丛书》第6辑（内

部资料)，1984年。

中共宣汉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宣汉党史资料》第5辑（内部资料），1985年。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苏区革命历史歌谣》，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苏区教育史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1985年。

中共平昌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川陕苏区平昌县历史文献汇编》（内部资料），1986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9—193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杜中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中共酒泉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1）（内部资料），1987年。

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军需工厂简介（1927—1949）》（内部资料），1988年。

李树棠编著：《川陕革命根据地粮政史长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金昌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金昌文史》第3辑（内部资料），1989年。

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川县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内部资料），1990年。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年版。

盛继红编：《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共宣汉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宣汉党史资料》第 10 辑（内部资料），1991 年。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

张掖地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张掖地区文史资料》第 1 辑（内部资料），1999 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 9 辑（内部资料），1999 年。

民政部法规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规大全》，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

中共宣汉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宣汉党史资料》第 16 辑（内部资料），2003 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8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张挚、张玉龙主编：《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三、口述资料、回忆录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战士出版社 1987 年版。

王宏坤：《我的红军生涯》，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编：《豪情忆征程》，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编委会编：《巴山烽火：川陕革命根据地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北京部队红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编写组编：《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星火燎原丛书之五：女兵回忆录专辑》，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生产历史回忆资料（1927—1949）》（内部资料），1990 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

四川省妇联编：《巴蜀巾帼壮歌——红四方面军女战士革命斗争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我的长征——寻访健在老红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

李芝兰编著：《巾帼壮歌——川陕苏区女红军纪实》，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 年版。

郝成铭、朱永江主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张云逸、杨至成等：《星火燎原·未刊稿》第 2 集，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版。

四、著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蒋方震：《新兵制与新兵法》，商务印书馆 1945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内部资料），1979 年。

温贤美：《川陕革命根据地英烈传》，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

瞭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传》，新华出版社 1986 年版。

温贤美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论丛》，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菡子主编：《女兵列传》第 3 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年版。

郭际富、向思第、赵宗映纂辑：《通江苏维埃志》，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

四川省通江县卫生局编：《通江卫生志（1912—1935）》（内部资料），1988 年。

唐敦教主编：《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

瞭望编辑部编：《红军女英雄传增补本》，新华出版社 1989 年版。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春秋出版社 1989 年版。

王虹生等主编：《工青妇大辞典》，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0 年版。

《妇女词典》编写组编：《妇女词典》，求实出版社 1990 年版。

中共南江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南江斗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洪荣华、王明渊、朱宗玉主编：《红色号角：川陕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朱广振、周桂英编：《浩气壮河湟——西路红军在青老战士》（内部资料），1991 年。

王沪宁：《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蒲龙：《川陕苏区钱币》，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报业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社 1996 年版。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张静如、梁志祥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第 3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王政、杜芳琴：《社会性别研究选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范青、陈辉汉：《陈昌浩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中共巴中市委党史办编著：《红军在巴中》（内部资料），2002 年。

李小江：《让女人自己说话：亲历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李小江：《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赣南红色旅游》编写组编：《赣南红色旅游》，红旗出版社 2005 年版。

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版。

中共通江县委党史办研究室编：《通江苏维埃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徐彬：《前进中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1921—1966）》，新华出版社 2007 年版。

何光表：《川陕苏区的妇女状况》，作家出版社 2007 年版。

张雪英：《中央苏区妇女运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中国共产党平昌县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平昌县历史（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王焰安：《红色歌谣》，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艾芜：《艾芜全集》第 17 卷《日记（1963—1965）》，四川文艺出版

社 2014 年版。

彭俊礼主编：《通江女红军》，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年版。

赵俊清：《李兆麟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王志雄：《川陕苏区宣传工作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年版。

钟日兴：《乡村社会中的革命动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耿化敏：《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史（1921—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胡军华：《异军与正道：对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李健：《川陕革命根据地党群关系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

〔德〕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上），陈韬译，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英〕道格拉斯·安斯利英译，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澳〕李木兰：《性别、政治与民主：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方小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美〕查尔斯·H·科茨、罗兰·J·佩里格林：《军事社会学》，北京大学国防学会译，国防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 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出版社 1980 年版。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2005 年版。

〔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陶宜、徐复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

五、论文

聂辉扬：《童养媳在现行法律上之地位》，《安徽大学月刊》1933 年第 1 卷第 3 期。

乔启民：《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长》，《东方杂志》1935 年第 32 卷第 1 期。

张之华：《排难创新的写照 不胜不休的记实——介绍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报纸》，《新闻研究资料》1981 年第 3 期。

沈果正：《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报刊》，《新闻研究资料》1987 年第 4 期。

〔美〕凯塞 L·M·瓦尔克：《中国共产党与中央苏区妇女运动》，曾成贵译，《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 年第 2 期。

屈德骞：《中国第一女团长张琴秋》，《党史天地》1994 年第 8 期。

吴小卫、杨双双：《中央苏区婚姻制度改革与妇女解放》，《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 年第 1 期。

邓均洪：《川陕苏区妇女武装产生的历史条件探》，《四川党史》1998 年第 1 期。

吴重庆：《革命的底层动员》，《读书》2001 年第 1 期。

林颂华：《中央苏区妇女问题初探》，《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2 年第 2 期。

李涯：《苏区妇女解放实践初探——以川陕根据地为例》，《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4 期。

黄道炫：《一九二〇—一九四〇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历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魏法谱：《论妇女在川陕苏区中的作用》，《沧桑》2007年第2期。

张玉龙：《中央苏区时期妇女教育略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12期。

张海鹏、赵庆云：《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

杨会清：《“红五月运动”的兴起及其运作模式（1921—1935）》，《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

李霞、尹士凤、邱祥莺：《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妇女解放运动》，《党史文苑》2009年第2期。

苗伟东、江静：《中央苏区农村妇女参政叙论》，《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1期。

李敏、陈宇：《川陕革命根据地党对群众团体工作的领导》，《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2期。

李敏、赵红梅：《论川陕革命根据地党对妇女的思想政治工作》，《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刘英华：《浅谈川陕苏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汤水清：《乡村妇女在苏维埃革命中的差异性选择——以中央苏区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1期。

祝秦：《川陕革命根据地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初探》，《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胡军华、唐莲英：《论中央苏区的妇女政治动员》，《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王强、李单晶、罗大明：《从红军长征路线申遗看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的历史贡献及时代意义》，《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1期。

陈雪涛：《川陕苏区的妇女解放与妇女歌谣》，《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何广华、何明圆：《妇女独立团武艺总教官何子友的烽火岁月》，《党史纵览》2014年第7期。

徐峰：《性别视域下川陕妇女的解放与革命——以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为中心》，《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5期。

徐峰：《剪发与革命：苏区革命妇女的身体政治史研究——以妇女独立团剃光头为例》，《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马建堂：《论川陕苏区时期的群众组织》，《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吴丹、雷志敏：《妇女武装在万源保卫战中的独特作用及原因初探——以妇女独立团为例》，《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马建堂、刘长江：《川陕苏区时期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钟日兴：《“政权主导”模式下的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16年第5期。

邓美英：《中央苏区妇女政治动员探析》，《苏区研究》2016年第6期。

何先成：《再论川陕苏区的戒烟运动》，《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何先成：《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详考》，《苏区研究》2018年第2期。

何先成：《匹妇有责：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对革命的体验》，《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

叶芳：《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研究（1932.12—1935.4）》，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郭璐：《论中央苏区妇女地位的演变》，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陈华：《中央苏区妇女社会生活的变迁研究》，赣南师范学院硕士论文，2008年。

李如英：《中央苏区妇女权益保障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何莉：《中央苏区妇女教育问题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黄文治：《鄂豫皖苏区道路：一个民众动员的实践研究（1920—1932）》，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沈婷婷：《川陕苏区女红军研究》，西华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胡军华：《异军与正道——以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为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吴丹：《川陕苏区妇女教育问题研究（1932—1935）》，四川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王景璐：《中央苏区妇女革命动员工作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